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文物中国史

4

秦汉时代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文物中国史

4

秦汉时代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物中国史·秦汉时代 /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3.12

ISBN 7-5440-2647-7

I. 文… II. 中… III. ①中国—历史—秦汉时代—普及读物

②文物—中国—秦汉时代—图录 IV. ①K209②K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4451号

《文物中国史》由山西教育出版社与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

文物中国史·秦汉时代

编者: 中国国家博物馆

出版发行: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迎泽园小区2号楼)

总责编: 王宇鸿 张金柱

责任编辑: 刘立平

助理编辑: 薛海斌

复审: 张金柱

终审: 王宇鸿

装帧设计: 孟 孟(香港)

排版制作: 陈先英(香港) 李秋云(香港)

责任印制: 林佳年(香港)

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万福工业区)

版次: 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全套定价: 800.00元

《文物中国史》编辑委员会

主任：朱凤瀚

副主任：李季 董琦

委员：王冠英 信立祥 孙国璋 高世瑜 王冠倬 刘如仲

编者：

史前时代：李季 安家瑗 孙其刚（绘图：郑婕）

夏商周时代：李维明

春秋战国时代：王冠英 韩钟

秦汉时代：陈成军 王永红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孙国璋 邵小萌

隋唐时代：高世瑜 胡晓建 梁丰

宋元时代：黄燕生 陈煜

明清时代：苏生文 王芳 李雪梅

编务：王永红 董青

前言

这部《文物中国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正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在读者阅读本书之前，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先向读者说明。

一、顾名思义，所谓“文物中国史”，是以文物为线索来讲述中国历史，这当然与一般主要依据文献史料讲述历史的著作不同。文物是历史文化遗存，每一件文物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历史的实物见证，或称物化的历史。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更真实地感受历史。所以阅读这部《文物中国史》，要比读一般的历史教科书更生动，对许多重要历史问题的体会也会更深刻、更切近真实，因而也更适合青年人阅读。这是我们编撰本书的原因。

二、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工作经验。所以，我相信读者读这部书，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这应该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当然，据我所知，类似的著作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日本都出版过，体例并非本书首创，但是由于本书作者们均具有博物馆专家、学者身份，故而本书在文物选择之得当与诠释之准确方面，应该是同类书很难达到的。

三、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我认为，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只能称为狭义的历史学，如何将其更好地与考古学相结合，使二者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双翼，这个问题虽已开始受到历史与考古学界的重视，两

种学科的交流、融合也不断产生着新的成果；但是目前大学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似仍未能充分重视从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个方面全方位地培养学生，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对于促进历史学科教学的发展，特别是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是有裨益的。

四、作为一部带有一定通史性质的著作，尽管是以文物为主述线索，仍需要有自己的科学的体系，使读者能够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较系统、较完整的过程。这是我们在确定这部著作体例时十分注意的。要保证体系的科学性，一个首要问题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本书没有采取以往较常用的以原始、奴隶、封建社会等经济社会形态名称划分中国古代史发展阶段的做法。这首先是因为这种较传统的划分方式，固然有其理论依据和合理成分，但近年来中国史学界众多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国古代经济形态的发展做了更深入的探讨，并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古代文明发展历程进行比较研究，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许多新认识。而且，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应是由各段社会形态特点的差异来决定的，仅以经济形态的一些变化来划分并以这些名称来概括也是不完全的。社会形态的划分，应综合考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中国古代社会长时间处于独特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中，其发展在总体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但同时又有许多自身的特点。鉴于中国古代文明作为世界几大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尤其是其从未间断过的悠久历史、广阔的地理分布，与在世界文明史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无疑应该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模式之一。所以，关于中国古代史科学的分阶段、分期问题应该从这一高度做更深入的研究。本书以分卷的形式，每卷包括中国历史上一个时段。虽然并非是对中国古代史做上述意义的分期，而只是从本书编撰方便出发设计的，分卷亦即分时段仍尽可能吸收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多年研究成果，充分考虑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以若干王朝相聚合为一历史时段，与纯粹的王朝体系是不同的。被归为同一时段亦即同一卷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社会结构及思想文化发展方面均大致有其可以区别于其他时段的特点。

五、本书虽带有一定的通史性质，但是是以典型文物为线索展开叙述的，文字也要求简练。这样就不可能在每一卷中都像通史著作那样，对政治、经济、文化及事件、人物等都叙述得那么系统、详备；而是要突出时代特色，在叙述清楚各时段历史背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基础上，注意选择本阶段中那些最能体现社会进展，对中国历史进程乃至对整个世界文明史有较大影响的内容展开叙述，并不要求面面俱到。希望通过这样的编撰方法，使读者能够在熟悉文物的同时，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基本内容有一个较清晰的印象。

六、作为以文物为线索来展述历史的著作，最理想的是所要叙述的每个重要史实，皆有典型文物来体现。本书虽致力于此，但显然难以完全做到。所以采取了如下方式，即凡史实能与文物结合、有典型文物表现的，即多着笔墨，以合乎本书之主旨；而无文物可表现之重要史实，则出于上述通史体例要求而必有所交代，但行文则略为简练。

说明了以上几点，相信会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的内容。专家、学者们一般都有体会，写稍普及的著作其实更难，既要专业知识用较通俗流畅的语言表述出来，同时又要准确、深刻，所谓深入浅出，实非易事。本书各卷作者致力于此，为能使读者满意，已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但不尽理想之处与疏误仍在所难免，我谨代表本书编委会与作者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教。

朱凤瀚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五日

目录



第一章 一统天下的秦朝 2

- 第一节 集权中央 2
- 第二节 整齐制度 8
- 第三节 巩固统一 16
- 第四节 周巡天下 20
- 第五节 秦末烽火 27



第二章 强盛的西汉 38

- 第一节 汉并天下 38
- 第二节 郡国并行 45
- 第三节 文景之治 54
- 第四节 武帝盛世 60
- 第五节 王莽改制 73



第三章 豪强统治的东汉 82

- 第一节 豪族大姓 82
- 第二节 衰颓晚景 92



第四章 秦汉周边民族 100

- 第一节 匈奴族 100
- 第二节 乌桓族和鲜卑族 106
- 第三节 百越 112



第四节 西南各族	118
第五节 西域诸族	131

第五章 秦汉经济生活	138
第一节 精耕细作——秦汉农业	138
第二节 部门齐全——秦汉手工业	151
第三节 丰富精致——秦汉衣食住行	168

第六章 秦汉科技文化	206
第一节 笔墨纸砚	206
第二节 天文、地学	212
第三节 医学保健	218
第四节 文学史学	224
第五节 乐舞百戏	227
第六节 宗教	238

第七章 秦汉中外关系	244
第一节 一衣带水——徐福东渡的传说	244
第二节 丝绸之路	247

参考书目	256
图片索引	258



文物中国史

中国国家博物馆



第一章

一统天下的秦朝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元代著名散曲家张养浩在其《山坡羊·潼关怀古》中的不朽名句。他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揭示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即不管封建王朝如何更迭，蒙受灾难的总是那些无辜的百姓。毋庸讳言，王朝存在和更替的历史作用，往往是建立在百姓痛苦的基础上。秦朝存在仅仅十五年，繁重的徭役、严酷的刑罚使百姓不断蒙受血与火的煎熬，但其历史作用却是任何一个朝代无法替代的。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最终兼并韩、赵、魏、楚、燕、齐六个诸侯国，建立秦朝，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开创了大一统国家的新时代。秦朝建立的一套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体制的基本模式。秦朝开创的各种制度及高度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对古代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外国人的心目中，“秦”就是“中国”的代名词。

第一节 集权中央

统一中国后，由于原来的国家组织机构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秦王嬴政就在原来政权机构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完善，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皇帝—公卿—郡县”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对后世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皇帝·诏·朕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踌躇满志，自感干出了一番空前绝后的大事业，认为是由于他兴兵诛灭暴乱，扫平六国，才使得天下安定，因此秦王的称号已经和他的地位、身分、功绩不相称，他要臣属为他另议尊号。

朝中大臣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以及博古通今的博

士们都认为：古代五帝时地方不过千里，诸侯外夷来朝或者不来朝，天子不能控制。如今秦王兴义兵，平定天下，这是上古以来不曾有过的功绩，连五帝都赶不上。他们认为古代有天皇、地皇、泰皇三皇，其中以泰皇最为尊贵，建议秦王嬴政改称泰皇。嬴政觉得群臣没有完全领会他的心思，所上尊号还不足以显示他显赫的功绩和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没有完全赞同他们的建议。经过一番考虑后，嬴政决定去掉“泰”字，保留“皇”字，再采用上古帝王的名号，自称“皇帝”。皇帝从此成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谓。皇帝称号确定以后，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幻想皇位永远在他一家传承下去。至今，在秦朝的很多文物中都留有皇帝称号广泛使用的痕迹。如嵌钉在权、量上的诏版用铜铸成，上面有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制度的诏文，其诏文中就记载了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后“立号为皇帝”的史实。秦二世即位后，又重新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附刻在秦始皇铜诏版后面，在诏文中，秦二世就称先皇秦始皇为“始皇帝”。

为神化皇权，秦始皇废除谥法，认为周朝以来君主死后，由臣属根据他的行为议定谥号，是子议父、臣议君，有损君父尊严。为表示皇帝与众不同，他同意王绾、李斯等人的建议，称皇帝所下的“命”为“制”，所下的“令”为“诏”，所用的印为“玺”，自称“朕”。以前“朕”字每个人都可以使用，从此却成为皇帝的专称。秦始皇还创立避讳制度，禁止臣下在语言和文字中涉及皇帝的名字。文件上逢“皇帝”、“始皇帝”等字句时，均需抬头，顶格书写。

为替新建的秦朝寻找理论根据，秦始皇采用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根据五德终始说，秦得水德，为此秦始皇制定了一系列与此相适应的制度：改黄河为德水；以



秦始皇像

十月为岁首，作为一年的第一个月；色尚黑，所以秦的礼服旌旗等都用黑色，黑色成为秦朝的流行色；度以六，即各种器物都用数六为度。1974年至1975年在陕西咸阳东郊秦1号宫殿遗址出土的空心砖砖面雕饰的龙纹，就是秦得水德的象征。1979年陕西咸阳发掘出的秦3号遗址壁画上的建筑和人物图案一般为黑色，就是这一制度在秦朝施行的证据。

二、封泥·三公九卿制·郡县制

中国古代在封缄公文或书信时，往往在简外加上一片被称作“检”的刻有小木槽的木片，用绳索将木片捆缚起来，在槽内捺上一块



龙纹空心砖

秦

1974年至1975年陕西咸阳市东郊秦1号宫殿遗址出土，长100厘米，宽38厘米，厚16.5厘米

空心砖始见于战国时期，西汉时期使用臻于极盛，主要用来建筑宫殿、官署和墓葬。此空心砖砖面饰龙纹，是秦得水德的五德终始说的反映。

湿泥将绳结盖住，再用印章在泥上打出印文。这种带印文的泥块被称作封泥，也叫泥封、艺泥。不要小看这些蕞尔之物，1995年陕西西安汉城出土的大批秦朝封泥，就为重新认识和证实秦朝的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将原来秦国的中央政府组织机构加以调整、改进和扩充，建立了一套在皇帝操纵驾驭之下、处理国家各类政务的三公九卿制度。秦朝的三公由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组成。丞相有左右两员，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为百官之长。太尉掌军事，不常置，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贰，掌管图书秘籍，监察百官。秦朝的九卿，实际数量不止于九，大部分是秦国原有的，少数是统一后新增置的。其中奉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典客掌诸侯及归附的少数民族的礼仪，廷尉掌刑狱，治粟内史掌谷货，宗正掌皇族宗亲内部事务，少府掌山河湖海税收和供皇室需要的手工业制造，中尉掌京师保卫，太仆掌皇

室车马。这些三公和九卿，四分之三以上可以在陕西西安汉城出土的封泥中找到其本官或属官。如与御史大夫有关的，有“御史之印”；与奉常有关的，有“奉□丞印”、“祝印”、“泰医丞印”、“都水丞印”；与郎中令有关的，有“郎中丞印”、“谒者之印”、“西方谒者”等；与太仆有关的，有“泰厩丞印”、“家马”、“上家马丞”、“中车府丞”；与卫尉有关的，有“公车司马丞”、“卫士丞印”；与典客有关的，有“郡左邸印”、“郡右邸印”；与治粟内史有关的，有“泰仓”、“泰仓丞印”；与宗正有关的，有“宗正”、“内官丞印”；与少府有关的，有“少府”、“少府工丞”、“泰医丞印”、“乐府丞印”、“居室丞印”、“左司空丞”等；与中尉有关的，有“武库丞印”、“都船丞印”，印证了《汉书·百官公卿表》的基本正确性。这些封泥还补充、订正了《汉书·百官公卿表》的某些缺误。如封泥中有“丞相之印”、“左丞相印”、“右丞相印”，这种丞相与左右丞相并存的现象，为研究秦朝实行三相制提供了依据。又如，郎中令的属官谒者为掌宾赞受事之官，

其类别情况历来不详，新发现的“西方谒者”封泥表明，秦朝谒者可能按方位各有职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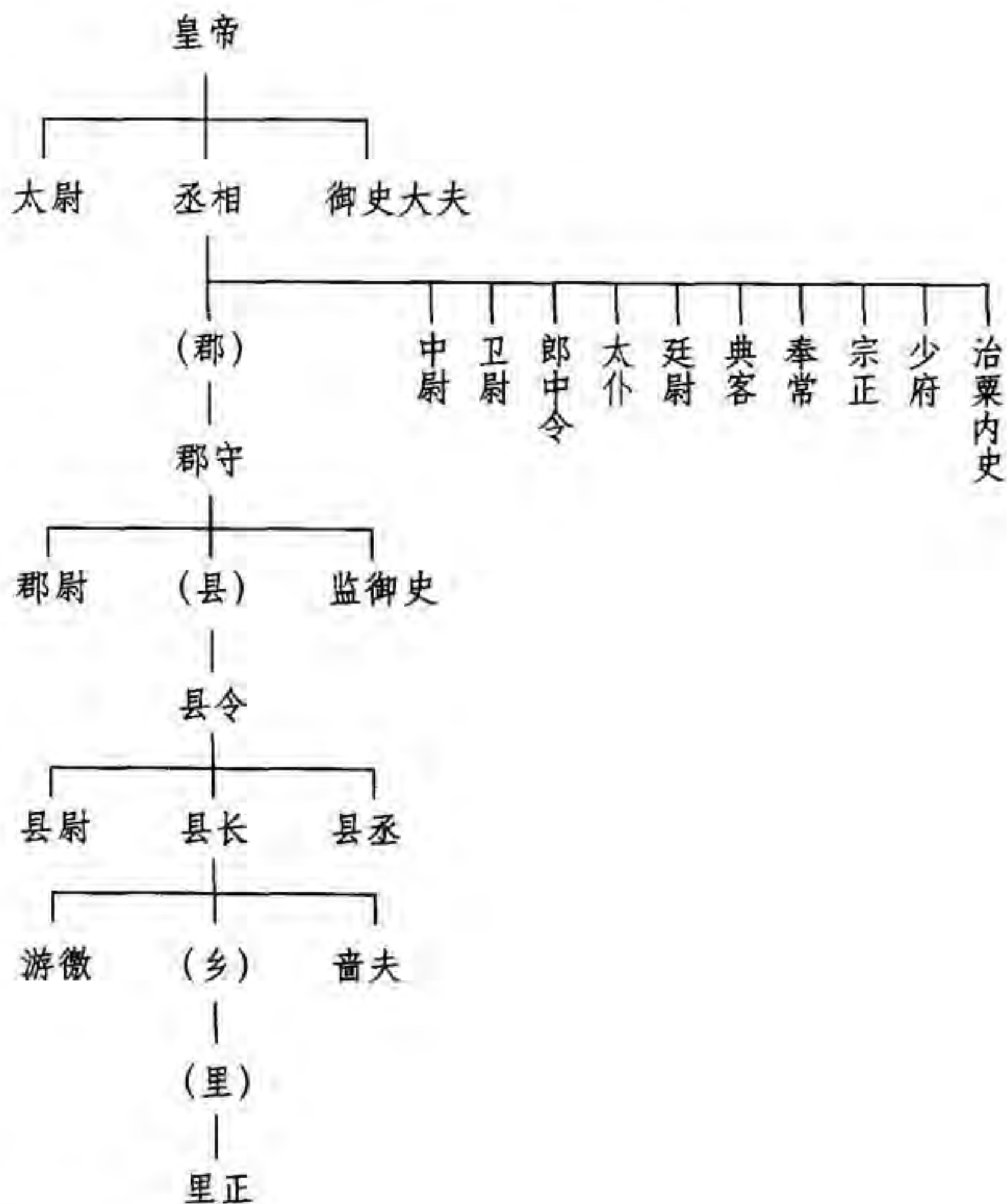
在议定皇帝尊号、初建封建朝廷后不久，秦始皇和公卿大臣们对于如何管理辽阔的国土，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分封与实行郡县制的争论。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一批大臣认为，关东诸侯国刚被消灭，而且燕、齐、楚的故地距离秦朝的统治中心又偏远，如果不分封秦始皇的儿子们去当国王，恐怕不便于统治。廷尉李斯认为西周初年分封的子弟亲属很多，传到后世亲戚关系却疏远了，相互攻击如同仇敌，兼并战争不断发生，周天子也无法控制，到现在才好不容易天下统一。他主张立秦始皇的儿子们和功臣为封君，用国家征收的赋税重赏他们，使他们富足尊贵，但不能封疆裂土。秦始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从前战争连绵不断，就是由于诸侯王的存在，现在天下刚刚统一，如果再实行分封制，只会重起战端，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他采纳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郡县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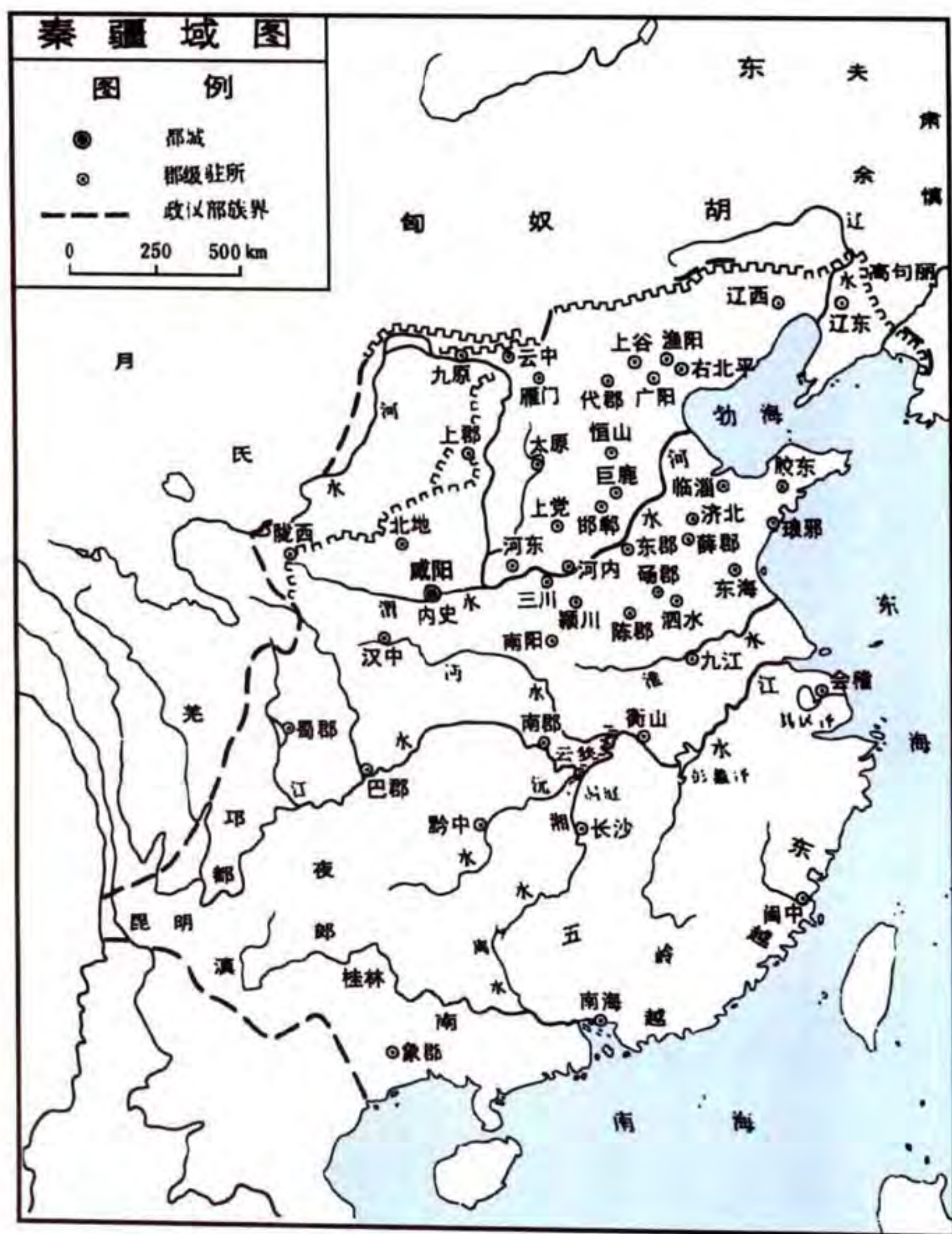
关于秦朝郡的设置过程、数目和诸郡的名称，谭其骧先生认为秦朝初年所置三十六郡为上郡、巴郡、汉中、蜀郡、河东、陇西、北地、南郡、南阳、上党、三川、太原、东郡、云中、雁门、颍川、邯郸、钜鹿、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碭郡、泗水、薛郡、九江、辽东、代郡、会稽、长沙、齐郡、琅邪、黔中、广阳、陈郡、闽中。随着对边远地区的开发和郡辖范围的调整，秦朝又先后增置了南海、象郡、桂林、九原、东海、常山、济北、胶东、河内、衡山、鄣郡、庐江等郡，总数可能达到四十八郡。2002年5月至6月，在湖南龙山里耶战国古城1号井出土的大批秦代简牍中还出现了“洞庭郡”、“苍梧郡”的名称，这说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郡的设置较历史记载要广泛得多。郡是秦朝地方最高的一级行政建制，其

行政长官为郡守。根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的“成都上恒书太守处”句和陕西西安汉城出土的秦封泥“□□太守”可知，秦朝郡守有时可称为“太守”。郡守统揽民政、司法、监察、财政、武事等，治民除邪、维护地方统治秩序是其基本政务。郡守之下设郡尉、郡监。郡尉辅佐郡守，并掌管军事；郡监负责监督百姓和地方官吏，其作用相当于中央的御史大夫。郡守、郡尉、郡监分职明确，与秦统一后中央政权的三公分权原则是一致的。

县或道是郡以下的一级行政组织。内地均设县，只有边地少数民族地区才设道，县和道是平级的。有关秦朝诸郡所属之县，由于史籍缺载，极为不详。陕西西安汉城所出封泥载有秦县40个，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

秦朝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示意图





秦朝疆域图

史地图集》所绘秦朝诸郡所属之县比较,相合的共计31个,该地图集未绘出的有阳陵、华阳、酆、翟道、西城、兰干、洛都等共9个。这些封泥所见县名,既印证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权威性,又弥补了该地图集的缺漏。县的最高长官为县令、长。秦制规定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县设县长。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县嗇夫”、“大嗇夫”,据研究是县令、县长的别名。县令、县长掌治其民,下设丞、尉作为辅佐。县丞辅佐令、长处理县内政务与司法。县尉负责军事、治安、征发徭役、管理士卒等事。秦朝县下辖若干乡。乡设三老、嗇夫、游徼。其中三老掌教化,属义务性质;嗇夫负责乡内主要行政事务;游徼负责社会治安。乡由里组成,设里正或里典。里之

下还有以十户编成的什和以五户编成的伍。

秦朝的三公九卿制度集行政、司法、军事、财政、监察等于一体,以较严密而严格的行政法规确定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各机构间既有细密的分工,又有彼此的协同,还有一定程度上的制约机制。三公互不统属,直接向皇帝负责。九卿既互相牵制,又互相配合,发挥各自的作用。秦朝的郡县制在一个地方集行政、司法、军事、财政、监察为一体,既系统又严密,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封建专制政体的要求,维护了国家统一,也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机构的基本模式和原则。通过建立三公九卿制度和施行郡县制,秦始皇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了高度的加强。

三、咸阳气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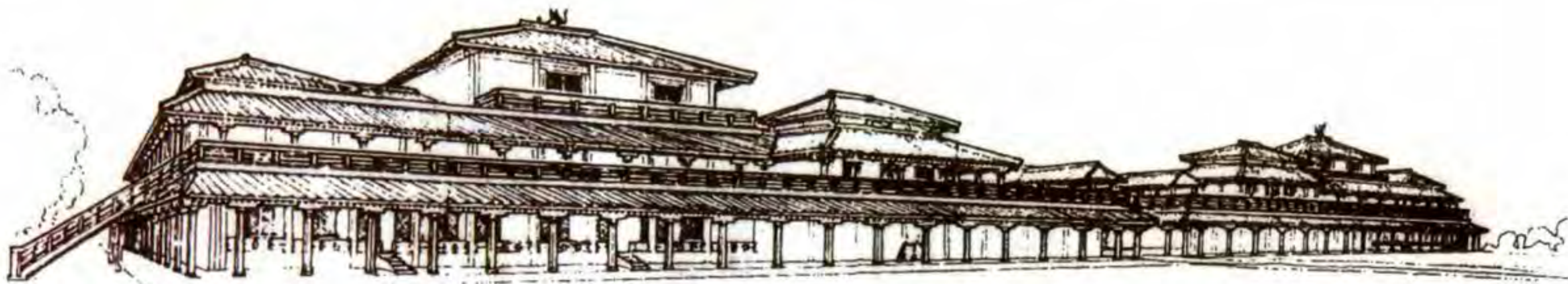
咸阳是秦人建立国家后最后选择的一个都城。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阳后,首先营造“冀阙宫廷”,开始了这座历史名城的奠基礼。阙在早期是立在宫廷建筑前面大道两旁的一对建筑物,君王常在这里出列教令,臣下常在此地待诏记事,是君权威严的象征物。今陕西咸阳市秦都区东北15公里的牛羊村和姬家道之间的原边上,有一对高台建筑基址,西侧为第1号遗址,东侧为第2号遗址,居高临下,俯视渭水,应该就是冀阙遗址。其中第1号遗址保存较好,1974年至1975年进行了发掘,是一座上下三重的建筑物。其底层围绕台基排列着七个单室(南五北二),出檐设廊;上层正中是主体居室,南临露台,北临空敞的榭,正门东通曲阁,可上阁道;主室东西两侧建卧室及盥洗室四间;顶层有四望的楼阁,人们可以借助扶梯拾级而上,室内地面呈暗红色,平整光滑而坚硬;墙壁上多有黑色壁带和壁画。壁画分两类:一是在粉底墨绘的条带上

由粉白的连珠组成几何纹样，或两色套绘作卷云纹；一是用墨、褐、朱红、湖蓝、橘黄绘为流云纹和四方连续的几何纹图案。室内设有冷藏食品的竖井和取暖的土炉，还有一套由倾水池、陶水道、渗井组成的供水、排水系统。整个建筑主室宽敞，回廊曲绕，露台平阔，冷暖自调，可居住登临，凭栏远眺渭河与南山风景，不同于战国以前和汉以后对称工整的阙式概念，具有宫观一样雄伟壮丽的规模。遗址北侧和东西两翼还有许多宫殿建筑遗址，表明冀阙宫廷是一个错落杂陈的群体建筑。以后，经过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和庄襄王五世近百年时间的营建，咸阳又跨越渭河向南发展。寝庙和皇家苑囿分列于渭南的东西两区，诸多宫殿建筑则以渭水为轴线，有如飞禽之两翼，南北伸展，横空而行。其中咸阳宫位于渭北，为秦国的政治重心所在。章台宫位于渭南，是秦王的重要朝宫，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动多在此进行，其遗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的高低堡子一带。此外，还有华阳宫、兴乐宫、六英宫、芷阳宫、长安宫、步高宫等。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咸阳都市，宫殿台观，阙庙苑囿，星罗棋布，蔚为壮观。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都城咸阳的建设置于整体规划的思路下，在帝王思想的支配下，采纳取法天象的设计指导思想，沿着北原高亢的地势，营造殿宇，并以这些殿宇为中心，殿门向四个方向伸展开来，有如天帝居处

的紫宫；滔滔东去的渭水穿过都市，恰似银河经天，划破无垠星空；河上横架飞桥，把南北的宫阙庙宇连接起来，犹如在满天星斗的苍穹里飞来的鹊桥使牛郎织女得以团聚。整个平面布局 and 空间结构洋溢着浓厚的神话色彩。据研究，咸阳宫殿的分布范围大致是以今陕西咸阳市塔儿坡起，沿着咸阳原（北坂）东北行，至泾、渭之交，折而向南，过渭河，斜穿西安市的东北郊和西北郊，再从三桥镇南的阿房宫遗址转往西北，北越渭河，返抵今咸阳市东郊。其中，咸阳宫位于渭北，为秦始皇扩建的重点工程之一，布局严谨，陈设华丽，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都在此进行，其具体位置大约在今咸阳市秦都区东聂家沟到刘家沟之间的咸阳原上下。六国宫室在咸阳北坂，为秦始皇融合和发展东方六国建筑形式和技术经验的产物，其具体位置大约在今咸阳以东的渭城湾到杨家湾之间的北原。兰池宫风景秀丽，其具体位置在今咸阳原以南沿杨家湾一带。信宫地处渭南，为前220年开始建造的一项巨大工程，原只是作为渭南暂宿的行宫，事实上却成为皇帝举行庆典、朝会群臣的大朝之处，后改称极庙，成为祭祀天神的礼制建筑。此外，还有望夷宫、宜春宫、曲台宫、阿房宫等。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咸阳集中了战国时代列国都城的精华，其壮丽繁华是此前任何朝代的国都无法比拟的，成为当时世界东方的一颗明珠，放射出独特的光彩。当时服役

秦朝咸阳宫1号建筑遗址复原透视图



于此的刘邦看到都城的繁华和秦始皇的威仪，不禁喟然长叹“大丈夫当如此”。遗憾的是，前206年项羽进入咸阳，在屠城之后纵火焚烧，宏伟的都城化为灰烬，举世闻名的都市就这样消失了。

第二节 整齐制度

除建立和健全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外，秦始皇还整齐确立了各种制度，其中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措施，促进了当时政治局面的统一和稳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曾称赞秦始皇“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指的就是他整齐制度时的魄力。

一、诏版·权

统一六国后，鉴于战国时期紊乱的度量衡制度给人们经济生活带来的不便，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颁布了统一度量衡诏书。诏书大意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天下，

百姓安宁，立下皇帝称号，下诏书于丞相隗状、王綰，把不一致的度量衡制度都明确地统一起来。秦二世即位后，再次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大意是：秦二世元年（前209），下诏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说，统一度量衡是秦始皇之制，后嗣只是继续施行，不敢自称有功德。现在把这个诏书刻在左边，使不致有疑惑。这些诏书有的直接刻在器物上，有的则刻在铜版上，嵌钉在铜、铁权或木量上。秦始皇的诏版曾在陕西咸阳遗址出土，嵌于权身的秦始皇诏版，曾在山西左云、山东文登等地出土。而秦二世的诏版至今只有传世品。

为保证统一的度量衡制度的推行，真正划一器具，秦始皇采取了很多措施。他规定每年二月对全国度量衡器进行定期检查，以保证计量器具的准确和统一。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工律》规定，县和工室（管理官营手工业的机构）由有关官府校正其权、斗桶和升，至少每年应该校正一次。本身有校正工匠的，则不必代为校正。这些器物在领用时就要加以校正。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内史杂》规定，贮藏谷物的官府需要进行称量



的，都应备有权、斗桶，以足用为度。这些器具应在官府中使用，不要借给百姓。当时不使用的器具，也要校正准确。秦始皇还以法律保证统一度量衡制度的推行，凡不按照国家规定标准行事，就按法律制裁。睡虎地秦简《效律》规定：衡石不准确，误差在十六两以上，罚该官府啬夫一甲；不满十六两而在八两以上，罚一盾。桶不准确，误差在二升以上，罚一甲；不满二升而在一升以上，罚一盾。斗不准确，误差在半升以上，罚一甲；不满半升而在三分之一升以上，罚一盾。半石不准确，误差在八两以上；钧不准确，误差在四



铜量

秦

椭圆形者长30.2厘米，方形者长24.3厘米，外壁均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是秦当年统一量器的标准器具。

方形铜量外壁所刻的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局部）

秦



秦始皇、秦二世双诏版(残)

秦

残高11.5厘米,宽13.4厘米
外壁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和秦二世元年补刻的诏书。



两以上;斤不准确,误差在三铢以上;半斗不准确,误差在三分之一升以上;参(三又三分之一升)不准确,误差在六分之一升以上;升

不准确,误差在二十分之一升以上;称量黄金所用天平砝码不准确,误差在半铢以上,均罚一盾。

陶量

秦

1963年山东邹县出土
高9.4厘米,口径20.4厘米,
容积2000毫升
外壁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这种陶量出土很多,均是秦当年统一量器的标准器具。





八斤铜权

秦

高5.5厘米，底径9.8厘米，
重2063.5克权身刻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
度量衡的诏书，并铸有阳文
“八斤”二字。

铁权

秦

1956年山西左云出土
高19厘米，底径26厘米，重
32.5公斤权腹侧嵌秦始皇二十六年统
一度量衡的诏版。铁权为迄
今出土最重的秦权。

大量文物证明，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尽了极大的努力实行统一度量衡这一措施。现存秦量多数为传世品，山东邹县、内蒙古赤峰蜘蛛山等地则有实物出土，多为铜质和陶质，铜量有方形和椭圆形，陶量多为圆桶形，其外壁大都带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部分带秦二世所颁袭用旧制的诏书。据实测，秦量主要有一升量、二升半量、三分之一斗量、半斗量、一斗量五种。当时兵卒的食量配给分五升、三升小半升（即三分之一斗）、二升半、二升、一升大半升（即一又三分之二升）五等。秦权除传世品外，在陕西西安、咸阳、临潼、宝鸡和甘肃秦安、山东文登、江苏盱眙、山西左云、河北围场、内蒙古赤峰等地均曾出土。这些秦权多为铜质，少数为铁质，偶为陶质，形如后世的秤锤，有的作瓜棱形，



均带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有的加刻秦二世元年的诏书；秦二世时制作的，则同时并刻两诏。权的重量单位主要有一斤、五斤、八斤、十六斤、二十斤、二十四斤、三十斤和一石权八种。从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可知，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统一度量衡的目标。西汉前期许多诸侯王纷纷铸造地方性货币，却不见另立的度量衡制度，如果不是在事实上已经实现了度量衡制度的统一并得到稳定，是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二、半两钱·《金布律》·《关市律》

在统一度量衡制度的同时，秦始皇还统一了货币，规定货币分为二等，黄金为上币，以镒（二十四两）为单位；圆形方孔的铜钱为下币，以重十二铢的半两为单位。

根据考古发现，秦朝半两钱与战国半两

钱一样，大小不一致。战国半两钱一般重六铢以上，以重八铢的居多。秦朝半两钱的重量有所减轻，平均重四至五铢左右。据研究，秦朝半两钱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可以内蒙古赤峰新惠长城窖藏出土的半两钱为代表，最大的直径为3.3厘米，最小直径为3.1厘米，最重为12.3克，最轻为10.2克。其大小、轻重虽然不尽相同，但字、文风格和铸造工艺却如出一范，均钱轮圆净，钱面平整，无上凸下凹如“蜂窝”者；书体方折，字形规范而书法秀丽，笔画粗细布白均匀；穿孔方正，边缘整齐，且铸口较窄。晚期的可以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郑庄石料加工厂、上焦村秦墓、鱼池村遗址、赵家背户村刑徒墓所出的600余枚半两钱为代表。从出土数量最多的鱼池村遗址540余枚中选出的钱币作出的实测数据可知，最大直径为2.83厘米，最小直径为2.64厘米，

半两铜钱及钱范

秦

此钱为秦始皇在全国通行的统一的货币。钱范为铸造半两钱的模具。



最重为6.01克，最轻为2.31克，显示了秦朝晚期半两钱有逐渐缩小的趋势。但铸造工艺、钱形字文与早期半两钱略同，均钱面平整，净边圆轮，书体方折，笔画方整秀丽。

秦始皇统一货币，不仅仅是简单地统一货币的形制、重量，还包括统一钱币的铸造和币制、币信。他专门立法，以保证货币的铸造、收藏和流通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有一简，记载“丙”与“丁”合伙盗铸钱币而被逮捕，并搜出用于盗铸的钱范（称“容”）一副。由此可知秦朝钱币由国家统一铸造，严禁私铸，否则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同地出土的《金布律》是有关钱币收藏、使用和流通的立法。该律文规定官府收入的钱币，都以一千钱装为一釜，釜外边必须用主管丞、令的印章封缄；不满一千钱的，也必须同样封印。不管钱质好坏，都必须装在一起，动用时先将印封呈献给丞、令检查封缄是否完好，然后才能启封使用。老百姓在使用中，不论钱质量好坏，都要一体流通，不准挑选。《关市律》中有关于交易中收纳钱币的立法，规定凡属商贩手工作业出售商品，或替政府出售货物，所收的钱必须投入“𡔷”（相当于扑满），不然就要罚一副铠甲。

秦始皇的这些措施结束了过去货币不统一的混乱状态，便利了各地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因其使用方便，秦朝铜钱的形制沿用二千余年而不变。

三、篆书·隶书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虽用同一体系的汉字，但由于政治上的长期割据，字体变得非常复杂，各地同字异形的现象非常严重，从而给政令的推行和文化的交流造成了严重障碍。统一中国后，秦始皇推行“书同文字”政策，对汉字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规范整理。

齐	𡈼𡈼	𡈼𡈼	𡈼𡈼	𡈼𡈼	𡈼𡈼
楚	𡈼𡈼	𡈼𡈼	𡈼𡈼	𡈼𡈼	𡈼𡈼
燕	𡈼𡈼	𡈼𡈼	𡈼𡈼	𡈼𡈼	𡈼𡈼
韩	𡈼𡈼	𡈼𡈼	𡈼𡈼	𡈼𡈼	𡈼𡈼
赵	𡈼𡈼	𡈼𡈼	𡈼𡈼	𡈼𡈼	𡈼𡈼
魏	𡈼𡈼	𡈼𡈼	𡈼𡈼	𡈼𡈼	𡈼𡈼
秦	𡈼𡈼	𡈼𡈼	𡈼𡈼	𡈼𡈼	𡈼𡈼

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的说法，所谓“书同文字”，大抵是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废除各国古文，推行由李斯等人根据籀文改定的秦篆。李斯、赵高、胡毋敬曾分别用秦篆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书，作为推行秦篆的课本，但三书都已失传。根据相传由李斯手书的《泰山刻石》早期拓本、《琅邪刻石》的二世补辞遗字以及秦权上的诏版字迹，与先秦的文字资料进行分析比较，大致可以推定当时采取了四项整理文字的规范措施：确定各种偏旁的形体，固定偏旁在字体中的位置，选定偏旁的种类和性质，规定每字的书写笔数。从这些原则，我们可知，秦始皇“书同文字”就是对汉字结构进行规范，使汉字形体走向定型。后来的隶书和楷书，虽然在字形方面又有很大发展变化，但字体结构基本承袭秦篆。

秦朝统一文字表

除对篆体汉字进行系统整理、使其规范定型外，秦朝还进一步从书写方面力求简易，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隶书。有关隶书的创造者，文献记载不一。有的说是隐居庸山中的王次



小篆体十二字砖

秦
长30.8厘米,宽26.7厘米,
厚4厘米
砖文为:“海内皆臣,岁登成
孰,道毋饥人。”

小篆体十二字瓦当

秦
瓦文为:“维天降灵,延元万
年,天下康宁。”

仲上书秦始皇,要求使用民间流行的隶书。秦始皇得到王次仲的上书,非常高兴,三次遣使召见他,都被婉言谢绝。后来秦始皇便下令根据王次仲的隶书进行整理。有的说是程邈把民间的隶书加以搜集和整理,呈报给秦始皇,受到奖励,从此隶书就被广泛推行。其实,隶书在战国时代就已产生。战国的一些文字资料中,有时在篆书中就夹有隶书,甚至有的在

一字之中写成半篆半隶。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为隶书,也证明当时的官方文书中已经使用隶书。因此,秦朝所谓创立隶书,实际上是程邈等人对自战国以来民间流行的隶书进行规范整理,作为日常使用文字在全国范围推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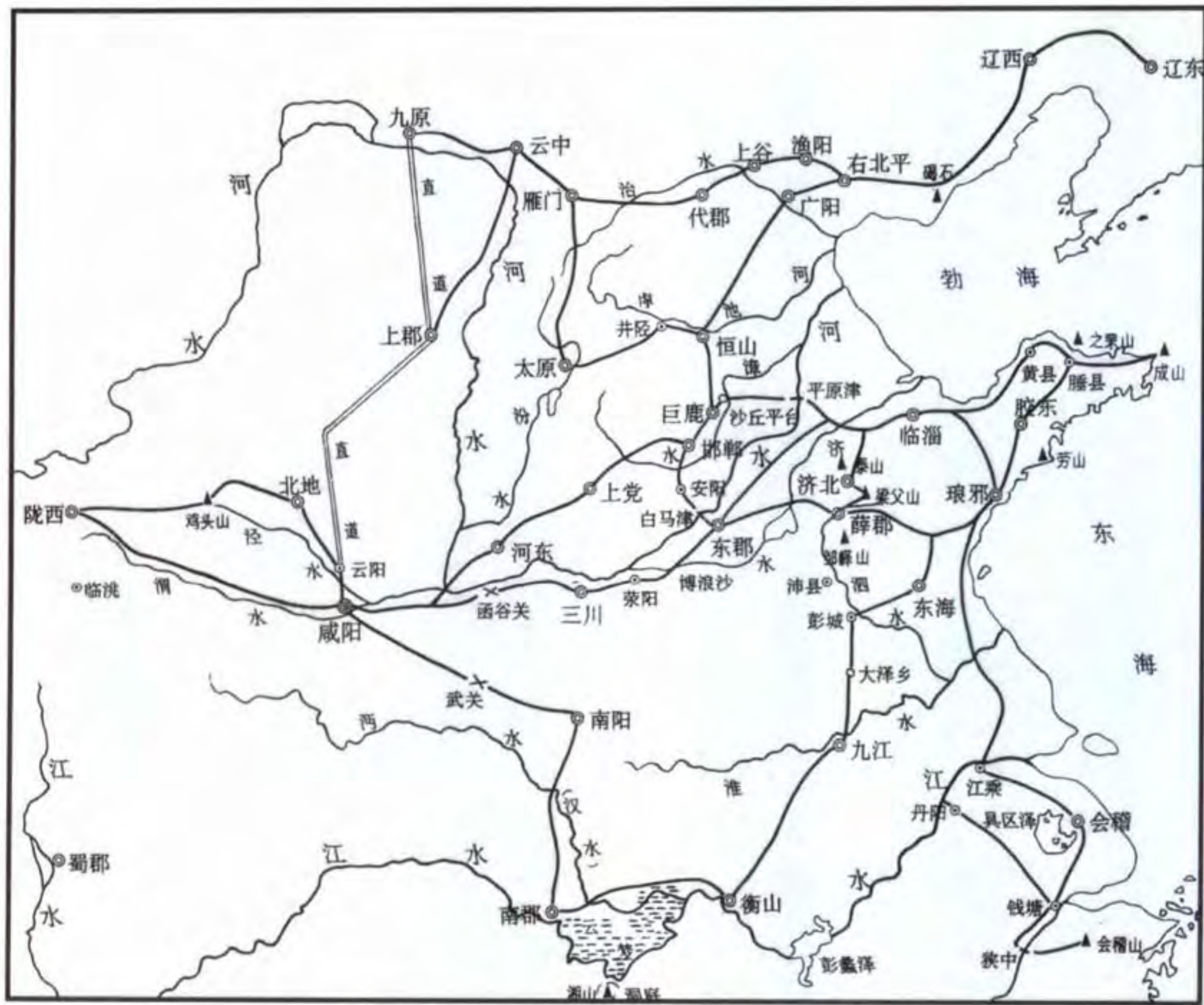
先秦古字经过这次整理后,字体结构得到简化和定型,这对推行法令、传播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驰道·直道·灵渠

前220年秦始皇第一次西巡,就深感交通便利与否,对有效维护中央集权至关重要,所以返回咸阳后,他立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驰道。有关秦朝驰道,汉朝贾山在其《至言》中写道:“(秦始皇)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由此可知,秦朝驰道以国都咸阳为中心,东达今山东、河北和辽宁,南抵今湖北、湖南,东南至今安徽、江苏和浙江。驰道路面极为宽阔,路基高厚,又以铁锤夯筑得坚实平坦,还在道旁栽种了树木。从陕西咸阳第3号宫殿建筑遗址从廊东壁第四间车马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车马、道路和树木安排在同一画面。车马在道路上奔驰,道路两旁植以青松,青松两株一组,在路两侧对称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秦朝驰道的生动写照。这些驰道与各郡县道路相连接,在黄淮流域构成了比较完整的交通网络,促进了黄淮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作为政治中心的关中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关东的联系。

前212年,为防御匈奴南下侵扰,密切北边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及政治联系,秦始皇命令蒙恬等修筑了从咸阳附近直通北边的直道。《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直道北





秦朝开辟驰道示意图

起九原郡治所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抵云阳（今陕西淳化）。关于直道的路线和经过的地区，史籍记载不详，当今学者勘察研究的结果也不尽相同。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认为，秦直道从秦林光宫即今陕西淳化北梁武帝村起，沿子午岭北段北行，经旬邑石门关及陕甘交界处五里墩至黄陵沮源关后，再沿子午岭主脉西侧的甘肃华池东，又直北经陕西定边东南，复折东北方向，抵达内蒙古乌审旗红庆河、东胜西、昭君墓东，至包头西秦九原郡治所九原，全长一千八百里，合今约70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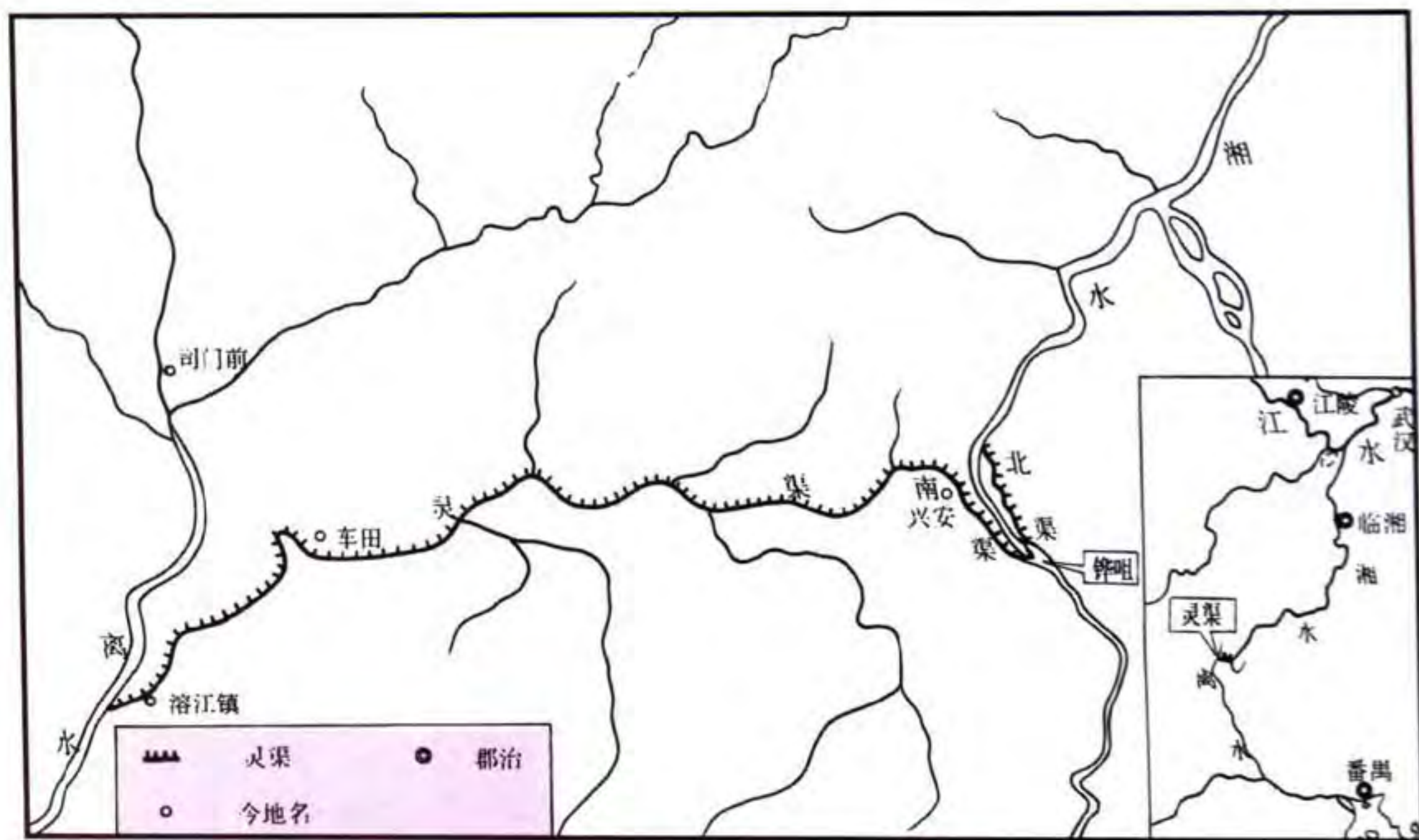
秦直道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主体工程，展示了惊人的筑路技术。首先，从地理形势看，子午岭主脉和所有支脉均呈南北走向，山巅大部分宽阔平坦，加以多系风化石，易开凿成路，且成路后路基坚实，没有泥泞之害。直道沿山脊走，居高临下，利于攻守，体现出先进科学的勘测技术。其次，利用沿途天然山丘

设置烽火台，不但省工省时，而且路和烽火台都在山岭上，可快速传递信息，做攻守准备。其三，利用铁夯把路基尤其是路肩夯实，并采用填土、垫方和在山谷中构筑土桥等方法，表

直道遗迹
在今陕西淳化境内



秦朝开凿灵渠示意图



现出独特的夯土技术。秦朝直道路基保存了两千多年，路中没有长出巨大的树木，足以说明当时夯土的坚实性。

秦朝所修直道，不仅是一条军事通道，还是发展南北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道路。汉初，匈奴曾经多次窥伺中原，却未大规模地举兵进攻，就是直道在起着威慑作用。秦直道沿途曾陆续出土汉、唐、明、清时期的遗物，说明直道在秦汉以后并没有废弃，而是长期为商贩和行旅所使用。当丝绸之路在河西走廊受阻时，中西使节和商人也曾绕行直道往返于西域和长安间。

灵渠遗址

在今广西兴安境内



除直道、驰道外，秦始皇还在西南地区修建了“五尺道”，在今湖南、江西、广西、广东间修筑了“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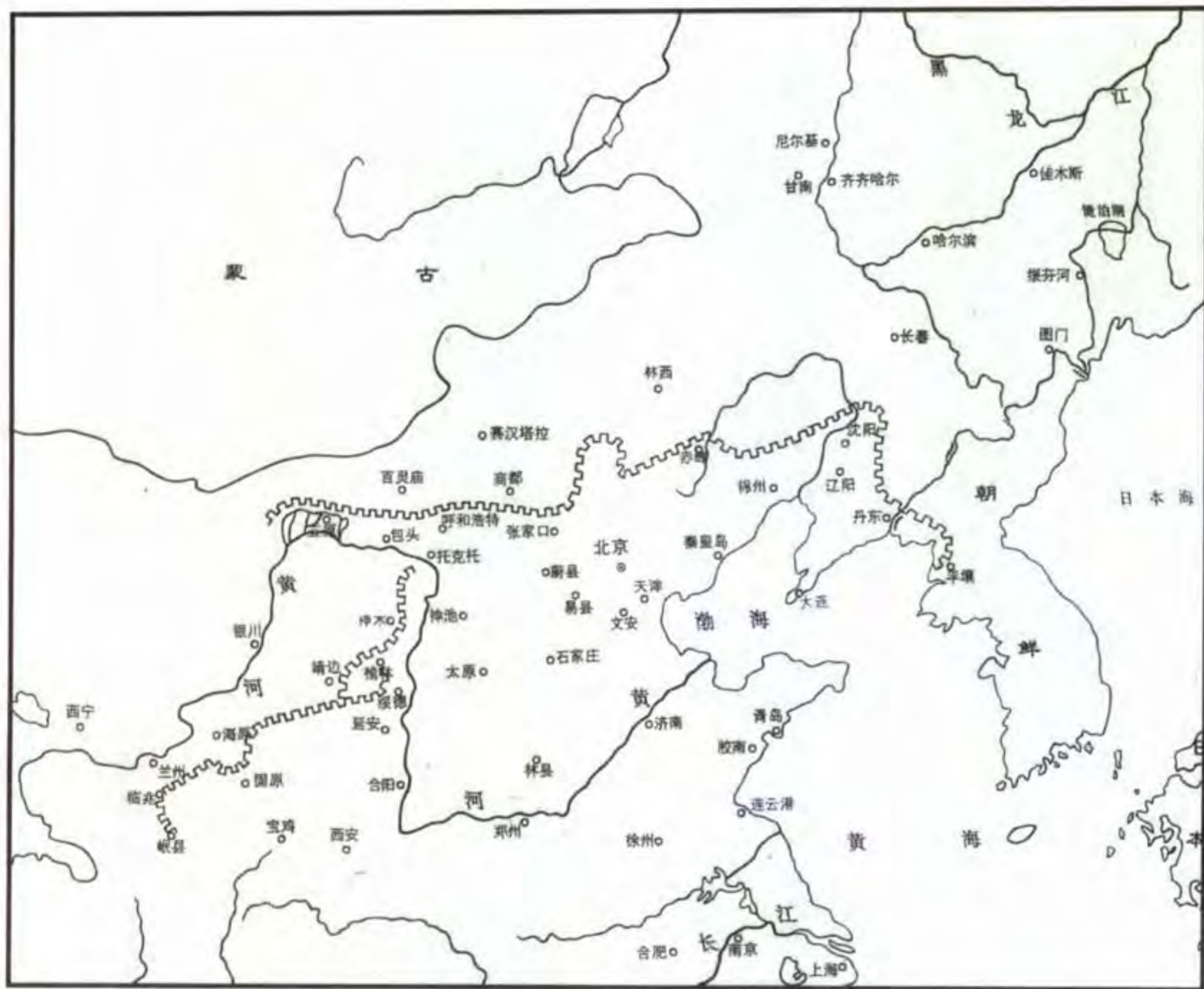
除重视陆路交通建设外，秦始皇还在发兵攻打百越时，为解决运兵转饷的困难，派遣史禄开凿灵渠以通粮道。灵渠在今广西兴安境内，全长30公里，沟通湘、离二水，连接珠江和长江，成为联系中原和岭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第三节 巩固统一

兼并六国后，秦始皇创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实行了多项统一措施。对于这些措施，后人多予以充分肯定。但对秦始皇修筑长城和焚书坑儒，人们则口诛笔伐，并敷衍出许多历史故事。

一、蒙恬·长城·孟姜女

作为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匈奴族长期生活在蒙古高原上。战国末年，他们利用骑兵行动迅速的优势，经常深入中原进行侵扰。由



秦朝长城示意图

于兼并战争剧烈，与匈奴为邻的秦、赵、燕对匈奴一般都采取守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国力渐强，具备了对付匈奴的实力。

关于秦始皇北伐匈奴的原因，《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前215年，燕人卢生被秦始皇派到海中寻找仙人，回来以后为了说明鬼神之事，他向秦始皇上谶纬图书，书上说：“灭掉秦朝的将是胡。”于是秦始皇派蒙

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其实，这只不过是导火线，真正的原因是秦始皇要解除匈奴对北方的威胁，巩固刚刚建立的秦王朝。蒙恬率兵收复了河套地区，即当时所谓的“河南地”。前214年，蒙恬继续进攻，收复了河套以北的阴山一带。秦始皇自榆中（今甘肃兰州榆中一带）向北，在黄河以东、阴山以南地区设置三十四县，在黄河的一段地区因河为塞，

秦朝长城遗址

在今内蒙古包头固阳这段长城全长约120公里，一般高出地表1米左右，均为石筑，每间隔数里筑一座烽火台。





修筑长城的工具：铁铲和铁凿

秦

1973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内城外出土

兼并六国后，秦朝的冶铁业得到迅速发展。铁器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尽管由于生产经验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冶铁的生产规模仍然落后于铜器制造业，但秦始皇兵马俑坑内出土的锤、斧、钩、削等铁器，表明在秦朝的建筑兴作中铁器仍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迁徙几万户到河套地区，以加强边地的开垦和驻防。

为有效地防御匈奴侵袭，秦始皇还命令蒙恬大规模修筑长城，将原来秦、赵、燕三国修筑的长城修葺、新筑，联为一体，形成规模宏大的万里长城。秦朝万里长城，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保留至今的有山西大同北部一段，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附近一段和甘肃临洮附近一段等。临洮附近的秦长城城墙下部宽4.2米，上部宽2.5米，残存高度3米左右，用黄黏土夹杂少量的碎石、经夯头紧密捣固而成。从现存遗迹看，秦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伟大创造力的结晶，堪称世界古代伟大建筑工程之一。

为完成这一艰巨的工程，除军队外，犯了过失的官吏和不遵守焚书命令的人都被罚去修长城，被征调的民夫更是不计其数，据统计，人数至少在三十万以上。由于劳动工具极为简陋，医药卫生条件又差，军民伤亡极多。千百年来，人们用孟姜女的故事控诉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的残酷。故事是这样的：在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时，南方有个名叫范杞良（也有称万喜良）的人，被抓到北方去修筑长城。其妻孟姜女日夜思念，决心到北方去寻找丈夫。她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修筑长城的地方。可是她的丈夫已经死了，被埋在长

城底下。孟姜女悲痛欲绝，一连哭了三天三夜，感动了天地，长城竟然倒塌下来。实际上，孟姜女的故事和秦始皇修筑长城没有任何关联。《左传》记载，春秋战国时，齐国有个叫杞梁的人，在齐军攻打莒国（今山东莒县）时战死。杞梁妻得知消息后万分悲痛，哭吊于莒城之下。后来又传说她把城墙哭塌了一块。传至汉代，人们把情节发展了，说孟姜女听说丈夫战死，痛哭于莒城下，路人无不为之挥涕，过了十天，城被哭塌。到了唐宋时代，又演变成孟姜女哭倒长城，借以表达人们对秦始皇修长城的痛恨和谴责。

二、焚书堆·悯儒谷

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在今陕西渭南涇水东岸土丘上残存有灰堆遗迹，据说是当年秦始皇焚书的地方。在今陕西临潼洪庆堡村西南还有坑儒谷遗址，据说当年无数儒生就被掩埋在这里，因此又叫做悯儒谷。在明代编印的插图本《帝鉴图说》中，焚书坑儒赫然列于其中，以供帝王为政借鉴。焚书坑儒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原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众大臣对如何进行政治、经济等改革的意见并不一致。早在前221年，他们就在实行分封制还是实行郡县制的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最后秦始皇采

纳李斯的意见，在全国确立了郡县制。然而争论并没有结束。前213年，在咸阳宫的一次宴会上，博士淳于越又挑起了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争论。当时仆射周青臣颂扬秦始皇推行郡县制，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不必再受战乱之苦，这功绩自上古以来无人可比。听到周青臣的称颂，秦始皇非常高兴。博士淳于越却提出截然不同的意见。他指出殷、周的统治能够持续一千多年，就是因为分封子弟功臣为枝辅，认为秦始皇虽然拥有天下，而子弟却为匹夫，一旦出现像田常、六卿一样的乱臣，将会出现无人辅佐相救的局面，并危言耸听地说从来就没有不师法古代而能统治长久的事情。丞相李斯驳斥了淳于越的言论。他指出，时代不同，治理的方法也应该不同。现今皇帝统一天下，已经制定了统一的区别是非黑白的标准。可是那些诸生仍然在一起攻击国家法令，标新立异抬高自己，煽动百姓造谣诽谤。像这样，如不禁止，则在上危及皇权，在下会形成

朋党，统一的大好局面可能会遭到破坏。他建议除秦纪以外的史书、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所藏《诗》、《书》、百家语外，凡私人所藏儒家经典、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上缴到官府销毁；有敢相聚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知道而不检举的与之同罪；三十天还不烧毁，脸上刺字，罚作修筑城墙的苦役；严禁私学，如想学法令，应拜官吏为师。淳于越和周青臣的意见虽然针锋相对，却都是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李斯却认为淳于越是在以古非今，诽谤和攻击秦始皇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点燃了秦始皇对儒生的怒火，于是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事件。

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三皇五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为永远享受这种威德，他派徐福、侯生和卢生等方士寻找成仙之药，以求长生不死。成仙之药本属于虚乌有之事，数年过去，这些方士未能为秦始皇寻来半粒仙药。他



坑儒谷

在今陕西临潼洪庆堡村西南

们深感难逃欺君之罪，特别是焚书令颁布后，就一直被大祸临头的梦魇笼罩。于是侯生、卢生相互商议，认为秦始皇为人刚愎暴戾，任意妄为，他们觉得为这样贪婪残暴的人寻找仙药不值得，大骂秦始皇一顿后，就逃之夭夭了。侯生、卢生逃跑后，秦始皇发觉自己上当受骗了，不觉怒从心起，就以妖言惑乱百姓的罪名，派遣御史把居住在都城咸阳的诸生捉来，审问追查那些诽谤过自己的人。诸生经不起皮肉之苦，就互相告发以开脱自己。秦始皇在诸生中亲笔圈定四百六十余人，将他们活埋在咸阳。这就是历史上的“坑儒”事件，发生于前212年。

秦始皇策划焚书坑儒事件，目的是加强思想控制，打击异己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其中焚书事件，将先秦许多文献古籍付之一炬，使春秋末叶以来蓬勃发展的自由求索的精神遭到致命打击，中国古老的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坑儒事件，则把相当一部分基本支持秦政权、只是对秦政府某些措施不满的儒生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大大削弱了秦朝的统治基础。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不少儒生投入到反秦的队伍中，正是这一事件种下的恶果。透过焚书坑儒，我们还可以看到秦始皇统治政策的转变。在焚书坑儒以前，秦始皇的政治是开明的，表现在他能吸收天下奇才，尊重、重用、信任、宽容他们，为他们发挥才能提供条件。焚书坑儒以后，秦始皇逐渐陷入闭目塞听的境地。

第四节 周巡天下

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先后于前220年、前219年、前218年、前215年和前210年五次周巡天下。除第一次巡视地区为陇西（治今甘

肃临洮）、北地（治今甘肃庆阳西南）两郡外，其余四次均为被兼并的东方六国。秦始皇周巡天下，自然带有游玩、享乐、求仙的目的，但其政治目的也很明显，就是通过巡行向不安分的六国旧贵族和人民示威，以强化和维系空前庞大的秦王朝的统治。

一、封禅泰山

泰山位于今山东省中部，海拔1500多米，突兀峭拔，气势磅礴。春秋战国时代，齐鲁是重要的文化中心。在齐鲁人心中，泰山是最高的山，帝王应该到泰山去举行典礼，表示受命于天。它包括两种祭祀仪式，一是在泰山顶上筑坛祭天，称“封”；一是在泰山下的小山梁父辟土祭地，称“禅”。春秋战国以来，人们多认为只有举行过这种典礼，才算真正受命于天。

前219年，秦始皇到东方和南方巡行。秦始皇这次巡行的主要目的是到泰山举行封禅之礼。虽然通过五德终始之说，秦始皇证明自己受命于天，但这还不够，他还需要进一步实



行自古相传的封禅大典，认为只有如此才算得上名副其实。然而到了泰山脚下，秦始皇和随行的官员却不知道如何举行封禅仪式。于是秦始皇召集齐鲁当地儒生询问。儒生们说：“古代封禅时所用的车子，是用轻柔的蒲草包裹轮子的，以免车子压伤山上的草木土石，这是仁者的风度。然后把地扫除一下，再铺上一些茅草稻茎，就可以祭祀了。”听到儒生的这些话，秦始皇觉得他们是在捉弄自己。远道而来，哪里会准备蒲轮车舆，再者大队人马上山，怎么可能不伤草木。他恼怒这帮人不济事，把他们统统斥退，然后命令士兵斩木除草，开山辟路，登山祭天，举行封礼，接着在梁父山举行了禅礼，从而完成了封禅大典。

秦始皇完成封禅大典后，心中颇为得意，于是刻石留念以歌功颂德，这就是泰山刻石。刻石主要是叙述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申明法令，充分利用法律权威来保护刚刚建立起来的秦朝的各项制度。其书体为统一文字后的小篆，相传为李斯手书，是秦代的重要文献。遗憾的是，刻石年久漫灭，至明朝时只剩下29

字，到清代仅存10字。传世拓片中，以北宋时的全拓本最佳。中国国家博物馆在通史陈列中展出的则是明拓本的泰山刻石残字。从这些残字中，我们已经很难感受秦始皇封禅后的无限欣喜，感受更多的是历史的无情与沧桑。

二、琅邪刻石

这是一块竖直的长方体残石，书体为秦篆，相传为李斯所书。现残存13行86字，前2行为从臣的官职和姓名，后11行为前209年秦二世补刻的诏书及其从臣姓名，字已漫漶。此刻石本在山崖上，清代被人凿下保存，是秦刻石的稀世珍品。这件其貌不扬的文物就是著名的琅邪刻石，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战国中期，燕齐滨海地区兴起一种强大的方士之学。燕齐方士之学是各类方术、方说的综合体，大抵以海上神山神仙之说为主旨，饰以阴阳五行之学，泛海求仙、寻找不死之药是燕齐方士的主要活动。方士们传言，在渤海中，距离尘世不远的地方，有蓬莱、方丈、瀛

明拓本泰山刻石残字册页



洲三座仙山。山上有很多仙人和长生不死的神药，物类飞禽走兽都是白色的，宫殿是黄金白银砌成的。当人们未到时，远远望去，茫茫一片云海；当人们到达时，三座神山往往在海下面；当人们再要逼近时，往往给风刮开。这本是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的景象，在方士们如簧之舌的鼓吹下，却变成了求仙者孜孜以求的仙境。当时，兼并剧烈，国君权贵最需要的是各种周急救世、富国强民的法术，或者审时度势、纵横变诈的计谋，鸡鸣狗盗之徒只要间或有用，都可延为上宾。方士们的神山仙人之说虽虚无缥缈，缺乏实用性，却也吸引了齐威王、宣王和燕昭王等许多君王的注意，他们曾先后派人到大海中去探寻三仙山。

秦始皇在泰山举行完封禅大典后，继续在今天的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巡视，然后到达琅邪（治今山东胶南）。在这里，方士们趁机向秦始皇游说，秦始皇也认为到了海上而不去访求神仙，是坐失良机，岂不可惜！于是他派方士徐福入海求长生仙药。秦始皇在此留连忘返，等待着徐福寻求仙药归来。可是徐福回来后却欺骗秦始皇，说只有派童男、童女、

百工技师携带谷物种子去，才能拿到不死之药。秦始皇迷恋长生不死，根本不分辨徐福的话是真是假，立即派出童男、童女三千人带了一批谷物种子、百工技师前去求仙。可是徐福一去竟然杳无音信。秦始皇在那里留连了三个月，想等徐福求得不死之药返回来。他修筑了一个琅邪台，又迁徙三万百姓到琅邪定居，并在琅邪刻石。在刻石中，秦始皇热情歌颂了自己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强调了制定统一的法律制度作为办事的准则，重申了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以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性。看来，秦始皇在难以抵御滨海地区方士文化诱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周巡天下的主要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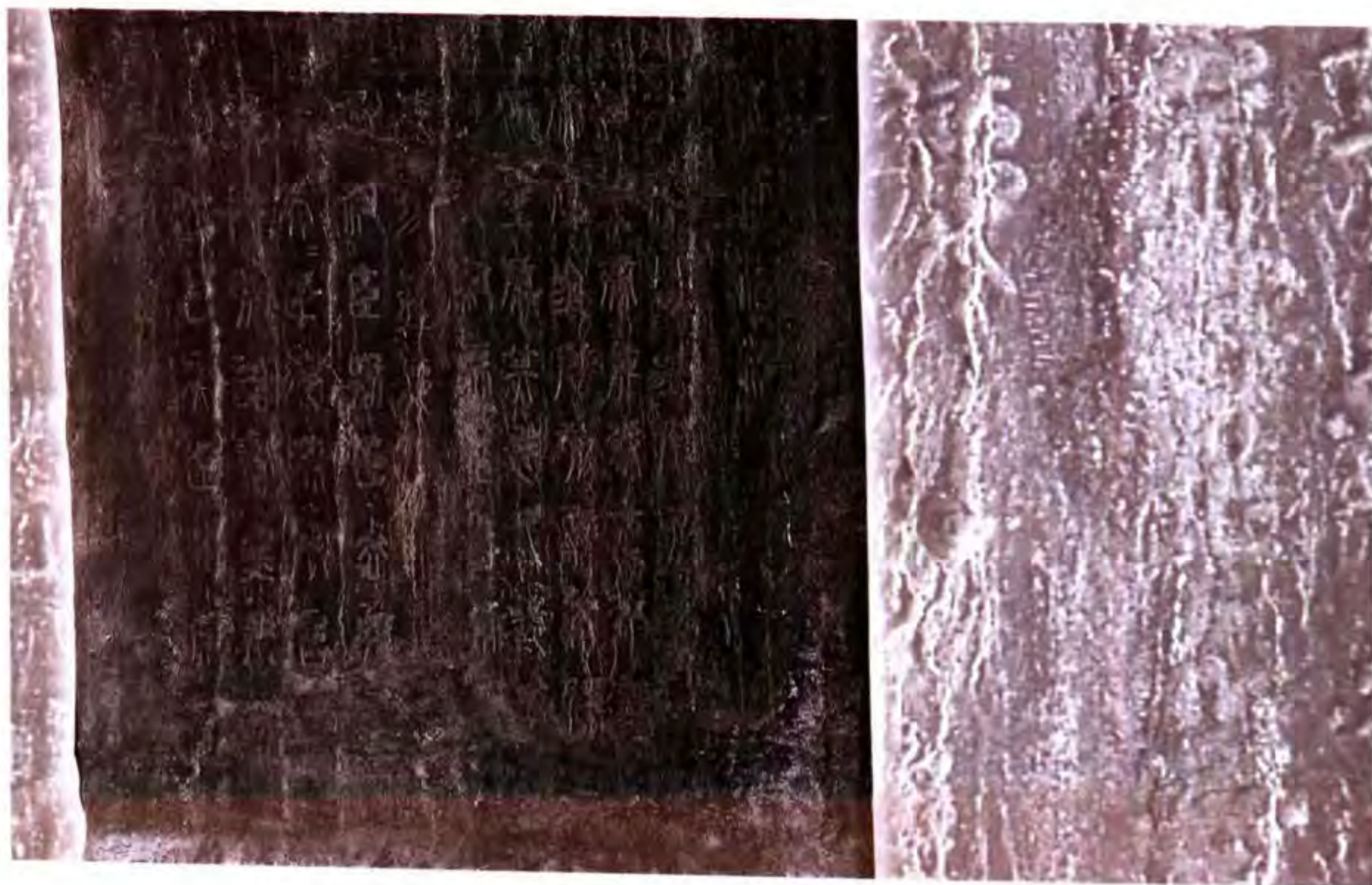
三、泗水捞鼎

山东嘉祥武宅山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上，有这样的画面：在河面上竖立着两根柱子，左边四人和右边三人各拽一根绳子，绳子经过柱子上的滑轮系着一件鼎。鼎中有一龙昂首啮断了绳子，拽绳子的人都仰跌在地。柱子上部还绘有一列人物，中间二人冠服相对，躬身

琅邪刻石

秦

高132.2厘米、宽65.8厘米
至71.3厘米，厚36.2厘米



下指，观望着捞起的鼎。研究者认为，这块画像石演绎的是秦始皇泗水捞鼎的故事。

这个故事同样发生在前119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途中。秦始皇第二次出巡离开琅邪后，路过彭城（今江苏徐州）。他在那里斋戒祷祝，想从泗水中捞出失传已久的周代铜鼎。秦始皇为什么想起打捞周代的铜鼎呢？一方面，文献记载夏代曾铸九鼎，后来相继迁于商周；春秋时代，楚、齐、秦都企图夺得周鼎，说明那时鼎已经被视为国家政权的象征物。《史记·封禅书》有“宋太丘社亡，而九鼎没于泗水彭城下”的记载，说迁于周的九鼎后来沉到了泗水里。按照五德终始的理论，尽管秦朝取代周朝而拥有天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要想让天下的人，尤其是那些刚刚被征服的六国地区的子民们接受这一想法并非易事。如果能将传说中的周鼎打捞上来，这无疑会增加秦朝授命于天一说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在统一战争中，秦楚之战激烈而持久，多有反复，在楚国遗民中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他们甚至喊出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口号，反映出强烈的复仇愿望。秦始皇敏锐地觉察

到这种情况，希望通过出巡慑服那些企图谋反的楚国遗民。因此，当出巡步入昔日的楚国的国土时，秦始皇非常希望打捞出周鼎，给那些不安分的楚国遗民以心理上的威慑。遗憾的是，他派人入水寻找周鼎，却没能找到。没有捞到周鼎，秦始皇自然有些不快。由南郡（治今湖北江陵）到湘山祠（在今湖南岳阳西）时，遇到了大风，差点不能渡江。秦始皇勃然大怒，问随行的博士：“湘君是什么神？”博士说：“听说是帝尧的女儿，嫁给舜，死后葬在这个地方。”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尧舜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湘神仅仅是两个帝妃，竟敢兴风作浪，拦阻巡行！盛怒之下，秦始皇命令三千刑犯把湘山的树木砍个精光。秦始皇表面上是在与神争斗，实际上是在向楚地那些不安分者示威：尽管他没有捞到周鼎，但谁敢违忤他的意志，就会遭到像湘山树木一样的命运！

耐人寻味的是，这块泗水捞鼎画像石表现的却是秦始皇捞鼎得而复失的结局，其用意何在呢？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六国遗民慑于秦的威力，暂时放弃了暴力反抗，但非暴力的反抗活动时常发生，齐国就有不少。齐是文化之邦，人才众多，反秦舆论易于传播，对秦朝的威胁很大。在第二次出巡到达齐地时，秦始皇本来想在封禅大典中对那些儒生有所重用，却没有想到那些儒生竟然是死抱书本、不知变通的一群腐儒，只好将他们斥退不用，也因此激起齐地儒生的愤恨。秦始皇举行完封禅大典下山时，遇到大雨，被迫跑到松树底下躲避。幸灾乐祸的齐地儒生讥讽秦始皇之所以遇雨，是由于寡德。焚书坑儒事件发生后，儒生们对秦始皇更是恨之人骨，因此在泗水捞鼎画像石中，他们表现的是秦始皇得而复失的那一瞬间，仿佛在告诉秦始皇：别再做梦了！德行不够，即使捞到了周鼎，老天也会降



泗水捞鼎画像石

东汉

山东嘉祥武宅山出土



下神物，让你得而复失。

四、东临碣石

自1984年以来，考古工作者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北起辽宁绥中墙子里村、南到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全程40公里的环渤海地带，发现了秦朝的大型建筑群。绥中墙子里村地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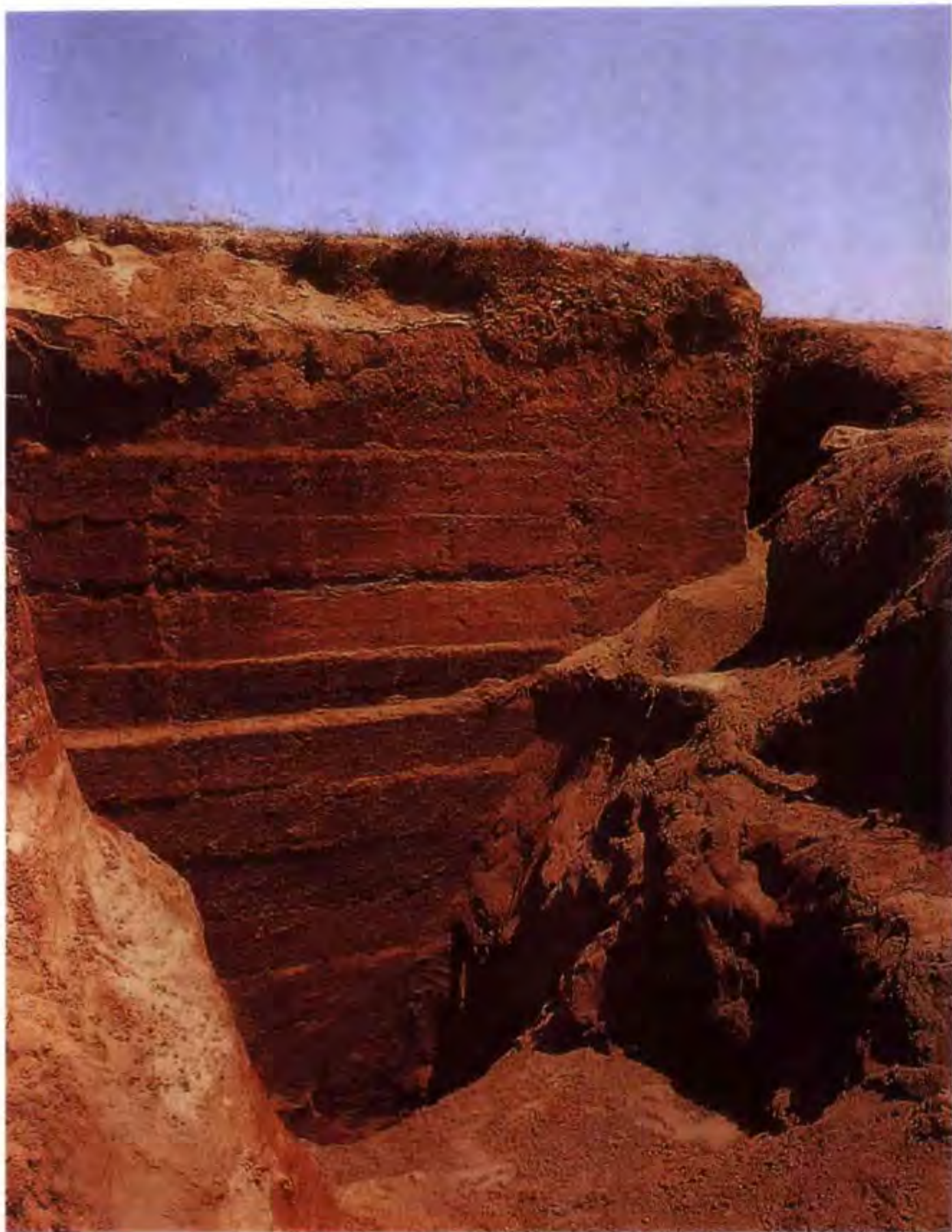
山海关外15公里处的渤海之滨。这里有一组自然礁石耸立在海中，民间传说为“姜女坟”。在紧靠“姜女坟”的海岸上发现了六处建筑遗址群。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面对“姜女坟”的石碑地建筑遗址。其中心建筑台基南北长500多米，东西宽近300米，台基高8米。夯土台上有多级建筑。在建筑基址上发现了通长68厘

发掘中的石碑地碣石宫遗址



米、当面直径52厘米的高浮雕夔纹大瓦当、变形夔纹大瓦当，形制与秦始皇陵区出土的十分近似。其他建筑用材也与秦咸阳故城出土的相类似。从遗址所在地及与“姜女坟”的关系看，“姜女坟”应该就是史籍所载的东海碣石，而这组建筑则可能就是秦始皇东巡的碣石宫。

前215年，秦始皇第四次出巡。这次出巡的目的地是碣石（在今河北秦皇岛附近）和右北平（治今天津蓟县）、渔阳（治今北京密云）、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南）、代郡（治今河北蔚县西南）、雁门（治今山西右玉南）、云中（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等北方边塞。从咸阳到碣石的路上，秦始皇目睹往日遗留下来的城郭、关塞和川防，深感这些防御设施不仅妨碍了交通和社会生活，而且可能为各种反秦势力所利用，为此下令加以拆除。抵达碣石后，燕人卢生在秦始皇面前鼓吹求仙学道之事。一心求仙的秦始皇当即派卢生去寻找羡门、高誓这两位传说中的古神仙，不久又派韩终、侯公、石生去寻觅仙人和不死之药。这样看来，碣石宫未尝不是秦始皇寻访真人的处所。但碣石毕竟属于右北平，与渔阳、上谷、代郡、雁门、云中均是匈奴游牧聚居的地方。战国以来，匈奴趁中原兼并战争之机，不断侵扰内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这一边患尚未解除。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燕人卢生在没有找到神仙后，就装神弄鬼，谎称入海求得一部仙书，书内有“亡秦者胡也”五字，意思是秦王朝将来必为匈奴灭亡。这使秦始皇认识到，不灭匈奴，秦王朝不得安宁。所以巡视北部边境后，他就派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伐匈奴。从这个意义上讲，碣石宫不仅是用来寻访真人的，很可能还是反击匈奴的前哨，以致后来的秦二世、汉武帝和曹操都先后寻访此地。



石碑地碣石宫中心夯土台基一角

五、沙丘落日

第四次出巡后，秦始皇在宫中呆了四年多。由于横征暴敛，大兴土木，焚书坑儒，举国上下怨声载道。前211年，一颗陨石降落在东郡（治今河南濮阳西南）。有人在陨石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七字，诅咒秦始皇死，秦王朝灭亡。秦始皇知道后，就派御史去调查。御史没有查出结果，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陨石落处周围的居民全部杀光。类似的事情不止一次地发生，使秦始皇感到政局极为不稳定，自己有必要再次巡行，向那些妄图作乱的人示威。

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巡行出游。这次出巡，秦始皇让右丞相冯去疾留



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

秦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

通长317厘米，通高106.2厘米

守咸阳，他带着左丞相李斯和宠爱的小儿子胡亥以及中车府令赵高等人一同前往。他们从咸阳出发，经武关（今陕西商南东南）、宛县（今河南南阳），十一月南下至云梦（今汉水、长江交汇处至洞庭湖一带的湖泊区），然后沿长江东下，过丹阳（今安徽当涂东），抵钱唐（今浙江杭州），在狭中（今浙江富阳附近）渡浙江东南行。在向会稽（今浙江绍兴南）前进的路上，楚国贵族后裔项梁及其侄子项羽去观看秦始皇浩浩荡荡的车队仪仗。年少而又雄心勃勃的项羽看到秦始皇的仪仗队伍那样威严盛大，不禁脱口说道：“他，我可以取而代之！”秦始皇当然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个口出狂言的少年后来率兵推翻了秦朝的统治，使秦朝延续千秋万代的愿望化为泡影。到了会稽，秦始皇祭大禹，在那里立石刻辞。在刻辞中，秦始皇继续颂扬自己平定六国、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是长久的，谴责六国的诸侯王独断专行，背信弃义，贪婪残暴，骄傲凶猛，拥兵称霸，屡次挑起战争。从会稽返回钱唐后，秦始皇一行过吴（今江苏苏州），从江乘（今江苏镇江北）渡江，北上至琅邪，再北上

至成山（今山东成山角）、之罘（在今山东烟台），然后取道临淄西归。

由于纵欲过度，秦始皇过早地衰老了，根本无法经受长途跋涉的劳顿。当车驾抵达平原津（今山东平原西南）时，秦始皇突然患病。他怕死，更忌讳别人谈到死的问题，所以没有人敢同他议论后事。随从医官诊脉进药，却不见效，最后秦始皇于七月丙寅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这位叱咤风云的千古一帝，年仅五十岁就匆匆离开了人世。

1980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的一件铜车马，单辕，双轮，舆呈凸字形，分前后两室，前面和两侧有启动灵活的车窗，后面有开关自如的车门。驾车的驭官俑跽坐于前室，双手前伸，紧握缰绳。这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结构最复杂、形体最大、车马具器件最完整的铜铸马车，被认为是秦始皇生前所乘车的模型。面对这奢华的模型，我们不禁感慨万千。统一六国后，尽管秦始皇勤勉地五次巡行，却仍然无法消除其残暴统治所产生的社会危机。他死后不久，反秦风暴就席卷全国。这大概是他治标不治本的缘故吧。

第五节 秦末烽火

在议定帝号的过程中，秦始皇曾经幻想自己缔造的秦帝国能够传到千世万世。由于徭役繁重，刑罚严酷，加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丛生，秦始皇死后不久，反秦风暴就席卷全国，庞大的秦帝国很快就灰飞烟灭了。

一、秦始皇陵

古代陵墓一般选择在地势较高、环境优美的地方。骊山北麓为洪积扇和带状黄土台，海拔高度在500米左右，地势高亢辽阔，是营造陵墓比较理想的地方。秦始皇于是选择这块风水宝地作为自己的长眠处所。

秦始皇即位后，就开始在骊山营建他的陵墓。当时兼并战争正酣，秦国仅有几百万人，最多只能调动数千人乃至万人来修筑陵墓。兼并东方六国后，秦始皇动用了七十余万

人修建阿房宫和陵墓，而修陵的人最多时达三十五万人。秦始皇在出巡途中猝死时陵园工程尚未竣工，秦二世胡亥即位后继续营造。由于任务紧迫，他把大批修建阿房宫的人员也调到始皇陵从事覆土工程，这时修陵的人员达到了七十余万人。秦朝末年，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当农民起义军打到距骊山北麓十余里的戏水附近时，秦二世把大批修陵工徒调去打仗，始皇陵园的修建工程才被迫停工。秦始皇陵墓的修建工程，前后延续达三十八年之久，直到秦朝灭亡也未全部竣工。

秦始皇陵园的修建工程，前期可能是由吕不韦主持，后期可能由丞相李斯主持，将作大匠长官和少府也是参与者。修陵人包括刑徒、居赀、官府和民间手工业作坊的工匠。在秦始皇陵西北角郑庄发现了一处秦代的打石场遗址，面积达75万平方米。遗址内除出土了秦代的铁锤、铁釜、铁钉、石水道的半成品



大瓦当

秦

1956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区
采集
直径约40厘米

云纹瓦当

秦

1974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区出土

直径一为15.5厘米，一为16.5厘米

云纹瓦当占秦宫殿遗址出土瓦当的大多数，云纹是当时最流行的纹饰。



和大批石材外，还发现了铁钳、铁桎等刑具和人的尸骨。其中铁钳为刑徒颈上戴的刑具，铁桎是刑徒脚上戴的刑具，即脚镣，均是打制石料的刑徒所戴的刑具。在秦始皇陵西南角的赵家背户村西发现一处修陵人墓地，墓地内出土有18件覆盖在死者尸骨上的刻有文字的残瓦片，其中有十人写明其身份为“居赀”。所谓居赀，就是因犯法而被罚钱财，本人无力缴纳钱财，而用劳役代替。居赀不穿囚衣，不戴刑具，身分优于刑徒。在这些残瓦片中，“阌陵居赀便里不更牙”瓦片，高4.9厘米，宽3.9厘米。“阌陵”是地名，在今山东苍山兰陵镇。“便里”是乡里名。“不更”为秦代第四等爵。“牙”是死者的名字。“杨民居赀大（教）”瓦片中的“杨民”是地名，在今河北宁晋附近。

“大（教）”是死者的名字。这些残瓦片表明，全国统一前，修陵人大都是来自关中地区的秦人；全国统一后，修陵人是从全国各地征调的。

秦始皇陵园平面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夯土筑造的垣墙。内垣墙南北长1300米，东西宽578米；外垣墙南北长2513米，东西宽974米，内外垣墙每边都设有门。坟丘在内垣墙的南半部，夯土筑造，远望像一座突兀拔起的山岭，形状呈覆斗形，顶部略平，中腰部有两个缓坡状的台阶，形成三层阶梯。其底部南北长350米，东西宽345米，周长1390米，占地面积120750平方米。坟丘原高五十丈，即115米，但两千多年来，经雨水冲刷，其高度已大为降低：站在坟丘西侧海

拔277.7米处测量，现高43米；站在坟丘西北角的缓坡处测量，或站在西侧中部测量，高为76米；站在坟丘北边沿测量，高为52.5米。这种高度上的差异，主要是秦始皇陵所处地势南高北低，且中间高、东西两侧低，落差较大的缘故。坟丘上原植有松柏，望之如林。坟丘的东、西、北三边都发现了墓道。内垣墙的北半部，有规模宏大的建筑群遗址，应是秦始皇的寝殿所在。内垣墙的东、西、南三面墙外，都有沿墙边建筑的廊房遗址，在遗址中出土的陶壶上，发现了“丽山园”、“丽山食官”的铭文，知为丽山园左右食官居处。1956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区采集的大瓦当直径40厘米，画面为夔凤纹，凤纹遒劲，特别硕大。1977年在该地出土的另一件瓦当高48厘米，直径61厘米，残筒长32厘米。根据这两件大瓦当，当年秦始皇陵园的宏大规模和恢弘气势可以约略想见。

地宫是秦始皇陵墓建筑的核心部分，是放置棺椁和随葬品的地方，位于坟丘之下。根据文献记载，地宫挖得极深，穿过三层泉水之下，据推测可能在23米至30米之间，用带有花纹的石头镶砌，并涂以红漆，从而把泉水封堵，不致渗入墓室。墓室穹顶绘以天文星宿图像，下边摹拟九州五岳的地理形势，修筑山川河流、江河湖海，并在其中注入水银，使之川流不息。还用金银铸造雁凫，用琉璃杂物雕刻龟鱼，用沙棠沉檀制造舟楫，并以明珠镶嵌成日月星辰，刻玉石为松柏，以点缀地下江山。地宫内，文武百官依次排列，宫廷楼阁塞满奇珍异宝，用东海捕到的一种人鱼炼油制成蜡烛。为防止盗墓，凡墓道入口处都设有自动发射的防盗机弩，倘若有人盗掘，触动机关，就会被乱箭射死。为防止那些经手墓内珍藏、修建机密设施的工匠泄露地宫内埋藏的秘密，秦政府将他们全部关闭在墓门内。咸阳宫内，



没有子女的宫女也都被迫随葬，惨遭活埋。

“机关算尽太聪明”，秦始皇在装点得犹如人间王宫的地宫内，并没有过几天安稳自在的日子。根据文献记载，前206年项羽进入关中后，就让部将率军队发掘了地宫，派遣三十万人搬运里面的金银财宝，三十天还没有搬尽。后来，一个牧童到此牧羊，因为羊坠入墓圪中，就取火找羊，羊找着后，就顺手把火炬扔在了地宫内，从而引发了一场大火。大火持续九十天而不熄，将地宫烧得干干净净。这种记载也许是后世的传闻，寄托了人们对秦始皇残暴行为的蔑视与仇恨。

二、阿房宫

阿房宫位于渭南上林苑中，即今陕西西安市西郊三桥镇南巨家庄一带，为秦都咸阳宫殿中规模最大的建筑群，气势磅礴，威仪万千，充分体现了帝国凌驾群雄、不可一世的气

铁钳和铁桎

秦

1973年陕西临潼郑庄秦石料加工场出土

铁钳长18厘米，钳体宽2厘米，厚0.8厘米，铁桎长38厘米，环体宽3厘米，厚1厘米，直径8厘米



“阡陵居货便里不更牙”，
“杨民居货大（教）”残瓦片

秦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
侧赵家背户村刑徒墓出土

势。

阿房宫，亦称阿城，始建于惠文王，宫未成而惠文王死去，工程于是中途停工。前212年，秦始皇认为咸阳人口太多，而先王修筑的宫廷狭小，不足以体现秦政权的威严和满足他享乐的需要，就开始大规模地扩建阿房宫。

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在其《阿房宫赋》中这样写道：“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勾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赋中所言，虽有夸大的成分，但阿房宫确为当时宏大惊人的建筑群。

由于工程过大，秦始皇先修筑了阿房宫前殿。该建筑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殿上可同时坐一万人，殿下可竖起五丈高的旗子，四周有阁道，从殿下直抵南山。以南山之巔为门阙，修复道从阿房宫渡过渭水，抵达咸阳，就像无极紫微星宫横渡银河、抵达营室一样，规模相当宏大。在今陕西西安西郊三桥镇阿房宫村南附近，有一座大土台基，全部用夯土

阿房宫夯土遗迹



筑起，被称为“始皇上天台”。在阿房宫村西南附近，从东边的巨家庄、赵家堡直到西边的古城村，夯土迤邐不断，长1300米，南北宽500米左右，总面积在60万平方米以上，其高台建筑基址至今仍高出地面10米以上。这两处地方是阿房宫最显著的建筑遗迹，从中我们仍可以看出当年阿房宫恢宏壮观的气势。

据《西京杂记》记载，阿房宫前殿相当精美，殿内所用栋、梁都是梓木和檀香木。因为怕刺客带兵器潜入宫里，宫门是用磁石做成的，身怀武器入门的都可以查出。殿内陈设也相当豪华。宫中挂有奇异的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作蟠螭形，以口衔灯，灯点燃后，鳞甲金光闪动，灿然似天上繁星。宫前立有十二金人。宫中悬有神奇精巧的自然之帘，开卷自如，不用钩挂。尤为奇特的是，宫中装有照人五脏的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人如果体内有疾病，用方镜照，就知道疾病所在；女子如果有邪恶之心，用方镜照，就会胆张心动。秦始皇常用方镜照宫人，胆张心动者，一律格杀勿论。这些记述有明显夸大失实的地方，但多少反映了阿房宫的富丽堂皇和陈设的奢华。



圆形、方形铜建筑构件

秦

1974年陕西长安小苏村阿房宫遗址出土

方形构件长19厘米、宽14厘米、高7厘米，圆形构件高9.3厘米、直径11.4厘米

方形构件上面中部有浅圆窝，应当是供套用门扉转轴用的户枢。圆形构件中空，可能是用来结合、固定木质建筑材料的构件。这些构件当是在阿房宫宫殿建筑上使用的。

为修阿房宫，秦始皇命令从北山运来石料，从今四川、湖北运来大批木料。在当时交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修建如此恢宏的宫殿，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当时的童谣就直接诅咒秦始皇：“阿房阿房，亡始皇。”咒骂秦始皇就要死亡，表达他们忍无可忍的愤怒心情。

葵纹瓦当

秦

1975年陕西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

直径一为13.5厘米，一为14.4厘米

葵纹瓦当主要见于秦代，数量比云纹瓦当少。它与动物纹瓦当、吉祥语的文字瓦当以及叶纹、树纹、水波纹瓦当一样，都是赞颂秦朝统一六国大业的思想在建筑艺术中的反映。



阿房宫建筑群实际上并未完成。尽管它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又动用了几十万劳动力，但正式营建不过三年。即便是先行的阿房宫前殿工程，室堂尚未完工，就因为秦始皇驾崩而停辍。秦始皇陵覆土后，秦二世继续营建阿房宫，但不到一年的时间，陈胜部将周文率领的起义军就攻入关中，直驱戏水，阿房宫工程也就不了了之。传说项羽进入关中，阿房宫被付之一炬，但最新考古工作证实，项羽土火烧阿房宫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三、尸首被肢解的陪葬墓

秦始皇第五次出巡，至平原津病重。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就作玺书赐公子扶苏，命令他“与丧会咸阳而葬”，意思是让他回来继承皇位。然而玺书留在中车府令赵高的手中还没有发出去，秦始皇就病死在沙丘平台。赵高是公子胡亥的死党，他鼓励随行的胡亥夺取皇位，并胁迫李斯一起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立胡亥为太子，赐公子扶苏、将军蒙恬死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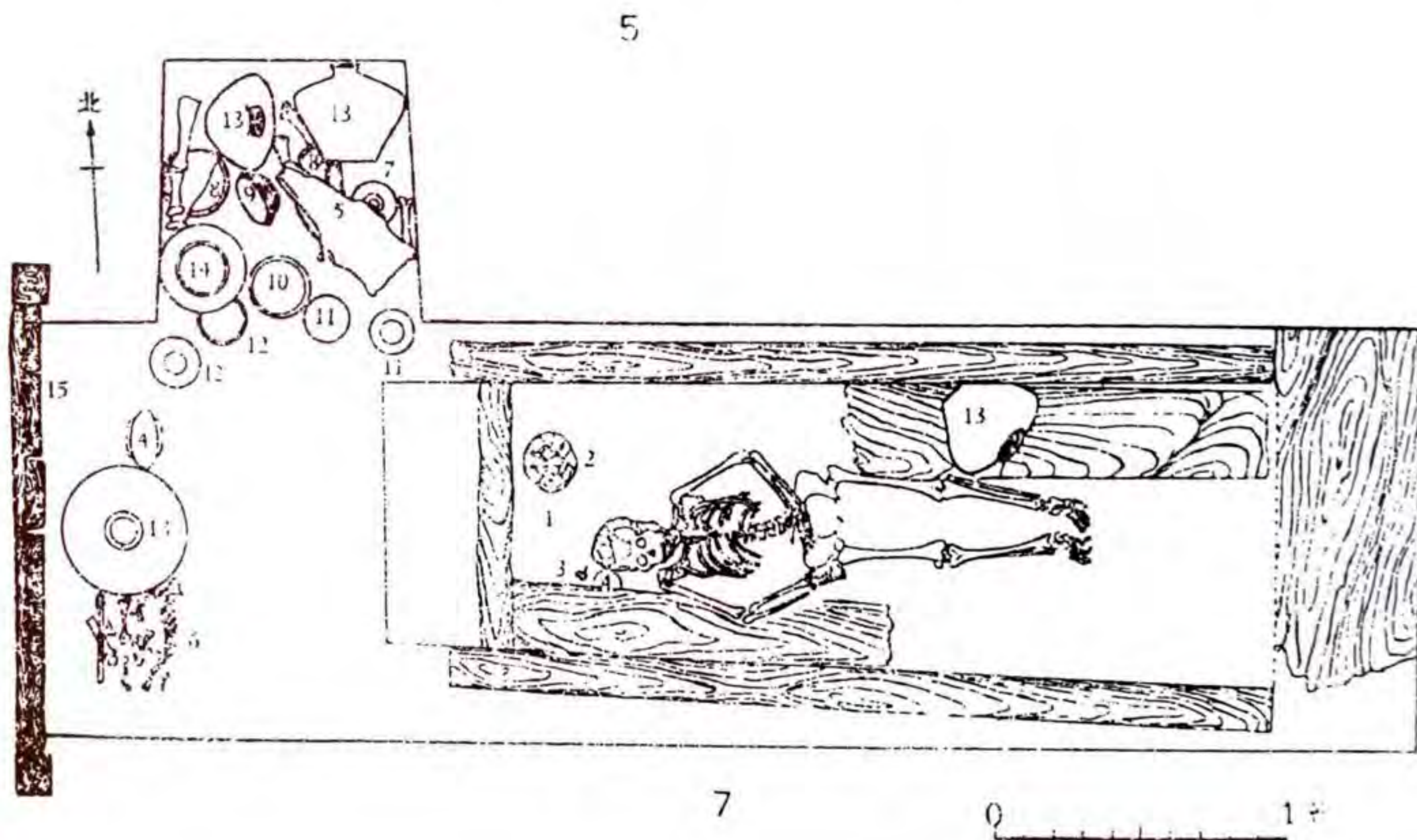
结果扶苏自杀，蒙恬下阳周狱待罪，胡亥袭位，是为秦二世。

秦二世即位后，任命赵高为郎中令，侍奉左右，参与政事。赵高担心众大臣及诸公子对在建立秦朝过程中无尺寸之功的胡亥不服，就怂恿秦二世诛杀大臣及诸公子。将军蒙毅，蒙恬先后被杀，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以不能禁止群盗、不竭尽忠力等罪名被下狱，冯去疾、冯劫不愿受辱而自杀，李斯被腰斩。秦二世和赵高又借口诸公子怀疑他们沙丘密谋，将十二个公子在咸阳斩首示众，将十个公主在杜陵肢解而死。他们的财物被没入官府，连坐被杀的人不可胜数。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秦二世大肆诛杀大臣和兄弟姐妹，结果造成统治阶级内部人心浮动，离心离德。

1976年10月，秦始皇陵兵马俑考古队在秦始皇陵东侧的上焦村西探出墓葬17座。1976年底至次年1月，对其中的8座进行了发掘。通过对这8座墓的发掘，我们对这17座

上焦村 M7 墓葬及随葬器物平面图

1. 铜印章 2. 残铜镜 3. 铜带钩 4. 漆耳杯 5. 牛头骨 6. 杂骨 7. 蒜头陶壶 8. 陶钵 9. 陶釜 10. 陶甗 11. 陶豆 12. 陶盒 13. 陶罐 14. 大口陶罐 15. 封门木



墓有了很多的认识。首先,17座墓葬均作南北向一字形排列,墓向一致,排列整齐,说明是同时埋葬,而不是先后葬入。其次,墓内均有棺槨,有一定数量的陪葬品,有的墓内还出土刻有“少府”铭文的器物,说明墓主人是地位较高的与宫廷有关的人物。第三,在两座墓坑底部的东北角,都发现有建墓人烤火留下的木灰遗迹,说明挖墓时天气较冷。第四,墓葬出土的人体骨骼身首分离,死因或系肢解,或系缢杀。死者的年龄为二三十岁。结合有关文献推断,这17座墓葬的主人,有可能是秦始皇的公子和公主。他们是宗室显贵,是秦二世的兄长、姐妹,虽然被杀,二世仍然给他们以一定的礼遇,给予棺槨和陪葬器物,让他们陪葬始皇陵。另外在始皇陵内城西部发现的一座中等甲字形墓,在始皇陵园的陪葬墓中规模最大,并且所处位置特殊,靠近始皇陵的封土,很可能是公子高的墓。面对这些墓葬,凝视着墓葬中那些身首分离的人体,我们似乎感受到秦二世的昏庸残暴和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惨烈。

四、帛书《五星占》中的“张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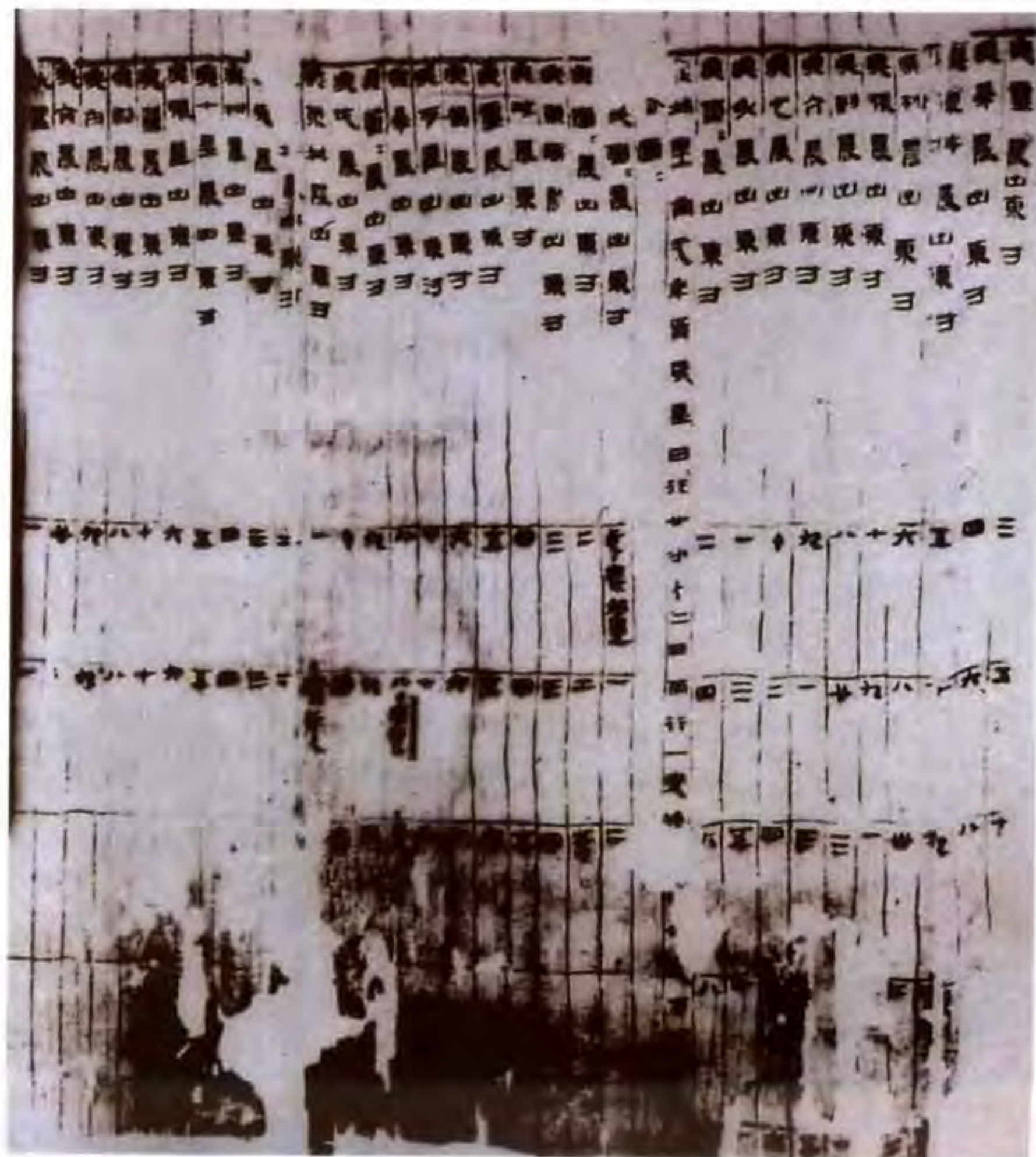
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中《土星行度表》里,有以“张楚”纪元的记载。有人认为这是“张楚”为陈胜农民政权称号或国号的确证。也有人认为,“张楚”一词在《史记》里多次出现。《史记·天官书》记载:“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这说明当时打着复立楚国旗号的起义军不止陈胜一家,刘邦、项羽都是如此,因此说“张楚并起”。这样,怎么能说帛书《五星占》中的“张楚”就是陈胜建立的政权的国号或者王号、年号呢?

原来,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朝

廷下令征调淮河流域一带的贫苦农民九百人到渔阳(治今北京密云)戍守。陈胜、吴广在被征之列,并被指定为屯长。这九百名戍卒,在秦尉的监督下,行至蕲县大泽乡(在今安徽宿县),正赶上大雨,道路不通,无法按期到达指定地点。按照秦法,戍卒误期要处斩。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陈胜、吴广共同分析了当时的情势和出路,一致认为,逃亡是死,起义也可能死,同样是死,倒不如起义反秦。准备工作就绪后,陈胜、吴广杀掉两个秦尉,发动士卒起义。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戍卒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举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旗帜。

陈胜、吴广率领起义军,诈称是公子扶苏、楚国名将项燕的军队,很快占领了大泽乡,接着攻克蕲县城。陈胜派葛婴率兵攻打蕲县以东的地方,主力部队则向西进军,连克铚(今安徽宿县西南)、酈(今河南永城西)、譙

帛书《五星占》中的“张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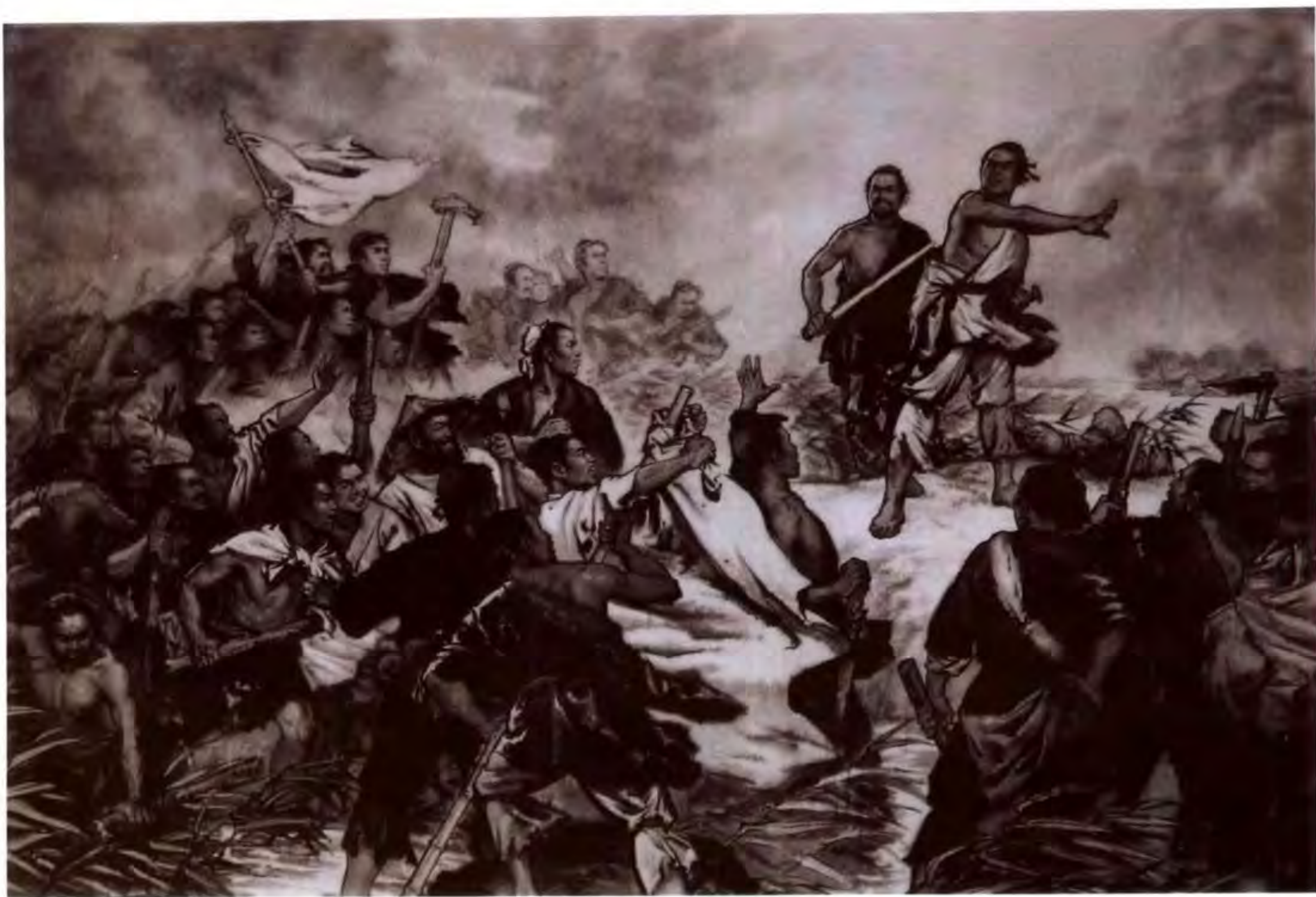
陈胜、吴广起义地点——大泽乡

(今安徽亳县)、苦(今河南鹿邑东)、柘(今河南柘城北)等地,又集中兵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人、步兵数万人,一举攻克陈县(今河南淮阳)。在大家的拥戴下,陈胜自立为王,号为“张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各地苦于秦朝统治的人们纷纷起来杀掉守令,响应陈胜,反秦风暴席卷全国。

陈胜在陈县建立起义政权后,就兵分三路,向秦朝发动总攻。一路由假王吴广率领,进攻荥阳(今河南荥阳);一路由宋留率领,取道南阳(今河南南阳),攻打武关;另一路由周文率领,进攻关中,直取咸阳。同时,陈胜派遣邓宗进攻九江郡(治今安徽寿春),派遣武臣、张耳、陈余等进攻赵国故地,派遣召平进攻广陵(今江苏扬州),在各地发展起义力量,配合主力西进。各路大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尤其是周文的十万军队,抵达函谷关时,已经发展成兵车千辆、战士几十万人的强

大军队。他们越过函谷关,打到距离咸阳只有几十里的戏水,直接威胁秦都咸阳。秦二世采纳章邯的建议,大赦天下,释放并武装骊山刑徒,由章邯率领三十万大军,向起义军猛扑,并从北方调回防御匈奴的王离的军队作为援军。由于孤军深入,后无救援,周文大军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被章邯的军队击败,不得不退出关中,屯军曹阳(今河南陕县西)。在渑池(今河南渑池西)一役中,周文的军队再次被章邯击败,周文自杀,西路军主力被击溃。章邯击败周文后,乘胜进逼荥阳。当时吴广正在荥阳城下同李由率领的秦军主力相持不下,吴广部将田臧假借陈胜的命令,擅杀吴广,引起起义军内部混乱,在章邯和李由两路秦军的夹攻下,这支起义军也告失利。

周文和吴广的西征军是陈胜起义军的主力。这两支大军的失利与溃败,极大地削弱了“张楚”政权的基础。章邯乘势向陈县进攻,陈



胜亲自率军奋力抵抗。由于起义军主力大部被派往各地，力量过于薄弱，加以魏、赵等地军队违抗陈胜的命令，拒不增援，起义军只得放弃陈县，向东南退却。秦二世元年（前209）十二月，陈胜退到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时，被其车夫庄贾杀害。此时，宋留大军已经攻占南阳。陈胜死后，南阳也被秦军攻陷，宋留向东退到新蔡（今河南新蔡），不久便投降秦军。陈胜、吴广牺牲后，由他们倡导的反秦斗争并没有结束。陈胜的部将吕臣与在鄱阳湖一带活动的英布合作，在青波（今河南新蔡西）大败秦军。他们后来与项梁领导的起义军联合，继续开展反秦斗争。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前后只持续了六个月，却沉重地打击了秦王朝的腐朽统治，为推翻秦王朝奠定了基础。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充分肯

定了陈胜、吴广在反秦斗争中的首倡之功。这样看来，陈胜、刘邦和项羽尽管先后起义，并且都打着复兴楚国的旗号，但在秦二世元年（帛书中写成秦始皇三十八年）真正对秦朝产生重大威胁的还只是陈胜的一支，因此说帛书《五星占》中的“张楚”为陈胜起义政权的称号还是令人信服的。

五、破釜沉舟

陈胜、吴广起义后，各地反应强烈。秦二世元年九月，楚国旧贵族项梁、项羽在吴县（今江苏苏州）杀死会稽郡守，率领精兵八千人响应起义；刘邦在沛县（今江苏沛县）县吏萧何、曹参等支持下，杀死沛令，聚众二三千人，在沛地起义。他们领导的起义军成为陈胜、吴广起义后最重要的反秦力量。

此时，奉陈胜命令进攻广陵的召平，听说陈胜败走，秦军又将南下，便渡江假称陈胜命

陈胜、吴广起义
姚有多创作

令，封项梁为上柱国，要项梁率领队伍向西进击秦军。于是项梁、项羽率领八千江东子弟兵渡江而西。秦二世二年（前208）二月，项梁军渡江后，先后与陈婴、英布、蒲将军、吕臣和刘邦领导的起义军会合，起义军的队伍迅速扩大到六七万人。同年六月，项梁得知陈胜遇害后，就召集各路起义军在薛城（今山东滕县东南）共谋反秦大略。项梁、项羽等采纳范增的建议，立前楚怀王的孙子心为王，仍号楚怀王，都于盱眙（今江苏盱眙北），封陈婴为上柱国，项梁自号武信君，掌管军政大权，成为各路起义军的实际首领。

薛城会议之后，反秦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秦二世二年七月，项梁与齐田荣军大破章邯军于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项羽、刘邦率军攻占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北），大破秦军于濮阳（今河南濮阳东），接着又率军转攻雍丘（今河南杞县），大破秦军，杀三川郡守李由。由于捷报频传，项梁滋长了严重的骄傲情绪。九月，章邯指挥秦军乘虚夜袭，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大破项梁军，项梁战死。项羽、刘邦被迫从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北）前线撤回，与诸军集结于彭城（今江苏徐州）。吕臣

军驻彭城以东，项羽军驻彭城以西，刘邦军驻砀郡（治今安徽砀山）。三支军队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等待时机。不久，楚怀王也自盱眙迁至彭城。

章邯破项梁军后，认为楚地的起义军主力已被消灭，不足忧虑，就北渡黄河向张耳、陈余所率领的赵军进攻。赵王歇、张耳退至钜鹿城（今河北平乡西南）。章邯命令王离的军队围困钜鹿，自己则北进至钜鹿南，修筑甬道，源源不断地为王离的军队输送军用物资。王离兵多粮足，又有章邯的军队作后盾，不断地向钜鹿发动进攻。赵王歇、张耳方面粮少兵弱，危在旦夕，于是派使者向楚怀王求援。楚怀王决定兵分二路：一路以宋义为上将军，负责指挥救赵各项军事活动，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他们率领主力北上救赵；另一路由刘邦率军向西挺进，直攻关中。

秦二世三年（前207）十月，宋义等率军北上救赵。大军至安阳（今河南安阳西南）后，宋义置赵之危难于不顾，逗留四十六日。这时正值天寒大雨，士卒饥冻，宋义却饮酒聚会。项羽盛怒之下，杀死了宋义。楚怀王封项羽为上将军，并令英布和蒲将军归项羽指挥。项羽首先派遣英布和蒲将军率领二万人渡漳河，直奔钜鹿，以突袭的方式断绝章邯运粮的甬道，切断王离军队的补给线。随后，项羽统率全军抢渡漳河。为表示拼死奋战的决心，过河后，他下令凿沉了所有的渡船，打破了煮饭的釜、甑，烧掉了军营，每人只携带三天的粮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破釜沉舟”的壮举。项羽同王离的军队九次大战，九战九捷。在战斗中，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终于大败秦军。秦军主帅王离被俘，大将苏角被杀，涉间自焚而死。钜鹿围解后，项羽乘机派蒲将军击破秦军于漳水之南，接着又亲率大军大败秦军于汙水（漳水支流）。由于屡战屡

项羽像



败，再加上秦二世的怒责，章邯不得不于秦二世三年七月在洹水南殷墟（今河南安阳）向项羽投降。

钜鹿之战，是秦末战争中最激烈的战争，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次大战。这次战役击垮了秦朝军队的主力，扭转了整个战争的形势，奠定了反秦斗争胜利的基础。

刘邦率领的另一支起义军也屡败秦军，于汉元年（前206）十月进驻灞上（今陕西西安东南）。仅仅当了四十六天秦王的子婴，以绳系颈，乘素车白马，捧着御玺符节，在咸阳的轵道（在今陕西西安境内）旁向起义军投降。盛极一时的秦朝就这样结束了短暂的十五年的统治。

第二章

强盛的西汉

经过四年的楚汉战争，刘邦终于击败项羽，于前202年建立汉朝，史称西汉。西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首先，西汉重新确立并巩固和发展了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同时建立了系统、严密、完整的经济和学术文化制度，为此后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奠定了基础。其次，西汉时期，中国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更为密切，许多民族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汉族的经济文化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周边各民族，从而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基础。第三，仅就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世纪初而言，西汉国家统一，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边患勘定，疆域开拓，四夷宾服，声威远播，在各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并满怀信心地与西方进行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影响着世界。



第一节 汉并天下

秦朝灭亡不久，刘邦和项羽又重燃烽烟。自前206年至前202年，他们为争夺全国的统治权而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战争，史称“楚汉战



争”。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他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对于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一、鸿门宴风波

鸿门宴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自事件发生起，这个故事就成为各种艺术门类争相表现的题材，其中较早的要数河南洛阳烧沟61号西汉墓出土的壁画《鸿门宴》了。该壁画中火炉左边绘二人席地而坐，相相对饮，态度安详。其中右侧紫衣肥壮、右手举角形杯作敬酒状的是项羽，左侧身着赭色衣、面向右而躯体后缩的为刘邦。靠近刘邦、面左拱手而立的是有意掩护刘邦的项伯，相貌如同妇人、拱手而立的是张良，怒视右方、与张良并肩而立的老者是范增，面目狞猛、右手握剑作跨步起舞姿态的是项庄。耐人寻味的是，作者以山峦为画面背景，又绘烤肉者二人作为陪衬，既烘托了野宴的气氛，又使画面显得匀称。只是这种处理方法，与鸿门宴发生的实际场所大相径庭。

根据文献记载，秦二世三年（前207）七月，当章邯向项羽投降之际，刘邦率领的另一支起义军正向咸阳进军，并于汉元年（前206）十月进入咸阳，推翻了秦朝的统治。项羽听说刘邦已经进入咸阳，就率领大军，冲破函谷

关，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准备与刘邦决一雌雄。本来，在楚怀王派遣刘邦和宋义两路军向秦军进攻时，曾经约定“先入关者王之”，刘邦先入关，理应为关中王，但是项羽自恃功高，企图独霸天下。当时，项羽拥兵四十万，号称百万；刘邦有军队十万，号称二十万。面对项羽的大兵压境，刘邦自知寡难敌众，就采纳了张良的献策，亲至鸿门谢罪，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刘邦这番话无疑告诉项羽自己无意称王关中，是有人造谣，使二人产生隔阂。于是项羽设宴招待刘邦。在宴会上，谋士范增几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项羽犹豫不决。范增离席，召项庄进去祝酒，想乘舞剑助兴之机，击杀刘邦。项庄祝酒完后，请求舞剑为乐，就拔剑起舞。项伯与张良素为好友，早已暗中通风报信，并与刘邦攀为儿女亲家。他识破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用心，也拔剑起舞。项庄多次想击杀刘邦，项伯都用身体遮护刘邦，使项庄无法出手。张良见事情危急，就到军门召见樊哙。樊哙单剑拥盾，闯入宴会上。他陈述刘邦之功，怒斥项羽听信谗言，要杀功臣。项羽非常欣赏樊哙的豪爽，赐给他酒肉，连连称他为壮士，

壁画《鸿门宴》（摹本）

西汉
原画1953年洛阳烧沟汉墓出土



并让他入席就坐。后来刘邦在樊哙的保护下趁机逃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

鸿门宴后数日，项羽率军入咸阳，杀秦王子婴，烧毁秦朝宫室，将财宝妇女劫掠一空。面对被烧残破的秦朝宫室，他拒绝了以关中为根据地、称霸天下的建议，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急于回江东老家耀武扬威。项羽拒绝按照原来怀王“先入关者王之”的指令，亲自发号施令，分割天下。项羽尊怀王为义帝，都于郴（今湖南郴县），接着又暗杀了义帝。他自立为西楚霸王，占梁、楚九郡，都于彭城（今江苏徐州）；然后分封十八路诸侯，封刘邦为汉王，居巴蜀汉中，都南郑（今陕西汉中东）；章邯为雍王，都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今陕西西安阎良镇附近）；董翳为翟王，都高奴（今陕西延安东北）；魏豹为西魏王，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今河南洛阳）；韩成为韩王，都阳翟（今河南禹州）；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赵歇为代王，都代（河北蔚县西南）；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英布为九江王，都六（今安徽六安）；吴芮为衡山王，都邾（今湖北黄冈）；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今湖北江陵）；韩广为辽东王，都无终（今天津蓟县）；臧荼为燕王，都蓟（今北京西南）；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田都为齐王，都临菑（今山东临淄）；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今山东泰安东南）。项羽还封番军将领梅鋗为十万户侯，将南皮县旁之三县封给陈余为侯。

项羽的分封具有自己策略方面的考虑。首先，项羽分封基本遵循谁夺取的地盘归谁的原则，如申阳先夺取河南，就立其为河南王；司马卬定河内，就立其为殷王；张耳是赵的实权派，就以张耳为常山王，王赵地；吴芮

率领南方百越援助诸侯，就立其为衡山王。其次，项羽大量分封楚以外的其他诸侯的将领为王，表面上是论功行赏，冠冕堂皇，实际上是拉拢这些拥兵据地的实力派，造成“尽王故王于丑地，而王其群臣诸将善地，逐其故主”的结果，具有挑起诸侯内斗、分诸侯之势以弱诸侯的深层动机。第三，分封刘邦为汉王，封秦朝三降将王关中，利用他们堵死刘邦的出路，说明项羽的分封还是一种打击政敌的手段。由于项羽的分封确实出于私利的考虑，在分封中酬恩报怨，使用欺诈手段，并且其分封不具有权威性和神圣性，他和诸侯之间完全是一种利与害的计较，心怀不满的诸侯只是慑于项羽的兵威敢怒而不敢言，因此这种分封不具有任何约束性，诸侯就国，尚未暖席，就立即展开争斗，天下重新陷入诸侯纷争的局面。

二、楚汉风云

1978年至1980年，山东淄博窝托村西汉齐王刘襄墓陪葬坑出土银器130余件，其中一件鎏金银盘尤为引人注目。这件银盘口径37厘米，高5.5厘米，直口，平折沿，折腹，外底微凹，口沿及内外腹各饰六组龙凤纹图案，内底饰盘龙三条，外底、口沿背面刻四组铭文，其中口沿背面刻有“卅三年”等字样。整个银盘纹饰篆刻精致娴熟，线条富于旋律感，具有战国时代的特点。

这件器物耐人寻味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其纹饰，更重要的在于铭文中“卅三年”的解释。当时的发掘者认为，汉初，不论汉帝，还是齐王，均无在位三十三年者，据此推断“卅三年”可能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因此这件器物当为秦代宫廷用器。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对盘上的铭文重新进行了辨识、分析，认为这件银盘为秦器不误，但应是秦昭王三十三年

(前274)秦国的造器机构“左工”所造，归掌管膳馐原料的“御羞”所有，后因某种原因转入周王之手，藏于掌管财物的“中府”，并刻以价格。秦王嬴政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可能将这件祖宗制造的宝器重新收入宫廷。银盘篆刻工艺精致娴熟，图案富丽，线条流畅，足以代表战国时期秦国金银制造业的水平。令人费解的是，这件豪华富丽的鎏金银盘，如何从秦代宫廷流入西汉齐王刘襄陪葬墓中？推测这很可能与楚汉战争有关。

众所周知，鸿门宴后数日，项羽将咸阳市付之一炬，并杀了降王子婴和一批大臣，然后载着搜刮而来的秦宫中的金银财宝和美女而去。被项羽劫掠的这批金银财宝，有的可能属于战国秦的作品，有的可能是秦统一中国

后制造的。但是项羽东去后不久，汉元年（前206）五月，田荣在东方起兵，赶走被项羽封为齐王的田都，追杀胶东王田市，自立为齐王，又杀死济北王田安，尽据三齐之地；同时又赠予彭越将军印，令其夺回梁地。没有得到项羽封地的陈余又向田荣献策，将项羽封为常山王的张耳赶走，将其故地给与赵王歇，陈余被赵王立为代王。与此同时，刘邦以韩信为大将，乘机暗渡陈仓（今陕西宝鸡东），自汉中攻入关中，在三个月之内先后消灭了为秦遗民所极力反对的三秦王，接着挥师东下，出武关，由此揭开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的帷幕。

项羽知刘邦已并汉中，齐赵反叛，大怒。此时，刘邦谋士张良致书项羽，说刘邦只想得到关中，不敢东向。项羽信以为真，不西击刘



鎏金银盘

秦

口径37厘米，高5.5厘米
1978年至1980年山东淄博
窝托村西汉齐王刘襄墓陪葬
坑出土

刘邦像



邦，而北击齐。汉二年冬，项羽在城阳（今山东莒县）打败田荣，田荣被杀死。项羽兵至齐地后，毁城放火，掳掠妇女，坑杀田荣降卒，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齐人相聚而叛之”。田荣弟田横收集散兵，带领数万人，与项羽在城阳争战，双方相持不下。刘邦乘齐、楚相争之际东进，降伏魏王豹，掳殷王司马卬。到达洛阳新城后，刘邦听从三老董公的计策，公开为被项羽杀害的义帝发丧，指项羽杀掉天下共立的义帝，实为大逆不道，号召诸侯出兵讨伐，公开宣布同项羽决裂。从此，楚汉战争进入全面展开的阶段。

汉二年春，刘邦率领五路诸侯、总计五十六万人的军队，向东讨伐项羽。四月，刘邦率军攻入项羽都城彭城，取得了同项羽公开决裂后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正在齐地作战的项羽得知此消息，立即率精兵三万回击。刘邦被项羽一举击溃，士卒被杀十余万人，又有十余万人被杀死或挤落于睢水中，以致“睢水为之不流”。刘邦几乎当了俘虏，仅仅率领数十骑逃脱。刘邦败退荥阳，诸侯都背汉向楚。幸亏萧何调发关中老弱未成年者补充兵力和韩信的增援，汉军才重振旗鼓。从此汉、楚双方在

荥阳、成皋一带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汉三年五月，项羽重兵包围荥阳。刘邦留下诸将守城，自己率领数十骑从西门逃出。为缓和荥阳、成皋一线的形势，袁生建议，把项羽引向南方，使韩信等乘机抓紧北线的进攻，稳定河北，联合燕、齐，形成对项羽的包围，然后自正面荥阳、成皋突击，这样使项羽疲于奔命，顾此失彼。刘邦采纳袁生的建议，从武关出兵宛（今河南南阳）、叶（今河南叶县）。项羽果然引兵南下，刘邦坚壁不与战。这时，彭越乘项羽兵力被牵制之际，渡过睢水，与楚将项声、薛公战于下邳（今江苏邳县），大败楚军，杀薛公。项羽派终公守成皋，自己率军东攻彭越。刘邦乘机率兵击败终公，重新占领成皋。六月，项羽击败彭越，得知刘邦重新占领成皋的消息，又率兵而西攻克荥阳，包围成皋。刘邦与滕公从成皋玉门逃脱，进入张耳、韩信的营垒。八月，刘邦采纳郎中郑忠的建议，高垒深壁，屯兵于小修武（今河南获嘉东），同时派遣卢绾、刘贾率步兵二万人、骑兵数百，从白马津（今河南滑县东）渡过黄河，帮助彭越焚烧了楚军的粮食辎重，并攻下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外黄（今河南开封东）十七城。九月，项羽命令海春侯大司马曹咎固守成皋，自己亲率军队东攻彭越。汉四年冬十月，汉军进攻成皋，楚军坚守不出。汉军故意在阵前辱骂，曹咎被激怒出兵，军队半渡汜水时，遭到汉军的袭击。楚军被击败，曹咎自杀。同月，韩信用蒯通的计策，突袭攻破齐国。项羽派龙且率军解救齐国危困。十一月，韩信与灌婴击败楚军，俘虏齐王田广。听到曹咎兵败的消息，项羽率军西还，楚汉双方在广武（今河南荥阳东北）相持不下。韩信占领齐地后，被刘邦封为齐王，奉命进攻项羽，再加上彭越、田横不断骚扰楚军，断绝楚军的粮食供应，使项羽“少助食尽”，腹背受敌。此前，八月，项羽被迫与刘

邦讲和，双方以鸿沟（在今河南中牟）为界，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九月，项羽撤兵东归，刘邦也欲引兵而西，张良、陈平力劝刘邦趁势灭楚。他们认为，不趁此时灭楚，则“养虎自遗患”。刘邦听从张良、陈平的劝告，决定乘势出击，使项羽无喘息之机。汉五年十二月，刘邦集结韩信、彭越、英布等各路大军，将项羽包围在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入夜，汉军唱起楚歌，动摇项羽的军心。项羽连夜带领壮士八百余人突围而逃，最后在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自刎。

在楚汉战争中，项羽从秦宫中搜刮而来的那些金银财宝，可能有些为刘邦所得，这件战国时期秦国制造的鎏金银盘就是其中的一件。汉朝建立后，刘邦分封同姓王，很可能将这件代表荣耀的战利品送给自己所喜爱的儿子齐王刘肥。刘肥卒，子刘襄继立。刘襄卒，就将这件鎏金银盘当作了随葬品。这件鎏金银盘重见天日，使我们得以了解战国时期秦国金银器制造业灿烂辉煌的一面。

三、汉并天下

瓦当是古代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最初为半圆形，后变为圆形。中国用瓦当始于西周，从西周至明清各朝代，瓦当在式样、花纹上都有所不同。陕西西安汉长安城出土的这件瓦当直径不过17.5厘米，上面有“汉并天下”四字瓦文，是为了纪念刘邦战胜项羽、统一天下、建立汉朝而作。

汉五年（前202）二月，刘邦在汜水之阳的定陶（今山东定陶）登基，由“汉王”变成汉王朝的“皇帝”，是为汉高祖。在享受“汉并天下”的欣喜之余，刘邦面临着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和人口大量锐减的严峻现实。如何恢复生产，安定民生，稳固统治，成为摆在西汉君臣面前的当务之急。

刘邦采纳陆贾宽刑简政、休养生息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发展经济、稳固封建统治秩序的措施。首先，他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发展经济的措施，主要包括让士兵复员，愿留在关中的免除十二年的徭役，回归原籍的免除六年徭役；因战争逃亡山泽回到原籍的，恢复其故爵田宅，严禁官吏虐待；因饥饿自卖为奴婢的，恢复其庶民的身份；减轻租税，实行十五税一。这些措施对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生产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次，采取了一系列扩大统治基础的措施，主要包括赐军吏卒爵位，并按照功劳的大小分配田宅、免除徭役，从而在政治上、经济上扶持一批因军功而获得土地的地主，使他们成为新政权的拥护者；诏令各郡守、诸侯相国举荐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并负责护送到京师，成为汉代重视举荐人才的先导。第三，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统治秩序的措施，主要包括接受娄敬的建议，将齐、楚两地的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迁徙到关中，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命令萧何删除秦律中夷三族及连坐

“汉并天下”瓦当

西汉
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直径17.5厘米



的回答是：“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用壮丽的外观来强调帝王的威势，是汉初宫室设计的主导思想。未央宫在城的西南部，又称西宫，为皇帝朝会之处。据勘探，未央宫平面呈方形，四面筑围墙。东、西两墙各长2150米，南北两墙各长2250米，周长合汉代二十一里，全宫面积约5平方公里，约占城内总面积七分之一。据记载，其四面各有一个司马门。东面和北面门外有阙，称东阙和北阙。诸侯来朝，入自东阙；平民上书，则诣北阙。北门外立有著名相马者东门京所制的铜马，因此也叫金马门。宫内主要建筑物有前殿、宣室殿、温室殿、清凉殿、麒麟殿、金华殿、承明殿、高门殿、白虎殿、玉堂殿、宣德殿、椒房殿、昭阳殿、柏梁台、天禄阁、石渠阁等。据勘测，前殿居全宫的正中，基址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200米，北端最高处15米，是利用龙首山的丘陵造成的。1981年至1983年在未央宫前殿遗址北330米处，发掘了皇后居住的椒房殿遗址，发掘面积计12392平方米。椒房殿由正殿、配殿、厢房建筑组成，正殿前有双阙，内有庭院、踏步、回廊、散水、水井，并发现了巷道（暗道）、上殿的空心砖踏步。未央宫北面的天禄阁和石渠阁，是西汉时期的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司马迁曾利用天禄阁和石渠阁内的珍贵资料，写出了不朽的名著《史记》。未央宫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宫殿，西汉和以后的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七个朝代的政治中心都在这里。

除未央宫和长乐宫外，刘邦还营建了武库和太仓等建筑。其中武库主要是储藏汉长安城中守卫部队的武器。该遗址自1975年以来进行了科学发掘，遗址平面呈长方形，东墙和西墙各长320米，南墙和北墙各长约800米。武库内设一道隔墙，将其划分为两个院落，东

院有四个武器库，西院有三个武器库。该地曾出土存放兵器木架的础石，铁制的甲、戟、矛、剑、刀、镞和铜制的戈、镞等。

由此可见，汉高祖刘邦是以宫室、武库、太仓等这些代表政权、军权、财权的建筑作为都城规划的主要内容，以此来表明皇帝的尊严和政权的巩固，但在使用上还是有明确划分的，如大朝在未央宫，太后居长乐宫。

第二节 郡国并行

汉高祖刘邦在铲除异姓王后，大封同姓诸侯王，实行郡国并行的体制。这些同姓诸侯王在稳定刘氏政权、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繁荣学术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诸侯王国势力的膨胀，他们与西汉中央集权制度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酿成了吴楚七国之乱。

一、白马盟誓

公元前195年，刘邦讨伐英布叛乱后回师长安，途经故乡沛县，置酒与父老子弟欢聚，恣意畅饮。席中，刘邦击筑而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有名的《大风歌》。在歌中，刘邦并没有认真去想，异姓王为什么会造反，只是责备他们不肯替自己忠诚地守御四方。其实，刘邦之所以与诸侯王闹到这步田地，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早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争取同盟军，打败项羽，曾分封了韩信、英布、彭越等一些重要将领为王。西汉建立后，刘邦在洛阳南宫宴饮，曾经与群臣讨论自己为什么能够战胜项羽。他认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自己不如张良；坐镇后方，安抚百姓，调

运军粮，自己比不上萧何；率军出征，战必胜，攻必克，自己不及韩信。他的成功实赖于群臣之力，因此在建立刘氏王朝后，刘邦便裂土分封这些出生入死的文臣武将，与他们一起分享胜利的果实。

刘邦封功臣侯者百余人，封王的先后有八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敖（死后子张敖嗣）、燕王臧荼、燕王卢绾、韩王信、长沙王吴芮。这些异姓王功高权重，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他们的存在对中央集权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刘邦想方设法要消灭他们，以去掉自己的心腹之患。异姓王中要数韩信才能最高，功劳最大，因此被认为最为危险。前201年，有人告发楚王韩信谋反。刘邦采纳陈平的计策，假装游猎云梦，待韩信赶到陈县朝见时，便逮捕了他。回京免去死罪，将他贬为淮阴侯，最后被吕后、萧何骗进宫里给杀害了。前196年，刘邦又以谋反为借口，杀了彭越，还将他的尸体斩成肉酱，分赐给各地诸侯。这是一种警告。英布感到厄运就快降到自己头上了，于是起兵反汉。汉高祖亲征南方，英布兵败被杀。到前195年为止，刘邦先后将燕王臧荼、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杀掉，赵王张敖被废为列侯，韩王信、燕王卢绾逃入匈奴，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小的长沙王吴芮，作为汉朝与南越王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在被消灭的七个异姓诸侯王中，赵王张敖、梁王彭越本无反意；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卢绾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反；燕王臧荼造反原因不详；韩信则是因为心怀不满而图谋造反。因此，确有主动谋反意识的仅韩信一人而已，而且韩信主动谋反的意识萌生于贬为淮阴侯之后。这样看来，刘邦削平异姓诸侯王，纯粹是为了保证君主享有绝对的权力，确保刘氏家天下。

随着异姓王的剪除，刘邦总结秦朝灭亡

的教训，认为秦朝覆亡是由于没有分封子弟为王，屏藩皇室所致。他陆续分封齐王刘肥、楚王刘交、代王刘仲、吴王刘濞、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梁王刘恢、赵王刘如意、淮阳王刘友、燕王刘建等刘姓子弟为王，并杀白马盟誓：从今后，非刘氏不得封王，非功臣不得封侯。如果违背的，天下共同讨伐。刘邦以为有这么多同姓诸侯王的屏藩，刘氏天下就可以固若金汤。他哪里想得到，自己尸骨未寒，吕后就大封诸吕为王，差一点动摇了刘汉江山。又哪里知道四十年后，同姓诸侯王也因觊觎帝位而发动叛乱。

二、周勃安刘

1999年7、8月间，在山东章丘洛庄发现了第一代吕王吕台的墓葬。其陪葬坑中不仅出土了“吕大官印”、“吕内史印”和“吕大官丞”三种吕国的官署印章，还出土了大量刻有“齐”的铜器和漆器，显然是齐王迫于吕后的压力而主动进贡的。这些器物真实地再现了吕后统治时期吕氏诸王和刘氏诸王的微妙关系，也显示了诸吕的强大势力。刘邦在白马盟誓中曾提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诸吕是如何被分封为王的？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势力呢？其实原因很简单，都是因为吕后的缘故。

汉高祖刘邦在临终之前嘱咐吕后，自己死后由萧何、曹参、王陵、陈平等相继任丞相。刘邦死后，子刘盈继位，是为惠帝。刘盈时年十六岁，尚未成年，且生性懦弱，大权掌握在吕后手中。吕后玩弄权术，想大封吕姓亲属为王侯。对于分封诸吕为王的问题，她首先问右丞相王陵。耿直的王陵说：“高帝曾经杀白马盟誓，说：‘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现在封吕氏为王，是没有遵守盟约。”吕后听了很不高兴。她又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

这两位老谋深算的刘邦功臣巧妙地回答道：“高帝做天子，可以封子弟为王；现在您君临天下，当然也可以封吕家子弟为王。”吕后于是拜王陵为太傅，实际上是免去了王陵的右丞相，而以左丞相陈平为右丞相，以审食其为左丞相。

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吕后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她先选择刘家有功和有影响的人物封王封侯，以缓和刘氏对吕氏的对立情绪，并封刘邦时的功臣冯无择为博成侯，封刘章为朱虚侯、刘章之弟刘兴居为东牟侯，都让他们入廷宿卫，加以控制。她还封诸刘中年龄最长的刘泽为琅邪王。在王诸吕前，吕后先封诸吕为侯，作为以后封王的准备。至前180年，吕后相继封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吕通为燕王等。

吕后抑制刘氏诸侯王的做法，引起宗室和群臣的反对，他们暗中酝酿着铲除诸吕的斗争。前180年，吕后病危。她自知封诸吕为王不得人心，刘家的势力还是比吕家的大，就告诫吕产、吕禄说：“高帝平定天下后，曾与众大臣杀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现在吕氏被封为王，大臣心中不平。我就要死了，皇帝年少，大臣恐怕要发动政变。你们一定要抓住军队，将宫室牢牢地守护住，小心谨慎，千万不要发丧，不要被人控制。”吕后死后，诸吕计划大杀功臣。朱虚侯刘章知道后，立即通知齐王刘襄，要他起兵进攻长安，消灭诸吕，同时联合周勃、陈平等，使用计谋夺得兵权。周勃率先入宫，朱虚侯刘章杀吕产，诸吕男女无论少长都被诛杀，吕氏集团被彻底消灭，代王刘恒被迎立为帝，是为文帝。在消灭诸吕的过程中，大臣周勃发挥了重要作用，应验了刘邦“安刘必周勃”的预言。起初，齐王刘襄起兵时布告天下，自己出兵的目的是“诛不当为王者”。消息传到长安，相国

吕产派颍阴侯灌婴领兵迎击齐王的军队。灌婴的军队到达荥阳后却停止不前，与齐王联合，告谕诸侯，静观诸吕动态。由于在诸侯国中实力最强，齐国出兵无疑对诸吕产生了强大的威慑作用，使他们信心不足，犹豫不决。作为外援，齐王刘襄有力地配合了平定诸吕之乱，确保了刘氏王朝的存在。从这件事上看，刘邦当年的愿望并没有落空。

三、藩国强势

根据《汉书·诸侯王表》记载，汉高祖刘 洛庄汉墓 35 号坑下部陶器



楚王墓兵马俑

西汉

1984年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随葬坑出土

狮子山楚王墓随葬坑出土了数千件彩绘兵马俑，以步兵俑为主，骑兵俑也有，战车已不见，反映了战车在军队组合中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重要地位，对研究西汉军事制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邦分封的同姓诸侯王几乎占据了国土的大部分，大的诸侯王国，甚至“跨州兼郡，连城数十”，中央直辖的仅仅有十五郡。这些藩国在政治上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根据新旧出土的印章、封泥、铭文材料，王国官制同汉中央官制相同或相似，包括丞相（相）、傅、内史、御史大夫、太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典客、宗正、大司农、少府、中尉、将作少府、詹事、将行等，基本上

是中央官制的一个缩影。其中国相由天子代置，是诸侯国中的最高行政长官，对于诸侯王既有辅导之责，又有谏诤或举奏之责。傅也由天子代置，职在辅王，遇有诸侯王不法，得谏诤或举奏于朝。自内史以下的官员，则由国王自置。国王在用人方面有很大的权力，可以网罗有用的人才，任以显职，并给予很高的爵位，又和中央一样可以置郎官、谒者，以培植亲信和爪牙。在王国内，国王还有较为独立的



司法权，在臣民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在军事方面，王国拥有为数不少的军队，如刘邦在进攻英布时，齐悼惠王以车骑十二万来相援。1978年至1980年，山东临淄齐王墓随葬坑出土了戟、铍、弩机、箭镞等兵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是汉初齐国军事实力强大的生动写照。1984年，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随葬坑出土数千件彩绘兵马俑，手中所持多为象征性的兵器，为楚国所拥有军队的模

型。汉代有通过虎符来控制王国发兵的制度，但是在文帝以前或文帝早期似乎在王国中尚未实行。这样，诸侯王就拥有了能够为自己所控制的军事力量。

在经济方面，王国不仅可以向臣民征收租税，而且还可以利用铜、铁、海盐等各种自然资源来增加财政收入。如吴王刘濞，居国以盐铁铜冶致富，平时百姓无赋，有事征发徭役则给予佣金。齐国“膏壤千里，宜桑麻”，有



金禽铜戈

西汉

1978年至1980年山东淄博临淄齐王墓随葬坑出土
长22.5厘米，高12厘米
这件铜戈，形制与战国时期的相仿，装金质筒形禽，顶饰一只回首鸳鸯，堪称西汉铜戈的精品。这一类铜戈主要用于宫廷仪卫。



鎏金铜弩机

西汉

1978年至1980年山东淄博临淄齐王墓随葬坑出土

长15厘米，高16.6厘米。此弩机有铜廓（机匣），其中的机件有望山（照门，类似现代瞄准器上的标尺）、悬刀（扳机）、钩心（又名牛，即棘爪）和两个贯穿各部件的轴孔，使之组合在一起的键。这件鎏金铜弩机尽管鎏金有剥落，机件也有遗失，但仍显示了汉代弩机的基本结构和制作工艺。机上有“□工何造”字样，“□工”为工官之称，“何”为人名。

渔盐之利。在汉初政治较为稳定的社会条件下，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为社会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山东临淄齐王墓随葬器物坑出土了矩形铜镜、金禽铜戈、铜炉及百余种漆器等，正是当时齐国手工业发达的标志，也是齐国社会经济繁荣的一个缩影。当时，许多依法不得仕宦的商贾子弟纷纷投靠到诸侯王门下，依靠他们的钱财，交结王侯，更增加了诸侯王的经济实力。

由于诸侯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强大实力，许多诸侯国的国都成为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楚王刘交、淮南王刘安、河间献王刘德、梁孝王刘武、鲁恭王刘余都以好学著名，招宾客，养贤士，让他们著书讲学，或创作文艺。

汉高祖刘邦统治时期，诸侯王年龄还小，再加上长期战乱，经济凋敝，他们还不足以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文帝统治时期，诸侯王集军权、财权、行政权于一身，并用学术文化作

为自己的点缀，羽翼日益丰满，实力已今非昔比。“山雨欲来风满楼”，它们与中央的矛盾一触即发。

四、七国之乱

1965年在陕西咸阳杨家湾长陵4号墓和5号墓南边的十一个陪葬俑坑内，出土了2500余件彩绘兵马俑，其中步兵俑1800多件，骑兵俑580多件，还有战车模型。步兵俑四个坑和骑兵俑六个坑，分左右两列，每列五坑，横向为前后两排，每排两坑；战车坑一个，居两列之间，模拟送葬的仪仗军队，也是当时军阵的真实反映。战车坑居中，说明战车居主位；骑兵俑所占比例，较秦陵兵马俑坑的情形已经显著增多，且独坑布置，自成方阵，表明骑兵已经成为独立兵种。这批兵马俑反映当时的战争形式正处于由车骑并用向以骑兵为主力的转化中。随葬坑的主人据说是汉代周勃、周亚夫父子。周勃是消灭诸吕、安定刘姓王朝的功臣。周亚夫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名声一点也不比其父逊色。那么，吴楚七国之乱又是怎么回事呢？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侯王国的势力逐渐膨胀。由于汉文帝以外藩入继大统，威信未立，羽翼不丰，对诸侯王多予优容。汉文帝的这种做法不仅没有收到任何实效，反而助长了诸侯王骄纵不法的气焰，济北王刘兴居与淮南王刘长就先后发动叛乱。虽然济北王、淮南王的反叛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却表明诸侯王羽翼丰满，正在日益威胁着中央集权制度。政论家贾谊在其《治安策》中指出，如果听任诸侯王国势力的发展，势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必须采取措施予以根治。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就是把一个诸侯国分为几个，分散他们的力量，使他们无力

对抗中央。贾谊的建议得到了文帝的重视，不久他就封齐悼惠王六子为王，分淮南为三，立淮南王三子为王。但是贾谊的建议仅仅是分而治之，朝廷并不直接增加辖地，不能从根本上抑制已经膨胀起来的诸侯王国的势力。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开始削夺王国的土地，划归中央直接管辖。他从势力较小的王国开始，先后以各种罪名削去楚王刘戊的东海郡、赵王刘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刘卬的六个县，引起吴王刘濞等诸侯王的极大震动。前154年，吴王刘濞串通楚、赵、胶东、胶西、济南、菑川六国的诸侯王，公开举兵叛乱。

吴王刘濞借口“请诛晁错，以清君侧”，把封国内十四至六十二岁的男子二十余万人编成军队，亲自率领，从广陵（今江苏扬州）起兵，渡淮北上，先并楚军，进攻梁国；胶西、胶东、菑川则围攻齐国。吴王刘濞宣布赏赐的办法，“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户。皆为列侯”，气焰极为嚣张。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景帝派遣太尉周亚夫率

领三十六位将军迎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郿寄进攻赵叛军，将军栾布率兵解除齐国之围；任命窦婴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作为策应。同时，景帝杀掉晁错，命袁盎为太常，去吴国劝刘濞退兵。刘濞不仅不退兵，反而扬言“我已为东帝”，于是景帝决定讨平叛乱。

七国反叛后，吴、楚合兵西进，梁国首当其冲，成为叛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梁国能否顶住吴楚的进攻，关系着这场战争的全局。主帅周亚夫的制敌之策，首先是用梁国的军队抵挡吴、楚的军队，其次是断绝吴、楚军队的粮道。其中梁国与吴、楚军队之间的较量最为关键。如果梁国抵挡不住吴、楚军队的进攻，叛军将会师洛阳，据有敖仓之粟，断绝其粮道的计策也就难以实施和奏效。由于梁王刘武是景帝的亲弟弟，同为窦后所生，与景帝关系最为密切。周亚夫明白其计策的实行，必然会结怨于梁王，所以向景帝请示。在得到景帝的批示后，周亚夫开始按计行事。周亚夫率军从蓝田出武关，到达荥阳，然后深壁高垒，避吴、楚军队的锐气。此时，吴、楚军队攻克棘壁（今河南柘城西北），杀数万人，乘胜向前推进。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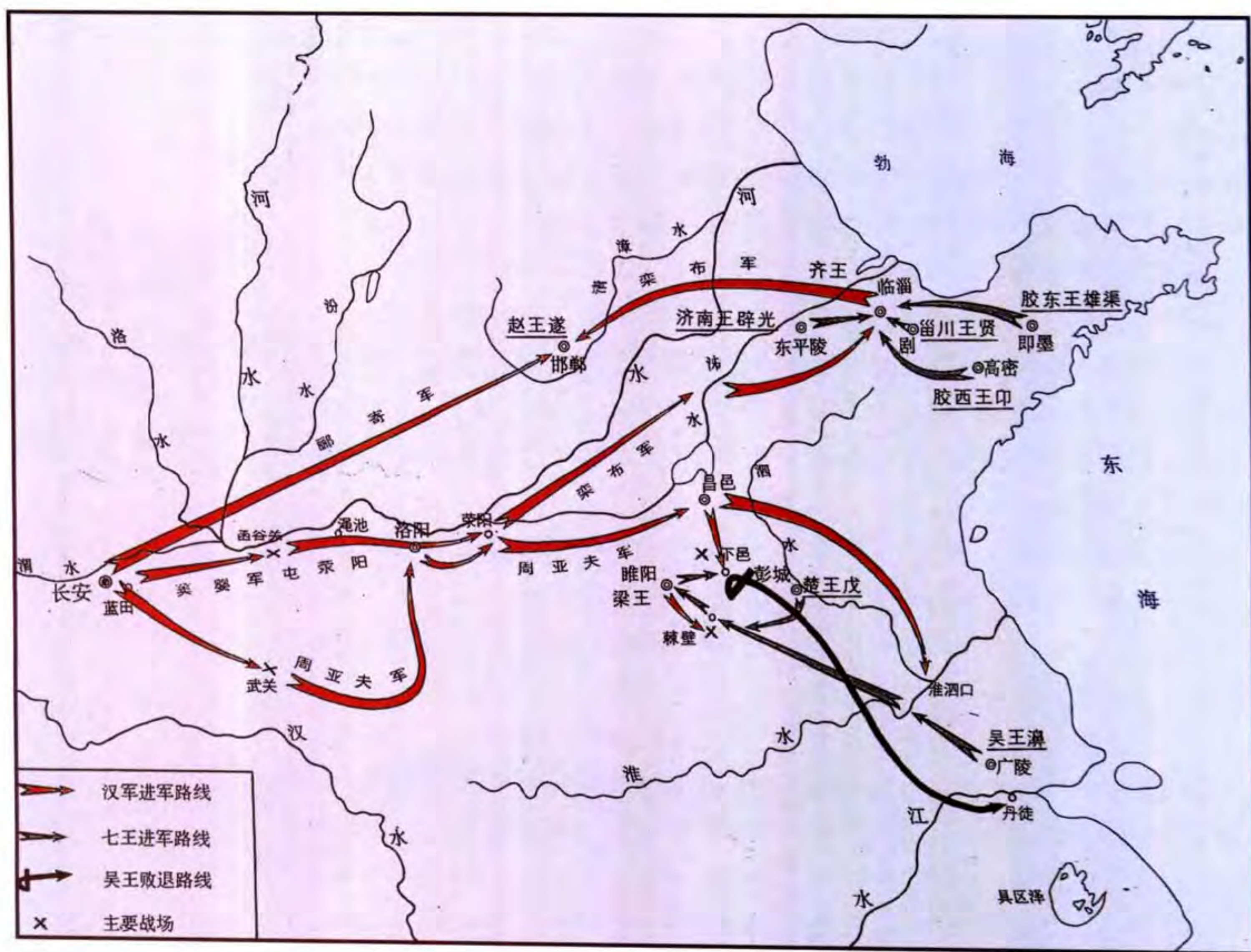


铁长铍及铜铸

西汉

1978年至1980年山东淄博临淄齐王墓随葬坑出土
铍首长72厘米，箍长13.3厘米，铸长28厘米

这件铍的柄已朽烂，复原后通长2.9米。铁长铍有长刃，兼具矛和剑的优点，较其他兵器有更强的杀伤力，在当时是一种较先进的武器。齐王墓随葬坑出土的铁长铍在数量上仅次于戟，说明它在当时武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平定七国之乱示意图

王派遣六位将军反击，其中两位将军被击败。梁王向周亚夫求救，还派人上书景帝，让景帝降诏周亚夫救援梁国，周亚夫都予以拒绝，坚壁不出。梁王只得依靠本国力量作战。他派遣韩安国和张羽为将军，跪送他们率兵出战，最后击败吴、楚军队，使他们不能越过梁国。同时，周亚夫派轻骑兵切断吴、楚军队的粮道，使吴、楚军队乏粮，斗志锐减，且不能持久作战。由于饥饿，士卒多叛乱逃散，吴王刘濞只得退军。周亚夫率领精兵追击，吴王刘濞仅率领千人南逃，后被东瓯王杀死。其余诸国也相继被打败。七国之乱经过三个月就平定了。

七国之乱的平定，使诸侯王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为彻底解决长期困扰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景帝首先对诸

侯王国的设置进行了大调整。他对参加叛乱的吴楚七国进行处置，除楚国另立王以续其后外，其他六国均被废掉，并新置或复置一批诸侯王国，继续立皇子为王。除临江国外，这些诸侯王国都分布在吴楚七国境内。通过设置这些王国，有效地加强了对吴楚七国地区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其次，结合对诸侯王的调整，景帝还大刀阔斧地全面推行削藩。到前141年，诸侯王国共有二十四个，比吴楚七国之乱前还增加了两国，但是他们与中央政权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为诸侯王领郡减少，大国不过十余城、小国数城而已；诸侯王领郡数少于中央辖郡数，使诸侯王国封域缩小，国力削弱，诸侯王国依仗国土广大作乱、威胁中央集权的

局面，基本上得到了改善。其三，汉初诸侯王拥有治民权，这是诸侯王国权势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前145年，景帝“抑损诸侯，减黜其官”。这主要表现为改王国丞相为相，由金印贬为银印，其官秩已与郡守相同，且仅辅佐国王，不得参与国政；废除其御史大夫、廷尉、宗正、博士等官；对大夫以下的官吏也予以裁减。同时，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的任免权全部收归中央，“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不能掌握政权和军队。从此，王国实际上变成了和中央直接统辖的郡一样的地方单位。其四，汉初，诸侯王在封国内可以征收赋税，这是汉朝中央政府赋予诸侯王在经济上的特权。吴楚七国之乱后，景帝将诸侯王这一特权取消，仅保留他们“食租税”的权利，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同中央相对抗的物质基础。到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可以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但是被封子弟之侯国，在管理上并不属于原来的诸侯王国，而是归汉郡所辖。这样，不仅使王国的势力范围缩小，而且扩大了汉朝直接管辖的地区，使中央集权比以前大为加强。前112年，汉武帝还颁布了“左官之律”和“附益阿党之法”。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以此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防止他们从事非法活动。附益法就是惩治非法增加王国收入方面的立法。阿党法就是严禁封国内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这样，皇权的力量更深入王国，紧紧控制和监督着诸侯王，诸侯王的独立性丧失殆尽。

可悲的是，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打击藩



王方面立下汗马功劳的周亚夫并没有得到善终。由于在平乱时他丢开梁国不管，甚至不奉诏救梁，不仅得罪了梁王刘武，也使窦太后很不高兴。这两个人不免在景帝面前讲周亚夫的坏话。后来在废立太子、分封匈奴降将等问题上，周亚夫据理力争，又得罪了景帝。景帝于是以谋反的罪名将周亚夫逮捕入狱。周亚夫气愤万分，绝食五天，饿死在狱中。一代名将最后落得如此下场。今天我们通过杨家湾的兵马俑，还能感受到他当年指挥千军万马、平定叛乱的魄力。

杨家湾兵马俑

西汉

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随葬坑出土

高64厘米

第三节 文景之治

西汉王朝建立后，高祖、惠帝和吕后都致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成效。文帝、景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在他们统治的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社会安定，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复兴，社会呈现一片稳定、升平的景象，形成历史上所称誉的“文景之治”。

一、太仓之粟，陈陈相因

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中出土了一件陶仓模型。陶仓模型在汉墓中多有发现，从表面看这件陶仓模型并无新奇之处。出人意料的是，这件陶仓模型出土时，内盛鲜黄

陶仓

西汉

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
高34.5厘米



稻穗四束。该墓葬属于文景时期，这四束稻穗既是当地把稻米当作重要主食的反映，也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一种象征。

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与汉文帝、景帝对农业的重视密不可分。文帝提倡以农为本，多次发布诏令劝农。前178年、前168年，文帝先后减免田租的一半；前167年，更是下诏免除了一年的田租。为表示朝廷对粮食积贮和大量农民“背本而趋末”问题的重视，文帝在春耕时节到京城的“藉田”上举行亲耕仪式，向天下表示皇帝奖励农耕。为缓和谷贱伤农的现象，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号令百姓为国家输送粮食到边境，根据输送粮食的多寡，赐给不同等级的爵位。景帝时继续实行劝勉农耕的政策，“屡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前156年，他下诏准许民户由土地饶薄、耕地缺少的地方迁到耕地多、水源丰富的地方；实行三十税一，从此成为汉朝的定制。前141年春，他下诏各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同时禁止官吏采买黄金珠玉，违反禁令的以盗窃论罪。这些措施从根本上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由于农产品丰富，当时的谷价每石三十钱，高不过百余钱，粟价低到每石十余钱。《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家给人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的高度发展。因此，在出土的陶仓中随葬稻穗就不是偶然的了。

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也日趋繁荣，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产品。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鼎、匕、盒、壶、钫、卮、耳杯、盘、奩、案、几、屏风等大量漆器和各种丝织品及



石猪

西汉

1956年湖南长沙南门外出土
大者长18.3厘米，小者分别
长4.9厘米、4.5厘米、3.7厘
米

汉代已普遍养猪，以圈养为主。一些地方官吏要求每户养两头母猪、五只鸡或者一头猪、四只母鸡。汉代葬俗中，还往往在死者手中各放一件这样的石猪。

衣物，无不保存完好，制作精美。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壶、奩、圆盒、樽、孟、勺、案、几等漆器，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耳杯、高足杯、卮、枕、佩饰等大量玉器，无不工艺精湛。这些漆器、丝织品、玉器的大量出土，既反映出当时手工业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也是当时社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一个缩影。

二、改革货币，货流天下

西汉初年，允许百姓自铸荚钱。所谓荚钱，就是既轻且薄的钱，钱文仍为“半两”，因其形状如榆荚，故称荚钱。荚钱直径多在2.2厘米以下，重量在2克（3铢）以下。由于允许民间自铸，有些钱币更小，如山东章丘出土的荚钱石范，钱径仅0.6厘米。由于钱越轻小，交换价值越低，信用越差，因此货重钱轻，不法之徒乘机囤积居奇，使物价飞涨，以至米每石高达万钱，马至每匹百金。为了遏制这种势

头，前186年吕后开始铸造八铢钱。八铢钱比重十二铢的秦半两轻，较荚钱重，其文仍为半两。但是当时政府尚未拥有整顿货币的经济实力，在荚钱泛滥的市场上投入八铢半两，势必带来非法的销铜改铸，造成混乱，所以前182年仍然使用荚钱。

由于钱愈发变轻，前175年汉文帝改铸四铢钱，其文半两，并且废除盗铸令，允许百姓铸钱。吴国是当时的诸侯国，开山铸钱，财富可以与天子相匹敌；邓通是文帝的宠臣，文帝赐给他严道铜山，使他能够铸钱，因此，当时吴钱、邓钱在天下广为流通。吴钱、邓钱的广泛流通，使政府感到一种严重的威胁，于是文帝开始有选择地批准民铸，但是必须以政府规定的法钱为标准，违者处以黥罪。根据考古发掘，江苏六合楠木塘西汉铸钱遗址发现的吴国铸造的半两钱、徐州北洞山楚王陵发现的楚国铸造的大批半两钱及钱范、河南商丘梁王墓发现的梁国铸造的大批半两钱、安徽



小半两铜钱

西汉

1956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直径2.3厘米

西汉前期继承秦朝币制，政府仍铸半两铜钱，只不过重量比秦半两减轻，俗称小半两。

阜阳汝阴侯墓出土的汝南郡铸造的半两钱，均属于文帝时期的四铢半两钱。

文帝的四铢钱虽然准许民铸但有限制。如为了保持钱币的法定重量，使用中还要称量核验。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出土的称钱衡证实了这种做法。它表明政府要求全体民户及商家共同遵守政府的这项规定，并且刻在每个天平上予以监督。但是文帝四铢半两钱也受到荚钱的干扰，被磨取铜屑而出现不少减重钱，甚至有在铜中掺铁或全以铁铸的。如湖南衡阳凤凰山8号、6号、58号与82号西汉墓中均发现铜铁合金半两。由于劣币对良币会产生驱逐作用，特别是铸钱是吴楚七国反叛的经济基础，景帝就在前144年禁止民间私铸，只允许郡国铸钱，使西汉政府初步控制了货币的铸造权，成为汉武帝大规模币制改革的先声。

文帝、景帝采取的货币改革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盗铸问题，但是由于四铢半两比较稳定，物价的涨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

遏制，有利于商品流通。除货币改革外，文帝还“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实行工商自由政策，鼓励百姓致富，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当时依靠盐铁致富的比比皆是，如蜀地卓氏、南阳孔氏、鲁地邴氏等。这样，在国内形成了统一市场，富商大贾周流天下，所有物资都投入流通。《史记·货殖列传》中生动地描述道：在通邑大都，大到车船，小到瓜果蔬菜，无论是海中特产，还是地下珍异，全国各地生产的重要物产都应有尽有。其种类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漆器上有“成市草”、“成市饱”等烙印戳记，湖北江陵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漆器上有“成市草”、“成市□”等烙印戳记，说明这些产品出自成都市府作坊，是当时商品流通天下的重要表征。

三、兼容并包，学派纷呈

在学术文化领域，文帝、景帝实行开明的政策。西汉初年，黄老之学极盛，在朝廷中和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当时君臣崇尚黄老，但并不排斥、禁止、灭绝其他学术派别。《史记·礼书》说文帝不喜欢儒家的繁文缛节，但并不排斥儒家等学派，令儒家经典与诸子学说同立学官，为它们设置博士职位。文帝曾派遣掌故晁错跟随儒学大师伏生学习《尚书》，晁错还因此获得博士职位。贾谊精通诸子之书，文帝把他召为博士。朝廷还允许不同派别的学者同坐一殿，毫无忌讳地辩论学术。景帝时期，“齐诗”专家辕固生与黄老学者黄生激烈地辩论商汤伐夏桀、周武伐殷纣的性质，实际上是从理论上探讨汉朝立国的合法性以及寻找历史根据。黄生认为，汤、武非受命，是以臣弑君。辕固生反驳说，桀、纣暴虐，天下人心都向着汤、武，所以汤、武是革命。双方各持一端，争论不休。最后，辕固生直率而又尖锐地点出争论实质：如果按照黄生的理论，那

么汉朝代替秦朝也是以臣弑君。学术辩论变成了政治是非之争，景帝并不动用皇权加以粗暴干涉，只是说：“食肉不食马肝，不算不知滋味；学者不言汤武受命，不为患！”不偏不倚，息事宁人，不强求舆论一律。文帝、景帝采取广泛全面的礼贤兴学的学术文化政策，对黄老以外各学派的存在和发展不加干预，放任自为，使诸学派得以共存并进，展示了宽容的胸襟。

文帝、景帝时期，从京师到郡国，学术文化气氛都很浓厚。浮丘伯在长安设帐教徒。文翁在蜀郡（治今四川成都）兴学，在成都商业区中筑学宫，派遣郡县小吏中聪敏有才的去长安受业博士。一批学术文化人物，如黄老学派的盖公、黄生等，阴阳家张苍、公孙臣等，经学家浮丘伯、申公、韩婴、高堂生、田何等，政论家贾谊等，文学家枚乘等，都活跃在文景时期。后来在汉武帝一朝极活跃的严助、严安、主父偃、朱买臣、司马相如、董仲舒等一批文学侍从名臣，实际上也都是文景时期所培养的。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大批帛书，按内容可分为六艺类、诸子类、兵书类、术数类、方术类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的竹简，内容包含《孙子》、《齐孙子》、《晏子》、《太公》、《尉繚子》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关于阴阳、时令、占候的著作等。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的竹简，有《诗经》、《仓颉篇》等书的部分抄本。1983年至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中出土大批竹简，其中有《脉书》、《引书》、《算术书》等著作。出土的这些著作涉及到很多学派，充分展示了文景时期兼容并包的政策下学术文化的高度繁荣。

四、节俭轻刑，不事奢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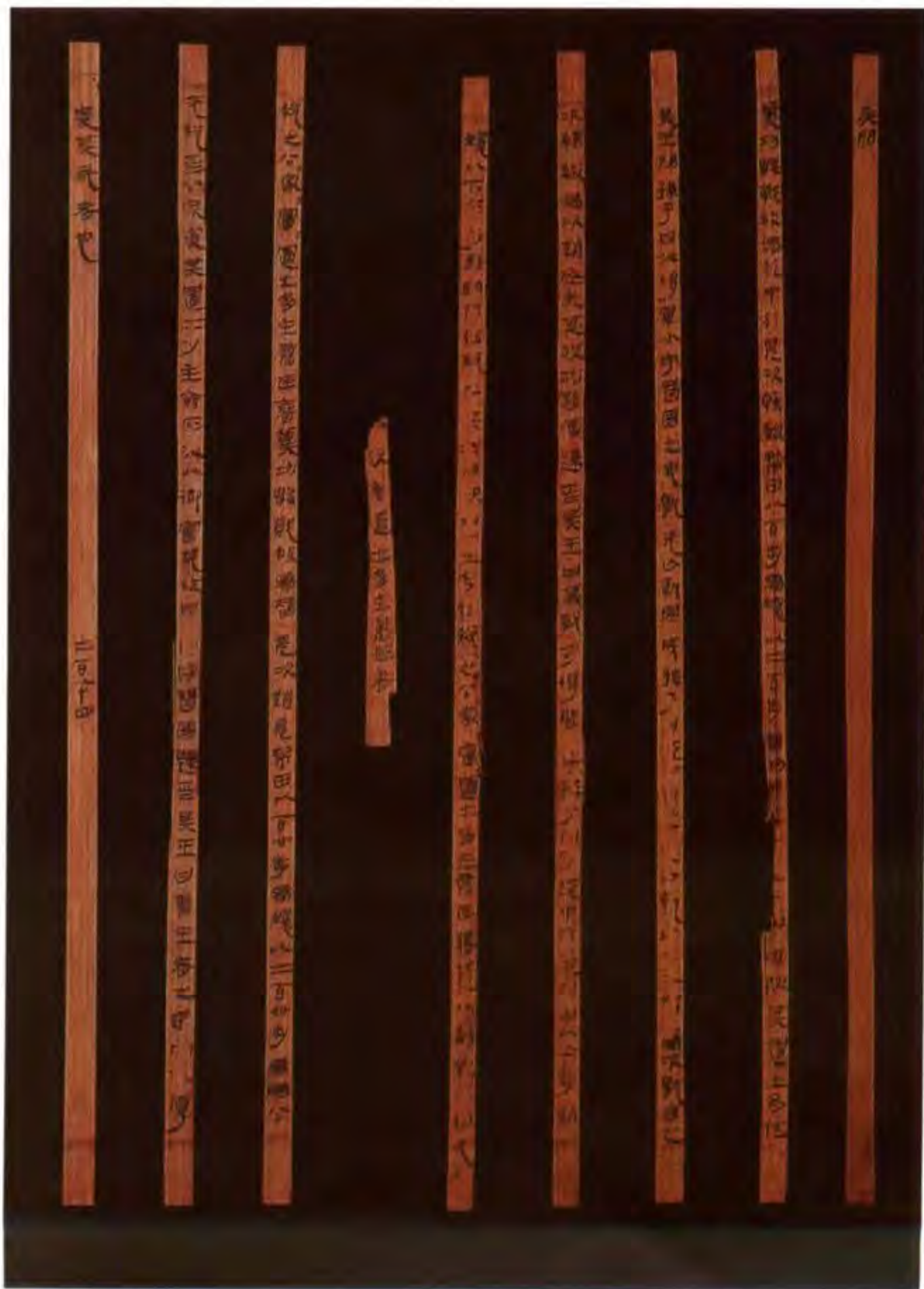
文帝是一个自我约束极强的皇帝。为防

止官吏贪赃枉法，他带头守法。如，一次他出行过渭桥，桥下有人走出，惊动乘舆，廷尉张释之判处该人罚金。文帝起初认为触犯天颜，应该重治。张释之认为，这样做法律将不能取信于民。文帝于是同意了张释之的判决。又有人盗窃高祖庙座前的玉环，文帝起初要处偷盗者以族刑，后来在张释之的说服下，还是依法定为弃市。文帝还施行减省刑罚的政策，废除了一些严厉的刑法。前179年，他废除了连坐法。前178年，为广开言路，他废除妖言诽谤罪。前167年，他废除断残肢体的肉刑，用笞刑（即打板子）来代替，规定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他一反秦朝皇帝奢侈的作风，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

《孙子兵法》竹简

西汉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
整筒长27.6厘米



所增益”。他曾经计划建造一座露台，命令工匠计算，需用百金，其花费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于是作罢。为自己修治陵墓，文帝要求都用瓦器，不得用金银铜锡作为装饰，也就是采用薄葬。虽然在实际运作中，未必完全做到这一点，但作为一个封建皇帝，在事死如事生的厚葬年代，文帝能够用薄葬来要求自己，是极为难得的。文帝的陵墓——霸陵就坐落在今陕西西安东郊凤凰嘴，它采取倚山为陵的形式，墓葬开凿于山崖中，不另起坟丘，属于崖墓。驻足霸陵，依稀能领略到一代名君的风范。

景帝虽然不像文帝那样严于律己，但还是有其父之风的。除继续执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外，他在很多方面修补了文帝时期的政策。例如，文帝以笞刑代替残断肢体的肉刑，由于对行刑用的板子没有具体规定，法吏多使用重板子，犯人再强健也很难支撑三百下，受刑的人大多难免于死。文帝废除肉刑，本意是为了减刑，没想到却落个“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的结果。于是前156年，景帝再次减刑，改笞五百为三百、笞二百为一

百，规定竹片长五尺、宽一寸，最薄的一端半寸，削平竹节；行刑时只准打臀部，行刑中间不得换人。这样，犯人可以苟全性命。前148年，景帝改磔为弃市，允许以腐刑代替死刑。在这个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不求细苛，以至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的美誉。

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景帝并没有像文帝那样死后薄葬，他死后葬于阳陵。阳陵位于陕西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村北原上。考古工作者经过近十年的勘探、试掘，已探明景帝阳陵陵园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1公里至3公里，面积达10多平方公里，是迄今中国考古探明最为完整的西汉帝陵陵园。整个陵园坐西朝东，以帝陵为中心，四角拱卫，南北对称，东西相连，显示了惟我独尊的皇家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帝陵平面为“亚”字形，坐西向东，中为墓室。“亚”字形大墓的探明，在西汉十一陵考古中是第一次，否定了汉代帝陵依照昭穆制度进行布局的论点。陪葬墓园区达3.5平方公里，有陪葬墓上万座，已探明各类大中小型墓葬5000多座。以先期发掘

霸陵

在今陕西西安东郊凤凰嘴





阳陵 21 号从葬坑出土情况

的南区 17 号从葬坑为例，这个坑又分南北两区，北区先后出土了两乘彩绘的木轺车和一套铜量具，车后部放置陶灶和井，车后随从有持戟、拥盾、挎长剑的武士俑群；南区面积是北区的 3.7 倍，用板材挡成 9 个木隔间，里面

装着已腐朽的谷、糜、麦等粮食，其灰壳至今仍厚 20 厘米，估计当时厚度应在 2 米以上。坑里出土的彩绘山羊、小乳猪、狗等动物陶俑成群结队，排列有序。这些物品不仅可以满足景帝及其文武百官、千军万马在地下王国的享

用，也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佐证。

第四节 武帝盛世

公元前141年正月，汉景帝崩于未央宫，年仅十六岁的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从此，西汉乃至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汉武帝在其统治期间，健全和调整了西汉的中央集权制度，平定外患，开拓疆域，建立了空前繁荣的大一统的汉帝国，使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巩固，中国开始以一个高度文明和富强的国家著称于世。

一、独尊儒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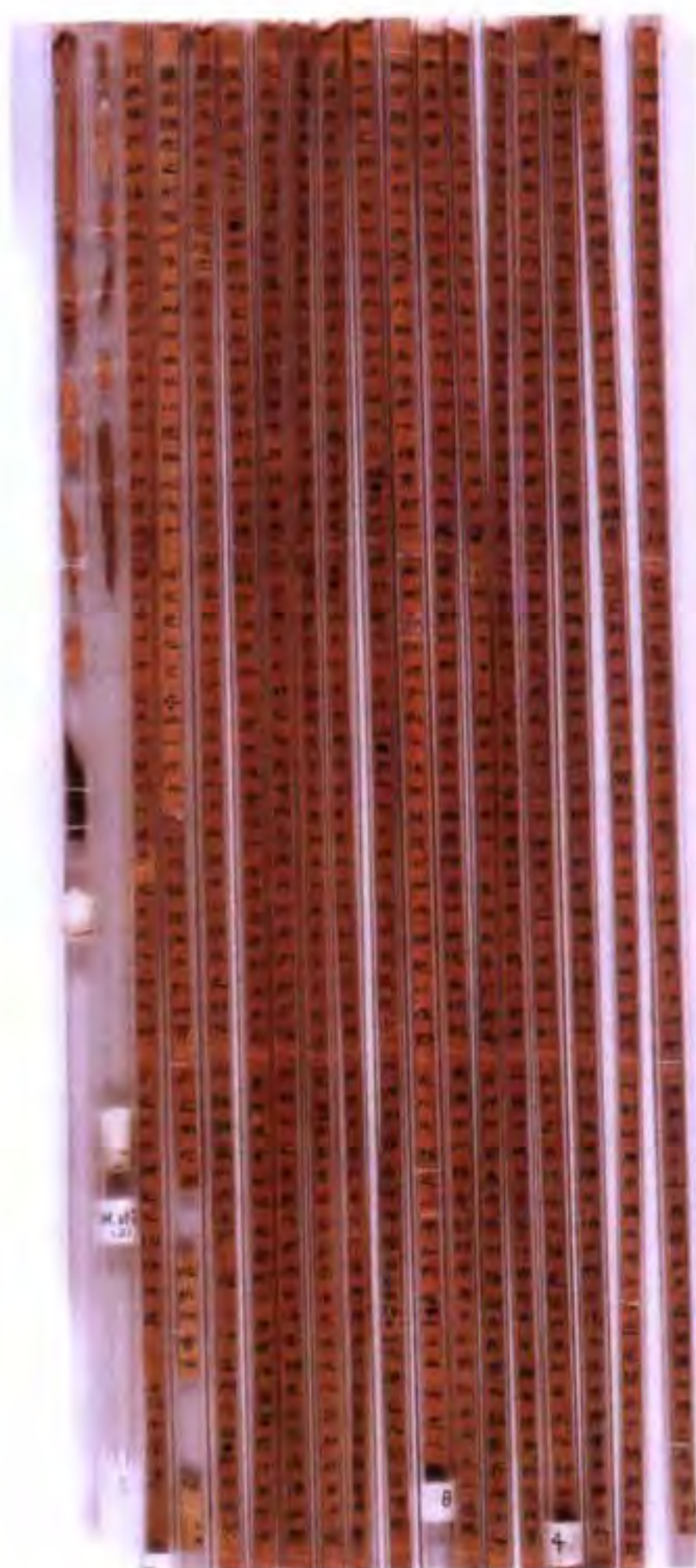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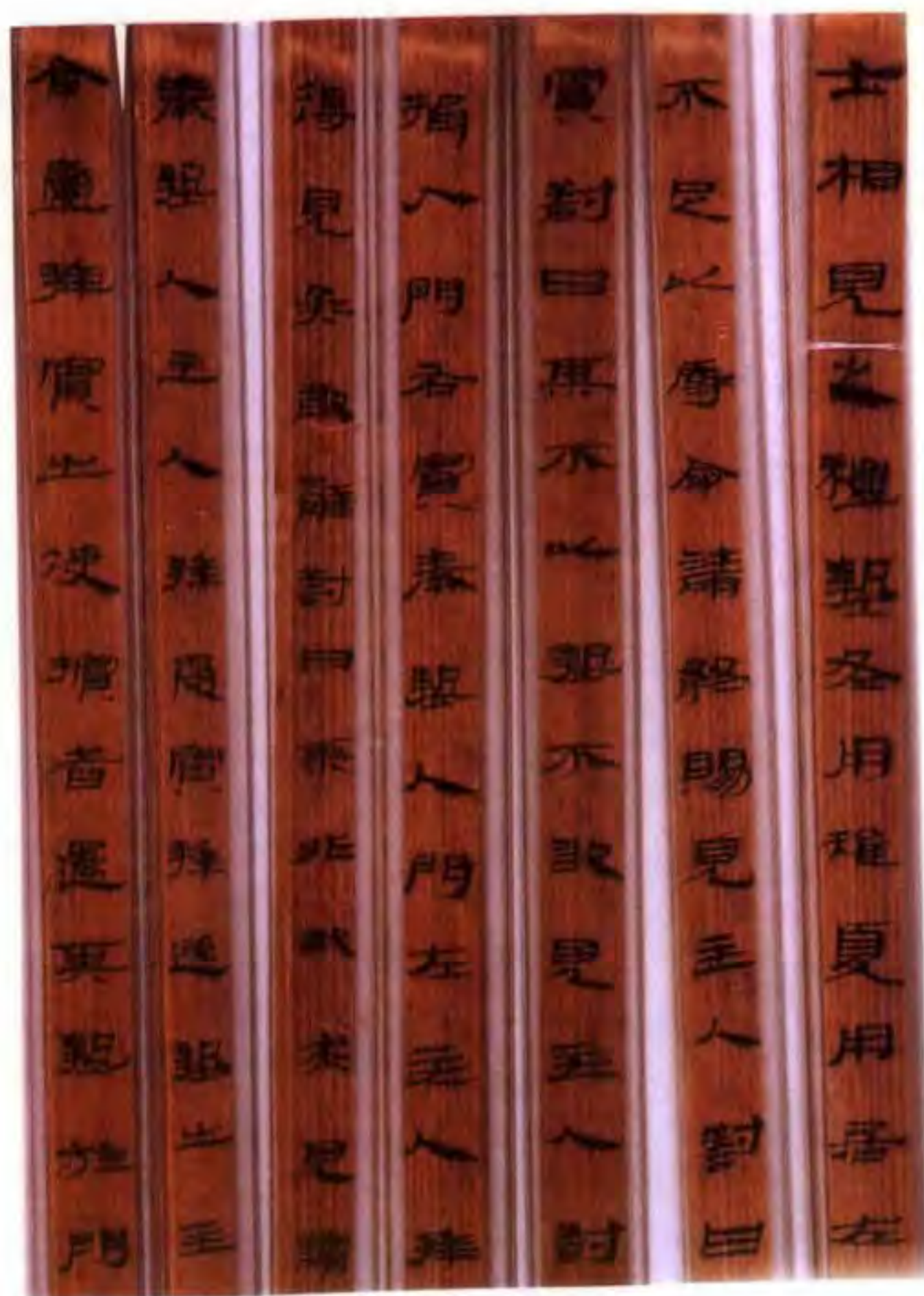
1959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的一座西汉墓中出土了儒家经典之一《仪礼》木简469枚，内容包括今存《仪礼》十七篇中的《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和《丧服》等。其中《服传》有两种不同抄本。该墓主人是地方学校教授儒家经

学的经师，存留的《仪礼》木简是他生前诵读的写本，反映了儒家思想在人们的思想生活中已经占据统治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不能不归功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统治术。

前140年，即位不久的汉武帝刘彻采纳御史等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采纳董仲舒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学，乱国政，请皆罢”，主张罢除儒家以外的一切学说，甚至包括为秦太后等统治者所崇信的黄老之学。由于遭到家后的强烈反对，董仲舒的主张没能实现。前135年，窦太后死，儒家学说开始崛起。前134年，汉武帝诏举贤良，并亲自策问，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史称“天人三策”。在对策以及《春秋繁露》等著作中，董仲舒非常强调“大一统”，认为大一统是天经地义，符合天道规律的。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主张政治上必须统一于天子，诸侯不得自立；思想上也必须统一，要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种思想成为汉武帝加强中央统一集权制的理论根据。董仲舒还抱封建统治永久化，把君权神圣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类。人的形体结构、思想意识，几乎无一不是天的缩影。天既然创造了人，当然应该拥有绝对至高无上的权威。在人世间，天把这个权威委托给了君主，所以受命于天的君主，被称为天子，有特殊的身分，老百姓对他要像对待天一样，绝对服从。这种君权神授的说教，适应了君主专制收归于帝王的需要。董仲舒认为，人世间无一不是天的缩影，天人之间势必可以互相感应。特别是代天治理人民的君主，更是有这种禀性。君主如果不仁不义，天便降灾害，怪异表示警告；君主倘若不知改正，就会招致败亡。董仲舒认为，君主统治天下，应该尊重天意，德、刑并举，而以德治为主，重在教化人民，使老百姓的禀性变善，不去追求利欲。这

汉武帝像





样就会奸邪不生，天下大治。董仲舒还完善了三纲五常说，把先秦儒家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的五伦观念加以改造，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统治与服从关系，认为这是永恒不变的。他在仁、义、礼、智、信五常中，特别强调仁，也就是说要人民无欲无争，要统治阶级内部协调，把这当作最高封建道德标准。董仲舒认为孔子学说是最完备、最正确的，建议汉武帝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学术的一律禁止，这样“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由于董仲舒的思想融合了法家、黄老、阴阳五行等学派的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加强君主专制和实现德泽四海群生的伟大目标的需要，因此为汉武帝所采纳，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

为提倡儒术，汉武帝先后采取了不少措

施。早在前136年，汉武帝就为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各置博士，让他们专心于传经讲学，宣传儒家学说。前134年，董仲舒上贤良对策后，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前124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公孙弘的建议，为博士置弟子员额五十人，根据成绩高下补文学掌故缺，才能出众的为郎中，吏有能通一艺以上的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郡太守卒史。这样，博士就从掌通古今的侍从顾问学官，演变为掌教五经的国家学术教育机关的学官，通晓儒家经典也就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儒学日益繁荣昌盛。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仅仅是确定儒学为官方学术，使治五经以外之学的一概丧失担任学官的资格，并没有采取禁绝百家的极端主张，在学术、思想领域中走的

《仪礼·士相见》木简

西汉

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出土
长35厘米至36厘米，宽0.8厘米

仍然是“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的路子。除学官独用儒家外，不少治诸子学问的人都能够各按所长，随才录用，有的官居公卿要职，有的侍从左右。对在郡国及民间的诸子学术活动，汉武帝也不加禁止，任由他们存在。这种开明的学术文化政策是汉初学术民主传统的继承，表明汉武帝在确定儒家为主流、主导思想后，仍然不断按照实际需要吸取诸子百家学说，使之成为政治指导思想的补充。

二、马踏匈奴

在今陕西兴平茂陵东约一公里处，坐落着汉武帝时期著名青年将领霍去病的坟墓。霍去病病逝后，汉武帝为表彰他的功绩，把他的坟墓修筑得像巍峨高耸的祁连山一样雄伟，并在墓前陈列各式大型石雕像，以示永久纪念。如今，霍去病墓锥形的土石封土仍隆然如

山丘，墓前的石雕像已成为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一批石雕艺术珍品，其中的马踏匈奴石雕更是艺术地再现了汉武帝时期反击匈奴的史实。

秦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乘楚汉相争之机，重新占领了河套地区，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拥有骑兵三十余万，势力十分强大。他们经常侵扰西汉北部边境。由于战争破坏，经济亟待恢复，政权尚未巩固，汉高祖刘邦无力对匈奴作战，只好采取娄敬“和亲”的建议，与匈奴约为兄弟，把汉宗室公主嫁给单于，每年还送去大批丝绸、粮食、酒等，以缓和匈奴的侵扰。此后七八十年间，汉对匈奴都采取了和亲的政策，但是和亲政策并不能阻挡匈奴贵族的掠夺。汉武帝即位后，中央集权大为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反击匈奴侵扰的条件已经成熟。前

“天降单于”瓦当

西汉

1955年内蒙古包头召湾出土
直径17.1厘米

“单于”是匈奴首领的称号，“天降单于”瓦当是对当时汉军击退匈奴贵族侵扰的一种颂扬。



133年，匈奴侵扰代郡（治今河北蔚县西南）、雁门（治今山西右玉西南）一带。汉武帝采纳大行王恢的建议，对匈奴进行反击，试图诱敌深入至马邑（今山西朔州），乘机歼灭。这次诱敌虽然失败，却揭开了西汉对匈奴大规模战争的序幕。

汉武帝时期，反击匈奴的战争主要发生在前133年至前119年间，先后打了十几次仗，其中带有决定性的大规模战役有三次。

第一次战役发生在前127年。这一年匈奴入侵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治今北京密云），杀掠吏民千余人。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兵出云中（治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沿黄河北岸西进，采取避实击虚的战略，迂回到陇西，对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军进行大包围，发动突然袭击，取得胜利，匈奴白羊王、楼烦王逃走。西汉完全收复了河南地，后来在那里设置朔方郡（治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和五原郡（治今内蒙古五原），修复了秦朝蒙恬修筑的边防要塞，并招募移民十万口充实朔方。河南地的收复，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

第二次战役发生在前121年。匈奴虽然遭到失败，仍然凭借河西要地控制西域，并在前122年派骑兵万余人攻入上谷，进行骚扰。前121年，汉武帝派遣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胭脂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和匈奴短兵肉搏，大获全胜，俘虏浑邪王的儿子及相国、都尉等，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越居延海（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境，为弱水汇聚之所），攻到祁连山，大破匈奴军，俘虏匈奴三万多人，河西的匈奴贵族损失惨重。这次战役后，匈奴贵族内部分裂，浑邪王率四万人降汉，汉政府把他们安顿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称为“五属国”。汉武帝及



铁矛及铜镞

西汉

1968年河北满城出土

矛长21.9厘米，镞长15.8厘米

这件矛的秘已朽，据矛、镞出土距离测量，通长约1.96厘米。西汉武帝时期，由于铁矛的迅速发展，青铜矛逐渐退出战争。铁矛取代青铜矛后，矛的长度缩短，重量减轻，前锋由圆钝变得锐利，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件铁矛呈扁平的柳叶形，铜镞细部用错金勾勒，表现出高超的兵器制作工艺水平。





铁戟

西汉

1956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长33.7厘米

戟兼具刺、钩、啄、割四种功能，在汉代实战中使用得十分普遍。人们常用“持戟百万”来形容军事力量的强大。说明持戟兵士的多寡已经成为衡量军事力量强弱的重要标志。此戟为汉代士兵最常用的戟形。

宣帝还在河西设置武威（治今甘肃武威）、酒泉（治今甘肃酒泉）、张掖（治今甘肃张掖）、敦煌（治今甘肃敦煌）四郡，历史上称“河西四郡”。河西四郡的设置，打开了汉通西域的道路，加强了中国与西域各国的文化、经济交流。

第三次战役发生在前119年。匈奴并没有因为前两次的失败而停止南下骚扰，他们又于前120年从右北平（治今辽宁凌源西南）、定

襄（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二郡南下，杀略千余人。为彻底击溃匈奴，汉武帝召集诸将商议，决定深入漠北反击匈奴。前119年，汉武帝集中十万骑兵，由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分东西两路进军。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这次战役，针对匈奴贵族认为汉军不能远征的错误判断，采取了奔袭追击的战术。卫青率领的西路军，从定襄越过沙漠，北进千余里，正遇匈奴伊稚斜单于的军队，双方交战至黄昏，突然狂风大作，飞沙扑面，卫青乘机对匈奴进行包围。深夜，匈奴单于率领数百骑突围远逃，其主力全部被歼，汉军一直追至赵信城（今蒙古杭爱山下）。霍去病的东路军从代郡、右北平出兵，深入两千余里，跨过大沙漠，同匈奴左贤王接战，大胜。经过这次战役，匈奴力量大为削弱，以至于无力大举南侵，“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制止了匈奴贵族的残暴掠夺，保护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使北部边境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同时，汉武帝与匈奴之战，实现了更大领域的政治统一，为后来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掖太守虎符

西汉

长5.6厘米，高2.5厘米

汉代使用铜虎符发兵的制度始于西汉文帝二年（前178）九月。铜虎符分左右两半，右半留京师，左半发给各郡。国家要发兵作战，派遣使者到郡，郡守必须验合左右虎符方能生效。此件虎符为半符，虎身侧面嵌“张掖左一”银字，背存“与张掖太守为虎符”八字的左半边，是西汉政府颁发到张掖郡的虎符。





马踏匈奴石雕

西汉

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出土
长168厘米，高190厘米

三、张骞通西域

在今甘肃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内，有一幅历史题材的佛教故事画，被绘成剃度模样的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这是迄今见到的最早的一幅有关张骞出使西域事迹的绘画。莫高窟所在地敦煌，处在汉唐中西交通的十字路口，曾经留下过张骞的足迹。以张骞的西

域之行来作佛教宣传，当地人民会感到亲切，远道来此进香礼佛的善男信女和中西使者、商旅等过客也会感到熟悉，宣传的效果无疑更佳。这正说明张骞所从事的事业符合各族人民的愿望，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因而能够世代记在人们的心中。

原来，汉武帝从匈奴降人的口供中获悉，在今甘肃敦煌一带本居住着一个大月氏部落，

因遭受匈奴的攻击，被迫西迁。大月氏人对匈奴恨之入骨，一心想回来报仇雪恨，只因势单力孤，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为反击匈奴，截断匈奴的右臂，汉武帝招募出使大月氏的人，准备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汉中（今陕西城固）人张骞以郎官的身分应募。前138年，他带领一百多名随从西行，没想到途中被匈奴人抓去，拘禁了十余年。后来，他乘机逃走，越过葱岭，经大宛、康居，到达了大月氏。此时，大月氏已经占有大夏故地，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大月氏户口殷盛，人民安居乐业，根本不愿东归。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只好东返。在途中，他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后趁匈奴内乱，于前126年返回长安。张骞的任务虽没有完成，但他沿途了解到西域各国地形、物产和

风俗，为第二次出使西域打下了基础。

前119年，汉朝进军漠北，匈奴向西退却，依靠阿尔泰山以南各国的人力、物力和汉朝对抗。张骞建议再次出使西域，联络乌孙，彻底割去匈奴右臂。于是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名随员，携带金币丝帛数千巨万、牛羊万头向西域进发。张骞到达乌孙国时，正遇上乌孙国发生内乱，乌孙王也无意东归。原定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张骞派出的副使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扩大了政治影响。当他顺利返回长安时，乌孙还派了数十名使者携带礼物到长安答谢。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从此，天山南北成为中西交通的要道，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密切。

《张骞通西域》壁画（摹本）
在甘肃敦煌莫高窟 323 窟





张骞墓

位于陕西城固饶家营

张骞的功绩后人从未遗忘。在今陕西城固饶家营就坐落着他的坟墓。1945年西北联合大学曾对该墓作过清理，出土了“博望家造”陶印模及铜镜、五铢钱、几何纹墓砖等，断定该墓为东汉时重建。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著名学者毕沅为张骞墓题写了“汉博望侯张公骞”的墓碑。这些与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一样，显示了张骞通西域对后代的深远影响。

四、货币专铸

由于开放铸钱业的政策行之已久，西汉前期禁止百姓私铸货币的效果并不理想。到汉武帝初年，市场和民间所流通的半两钱名为四铢，实际上早已减轻到只有三铢或不足三铢。前140年，为整顿当时滥恶的货币，汉武帝铸造三铢钱。三铢钱破除了自秦以来钱文皆书“半两”的名不符实的积习。同时，质量较好的荚钱重亦近三铢，发行三铢钱，实际上成了对荚钱的再承认，所以实行三铢钱后，尽管政府明令私铸要处以死刑，但是盗铸犯

令的案件更加增多。前136年，针对盗铸者磨取铜屑盗铸，汉武帝废止三铢钱，实行一种带有轮廓的四铢半两钱。前133年后，汉朝与匈奴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军费激增，府库空虚，而许多家财万贯的富商大贾却不急公家之所急，私铸者又乘机铸造虽有轮廓而更轻薄的新半两钱。为解决财政困难，汉武帝于前119年诏令销毁四铢半两钱，令县官更铸三铢钱，但这次减重的货币改革效果也不理想。

前118年，汉武帝改铸五铢钱，重如其文，并且在钱面和钱背都铸出凸出的边轮。这时的五铢钱是地方政府铸造的，即所谓郡国五铢，因此形制和重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以河北满城汉墓刘胜墓中室出土的大量郡国五铢钱可知，钱文法定五铢，但是由于对文字形式并未作严格规定，故钱文字形杂出，钱文记号也极其淆杂，有“穿上横郭”、“穿下横郭”、“穿上半星”、“穿下半星”、“四角决文”等。尽管刘胜墓中室出土的郡国五铢都是经过磨滤的，但是仔细观察，铜质大都比较淆杂，表色或黄或赤，砂眼痕垢分布其间。至于

其重量，最轻者只有2.5克，最重者可达7.5克，轻重悬殊。这种钱文、记号的淆杂和重量的差距，正是当时郡国铸钱混乱现象的反映。远郡人民不知道这次改币的大事，货币使用仍很混乱，许多富贾大姓和郡国守相就利用这种闭塞的状况，侵扰欺压穷苦百姓，以致造成更大的社会动荡。前117年，汉武帝派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巡行天下，进行晓谕宣传，但效果也不理想，地方盗铸还是非常猖獗，钱的重量更轻。前115年，汉武帝开始铸造“赤仄”钱。赤仄钱由京师钟官负责铸造，目的是整顿当时郡国和个人私铸钱币的混乱现象。由于赤仄钱也有一个极大的弊端，就是此钱一枚相当于旧五铢钱五枚，使藏钱用钱的人一下子遭受到贬值几倍的重大损失，加之铸造权虽然集中在首都的钟官，但是郡国依然自行铸钱，这样造成钱的重量和形制不能整齐划

一，民间的盗铸也并没有停止，赤仄钱逐渐失去信用。赤仄钱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暂，故后世流传者绝少。河北满城汉墓刘胜墓后室出土的大量五铢钱，赤铜为质，工艺精美，字文清晰而秀丽；钱径尺寸均在2.55厘米左右，其差别上下不超过0.2毫米；钱郭较厚，均在0.2厘米以上；重量一般在4克以上，其差距不大于0.65克；钱郭经加工修整，在一些钱的边缘上保留有明显的车削痕迹，应为赤仄钱。

鉴于私铸存在的种种弊端，前113年，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铸钱，把全国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把铸币大权收归中央。他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其中钟官负责铸造，辨铜负责审查铜的质量成色，技巧负责刻范。这次新铸的五铢钱重如其文，钱的质量很高，便于流通，成为当时惟一

汉武帝五铢钱

西汉

直径2.3厘米





五铢钱铜范

西汉

山东寿光出土

长24.1厘米，宽9.5厘米

这是汉武帝时期实行货币专铸政策以前地方铸钱的实证。

合法的货币。由于五铢钱制基本上是稳定和巩固的，因此自武帝中叶起到隋代止的六七百年间，五铢钱差不多成为封建王朝统一使用的标准货币。

五、盐铁专卖

盐铁生产是汉代大宗的工业，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汉初，盐铁为私人经营，国家仅设官收税，特别是汉文帝时期，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富商大贾往往占有山海，采矿冶铁，煮海制盐；各地诸侯王更是擅山海之利，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传世的“齐铁官印”封泥，就是西汉初年齐国经营铁业、自设铁官的证据。这种放任盐铁生产的政策促进了汉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也助长了地方的分割割据势力，是吴楚七国之乱的重要经济基础。

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汉武帝

于前119年冬任命盐商东郭咸阳、冶铁商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侍中桑弘羊以会计用事，筹备盐铁官营事宜。前118年，他们正式提出了盐铁官营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禁止一切私营盐铁业，将煮盐、冶铁之事收归国有；由官府招募盐户，主要费用由他们自己承担，政府给他们煮盐的器具和一定的生活费用；国家在产盐铁的山海川泽设置盐官、铁官，专门负责盐铁的专卖事宜，不产铁的地区设小铁官，以熔化废铁作农具或用具；胆敢私自铸铁、煮盐的，钛（夹在脚趾上的铁钳）左趾，将有关的器物没收。汉武帝采纳了这一方案，派遣孔仅和东郭咸阳乘传车奔走各地，宣传政府的盐铁专卖政策，取缔私营盐铁业，逐一设置盐铁官，任命原盐铁业主为吏，将盐铁之业逐渐收归国有。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在全国



“齐铁官印”封泥

西汉

残长2.5厘米

各地共设置盐官三十六处、铁官四十九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已发现冶铁遗址三十多处，其面积多在一万平方米以上，有的甚至达十几万平方米。山东滕县出土的铁器陶范带有“山阳二”、“巨野二”的标志，是西汉山阳郡（王莽时改为巨野郡，在今山东巨野一带）官府经营的第2号冶铸作坊的用具。河南巩县铁生沟冶铁遗址出土的铁器有“河三”铭文，说明该铁器为河南郡铁官第3号作坊的产品。类似带有铭文的铁器在河南郑州古荥镇、河南南阳瓦房庄等大型冶铁遗址及陕西、江西、云南等地都有发现，它们是汉代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的重要物证。

实行盐铁官营后，汉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四方征伐、运输转漕、军功赏赐的费用都有了保证。但是管理盐铁的官吏多为盐铁

山阳郡铁器陶范

西汉

山东滕县出土



商人，经营不善，生产出来的铁器往往质量很差，有的甚至连草都割不动，价格却很昂贵，农民购买不起，却强令农民购买。汉武帝元鼎年间，博士徐偃巡行郡国，就因郡国盐铁官营产品不足供应，矫制使胶东、鲁两国私自铸铁煮盐，一度使私营盐铁业在该地恢复，徐偃也因矫制对抗政府实行的盐铁专卖政策而受到惩罚。这说明，尽管盐铁专卖存在种种弊端，但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这项措施必须实行。

六、茂陵怀古

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逝于五柞宫（在今陕西周至东南），归葬茂陵。茂陵在今陕西兴平东北，坟丘呈覆斗状，底部东西长229米，南北长231米，高46.5米。坟丘四周筑夯土垣墙，东西长430米，南北长414米，厚5.8米，每面正中各辟一门，门外立夯土筑的双阙，为

西汉诸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汉武帝在其统治期间，继续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和不法豪强；实行盐铁专卖、货币专铸；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大规模地反击匈奴的侵扰；加强国内各民族间的联系和开展对外交流，使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发展，西汉进入全盛时期。与国势的强盛相应的，是帝王生活的穷奢极侈。汉武帝在长安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建章宫，千门万户，金碧辉煌。他好神仙之道，不但到处兴建离宫别馆，饰以明珠珍宝，充以怪禽异兽，还宠幸方士，甚至封方士栾大为将军，把公主嫁给他，弄得乌烟瘴气。他四处巡幸，多次封禅，祭神求仙，寻觅长生不老药。他还好大喜功，在匈奴的威胁基本解除后，为宣扬国威，炫耀武力，继续多次用兵。前104年，为了夺取大宛的汗血马，发兵远征，伤亡极大。而匈奴铁骑乘汉军西进，又多次在西汉王朝

茂陵

在今陕西兴平



的边郡劫掠。匈奴奴隶主贵族势力复振，又多次挑起双方战争，汉军往往失利，贰师将军李广利还兵败投降了匈奴。为强化中央集权统治，他改变汉初约法省刑的政策，任命张汤、赵禹论定律令。张汤、赵禹新制定的法律，条令繁多，“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新定律令极其残酷，不仅恢复了汉初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等，还创制了许多酷刑。这些酷刑在诛锄豪强、加强专制皇权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也大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

由于长期兴师暴众，施行严刑峻法，导致阶级矛盾尖锐，民怨沸腾，暴动此伏彼起，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

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等。在这种情况下，前89年，汉武帝接受大鸿胪田千秋的建议，斥退随行方士，表示不再相信什么长生不老的妖言妄语。不久，他又拒绝搜粟都尉桑弘羊请求增加轮台屯田吏卒之事。他认为在军事上不乏武备就行，有些战争是不必要的，当务之急是禁止严刑镇压，乱加赋税，让老百姓安心生产，不再扰劳天下。他让田千秋任丞相，封他为富民侯，表示与民休息。这在历史上被称为“轮台悔过”。他还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按垄轮作的代田法，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汉武帝从现实中发觉自己某些政策不当时，能够公开承认，迅速纠正，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铜斛

新朝

传河南中牟出土

高26.1厘米，口径32.8厘米
器身刻篆书八十一字铭文，
记载王莽在全国范围内颁布
标准度量衡器的史实。



第五节 王莽改制

汉武帝死后，汉昭帝刘弗陵和宣帝刘询相继即位。在他们统治时期，西汉政局趋于稳定，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出现了所谓的“昭宣之治”。但是“昭宣之治”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西汉百余年来积累的矛盾，尤其是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此后西汉历经元、成、哀、平诸帝，社会矛盾越发激化。公元8年，外戚王莽代汉而立，建立新朝。他托古改制，规定土地归国家所有，禁止买卖，称为“王田”；奴婢不得买卖，称为“私属”；实行五均、赊贷和六筭制度，以加强国家对工商业等活动的管制，但均遭到失败，新朝最后也覆灭于绿林、赤眉起义的烽火中。

一、尺·量·权

公元9年，王莽实行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制造标准的度量衡器颁行天下，作为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标准。全国各地相继出土有各种新莽的度量衡器物，为我们了解新莽时期度量衡器物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度器方面，甘肃定西秤钩驿出土的铜丈是王莽时代的标准铜丈。丈面无分寸尺线纹，仅刻两行八十一字的铭文：“黄帝初祖，德币于虞。虞帝始祖，德币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享）传亿年。”铭文记载了王莽在全国范围内颁布标准度量衡器的史实。根据上面的铭文推算，一尺当今22.93厘米。传世的新莽铜卡尺，用途与现代卡尺基本相同。这是一项创造，在公元1世纪初出现这样的测量工具，说明当时手工业技术已

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除出土的度器外，新莽有些铜器上也注明尺寸，为推测新莽时期的尺度提供了重要资料。如根据1970年陕西咸阳张家湾出土的始建国元年铜龠上的铭文推测，一尺当今23.03厘米。

在量器方面，王莽新嘉量是五量合一的标准器，上为斛，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上为合，下为龠。根据嘉量铭文记载的五量的径、深、底面积、容积推测，一升当今200.63毫升。另外，传世的始建国元年铜方斗，一升则当今193毫升。

在衡器方面，根据1927年甘肃定西秤钩驿出土的铜权上的铭文推测，新莽三斤权，一斤当今243.33克；新莽九斤环权，一斤当今246.97克；新莽石权，一斤当今249.6克。

中国的度量衡制在王莽时期已经处于相当稳定的状态。当时的律历学家刘歆总结了先秦以来度量衡的发展，把单位量值、进位关系、标准器的形制以及管理制度等详细地记录下来，后收入《汉书·律历志》。这是中国



铜石权

新朝

1927年甘肃定西秤钩驿出土
外径28.05厘米，孔径9.6厘米

此器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根据铭文折算，当时的每斤合249.6克。



铜方斗

新朝

通长23.92厘米，高11厘米。此器上下边缘刻篆书铭文，外壁漆画黍、麦、斗、禾、麻纹。据铭文可知，此器铸造于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王莽时期所用之尺长23.03厘米，与战国秦商鞅尺23.2厘米大体相合；王莽时期以16.2立方寸为一升，与战国秦铸造的商鞅方升自铭16.2立方寸为一升相合，说明自秦统一中国后度量衡制度曾经长期处于稳定状态。

第一部完整的度量衡专著，它标志着中国度量衡经过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发展阶段，已经达到制度化，度量衡器具也定型化。王莽颁布的标准度量衡器具，制作精湛，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重要物证。

二、宝货·国祸

从公元7年到公元23年的十多年间，王莽多次下诏改革货币。其变更之频繁，在中国钱币史上是空前的。

公元7年，王莽下令在当时流通的五铢钱以外，另外增发“大泉五十”（一值五十）、“契刀五百”（一值五百）、“一刀平五千”（一值五

千），同时宣布禁止列侯以下携带黄金，黄金归国家所有。这就是王莽的第一次货币改革。这次改革发行的这些大币面的铜钱，完全是对人民财富一种赤裸裸的掠夺。

公元9年，王莽废弃与“刘”字有关的五铢钱、“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增发“小泉直一”，与前次发行的“大泉五十”一起流行，并下令禁止携带使用五铢钱；对新货币持反对意见的，流放边境。为进一步推行新币，王莽还派遣谏议大夫五十人到各郡国铸钱。这是王莽的第二次货币改革。

公元10年，王莽实行宝货制，这是王莽的第三次货币改革。所谓宝货制，就是把货币

分成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即金、银、铜、龟、贝五种不同的币材。六名即黄金、银货、龟、贝、布货、泉货六种货币。二十八品包括泉货六品、黄金一品、银货二品、龟宝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其中泉货六品，是在“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之间增铸“壮泉四十”、“中泉三十”、“幼泉二十”、“幺泉一十”。布货是一种平首平肩、长身方足的布钱。布货十品包括“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弟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小布重十五铢，依次递增一铢，至大布则重二十四铢。小布与小泉的重量比

是15:1，兑换率却是1:100。大布与小泉的重量比是24:1，兑换率高达1:1000。这种极端混乱的币值引起了人民的强烈抵制，私下仍用五铢钱进行交易。王莽降诏禁止，重罚使用五铢钱的人，自公卿大夫至庶人，获罪的不可胜数。在这种情况下，王莽不得不下令废除极为荒唐的宝货制，专行“小泉直一”与“大泉五十”两种货币。但这两种货币的流行情况并不好，如“大泉五十”就存在迅速变小、变轻的贬值现象，甚至还出现过铁质的“大泉五十”。根据考古发掘，王莽在第三次货币改革中还铸造过一种“国宝金匱直万”的货币。该货币上半部为方孔圆形，铸出“国宝金匱”四

王莽货币



“国宝金匱直万”铜钱

新朝

高6.2厘米，宽3厘米



字，下半部为正方体，铸出“直万”二字，可能与布货十品相配合使用。由于布货十品行使不到一年就停废，该钱可能未正式流通，所以仅在陕西西安汉城一带出土过数枚。

“大布黄千”铜母范

新朝

长9.1厘米，宽7.4厘米



公元14年，王莽宣布进行第四次货币改革，改用“货泉”和“货布”两种，并允许“大

泉五十”流通。由于“大泉五十”贬值太厉害，到公元20年王莽便予以废除，专用“货泉”和“货布”两种。“货布”重二十五铢，“货泉”重五铢，但“货布”却值“货泉”二十五枚，比值非常不合理；而且根据河南安阳所出“货泉”中铸造较精的一千余枚进行实测的结果，平均重3.27克，与“五铢”之值相当接近。在此期间，王莽还铸造了一种“布泉”。这种货币史书失载，但在许多汉代墓葬和窖藏中曾出土，直径均为2.6厘米，多数重3.5克，与武帝的三官五铢钱相等。这些情况说明在兴废无常的币制改革最后阶段，王莽企图回到五铢钱的旧制上去。为使第四次货币改革顺利进行，王莽颁布连坐法，一家私铸钱币，五家连坐，没入为奴。尽管如此，工商业者和一般劳动人民对王莽的货币改革仍然进行着不妥协的反抗，盗铸和触犯法令的比比皆是。

货币改革是王莽改制中最混乱、最荒唐的一种，也是中国货币改革史上的特例。历代的货币改革失败者，多有别的原因，而不是制度本身的缺点，只有王莽的货币改革完全是制度上的失败。在王莽的货币改革中，各类货币的比值都很不合理，结果引起严重的货币贬值；币材太滥，品类太多，特别是实行的宝货制，竟然一次将五种不同的币材、六种不同的货币、二十八个品类同时投入流通，把已经被历史淘汰的龟、贝拿来重新使用，徒然制造了不少矛盾和混乱。十余年间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其变动之速，给社会经济生活和货物的流通带来了很大困难，“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这样，王莽的货币改革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从中国货币发展史的角度看，王莽的币制改革也有创新，即将记重货币改为记值货币，独创了中国货币的十进位制。从货币文化上讲，王莽的货币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不



“大泉五十”陶范

新朝

1958年陕西西安西北郊新莽
钱范窑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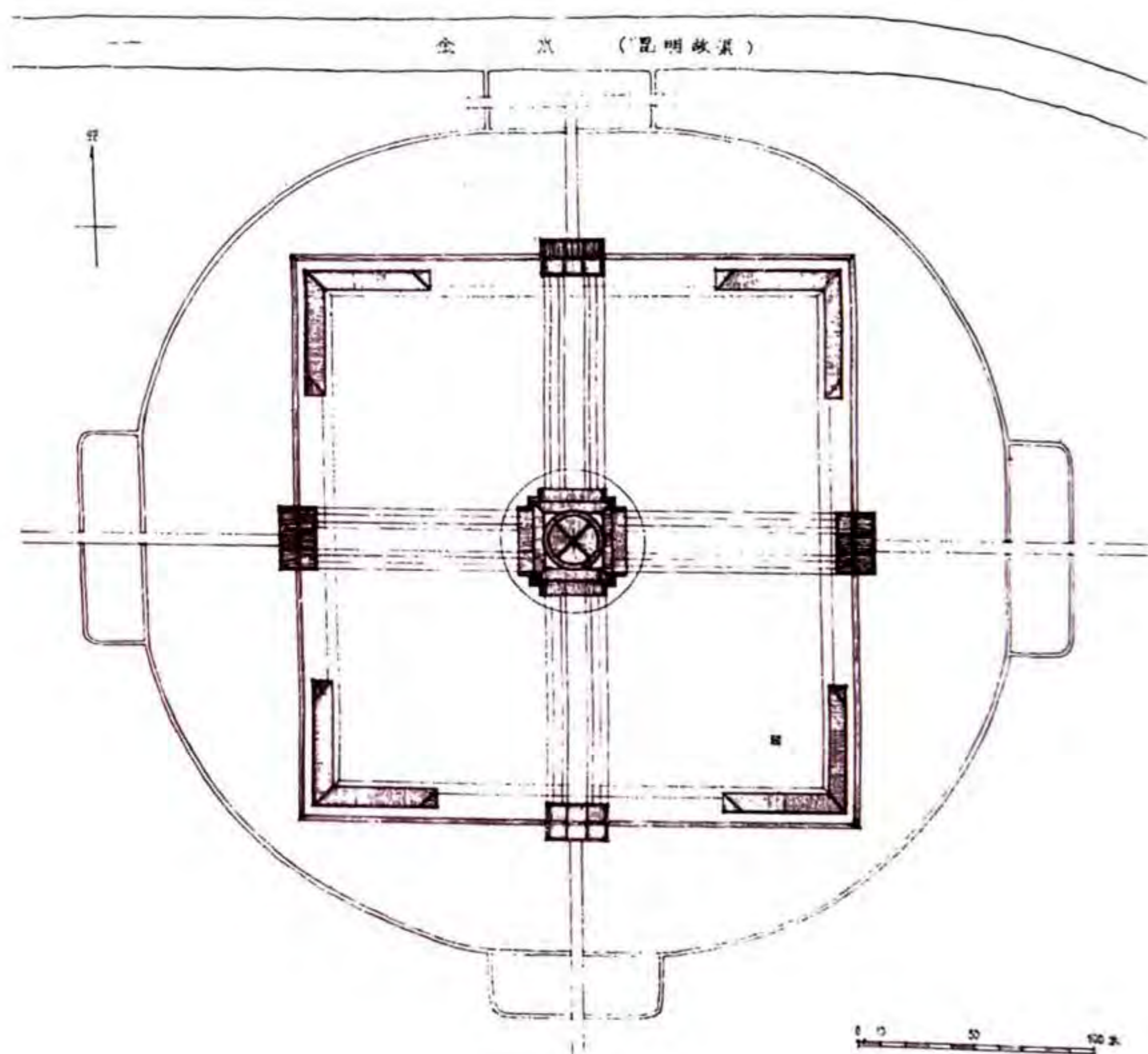
仅铜质绝好，铸造精致，文字书法也很工整，风格纤秀，有的还错金，在古代钱币中堪称精品。

三、辟雍·九庙

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王莽还依据儒家经典，进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政治改革。在中央集权制度已经确立了二百余年后，王莽竟然根据《尚书》、《诗》等儒家经典，于公元12年、公元17年先后两次裂土分封，在全国建立起二千多个大小不等的封邑。王莽根据《周官·王制》，多次下令更改中央和地方官制。如在中央建立了四辅、三公、四将、九卿、六监。四辅是太师、太傅、国师、国将，是安置德高望重的老臣们的虚衔。三公是大司马、大司徒和大司空，为中央的最高官吏。四将是卫将

军、前将军、更始将军和立国将军，为掌兵之官。九卿是丞相司直、大司马司允、大司空司若和原来汉代的大司农（更名为羲和，再更为纳言）、大理（更名为佐士）、太常（更名为秩宗）、大鸿胪（更名为典客）、少府（更名为共工）、水衡都尉（更名为予虞），在三公领导下负责中央各部门的具体业务。六监是指原来汉代的太仆（更名为太卿）、卫尉（更名为太卫）、执金吾（更名为奋武）、中尉（更名为军正）、光禄勋（更名为司中）和新置的大赘官，专为皇帝和宫廷服务。在地方行政方面，王莽在全国设置九州、一百二十五郡、二千二百零三县。州牧为最高一级的军政长官，郡的长官依据地理位置和重要程度称卒正、连率、大尹，县令、长称县宰。王莽对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郡县地名、行政区划，也屡加改变，

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复原图



有的郡县名称改易达五六次之多。新朝的国号也多次变更，有“新家”、“新室”、“黄室”、“新成”、“新世”或单称为“新”。

尤为荒唐的是，王莽还根据《周礼》记载的典章制度，力图损益出一套新的礼乐制度。他认为礼乐兴则万民化，希望通过制订一套礼乐制度来安定天下。从公元15年起，王莽就集合了一批公卿大夫、文人学士，讨论制定那套装潢门面的繁文缛礼，结果却连年不决。汉武帝崇尚儒术，儒臣们向他建议在长安城南立“明堂”，但未能付诸实施（当时的明堂在泰山）。汉成帝时，人们议立“辟雍”于长安城南，亦未成事实。到了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才在长安建立明堂、辟雍，同时兴建灵台和太学。当了皇帝后，王莽又大兴土木，建造他的宗庙，即所谓“九庙”。这些神秘的、充

满宗教色彩的建筑物是按照儒家传统礼制和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设计的，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它们的遗址，自1956年以来，在汉长安城的安门和西安门外的南郊陆续被发现，达十余座之多，有的已经经过发掘，考古学家统称之为“礼制建筑”。

1956年发掘的一座“礼制建筑”，位置在安门南面偏东处。它是一个平面呈正方形的大庭院，四面的围墙各长235米，每面设一门。在院内的四隅，紧靠着围墙，都筑有平面成曲尺形的房屋。院内的中央，则是这个建筑物的主体所在，为一个在直径60米的圆形台基上建立起来的厅堂。厅堂平面呈正方形，四面附有配室，互相对称。在庭院的外面，由宽约2米的水沟围绕成一个直径达360米的大圆圈。这个建筑物的特点，表现在它的整个平面图



四神瓦当

新朝

1956年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直径18.5厘米至19.4厘米

上，是圆形之中有方形，方形之中又有圆形，正与明堂、辟雍的所谓“上圆下方”或“外圆内方”的形制相符。由于各种记载中都说辟雍是四面环水，圜如璧，所以它很可能就是辟雍的遗迹。其余的礼制建筑，都集中在安门的南面偏西处，它们的形制与上述的辟雍有相似之处，但周围没有水沟环绕，中央的厅堂也不是建筑在圆形的台基上，所以不像是辟雍或明堂。由于出土的遗物明确地表明它们是新莽时所建，考古学家多认为它们可能就是王莽的九庙。值得注意的是，庙的四门所用瓦当的图纹多属“四神”，其中青龙瓦当用于东门，白虎瓦当用于西门，朱雀瓦当用于南门，玄武瓦当用于北门，正与“四神分司四方”的说法

相符。考古发掘证明，所有这些礼制建筑，包括辟雍和九庙，都和长安城的城门、宫殿一样，是在新莽末年的战火中被毁的。王莽醉心于礼乐制度的建设，仍未能挽救日益恶化的社会经济和更加尖锐的阶级矛盾，新朝只存在了短短的十几年就覆亡，只留下一些残垣断壁任后人评点。

四、绿林军·赤眉军

在很多人眼里，这也许是一件较为普通的文物，但是它的铭文会让人觉得它有些“看似寻常最奇崛”的味道。这件器物背后阴刻篆书铭文“更始二年十月工缙岑刻”十字。“更始”是绿林军所立皇帝刘玄的年号，“更始二

“更始”五铢铜母范



年”即公元24年。原来此范为更始政权制作五铢钱陶范用的母范。但是绿林军是怎么回事，更始政权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实行改制的同时，王莽还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发动战争。同王莽改制的结果一样，这些战争加重了国内人民的负担，使百姓在无法生活的情况下被迫起来反抗。公元17年，在湖北西部爆发了王匡、王凤兄弟领导的饥民起义。他们以绿林山（今湖北京山大洪山）为根据地，故称为“绿林军”。公元22年，绿林山一带发生严重的瘟疫，近一半的义军染病而亡。为了求得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绿林军被迫分兵转移：一支由王常、成丹率领，南渡汉水，在南郡（治今湖北江陵）一带活动，称下江兵；一支由王匡、王凤、马武等率领，北入南阳，称新市兵。同年七月，平林（今湖北随县东北）人陈牧、廖湛聚众数千人起兵响应，称平林兵。从此，湖北、河南等地成为起义军的纵横之地。

当王匡、王凤等人在绿林山举起反抗旗

帜时，公元18年，琅邪（治今山东诸城）人樊崇率领一百多人在莒县（今山东莒县）起义。他们以泰山为根据地，转战南北，队伍迅速扩大。公元22年，起义军同王莽派来的由更始将军廉丹和太师王匡率领的十余万军队在成昌（今山东东平）展开激战，获得全胜，一直把官军追杀到无盐（在今山东东平境内），斩敌万余，廉丹被杀，王匡逃命。在战斗中，为了同官军相区别，樊崇的军队每人都用赤色涂眉，因此这支起义军被称为“赤眉军”。

在绿林、赤眉等起义的同时，北方各地农民也纷纷起义，其中著名的有铜马、大彤、高湖、重连等。一些对王莽政权不满的豪强地主看到了复兴刘氏天下的希望，也纷纷从事反莽活动。西汉宗室刘玄在畏罪逃亡中参加了平林兵。南阳大地主刘縯、刘秀兄弟则联络附近各县地主豪强，纠集宗族、宾客，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军队，称为舂陵军。地皇四年（公元23）二月，新市、下江、平林和舂陵各路起义军汇集涿阳（今河南南阳南），协议推举刘

玄为帝。由于刘玄曾经担任过平林军的更始将军，故称更始帝，改元更始。上述铜母范就是更始政权存在的一个重要物证。

随着起义军的节节胜利，王莽惊恐万分。他派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率领各州郡精兵四十余万，号称百万，于地皇四年五月与严尤、陈茂的军队会合后，将昆阳城（今河南叶县）包围起来。城内起义军力量单薄，仅仅八九千人，但是他们毫不畏缩。王凤、王常一面坚守阵地，一面派刘秀、宗佻、李轶等十三轻骑乘夜从南门突围而出，到定陵（今河南舞阳北）、郾（今河南郾城）等地搬请救兵。昆阳城被包围后，严尤曾经劝说王寻先攻取宛城（今河南南阳），这样昆阳将不攻自破。王寻不听，决心攻下昆阳，并且认为破城只在旦夕，根本不把各地起义军放在眼里。趁王邑骄傲轻敌之机，刘秀率领三千援军敢死队冲乱

官兵中军，王凤、王常则从内向外冲杀，内外夹攻，一举击溃王莽的军队，王寻被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昆阳大战。

昆阳大战从根本上摧毁了王莽军队的主力，取得了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的决定性胜利。绿林军乘胜向王莽展开强大的攻势：一路由王匡率领，北上直接进攻洛阳；一路由申屠建、李松率领，西攻武关，直捣长安。九月，王匡等攻下洛阳，刘玄也移都洛阳。与此同时，西路大军势如破竹，很快逼近武关。这时析（今河南西峡）人邓晔、于匡等起兵响应，猛攻武关，降服其都尉朱萌，开关迎接西路大军。各路起义军将长安团团围住，四面夹击，最后从宣平门攻入长安城内。长安市民朱弟、张鱼等放火烧宫门，响应起义军。王莽狼狈逃入渐台被杀，统治中国十余年的新莽王朝就这样覆亡了。

第三章

豪强统治的东汉

建武元年（公元25）六月，在血与火的战争中，西汉皇族刘秀在鄯（今河北柏乡北）称帝，是为汉光武帝。他以长安之东的洛阳为都，史称东汉。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先后削平各地割据势力，完成了统一大业。同时，为巩固和稳定封建统治，刘秀大力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采取措施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为以后东汉王朝的发展和巩固奠定了基础，史称“光武中兴”。继任的汉明帝刘庄和汉章帝刘炟，继续奉行刘秀推行的各项政策，东汉王朝呈现出强大的风貌，历史上称这段统治为“明章之治”。从公元25年刘秀称帝到220年曹丕代汉称帝，东汉王朝存在近二百年。在这个历史时期，豪强地主势力恶性发展；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制度进一步强化，并由此引起外戚和宦官的更迭统治；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抗连绵不断。结果，统一的东汉王朝瓦解，中国历史从此进入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时期。



第一节 豪族大姓

东汉王朝是在南阳、颍川、河北等地的豪强大族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些豪强大族，在经济上，拥有规模很大的田庄；在政治上，通过“察举”和“征辟”的选举制度，牢牢地控制着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在军事上，拥有私家武装。从朝廷到地方，这些豪强大族都拥有雄厚的势力。这成为东汉社会历史的一个突出特点。

一、门生·故吏

东汉建立后，豪强大族的势力获得很大的发展。不少中兴新贵世代为官，逐渐成为名门望族。如邓氏家族自光武中兴后，累世宠贵，总计封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侍中、将、大夫、郎、

谒者不可胜数，在整个东汉王朝无人能比。耿氏家族与东汉王朝相始终，前后出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经学成为士人的利禄之途，由此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例如世传欧阳《尚书》的弘农杨氏，自杨震官至太尉后，杨氏家族得以复兴，杨震之子杨秉、孙杨赐、曾孙杨彪相继为三公。世传孟氏《易》学的汝南袁氏，自袁安起，四世相继有五人为三公。杨氏、袁氏均为名著汉史的世家望族。这些世家望族不仅是经学世家，有不少还是豪强大族。

东汉豪强大族势力的发展，反映在丧葬制度上，就是兴起了很多大家族的墓地。如河北无极的甄氏墓地，共有三十六座带封土堆的大墓，所占面积东西、南北各四五里。根据《太平寰宇记》记载，此地有王莽司空甄丰、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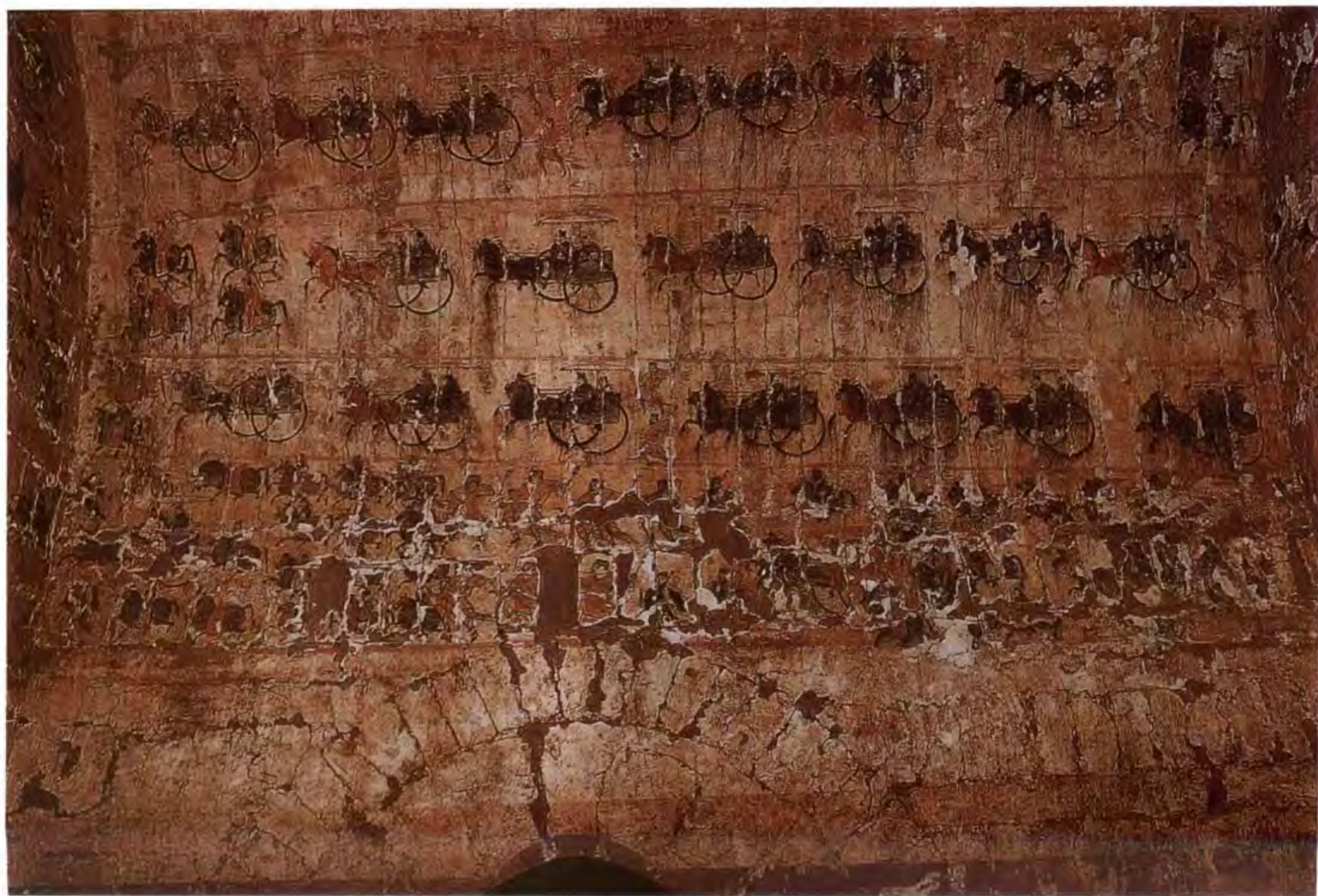
徒甄邯、光禄大夫甄阜以及北魏甄氏诸墓。陕西潼关吊桥的弘农杨氏墓地，东西宽167.1米，南北长106米，共有七座墓，排列整齐，自东而西按辈分定次序，分别埋葬着杨震、杨牧、杨让、杨统、杨著、杨馥和杨彪祖孙四代，前后相继达百年之久。安徽亳县曹氏宗族墓，包括魏武帝曹操及其先辈多人。当时的一些著作非常重视姓氏源流的考察和记录，王符的《潜夫论》有《志氏姓》，应劭的《风俗通》有《姓氏篇》，与司马迁所见上古的《帝系》、《世本》、《谱牒》等记载帝王、诸侯、大夫世系者性质不同，也是豪强大族势力发展的反映。

由于豪强大族世代为官，在政治上享有极大的特权，因此他们往往垄断着选官的权柄，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察举和征辟是当时东汉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察举，是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上去，经过考

壁画《车马出行图》

东汉

1971年河北安平逄家庄出土



核，任以官职。所谓征辟，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当官。无论是被察举的，还是被征辟的，都必须有高才重名，为乡党舆论所推崇。为了争取被察举和征辟，当时的士大夫非常注意修饰自己的品行，以激扬名声，抬高身价。有的人更是矫情造作，沽名钓誉，以便通过察举、征辟，博取高官厚禄。在察举和征辟时，贿赂请托，特权横行，司空见惯。汉明帝和汉章帝也不得不承认这种选举不实和权门请托的现象。

由于豪强大族垄断了仕途，士人为了做官，不得不效力于世家大族的门下，称为“门生”；大官僚可以自己挑选亲信作属吏，以效忠自己，称为“故吏”。当时宗师与门生、举主与故吏利害相连，兴衰与共，完全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形同君臣和父子的关系。门生对宗师，故吏对举主有着许多道义上的责任。如宗师死后，门生、故吏如同后世子孙为父祖立碑一样，也要为其立碑。至于守丧、服孝则更习以为常。如桓典是由国相王吉举孝廉为郎，王吉被诛杀后，桓典弃官收敛归葬，服丧三年，负土成坟，为立祠堂，尽礼而去。宗师、举主有罪，门生、故吏要舍身救护，否则就是

丧失名节，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如李固、杜乔被害时，李固的门生勃海王调上书，证明李固纯属冤枉；杜乔的故吏也诣阙上书。举主、宗师在政治斗争中失败，门生、故吏及其父子兄弟都要受到牵连，这在党锢之祸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李膺死后，妻子被流放边地，门生、故吏及其父兄都被禁锢。这正是当时把门生、故吏视为子弟的一种反映。宗师与门生、举主与故吏私为君臣，如改投他人，就如同委身于二朝，是可耻的行为。汉末公孙瓒的举主、太守刘君流放日南，公孙瓒不顾日南多瘴气，舍命相随。他在告别其先人坟墓时说：“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这种私恩结合，导致了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形成，扩大了豪强大族的政治力量，成为东汉末年分裂割据的重要因素。

东汉豪强大族政治势力的扩张，在考古文物上也有生动的反映。河北平安出土的彩色壁画车马出行图，分上下四列，共绘马车八十多乘。最下一列的主车是安平王的马车，上面三列的每一列都相当于二千石郡太守的官秩，是王的下属官吏。整个画面反映出地方豪强大族出行，前拥后随，排场极其盛大。1969

壁画《属吏图》(摹本)

东汉

原图 1952 年河北望都所药村出土



年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车马队由武士俑、奴婢俑、铜马和各种形制的铜马车模型组成，再现了封建官僚前导后拥的出行场面。河北望都出土的壁画属吏图，人物的榜题有“门下史”、“门下贼曹”、“门下游徼”、“门下功曹”、“门下小史”、“辟车伍佰八人”、“伍佰”等。山东沂南画像石祭祀图中，大批墓主人生前的从官属吏向已故的主人致祭，生动地再现了门生与宗师、举主与属吏之间的密切关系。至于从《隶释》卷十二所载《杨震碑阴》题名看，题名者一百九十人分别来自河东、河南、博陵、中山、魏郡、勃海等二十多个郡国，说明宗师、举主与门生、故吏已形成一种联系广泛的社会集团。

二、膏田·田庄

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了兼有生产性质的田庄。如茂陵富人袁广汉在北邙山下所筑田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其中鸟兽草木应有尽有，已非纯属消费游乐的乡村别墅。东汉时期，豪强大族凭借手中的政治特权和经济优势，建立了大量规模可观的田庄。

东汉田庄一般以农业为主，兼营林、牧、



壁画《庄园图》(线图)

东汉

原图 1972 年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

渔、手工业和商业，具有极强的自给自足的性质。田庄里种植谷物、蔬菜以及麻、桑、竹、漆等经济作物和林木，饲养家禽、牲畜，经营酿酒、煮盐、养蚕和纺织等手工业，自制农具和兵器，并且有专人在外从事贩运交易。如樊宏在湖阳（今河南唐河西南）经营的田庄，有一个东西十里、南北五里的樊陂，开垦耕地达三百余顷。在这个田庄中，高楼连阁，竹木成林，有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多种经营活动，同时樊宏还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田庄内部闭门成市，生活所需基本上可以不必仰赖田庄以外的市场。

东汉后期崔寔所写的《四民月令》，是豪强大族经营田庄的家历，详细记载了田庄多种经营的情况。田庄里种植着小麦、大麦、春麦、粟、黍、稷禾、大豆、小豆等粮食作物，胡麻、苴麻、牡麻、蓝等经济作物，瓜、韭、蓼、葱、蒜、姜、芋等蔬菜；制作各种酱、酒、醋及饴糖等食物；种植术、艾、乌头、冬葵、葶苈等药用植物来配制药剂；种植各种松、柏、桐、漆、梓、榆、柳、桑、竹等林木以及杏、桃、枣等果树；饲养马牛等耕畜和家畜，种植苜蓿等作饲料；养蚕、缫丝、制絮（丝絮），织成各种麻布和缣、帛、练等丝织物，并自己染色，制作衣服、鞋子；制造农具和兵器等。



壁画《牧马图》(摹本)

东汉

原图 1972 年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



田庄生产的这些产品，主要用于自给，部分商品可用于交换，如二月，可糴粟、黍、大小豆、麦子等；三月，可糴粟卖布；四月，可糴矿及大麦，收敝絮；五月，可糴大小豆、胡麻、大小麦，收敝絮及布帛；七月，可糴大豆、小麦及收缣练；八月，糴种麦，糴黍；十月，卖缣帛敝絮，糴粟、豆、麻子；十一月，糴杭、稻、粟、豆、麻子等。从《四民月令》的记述可知，在这种进行多种经营的田庄内，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依赖外界供应。

在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生动展示了东汉田庄的经营状况。四川各地发现的画像砖，刻画了宅院外边有大片稻田、池塘、山林和盐井等。山东滕县宏道院的画像石，则表现了田庄中冶铁的情景。最为生动的当属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中的壁画《庄园图》了。《庄园图》画出了整个庄园的轮廓，较为详细地描绘了庄园的各项生产活动。从壁画上看，农业在庄园经济中显然居于首要地位。在庄园建筑外的原野上，有几名农夫赶牛扶犁耕地，表现庄园田连阡陌、膏田满野的景象。庄园中还有

精耕细作的园圃作业：一片园圃地上，有两名手拿锄头的农夫在操作。为防止牲口的侵害，园圃砌有围墙。图中画的马厩、牛圈、羊圈，彼此都用墙隔开，在大畜之旁还画了些小畜。在圈外的空地上，则有野放的鸡群和猪群，表明畜牧业比较发达，在庄园经济中的地位仅次于农业。图的左上部，画了一大片森林，值得注意的是有女子在采桑，另外还画了一些筐箔之类的器物，说明庄园中是有蚕桑之业的。东汉时的庄园是大地主经营的，因而劳动是集体性的，这在《庄园图》中的表现也很明显，无论是大田耕作还是园圃劳动，都有较多的男劳力同时出动。

在田庄里，主要的劳动者是贫苦的宗族、亲戚和宾客，其中宗族占重要地位。一般说来，他们多是田庄主的依附农民，但是依附程

度不等。根据《四民月令》记载，每年腊月，田庄主选配人力，安排田事，让农民收拾农具，准备春耕。春冻一解，繁忙的农事正式开始，直到隆冬为止。农事稍闲时，农民还要为主人修理沟渎，葺治墙屋。四川绵阳出土的东汉劳动者和监视人陶俑、陕西勉县出土的执钺陶俑，生动地再现了这些依附农民辛苦劳作的情景。依附农民在承受繁重劳役的同时，还要向田庄主交纳实物地租。1959年河南密县打虎亭发现的东汉晚期画像石墓内，有一幅收租石刻画。该石刻画自右至左，依次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田园诗式的背景。第二部分是地主亲临坐阵，监督收租。第三部分是交租和收取租粮，有一人左手指着地上的量器，意思是让交租的农民把粮食倒入量器内，以便他验收。交租农民身后的一人张开双手



壁画《牧牛图》(摹本)

东汉

原图 1972 年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

像是要上前帮助他倾倒粮食，他们的身后及一侧还有两袋未经验收的扎着口的粮食，画面正中的三堆粮食可能是已经验收过的。他们的左边是运粮车，车侧一人似为女子，手持筒状物正打算从车中取粮。整幅石刻画是田庄主收取实物地租的生动写照。

尽管田庄主与这些依附农民的关系是主佃或主仆关系，但由于他们大多是同族人，所以他们之间又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宗族关系。田庄主经常以宗主的面貌出现，在一定的时节按照不同的亲疏关系，对族人进行慰问安抚。根据《四民月令》记载，每年春耕前后，青黄不接时，田庄主必定赈济九族中穷乏之人；秋收前后，存问九族中孤寡老病不能自存的；冬月腊日，邀请宗族、姻亲和宾客，讲好和礼，加强他们之间的联系，同时停止各种农作和徭役，使那些依附农民充分享受到田庄主的恩泽，同宗有贫穷不能葬敛的，就集合宗人合族收葬。田庄主通过这些小恩小惠，为封建剥削关系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也使这些农民能够稳定地依附于田庄主。汉代画像砖、石及壁画中，常常有墓主慰问安抚耄耋之人的养老场面，过去以为是汉代养老风俗的反映，其实也不妨看作是田庄主慰问宗亲、实行安抚政策的写照。正因为这样，每当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之际，各地的豪强大族常常率领着大群的宗族、宾客等，或择地以避乱，或筑坞以自守，甚至合族开上战场。

三、坞堡·部曲

西汉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许多豪强大族都拥有宗族、宾客等私家武装。在战争频繁的两汉之际，各地豪强大族为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纷纷营建坞壁、营垒。如樊宏与宗家亲属作营垒自守，归附他的有千余家。第五伦为营长，聚集宗族邻里依险而

守，抗拒赤眉、铜马起义军。不少豪强大族以私兵追随刘秀，成为东汉的开国功臣。如刘植率领宗族、宾客千余人归附刘秀，耿纯与昆弟耿宿、耿植等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集结于刘秀帐下，王霸率领宾客上谒刘秀于颍阳。

当时，一些豪强大族凭借手中的武装，雄张乡土，抗拒政令，被称为兵长、渠帅。如清河大姓赵纲营筑坞壁，修缮甲兵，为害一方；北海大姓夏长思囚禁太守，占据城池；赵魏豪右到处屯聚。这些人既不放弃自己割据乡土的武装，归附刘秀，又无力建号自守，与东汉政府公开抗衡。对待这种人，刘秀除用武力削平外，尽量采取安抚的手段。凡是率众投降的，其渠帅被遣送到京师，私兵被解散，让他们归家从事农桑，并拆毁他们聚众闹事的营壁，彻底消除他们谋乱的根基。但是这些兵长、渠帅对于刘秀的政策心存怀疑，他们彼此联系，拥兵戒备，长期不散，并且在郡县威福自行，权势胜过官府，无视已经形成的统一局面。

为彻底消除地方豪强大族的势力，真正巩固全国的统一，刘秀在公元39年采取了新的措施。他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和户口年纪，名为度田。度田的实际目的，除为了掌握确实的名籍和田数来增加赋税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图通过户口、年纪的检核来控制和解散豪族武装。由于得罪豪族往往要遭受灭门绝族的下场，州郡官吏不敢对他们推行度田，反而借度田之名蹂躏农民。为严厉推行度田令，刘秀处死了十多个度田不实的州郡大吏。郡国大姓和拥兵自重的豪右则利用农民反抗官府的情绪，发动叛乱，杀害长吏。郡县对他们进行追讨，他们则与官兵极力周旋，官兵到来时就解散，官兵离开后又重新聚集，青、徐、幽、冀四州情况尤为严重。刘秀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的手段，把捕到的作乱首领



绿釉陶楼

东汉

1956年山东高唐固河出土
高144厘米

东汉以后，除满足特殊要求外，高台建筑逐渐减少，而木构楼阁逐渐增多。这种楼阁合理地运用木构建筑技术，满足了功能上遮阳、避雨和凭栏远眺的要求。同时各层腰檐和平座有节奏地挑出与收进，使楼的外观既稳定，又有变化，并产生各部分虚实明暗的对比，成为以后中国古代木构楼阁长期遵循的建筑形式。这件陶楼是当时木构楼阁的一个缩影。

部曲陶俑

东汉
四川崖墓出土
高38.8厘米



人物迁往他郡，切断这些人同原郡县的联系。经过度田事件后，郡国大姓的对抗缓和下来，豪族武装转为隐蔽状态，得到了政府的默许。

根据《四民月令》记载，这时的豪族武装，与刘秀度田以前的情况不同，不是常设的，而是定期召集农民组成，称为“部曲”。每当二三月青黄不接或八九月寒冻时，田庄主往往纠集一部分农民修门户，设守备，防御春饥草窃之寇；或者修缮五兵，练习战射，防备寒冻穷厄之寇。后来豪强大族逐渐扩大这种私人武装规模，并按军队编制组成部曲，从而形成地方的分裂割据势力。

有关东汉豪强大族的私家武装情况，在文物中有充分的表现。前述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庄园图》宅舍旁，画了一座望楼，在前耳室中画了一座四方形带墙的建筑，其中一角还建有角楼一座。根据题记，知道它是

陶城堡

东汉
1956年广东广州东郊麻鹰岗出土
长41.2厘米，宽40厘米，高29.6厘米

这件陶院落平面呈方形。有供临窗眺望的谯楼，有执兵器的武士，有凭几端坐的主人和跪伏朝拜的吏役，是东汉时期豪强地主武装力量的一种真实反映，说明东汉豪强大族已经把住宅和防御设施紧密地结合起来，揭示了当时阶级对立和社会动乱的情况。





绿釉陶水亭

东汉

陕西西安新筑镇三里西村出土

高54.5厘米

陶水亭位于陶制圆形水池之中，环绕池周塑有人物、马、鹅等。陶亭高2层，下层置梯，以登顶层；上层平座栏杆之内，四角各塑有张弩控弦的武士，是当时普遍存在的部曲家兵的一种写照。亭中塑有扬袖起舞、抚琴、拍手伴唱的人物。

一座坞壁。既然在庄园内建造了望楼和坞壁这样的防御工事，也就意味着庄园主手中必然拥有一定的私人武装。部分出土的陶质楼阁、住宅模型，带有围墙、角楼、望楼、飞桥，具有军事性质。如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陶楼阁，平面呈长方形，四周围以院墙，院墙四隅上建角楼，各角楼之间和门楼连以飞桥，是东汉晚期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楼橹坞壁的建筑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不仅有防御工事，还设置了大量的私人武装。如河南陕县刘家渠出土的绿釉陶楼阁，楼高三层，中层中央有四个

人对坐下棋，四周各立一名武士，面朝外，均作持满弓欲射状；三层上有二人眺望，一人持满弓，楼四周有水池，池边堤上又有四个骑马的武士。广东广州东郊麻鹰岗出土的陶院落，平面呈方形，有供临窗眺望的谯楼和执兵器的武士。河南淅川出土的东汉陶水榭模型，由水池和亭榭组成，亭榭矗立于水池中，水池周围有轻骑巡逻，池中水榭上下层及四隅都设有弓弩手。还有一些东汉陶俑，如四川崖墓和宜宾翠屏村出土的，作农夫打扮，却佩带环首大刀，展示的就是田庄中亦兵亦农的部曲形

象。用兰绮来陈设兵弩的形象在东汉一般官吏和地主墓中也多有出现，反映出田庄私家武装的普遍性。

第二节 衰颓晚景

公元88年，汉章帝去世，年仅十岁的太子刘肇即位，是为汉和帝。和帝执政时期是东汉社会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以降，朝政日衰，外戚和宦官交迭统治。一部分官僚、太学生和郡国生徒也卷入到外戚和宦官旷日持久的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斗争中，上演了一幕幕颇为悲壮的党锢之祸。在东汉后期的七八十年间，小规模起义连绵不断，此起彼伏，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大起义。

一、外戚·宦官

对于蔡伦，多数人只知道他改进了造纸术，是有名的造纸专家，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个宦官，更不知道他还卷入了当时外戚与宦官间的权力之争。

东汉的皇帝，自章帝以下，都是年幼即位。和帝即位时十岁，安帝十三岁，顺帝十一岁，冲帝两岁，质帝八岁，桓帝十五岁，灵帝十二岁，献帝九岁。因为皇帝年幼，故多太后临朝。太后临朝，多依靠娘家人——外戚。小皇帝长大后，看不惯外戚的专横跋扈，就依靠自己最亲信的宦官夺回皇权。外戚和宦官为争夺权力而展开的激烈争斗，构成了东汉历史的重要内容。

和帝即位后，窦太后临朝称制，母舅窦宪位居机要，窦氏外戚集团掌握了实权。窦宪曾祖窦融是东汉开国元勋，他在世时，窦家已经有一公、两侯、三尚公主、四二千石，成为东汉初年统治集团中屈指可数的豪门。窦太后

临朝称制后，窦氏子弟亲戚飞黄腾达，专横跋扈，他们欺凌小民，强夺财货，辱掠妇女，商贾避之如避寇仇。地方官畏惧窦家权势，无人敢于举奏。在窦宪击破北匈奴，任大将军后，窦家权势更盛，刺史、郡守和县令大多出自其门下，东汉王朝实际上变成了窦家天下。公元92年，汉和帝在宦官郑众的帮助下，诛灭了窦氏势力，郑众也因功封侯，开始参与政事。不过，郑众与后世专权的宦官有所不同。他为人谨敏有心机，早在窦氏专权时就心向王室，不像其他朝臣那样依附巴结窦氏。辅助和帝诛灭窦氏后，每次按功行赏，他都辞多受少。所以郑众参与政事，还称不上是宦官擅权专政。

和帝死，邓太后为长期把持政权，废和帝长子，立生下仅百日的婴儿为帝，即殇帝。殇帝死后，她又迎立年仅十三岁的安帝，继续由自己掌握大权，其兄邓骘辅政。邓太后从窦氏的失败中汲取教训，严加管束自己的兄弟子侄，注意抑制他们的过分骄奢；大力表彰儒学，提倡读经，擢用名士杨震等人，以争取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在控制政权方面，部分依靠蔡伦等宦官，使宦官较和帝时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事，也拥有更大的权势。由于邓太后为人比较谨慎，所以其专权擅政时并无劣政，成为东汉外戚专权较为清明的时期。尽管邓太后采取各种措施以谋取各方力量的支持，但反对邓氏专权的政治力量依然存在。121年邓太后一死，安帝乳母王圣、宦官李闰等便诬告邓骘兄弟及宦官蔡伦图谋废立，驱除了邓氏势力，邓氏专权擅政的局面从此结束，蔡伦也因参与诬陷安帝生母之事而被迫服毒自尽。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

邓氏专权结束后，安帝开始亲政，阎皇后兄阎显等与帝舅耿宝并为卿校，典掌禁兵；宦官李闰、江京、樊丰等并掌机要，形成了外戚、宦官共同把持政权的局面。这些外戚、宦官互

相勾结，贪污受贿，作威作福，甚至随意假作诏书，使东汉政治败坏，百姓深受其害。125年，安帝病逝后，阎皇后与阎显等立幼童北乡侯为帝，企图长期控制朝权。没想到北乡侯即位二百多天就病死，宦官孙程等十九人密谋迎立已废的太子济阴王刘保，是为顺帝。宦官孙程等十九人因拥立有功，都封为侯。由于顺帝对孙程等宦官严加控制，所以宦官在其统治时期并未酿成大祸。且其生母李氏已被阎后杀害，顺帝即位之初也没有外戚控制朝权。132年，梁商女立为皇后，妹为贵人，梁商加位特进，官拜执金吾。135年，梁商开始以大将军主持朝政，朝政逐渐转移到梁氏外戚集团手中。梁商为人谨慎，主持朝政期间，得到了皇帝、朝臣、士人和部分宦官的支持。141年，梁商病逝后，顺帝拜其子梁冀为大将军。梁氏势力进一步膨胀，朝政为梁氏一门把持，劣迹昭彰。144年，顺帝死，年仅两岁的冲帝刘炳即位，梁太后临朝，梁冀的权力越来越重。不足一年，冲帝就死掉了，梁冀与太后定策，立八岁的质帝刘缵为帝。年幼的质帝说了他一句“跋扈将军”，就被毒死。梁冀与宦官曹腾等合谋，扶立尚未成年而又昏庸无能的汉桓帝刘志，将主张立长君以安定帝位的太尉李固等人下狱致死。梁冀又立胞妹为桓帝之后。有两后作后盾，梁冀更加肆无忌惮，大权独揽，朝廷的大小政事，都由他决定；百官的升迁任免，都要先到他家里谢恩，才到尚书台办理手续；地方郡县每年进献的贡品，要先把上等的送给他，然后才把次等的奉献给皇帝。梁冀的专横暴虐达到了极点。公元150年和159年，梁皇太后和梁皇后先后死去，梁冀失去了靠山。桓帝在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和唐衡等人的策划下，一举消灭了梁氏势力。梁冀与其妻孙寿当日自杀，宗亲都被捕弃市，自公卿大臣至宾客故吏，因牵连而死、



免官者，有三百余人。抄没梁冀的家财，拍卖后值钱三十多万万，相当于当时东汉王朝半年的租税收入。

梁氏势力被诛灭后，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五人因功同日封侯，世称“五侯”。不久，单超病死。掌握朝权的四侯专横跋扈，顺从他们的就可以青云直上，光耀三族；背逆他们的就会遭到参夷五宗的灾祸。他们穷奢极侈，竞起壮丽的宅第；犬马都穿金戴银，身披各种名贵的丝织品；多取良人美女为姬妾，其穿佩与宫人无异；姻亲兄弟宰州临郡，到处为非作歹，与盗贼无异。从此，东汉王朝进入了更为昏暗的宦官专权阶段。

蔡伦墓

位于陕西洋县龙亭铺南

167年，桓帝因纵欲过度而死，窦太后临朝，立十二岁的刘宏为帝，是为灵帝。窦太后以其父窦武为大将军、前太尉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共同辅政。窦武、陈蕃想诛除宦官，没想到事情泄露，反为宦官所杀。宦官仍然掌握着朝政，其擅权程度超过了桓帝后期，东汉政治更加腐败。宦官张让、赵忠等十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典据州郡，垄断财利，侵掠百姓。黄巾起义爆发后，一个叫张钧的小官上书灵帝，认为张角之所以能够兴兵作乱，万人归附，其原因在于这些中常侍放纵自己的父兄子弟姻亲宾客，贪残百姓，无恶不作，要求灵帝斩十中常侍，悬首南郊，以谢百姓。没想到灵帝看了以后，竟然勃然大怒，骂张钧是狂妄之徒，宣称：“十个中常侍中难道就没有一个好的吗？”可见灵帝比桓帝还昏庸。他常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宦官成了皇帝的“爹妈”，他们自然更加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了。

188年，灵帝死，十七岁的刘辩即位，是为少帝。不久少帝被废，九岁的刘协被拥上帝位，是为献帝。何太后临朝，其兄何进辅政。何进要诛杀宦官，与何太后商议，想招边将董卓带兵进京作帮手。何太后犹豫不决。不久宦官知道了何进的计划，在董卓未到之前，就假太后诏把何进骗进宫中杀掉了。司隶校尉袁绍曾与何进同谋诛杀宦官。何进死后，袁绍就和他的从弟虎贲中郎将袁术领兵包围了宫禁，逮捕宦官，无论少长，一律诛杀，死者二千余人。肆虐东汉朝廷的宦官就这样被一举杀尽了。

关于东汉外戚与宦官的争斗，有人认为在本质上是世家豪族与东汉皇权间的政治斗争。东汉外戚多半出于世家豪族集团。随着世家豪族政治经济权力的发展，他们要求削弱皇权对他们的干涉和限制，外戚就成了他们

的代表。而宦官是皇帝的家奴，有皇帝才有宦官，有皇权才有宦官权，宦官的立场就是皇帝的立场，宦官要求皇权对世家豪族特权予以限制。这种看法不无道理。

东汉时期，豪强大族政治经济势力的恶性膨胀和专制主义皇权的高度发展，为外戚与宦官交替擅权提供了土壤。从和帝开始，有十个皇帝都以童龄嗣位，不知国事，根本不能总揽朝政，原因是太后想擅专国政，所以贪立幼年皇帝。和帝时的窦太后，殇帝、安帝时的邓太后，少帝时的阎太后，冲帝、质帝、桓帝时的梁太后，灵帝时的窦太后，献帝时的何太后都是如此，而相应的外戚也就接踵而来。代表世家豪强的外戚集团一旦总揽军国大权，便对小皇帝任意摆布，甚至鸩杀皇帝，皇帝形同傀儡。皇帝成年后，不甘心失去驾驭国事的权力，更要摆脱扼喉之忧的处境，但萧墙之内得不到任何大臣的辅助，惟一可以利用的力量便是贴身的宦官。和帝要除窦氏时，深更半夜派人传语宦官求索故事，桓帝甚至躲到厕所和宦官谋商大事。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都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借助宦官之手除掉了外戚。皇帝亲政后，惟恐皇权再次旁落，却又找不到更放心的代言人，只有依恃宦官来巩固自己的专制中枢。从这个意义上讲，汉灵帝视宦官为衣食父母恰好反映了皇帝对宦官的依赖，是皇权的延伸和保证。

二、清议·党锢

太学是汉代最高学府，由中央政府开办，由属于九卿之一的太常掌管。博士是太学的教授，博士弟子就是太学的学生。东汉太学始建于公元29年，以后屡经扩建，至132年才全部完工。东汉太学原址范围很大。由于解放前在这里盗掘石经，遗址遭到严重破坏。经过勘探和试掘，可以确认其主要遗迹分为两部

分。一部分在辟雍之北，其范围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00米，过去许多石经碎片大多是在这里的北面附近出土的，从而可以认为是东汉太学的主要部分之所在。另一部分在它的东北约100米处，遗迹保存较好，其范围也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50米，四周筑有围墙。尽管东汉太学已成遗迹，但太学生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关注乃至参与仍令今人感佩不已。

根据制度，太学生按照考试成绩的高低可以授予一定的官职，从而进入仕途。但外戚、宦官把持朝政以来，太学生就不能按照正常的途径进入政治舞台，盘踞要津的多是那些靠裙带关系或凭借财产和请托权门而成为要员的无能之辈、无耻之徒。时谚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反映了当时选举制度极其腐败混乱。对于这种情况，太学生表示了强烈不满。他们议论政治，品评人物，对外戚、宦官进行了猛烈抨击，使当时的太学成为清议的中心。所谓清议，是东汉后期在官僚士大夫中兴起的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他们对朝廷施政的臧否、官吏人品的高低以及吏治的清浊进行指摘评论，尤其是在攻击朝政腐败和罪恶权贵的同时，还赞扬敢于干犯权贵的人。太学生的这些清议对改善东汉的吏治，铲除外戚、宦官的黑暗统治不会起到什么根本作用，但是他们所称道的官僚大多是敢于同地方豪强或外戚、宦官等恶势力斗争的正直之士，在社会上也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他们对宦官及其党羽暴政的揭露抨击，具有一定的舆论威慑作用，“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屣到门”。

太学生以清议为手段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得到了一些正直的官僚士大夫的支持。在这些官僚士大夫中，太学诸生最为尊崇的是

李膺、陈蕃和王畅，称赞他们为“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李元礼即李膺，陈仲举即陈蕃，王叔茂即王畅，均以清高自守、敢于抨击宦官势力而著称。他们互为推重，更相标榜，终于结为党人。河内人张成是与宦官交往密切的术士。他预知朝廷大赦，就故意唆使儿子杀人。当时李膺为河南尹，刚刚将其逮捕，果然遇赦。李膺对宦官泄露机密非常气愤，不顾赦令，处死了凶手。遭受打击的宦官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在166年指使张成弟子牢修上书朝廷，控告李膺等交游太学诸生，联合郡国生徒，结为部党，诽讪朝廷，淆乱风俗。昏庸的桓帝勃然大怒，不顾太尉陈蕃的劝谏，布告天下，命令郡国逮捕党人，收执李膺、陈寔等二百余人，并将不断上书劝谏的陈蕃免职。入狱的党人都以布囊蒙头，头、手、足枷以木械，暴于阶下，逐一遭受毒打。李膺等人在狱中供出不少宦官子弟，宦官畏惧引火烧身，就劝桓帝赦免党人；窦武、霍谡等近臣也向桓帝说情。167年，桓帝把党人赦归田里，但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

李膺、陈寔等虽然遭到压制，但是他们获得了社会上广泛的同情。范滂离开洛阳返回家乡时，汝南、南阳士大夫迎接他的有数千辆车。社会上都将这些被视为名士的党人冠以各种美名。如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李膺、荀爽、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此外还有“八及”、“八厨”。167年桓帝死后，灵帝即位，太后父窦武为大将军辅政。窦武嫉恶宦官专宠，就与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打算消灭宦官的势力。但因事情泄露，宦官曹节、王甫发动政变，窦武兵败被杀，陈蕃等被害。169年，宦官侯览指使人诬告张俭与同郡

二十四名士结党，图谋不轨，同时宦官曹节又乘机奏捕党人，导致李膺、杜密、虞放、范滂等百余人都死在狱中，其他因仇怨陷害相牵连而被诬杀、流放、免官、禁锢的有六七百人。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阙上书写反对宦官专权的文字，宦官集团又一次四处搜捕党人及太学诸生千余人。176年，又下诏规定，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直到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政府才宣布赦免党人，起用他们去镇压农民军。

两次党锢之祸持续近二十年，官僚士大夫等受到沉重打击。由于他们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同情。当他们受迫害逃亡时，许多人破家相容。当太学生和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对当权的宦官进行激烈的抨击时，对同样嚣张的外戚专权却很少涉及，甚至缄口不言。一些比较清寒的士人虽和外戚有一定矛盾，却认为受制于外戚比受制于皇帝的家奴还要好些。不言而喻，当党人首领巴结外戚、对代表皇权的宦官群起而攻之时，屡受外戚梁冀、窦武之害的桓、灵二帝自然是惴惴不安，宦官在皇帝的支持下才敢两次镇压党人。因此，把党锢之祸仅仅说成是宦官对正直士人的迫害，远远不能揭示当时错综复杂的特殊政治局势。那些自诩救世的士人互相提携，演成朋党，对于治理国政却毫无新的建树，即便提出过一些建议，也不意味着变古革新，称不上什么改革派，更谈不上什么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消耗在激扬名声和不暇稍息的争权夺利上，他们和专权的宦官并无进步和反动之分。何况一些名士对推荐他们的宦官也是感恩戴德，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他们争斗的实质是权力之争，而不是政见之争。

三、太平道·黄巾起义

安徽亳县元冢曹操先世宗族墓曾出土一块壁砖，上刻二十六字，大意是匠人被征调来制砖造墓，含冤不白，要同欺压他们的人斗争。其中“苍天乃死”，可以说是十四年后黄巾起义所提“苍天已死”口号的先声。基于这一点，这块砖的价值自然非同小可。然而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发掘者对砖上铭文释读有误，这块砖与黄巾起义毫无关系。但是无论如何，这块砖都与黄巾起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黄巾起义的历程，来思考一下二者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

东汉中期以后，土地兼并剧烈，大批农民失掉土地，有的沦为农奴，有的流离失所。在外戚和宦官的交替统治下，政治黑暗，官吏贪残，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人民负担沉重。东汉政府多次镇压羌族人民的起义，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加上水旱蝗灾连年不断，人民已毫无出路，只有起来反抗，争取生存。在东汉后期的七八十年间，小规模起义连绵不断，此伏彼起，仅桓帝在位的二十年内就有二十多次。这些起义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人民并没有屈服。当时有一首民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生动地表现了起义军前仆后继地进行斗争的英雄气概。

在这种情况下，钜鹿（治今河北宁晋西南）人张角以当时广为流传的《太平经》传道，创立了太平道。张角宣称太平道是黄帝、老子所创，自称大贤良师，用符水咒语替人治病来传道。得病日浅而痊愈的，就说是因为此人真心信奉太平道；没有痊愈的，就说此人没有真心信奉太平道，所以符水没有产生灵验。由于东汉末年，在外戚、宦官和贪官污吏的剥削压迫下，百姓不得温饱，生病又无钱医治，只得

求助于这种原始的巫术，为自己的精神找到安慰，而太平道主张平等、平均，反对不劳而食的思想又恰好投其所需，使太平道在东汉末年得到广泛传播。

张角利用给人治病，吸收了很多弟子。他派遣其中的八位，到各地用行医做掩护，秘密组织群众为起义作准备。十几年间，徒众发展到三十多万人，活动扩展到青、徐、幽、冀、扬、荆、兖、豫等八州。为了把人们更好地组织起来，张角按照地区把徒众分为三十六方，大方有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立渠帅，相当于将军，统一归张角指挥。许多贫苦农民变卖家产，辗转投奔，以致于堵塞道路。

面对太平道势力的蓬勃发展，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太尉杨赐曾经上书灵帝，指出张角势力日益滋蔓，如果诏令州郡捕讨，势必引起更大的骚乱，主张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诏令刺史、二千石，将张角徒众分流，让他们各归本郡，从而削弱他们的力量，然后再对太平道的首领下手，可不劳而安定天下。然而杨赐的建议并没有引起灵帝的重视，统治集团内部仍然忙于争权夺利。面对这样的大好时机，张角开始有计划地对起义进行全面部署。到京都洛阳亲自察看形势后，他派遣大方渠帅马元义调动荆、扬二州数万人北向邳县（今河北临漳西南）集结待命，以补充北方主力队伍的力量，并让他联络宫廷内部中常侍封谡、徐奉等人和宿卫人员以及京

都洛阳的教民作为内应。在舆论上，张角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并用白土在京师和州郡官府门上书写“甲子”字样，约定甲子年即中平元年（184）三月五日在京都洛阳和全国同时起义。

起义的时间确定后，八州徒众无不响应，只等张角一声令下。可是在预定起义的前一个月，张角的弟子唐周向东汉政府告密，将起义计划全部泄露。马元义被逮捕，并被处以车裂的酷刑，京师信奉太平道的宫廷宿卫和百姓一千多人遭杀害。东汉政府连夜下令到冀州搜捕张角。张角得到突变的消息后，马上派人驰告各方，立即发动起义。经过长期酝酿准备的各地农民军，接到张角的命令后，三十六方同时起义，十日之间，天下响应。数十万农民同时拿起了武器。他们头裹黄巾，因此被称为黄巾军。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自称“地公将军”，张梁自称“人公将军”，兄弟三人是黄巾军的最高统帅。黄巾军在各地杀官吏，烧官府，摧毁豪强地主的田庄，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物，开仓赈济贫民。起义后，黄巾军的主力主要集中在冀州、颍川、南阳三个地区。冀州黄巾军由张角、张宝、张梁兄弟率领，南阳黄巾军由张曼成率领，颍川、汝南的黄巾军由波才、彭脱等人率领，从东郡到江淮还有卜己、张伯、梁仲宁、戴风等人领导的黄巾队伍。

面对黄巾起义的烽火，东汉统治者十分



铁项钳，铁脚镣

东汉
1975年河南郑州古荥镇桐树村出土

“苍天乃死”字砖

东汉建宁三年（170）

1976年安徽亳县元宝坑出土
高37厘米，宽13厘米，厚6厘米

惊慌，急忙派何进为大将军，调集大军防守洛阳周围的要塞；同时任命皇甫嵩、朱儁为左、右中郎将，率领主力镇压对洛阳威胁最大的颍川农民军；命令卢植为北中郎将，向张角率领的冀州农民军进攻。东汉政府还下令解除党锢，动员整个地主阶级的力量来对付农民起义。各地豪强也挖长壕，修坞壁，协助东汉政府围攻黄巾军。在洛阳附近的战斗中，颍川黄巾军开始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他们在召陵

（今河南郾城东）击败汝南太守赵谦的地方官兵，乘胜向颍川、洛阳方向推进。四月，波才打败朱儁部，进攻皇甫嵩，将皇甫嵩部包围于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但皇甫嵩利用黄巾军轻敌的思想，纵火突击，骑都尉曹操率兵来援，朱儁残部也赶至长社，三股兵力合击，数万黄巾军战死。击败颍川黄巾军，就解除了对东汉首都洛阳的直接威胁。于是东汉政府调皇甫嵩率军北上，向冀州黄巾主力军进攻，朱

儁则转向南阳，围剿南阳黄巾农民军。

南阳黄巾军在张曼成领导下，杀南阳太守褚贡。在继任太守秦颉的反击中，张曼成战死。黄巾军推举赵弘为主帅，重整队伍，发展到十余万人，占据宛城，声威复振。长社之战后，朱儁率兵南进支援秦颉的地方官兵，荆州刺史徐璆也带兵至宛，三路军合兵围攻宛城。十一月，朱儁攻下宛城，南阳黄巾军被镇压下去。

冀州黄巾军在张角兄弟的领导下，在广阳（今北京房山）击杀了冀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并攻克了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和广宗（今河北威县东）等城邑，向南逼近。北中郎将卢植和董卓先后率兵进入冀州，与地方官兵配合镇压黄巾军。张角决定采取守势，与张梁率主力退保广宗，张宝率别部主力守下曲阳，互相呼应。由于卢植、董卓都攻不下广宗，同年八月，朝廷命皇甫嵩部渡河北上进攻广宗。此时，张角病逝，张梁继任统帅，坚守

广宗，与率兵扑来的皇甫嵩军展开激战。十月，黄巾军大败皇甫嵩，但得胜后又因麻痹轻敌，被皇甫嵩军偷袭，张梁阵亡。接着皇甫嵩移师南下，于十一月攻克下曲阳，张宝战死。冀州黄巾军失败。

从二月张角起兵，至十一月下曲阳失守，黄巾军主力持续战斗了九个多月。由于黄巾军提前起义，打乱了原定的部署，特别是在首都洛阳发动起义的计划没有实现，使得东汉王朝能够有组织地进行镇压，把农民军分割在许多地区各个击破；加上黄巾军缺乏作战经验，缺乏训练，更易为敌所乘。但黄巾起义是经过长期准备的有组织、有纲领的武装斗争，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从整个起义过程来看，黄巾起义的口号属于起义的一个临时约定，不是长期奉行的纲领。尽管亳县在东汉也属于太平道影响的势力范围，但这个口号与出现在安徽亳县元宝坑、时代为公元170年的字砖上的铭文很难发生联系。

第四章

秦汉周边民族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

东汉

1979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

高2.9厘米，印面边长2.3厘米

此印为东汉中央政府赠给匈奴族首领的官印。印文形式承自西汉宣帝以来传统，在赠给少数民族首领官印之首，署“汉”字，下为民族名，并在民族名的前后加上“归义”等封号，又常以驼钮作为这种印的基本钮式。汉代匈奴的主体并没有到达青海，但有一支起源于甘肃张掖一带的匈奴别部“卢水胡”，在东汉时已经越过祁连山而与青海东部湟中一带的月氏胡和羌人杂处。此印所称的匈奴，就是指卢水胡而言。

秦汉时期，在帝国的周边生活着匈奴、乌桓、鲜卑、百越、西南夷和西域诸族。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确立，这些民族与秦汉帝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日益密切，逐渐成为秦汉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一节 匈奴族

匈奴族是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部族，其社会组织以部落联盟为主，首领称为“单于”。在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匈奴族占有重要地位。





一、逐水草而居

匈奴族的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畜群是他们的主要财富，以马、牛、羊为最多，饮食、衣着及其他日用品多仰给于牲畜。匈奴人自幼熟悉骑射，长大

后则编为骑兵。他们适应塞北的地理环境和游牧的生活方式，平时“人不弛弓，马不解勒”。在出土的匈奴文物中，各种动物纹样的装饰品富有浓厚的草原气息，而以长方形铜饰牌最为典型。这些铜饰牌为腰带上的饰件，上面有双牛、双马、双羊、双驼等图案和表现

三人奏乐铜带钩

西汉

1956年内蒙古准格尔旗出土，长4.5厘米，宽1.9厘米。带钩亦称“师比”、“鲜卑”、“西毗”等，都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语音之译，是用于扣拢腰间革带的钩。其制一端曲首，背有圆钮，形式多样。匈奴人服装一般上着直襟衣，下穿长裤，在腰间束一条有扣的革带。传统意见认为带钩最早为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使用，春秋时传入中原，但最近在山东的西周晚期墓中已发现带钩。战国至汉代带钩极为流行。



骑士铜带钩

西汉

1956年内蒙古集宁二兰虎沟出土，长5.2厘米，宽3厘米。汉代匈奴族的带钩制作非常发达，而且形式多样，其形制和装饰图像往往反映出草原游牧民族的游牧生活和习俗。



牛形铜饰

西汉

1956年内蒙古包头市郊出土
长5.3厘米，宽3.8厘米

牛是匈奴族的主要牧畜，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他们装饰艺术中常见的形象之一。这件铜饰作卧牛状，造型别致，堪称匈奴族的一件艺术品。

犬马、犬鹿、鹰虎相斗以及骑马出征、骑兵捉俘虏等场面。这些文物不仅是研究匈奴民族造型艺术的珍贵资料，也生动地展示了他们的游牧生活。

匈奴族的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根据文献记载和匈奴墓葬出土的文物，匈奴有铁器、铜器、金银器、陶器、木器、毛织和皮革制造业。其中铁器有镞、刀、剑、镢、马衔、扣、鹤嘴锄、镰、铍、釜、鼎等，说明匈奴人的铁器制造和使用已经逐渐深入到生产、生活和军事活动的各个领域。从出土铁器的种类和数量来看，当时匈奴人的冶铁业可能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许多刀剑

形式酷似汉式，说明匈奴人的铁器制造业受到汉文化的很大影响，其工匠有可能多来自中原。匈奴族的铸铜业较为发达，出土的大批铜镞、铜刀、剑、马衔、斧、铍、车轴头、马面饰、车马饰、带扣、饰牌、炉、炊具、壶、鼎、钟、铃、镜等，显示出匈奴铸铜业已拥有较大的生产规模和较高的制作技术，说明铸铜业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随着冶铁业的出现和发展，铸铜业转为主要制造日常生活用具和饰具，兵器和重要的工具、用具则逐渐为铁器所代替。木器制造业也是匈奴族一个重要的手工业部门。西汉时，今内蒙古大青山和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是匈奴



狩猎纹骨饰

西汉

1954年内蒙古包头市郊出土
高7.7厘米，直径4.5厘米
匈奴以射猎禽兽及牧畜为生。这件装饰品用兽骨制成，外壁用针刻画出发鸟、奔跑的野猪、搭弓射箭的猎手等图案，技法熟练，造型生动，堪称反映匈奴游牧生活的艺术佳作。

穹庐、车辆、木盾和棺槨等木器制造业的重要基地。汉兵在河套地区击败南单于时，就曾经缴获其穹庐及车千余辆。

匈奴族的居室是便于搬动的穹庐。穹庐类似现代的蒙古包，建筑材料主要是木材、皮革和毛毯等。基于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基础，匈奴族自君王以下，都食畜肉，饮其乳汁，衣其毛皮，被发左衽。匈奴族的婚姻一般是一夫一妻制，在有权势和富裕的男子中间多妻也相当普遍。转房制广泛存在，父亲死后，儿子可以妻其后母；兄死后，弟可以娶其妻。

匈奴族实行土葬。单于和权贵的丧葬规格相当高。《史记》和《汉书》都记载单于死后，有棺槨金银衣裘，殉葬的近幸臣妾多达数十甚至上百人。普通百姓的丧葬就非常简朴。20世纪80年代宁夏同心清理了一批汉代匈奴墓，墓葬分为竖穴土坑葬、偏洞室葬和石槨葬，其中竖穴土坑葬居多，石槨葬很少。随葬品多是死者生前使用过的陶器、铜器、铁器、金器、漆器、海贝和料珠等，与汉族普遍使用的明器不同。



双羊铜饰

东汉

1967年河北张家口出土

高7.7厘米

东汉初年，匈奴族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北匈奴雄踞漠北，坚持与汉朝为敌，后在汉朝军队的强大攻势下远遁西逃，从此在中国古代史上消失。南匈奴则入居边塞，成为汉帝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这件铜车饰，作双羊伫立状，羊首低俯，双目圆睁，长角盘曲，短尾上翘，显得活泼可爱，为南匈奴遗物。



二、昭君出塞

把王昭君这样一个弱女子嫁到荒漠，惹怒了不少多情的诗人，他们纷纷为王昭君鸣不平。“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汉道方全盛，朝廷足武臣。何如薄妾命，辛苦事和亲”，这样的诗歌足以编辑成集了。其实，王昭君若不是嫁给单于的话，只不过是西汉皇宫中一名普通的妃子，也许在历史上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王昭君出塞时，汉朝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完全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昭君的出塞不应当被视作被逼为国家民族牺牲的红颜薄命式的悲剧，反而是一曲慷慨激昂的民族融合的赞歌。

由于内部矛盾的加剧，汉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下诏罪己，改弦更张，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以后的昭帝、宣帝继续实行这一政

策，使汉朝的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汉朝对其他民族很少用兵，与匈奴基本上和平相处，具体表现为匈奴将扣留十九年之久的汉使苏武遣返回汉，汉朝对匈奴的几次小的侵犯也都采取了防御政策。

由于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公元前72年秋，汉朝任命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率领四万余骑出河西（今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度辽将军范明友率领三万余骑出张掖（治今甘肃张掖），前将军韩增率领三万余骑出云中（治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率领三万余骑出酒泉（治今甘肃酒泉），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率领三万余骑出五原（治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各出塞二千余里，同时任命常惠为校尉持节护乌孙兵，协同进攻。前71年春正月，五将军从长安誓师出发，一同出击匈奴。匈奴

透雕双驼纹铜带饰

西汉

1983年宁夏同心倒墩子出土
长9.6厘米，宽4.8厘米
匈奴人身束革带，革带两端不便直接缚结，故在其上装有装饰带具。此类带饰的图案多动物形态，富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游牧生活所赋予的艺术特点。



昭君墓

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无力抵抗而逃，损失惨重。

不久，匈奴发生内乱，出现了五个单于，各派势力多争取与汉和亲，有的甚至投靠汉朝。汉朝为了自身的安宁，也积极结纳。前33年，呼韩邪单于到汉朝朝觐，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昭君嫁呼韩邪，号称“宁胡阏氏”。可以说，王昭君是在汉军对匈奴战争节节胜利、匈奴诚心归附的情况下出塞的，有强大的西汉王朝作为后盾，其境遇与西汉初年被迫和亲的女子大不相同。从此，匈奴首领不断朝觐，并遣子入侍，汉朝与匈奴和平相处了四十余年。在这一时期，匈奴社会安定，国力得到恢复，汉朝的北部边境也出现了“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局面。在今内蒙古，有多处象征性的昭君墓，其中位于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规模最大。墓地地势平坦，远望墓表，颜色青黛，故有青冢之名。墓前有清代以来所镌刻的石碑“汉明妃之墓”、“昭君青冢”、“塞外流芳”等，默默地倾诉着

后人对这位巾帼奇女的仰慕和怀念。

第二节 乌桓族和鲜卑族

乌桓(又称乌丸)和鲜卑为东北少数民族东胡的分支，语言习俗和经济形态大体相同。西汉初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一部分逃避到辽水上游的乌桓山一带居住，被称为乌桓；另一部分逃避到乌桓山东北的鲜卑山一带居住，被称为鲜卑。

一、壁画《护乌桓校尉幕府图》

1972年发掘的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中有一幅《护乌桓校尉幕府图》。这幅壁画高129厘米，宽159厘米，由壁画可知，幕府建在宁城县城内西北部，由幕府堂院、营舍和庖舍三部分组成。幕府南有三间单檐大门，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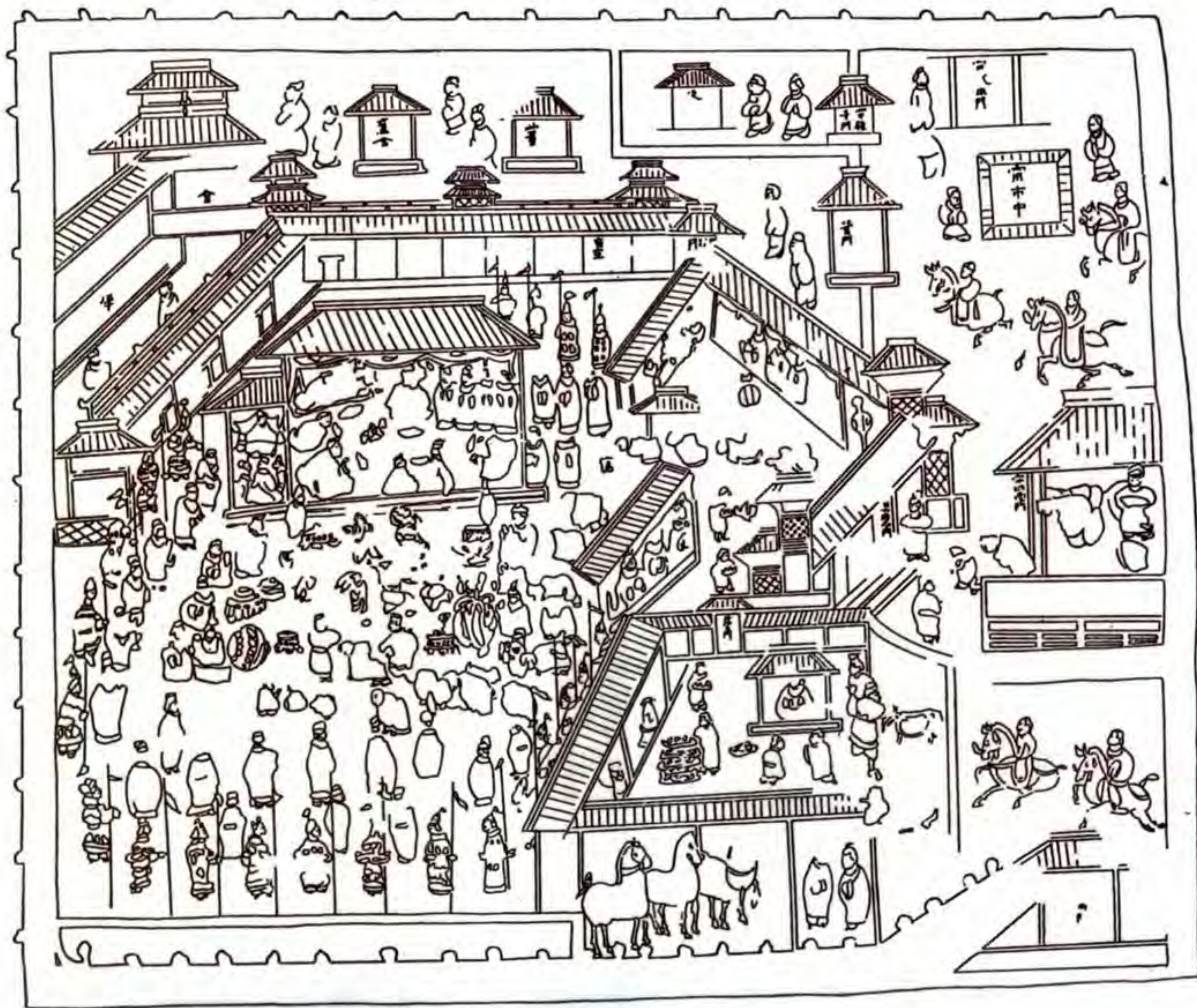
旁设子母阙，榜题“莫府南门”。门内侧立有建鼓。进门为庭院，东、北两面的房舍是客馆。再进入堂院，院庭宽阔，是幕府的主要部分。正面堂屋是一座高大的庑殿式房屋，帷幔高悬，主人校尉端坐堂上，院内正进行乐舞杂技表演。乌桓部族人物行经庭院重门，进入堂院，向校尉行伏拜礼，堂院周围环立武官、甲士和属官。堂屋北侧的抱厦内坐着主人的妻子。堂院北、东面为长屋廊舍，有一间廊舍题为“齐室”（即斋室），廊舍尽头是东府门。堂院后面是营舍，由南而东，依次为营门、营曹舍、司马舍和一场地，是管理军务和属官办事的地方。往北有一楼阁式仓房，连接北面的高台长屋库房。庖舍位于幕府西南隅，院内正进

行厨炊之事，院西房舍是马厩。此图形象地描绘了幕府的规模、建置和众人活动的场景，印证了文献上关于设置乌桓校尉幕府的记载，反映了汉朝与乌桓部族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据史书记载，乌桓与汉朝的关系始于汉武帝时。前119年，汉军击败匈奴左部，朝廷把乌桓迁徙于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治今北京密云西南）、右北平（治今辽宁凌源西南）、辽东（治今辽宁辽阳）、辽西（治今辽宁义县西）五郡塞外居住，为汉朝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部首领）每年入京朝见一次，并在幽州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使他们不得与匈奴交通。王莽时，为了进攻匈奴，曾令

壁画《护乌桓校尉幕府图》
（线图）

东汉
原图1972年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



乌桓部落组建军队，出屯代郡（治今河北蔚县西南），他们的妻子都被郡县扣为人质。乌桓人不愿为王莽卖命，纷纷逃亡，他们的妻子就被郡县杀害。这激起了乌桓人的反抗，许多乌桓部落重新迁居塞外。东汉初年，在匈奴贵族的诱迫下，乌桓各部不得不依附匈奴，并在匈奴的驱使下不断寇掠东汉边郡。公元46年，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乌桓各部摆脱了匈奴的控制，并乘机进攻匈奴。南匈奴归附东汉后，乌桓也向东汉政府表示臣服。公元49年，辽东、辽西境外乌桓各部首领九百余人至洛阳朝贡。刘秀封郝旦等大小酋长八十一人为侯王、君长，使他们居住于幽、并二州缘边十郡境内，招募乌桓人内附，又在上谷郡宁城（今河北万全）设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各部。和林格尔出土的《护乌桓校尉幕府图》壁画就反映了这段史实。

鲜卑与汉朝发生关系较晚，东汉时期才见于记载。公元45年，鲜卑万余骑侵犯辽东。

辽东太守祭彤率数千人迎击，大败鲜卑骑兵，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从此，鲜卑震怖，畏惧祭彤，不敢再窥伺边塞。公元49年，南匈奴和乌桓相继归附东汉王朝后，鲜卑大人偏何至辽东归附祭彤。公元54年，鲜卑大人于仇贲、满头等至洛阳朝贡，汉光武帝封于仇贲为王、满头为侯。公元58年，祭彤唆使偏何进攻赤山乌桓，斩其大人歆志贲，于是鲜卑大人都来归附汉朝。东汉政府也收买鲜卑部落大人，让他们专门对付北匈奴，甚至按照斩捕敌人首虏论赏的办法，鼓励鲜卑寇掠北匈奴。公元87年，鲜卑攻入北匈奴左地，斩优留单于。公元89年至92年，汉军与南匈奴大败北匈奴，使北匈奴远遁西北。鲜卑趁势占领匈奴故地，残留在草原上的十多万落匈奴人也都改称鲜卑。从此，鲜卑更加强盛，逐渐摆脱对东汉王朝的依附，成为威胁东汉王朝的一支主要力量。

珠饰

西汉

1956年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西丰西岔沟墓葬出土了大量玛瑙、碧色玉石、绿色石、白色石、各色琉璃质的管状珠、圆形珠、瓜棱形珠和扁方、长方形或菱形的石佩，构成了当时东胡部族所特有的装饰风格。





马形铜饰

西汉

1956年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
长6.5厘米，高4.3厘米

马是北方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牧畜，在其狩猎和畜牧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他们装饰艺术中最喜爱的纹样。这件铜饰作卧马状，为东胡族遗物。

二、田畜射猎

乌桓的经济生活以畜牧狩猎为主，过着随水草放牧的生活。辽宁西丰西岔沟乌桓人

墓葬中出土了20多面透雕铜饰牌。这些铜饰牌上有双牛、双马、双羊、双驼、犬马、犬鹿、鹰虎等动物图案和表现骑士出猎、骑马战士执剑捉俘虏的场面，出土的远射兵器有细石



骑马武士纹铜牌

西汉

1956年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
长11.1厘米，高8.4厘米

这件铜牌是皮腰带上的一种铰具，上饰骑马武士的图案，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面貌。



鍍金神兽铜牌饰

汉

1980年吉林榆树老河深出土，长11.3厘米，高7.2厘米。神兽形象近似飞马，吻部有一弯角上翘，昂首扬尾，四蹄腾云，双翼上展，作奔翔状，与《魏书·帝纪·序纪》所载“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大体相合。此神兽是据鲜卑族特有的神话设计的，对研究汉代东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镞、骨镞、铜镞、铁镞，都反映了乌桓族的游牧生活。

乌桓人还种植青稞、东墙等少数耐寒谷物，依靠布谷鸟掌握种植时令，十月和十一月收获。乌桓人还能够制作弓矢、鞍勒，锻造铁、铜兵器。辽宁西丰西岔沟乌桓族墓地出土的大量随葬品中，有刀、剑、矛、矢镞和鸣镝等铜铁兵器，展示了乌桓族在金属冶铸方面的技术水平。

乌桓人以穹庐为室，均朝东向日，居无常处。他们食肉饮酪，以毛皮为衣；没有针、药等医术，有病就用艾灸或烧石自熨、决脉出血等方法治疗。作为辅助衣食的丝帛、谷物等，

乌桓人主要依靠与汉人交换。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了大量具有汉族风格的铁镞、铁斧、陶器、刀剑、鍍金马具、铜镜、佩饰、货币等，反映了该部族与汉族的密切关系。

鲜卑族的经济与乌桓大体相类，以畜牧狩猎为主。内蒙古扎赉诺尔鲜卑族墓葬出土的飞马纹铜牌饰和马头、牛头、狗头、马蹄、羊蹄，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墓葬中出土的马、鹿等动物纹铜牌饰和殉葬的马匹，都反映了他们畜牧狩猎经济的特点。鲜卑人也种植青稞、东墙等作物，显示了鲜卑族农业的存在。由于没有发现犁、铧，仅发现锄、镰等生产工具，据此推测，鲜卑族的农业可能只是作为畜

牧狩猎的一个补充。

鲜卑族的手工业技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吉林榆树老河深出土的各种金、银、铜、铁、陶、骨质器物中，尽管有的原料来自中原，或者本为地道的中原产品，但有的经当地工匠二次加工后，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其中耳饰、项饰、腕饰、铜环、带饰等装饰品和长剑，制作技术娴熟，工艺水平很高，代表了当时手工业的技术水平。

由于鲜卑族以畜牧狩猎经济为主，男子在社会中的地位较女子重要，这在鲜卑族的墓葬制度上表现得很清楚。在吉林榆树老河深已经发现的五十五例男女同穴、异穴合葬墓中，男性随葬兵器，女性多随葬银、铜质腕饰等装饰品，表明该部族男子因为善于骑射、好战而普遍受到社会的尊重。一般的男性墓随葬品多，女性的稍次，死者排列的顺序都是男右女左，这说明男子生前的地位尊优，在经济生活和部族中居支配地位。



鲜卑族流行土葬，有棺，有的实行火葬，火葬时还殉马。大多数墓中均葬有镞或马衔，贫者一副，富者两副或三副，多为铁制的，也

铁镞、铜镞、鸣镞

西汉

1956年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这是东胡族使用的远射武器，同时出土的有细石器、骨镞、铜镞、铁镞，大致可分为翼式、棱式、扁平式和矛式。矢杆多用竹材。其中的鸣镞为铜制球形，中空有孔，射出后因风吹其孔，发出响声，俗称“响箭头”，又称“号箭”。

铜腕饰

汉

1980年吉林榆树老河深出土
通长15.6厘米

此器物每节呈圆环状，中间有一开口，外壁中部凸有一周棱，内壁平直，是取自中原的材料在经鲜卑族自己加工铸锻后而成，代表了汉代鲜卑族社会手工业的技术水平。这类器物发现于女性墓中，很可能是汉代鲜卑族妇女特有的一种装饰物。



有铜的和鹿角的。这说明马是他们生活中须臾不离的牲畜。为了表示对死者的悼念或避讳,鲜卑族还有一种随葬毁器的习俗。在吉林榆树老河深墓葬中,送葬者有意将环首小刀、小锥等殉葬小器折弯近90度角,或者把死者项部众多玛瑙中的一个或两个破碎作半,放在死者头下或前方;有的在死者头骨下放置半枚五铢钱,都出于类似的目的。

第三节 百越

战国时期,聚居在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广西等地的越族,包括很多分支,统称百越。秦汉时期,根据语言、习俗和地域的差异,越人可分为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部族。这些部族最后均置于汉朝的统治下,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崇安故城

1958年在福建崇安发现了一座汉城,翌年进行了发掘。城垣建在丘陵山坡上,随地势起伏,平面呈不规则的菱形,长约800米,宽约500米。夯土城墙宽8米至10米,残高2米

至6米。已发现三个城门豁口和两条连接城门的東西向道路。环绕城垣有宽约5米的护城壕。城内的文化堆积比较单纯,已探出建筑基址十多处。基址都建筑在比较平坦的台地上。城中偏北的一处基址,似为官署所在。另一座建筑基址,面阔二十间,进深四间,长47米,宽10米,有排列规整的柱础石五行,也应是一处重要建筑。出土的建筑材料中,有云纹和“常乐未央”瓦当。陶器中有一部分印纹硬陶,纹饰与广州西汉墓出土的相似。在房基和附近的灰坑中,有各种铁农具、手工工具和武器。一件铜弩机上的铭文,标明是“河内工官”的产品。关于这座古城的时代和性质曾经有过讨论。根据出土遗物显示的年代特征与大量兵器与农具共存的现象,推测应该是前110年汉武帝灭东海王余善以后,在这里设置的一个屯戍据点。汉朝之所以在这里设置屯戍据点,很大程度上与居住在这里的越族的不安分有关系。

秦始皇灭楚后,降服了居住在浙江一带的越族,设置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接着分别征服了东瓯和闽越,设置闽中郡(治今福建福州),其首领无诸和摇等被废为君长。在楚汉战争中,因佐汉有功,无诸被封为闽越王,都东冶(今福建福州),摇被封为东海王,

铁犁、铁铧和铁齿轮

西汉

1959年福建崇安汉城出土



都东瓯（今浙江温州）。闽越、东瓯统治集团内部宗族势力相当大，宗族之人多有封地，自有其民，各部各支间的争夺相当频繁。汉景帝时，吴王刘濞作乱，欲联合闽越、东瓯统一行动。闽越未动，东瓯则追随吴王反对西汉中央政府。吴王失败后，逃到东瓯，在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被杀。吴王的儿子刘子驹逃到闽越，常劝闽越进攻东瓯，为自己的父亲报仇。前138年，闽越发兵围攻东瓯。东瓯粮食将尽，准备投降，同时派人向西汉求救。汉武帝派遣严助持节征发会稽郡兵，渡海救援东瓯。汉兵还没有到，闽越就退兵了。为了避免闽越的威胁，东瓯王向汉政府要求举国内徙，得到了汉武帝的批准。于是东瓯迁居江、淮间，和当地汉族人杂居，接受西汉的直接统治。

前135年，闽越发兵攻打南越，南越向西汉求救，汉武帝遣大行王恢、大司农韩安国率兵增援。汉兵还没有越过五岭，闽越王郢的弟弟余善就与其相、宗族杀了郢，投降了汉朝。汉武帝于是封原闽越王无诸之孙丑为越繇王，不久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共同统治闽越。前112年，南越丞相吕嘉举兵反汉。东越王一面上书汉武帝，表示愿意出兵帮助汉楼船将军杨仆进攻南越，一面暗中和南越的反汉势力勾结。攻破南越后，楼船将军杨仆请求顺便进攻东越。汉武帝认为士卒疲劳倦怠，没有批准，命令杨仆屯兵待命于豫章梅岭（今江西宁都东北）。前111年，余善自立为帝，任命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进攻白沙（今江西南昌东北）、武林（今江西余干北）、梅岭，杀汉三校尉。汉武帝派遣军队分四道攻入闽越，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今浙江宁波西北），渡海从东方进攻东越；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归义越侯二人为弋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前110年，四路军队都攻入东越，越繇王居股等杀死余善，投降了汉



朝。汉武帝把闽越人迁徙到江、淮一带，与当地汉族人杂居。汉武帝还不放心，就在该地建立了这样一个屯戍据点。

二、“文帝行玺”金印

1983年，在广东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了一件“文帝行玺”金印。该印为南越国第二代王的帝号玺印，用黄金铸成，是南越地方割据政权的最高凭信，作封固简牍等用。这枚金印从质地、印钮、规格等方面均与秦汉官印迥异。以龙钮代替螭虎钮，印面规格超过方寸的常规，印文不用“皇帝行玺”而用自尊号“文帝行玺”，都具有浓郁的本地区政治文化色彩。以龙为钮和秦始皇称“祖龙”相吻合，把作为皇帝象征的龙与代表最高权力的帝玺结合起来，更是南越国的创举。在艺术上，这枚金印是异常精美的雕塑珍品。“文帝行玺”四字书体端庄，先铸后凿，字画的沟槽侧壁光洁垂直；上面的龙昂首盘躯，神气活现。这件金印正是南越政权曾经逍遥于汉域之外的历史见

越式铜鼎

西汉

1983年广东广州象岗山出土
通高28.5厘米

此鼎为南越青铜器中的典型器物。越式鼎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鼎足明显外撇是其特征。一般说来，汉代的越式鼎制作比较粗糙，无纹饰，底部多有厚烟炱，为实用器。

“文帝行玺”金印

西汉

1983年广东广州象岗山出土
通高1.8厘米，印高边长1.8厘米



证。

南越位于今两广地区。前214年，秦始皇征服南越，建置南海（治今广东广州）、桂林（治今广西桂平西南）、象（治今广西崇左）三郡。次年，又迁徙五十万人戍守五岭，与越人杂居，从而加速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和经

济、文化的发展。秦末战乱，南海龙川县令赵佗乘机杀秦朝官吏，断绝和中原的关系，统一岭南，自立为南越武王。西汉建立后，汉高祖刘邦派遣陆贾为使者，立赵佗为南越王。吕后时，因下令禁止出售铁器给南越，赵佗就断绝了和西汉的臣属关系，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

提链铜壶

西汉

1955年广西自治区贵县出土
通高30.5厘米

这件提链铜壶具有汉式特点，反映了秦汉以来越汉两族杂居，相互影响，逐渐融合的趋势。



打长沙边县。汉文帝即位后，以德治国，为赵佗在其家乡的亲冢置守邑，封赠其兄弟，再次派遣陆贾出使南越，说服赵佗撤去帝号。汉景帝时，赵佗遣使朝请，表示臣服，但在国中仍用帝号。

南越国王不仅具有完备的世袭制，还有一套完整的官制和地方统治机构。百官中有相、内史中尉、御史、都尉、司马，地方政权建有郡县，并在重要的地区分封赵氏贵族为王以加强统治，如苍梧秦王赵光；对西瓯、骆越，南越则设监官以统治安抚，如桂林监等。从这一套制度中我们不难看出，原为秦吏的赵佗承继了秦朝的制度，并采纳了汉初封功臣近亲为王侯的做法。南越建立在越族地区，赵佗还吸取某些越族原有的制度和统治办法，如自称“蛮夷大长老”就是以“蛮夷”首领、

长者自居。

前113年，汉武帝派遣使者宣谕南越王赵兴和王太后入朝，“比内诸侯”。南越王赵兴和王太后也愿意“内属”，只有丞相吕嘉不同意。他起兵杀赵兴、王太后及汉使者，立赵建德为王。前112年，汉武帝派遣四路大军讨伐南越，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从桂阳（治今湖南郴县）出发，顺浚水（今广东连江）而下；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从豫章（治今江西南昌）出发，顺横浦（今广东北江东源浈水）而下；故归义越侯二人为弋船、下濑将军，从零陵（治今广西全州西南）出发，顺离水（今漓江）而下，直抵苍梧（今广西梧州）；驰义侯征发巴蜀罪人、夜郎兵，顺牂柯江而下，最后会师于番禺（今广东广州）。前111年，路博德及杨仆攻破南越都城番禺，南越王投降，吕嘉等逃入



陶甗壶

西汉

1953年广东广州龙生岗出土
高27.2厘米

此类壶仿甗瓜制成，在广州地区西汉至东汉前期墓中均有出土，尤以西汉中后期为多，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



陶三足器

西汉

1957年广东广州华侨新村出土

通高9厘米，腹径15.3厘米
三足器是今广东广州一带西汉前期各型墓中都有的储容器，形体不大，器内偶尔见到一些碳化的黑色小粒和炭粉状物。

海后被捕获。南越政权自赵佗称王称帝，传五世九十三年而亡。汉武帝在其地设南海、郁林（治今广西桂平）、苍梧（治今广西梧州）、合浦（治今广西合浦东北）、珠崖（治今海南琼山）、儋耳（治今海南儋县西北）、交趾（治今

越南河内）、九真（治今越南清化）、日南（治今越南广治）等九郡。

三、汉越同风

秦汉时期，百越的农业生产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百越主要的耕作方式是种水田，同时也种一些旱地作物，在某些落后的地区还存在着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根据考古发掘，广东出土的秦汉时期的铁制农具已达500多件，广西平乐银山岭125座西汉早期墓出土铁锄、刀、斧、凿等240多件，福建崇安西汉早期城址发掘出土大批铁锸、锄、五齿耙等农具，均显示在中原汉族的影响下，越人在农业中开始使用铁器，农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较之中原和原楚国地区，百越的农业还是比较落后的。他们的铁制农具还比较缺乏，主要仰仗中原输入；西瓯、骆越地区，在交趾太守锡光、九真太守任



四联陶罐

西汉

1957年广东广州华侨新村出土

长17.5厘米，高10.1厘米
广东广州地区的陶制联罐主要流行于西汉前期，有二联、三联、四联和五联之别，延续至西汉后期，到东汉消失。联罐为盛干果或调味品的器物，造型奇特，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延传授牛耕、铸作田器前，还未用牛耕或不知牛耕。

秦汉时期，百越的手工业已发展到一定水平。首先，青铜器广泛使用，并表现出很高的铸造水平。1983年发掘的广东广州南越王墓，随葬品有1000多件，其中青铜器500多件，有些器物还是成批成套的。如出土的三套青铜乐器，一套是五件的甬钟，一套是十四件的纽钟，一套是岭南第一次发现的吴越乐器句鑃，共八件，每件甬部刻铸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铜鼓是我国南方民族一种特殊的青铜器，是象征财富和权力的重器，可用作典礼乐器、战争军鼓，也可用于贮存财物或置放尸骨，广泛存在于秦汉时期的百越族系中。1954年广西岑溪出土的五铢钱纹铜鼓，重75.4公斤，鼓面及周身间有五铢钱纹装饰，不仅反映了当时西南各族和汉族在经济交往、文化融合上的密切关系，也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技术。其次，百越逐渐掌握了冶铁技术。百越族系最

初使用铁器约在春秋晚期，战国时有所发展，秦汉时期使用较多。广东广州动物园西汉早期墓出土的铁钩、铁环、铁车饰，广州华侨村西汉早期墓出土的铁剑、铁矛、环首铁刀、铁匕首、铁带钩、铁钉，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



兔形铜水盂

西汉

1957年广西梧州出土
通长15厘米

这件铜水盂是研磨时向砚内注水的砚滴。中国古代的砚滴多取与水有关的动物形象，此砚滴则为兔的形象。兔为月的象征，而月属阴，也与水有关。



五铢钱纹铜鼓

汉

1954年广西岑溪出土
直径90厘米，高57.2厘米



干栏式铜仓

新朝

1990年广西合浦出土
通高198厘米

出土的铁凿、铁斧、铁铮凿等，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铁剑、镞、鼎、链条、弓、铠甲、杵、斧、铤、铲、凿、锥等，广西贵县汉墓群出土的铁剑、环首铁刀、铁镊等，都反映了百越铁器的使用较以前更加广泛。百越使用的铁器，虽然与汉族有密切的关系，有些器物甚至是同汉族交换来的，但有些铁器具有明显的地域和民族特征，显然是百越人自己制造的，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铁器的冶铸技术。

百越的纺织业历史悠久。他们纺织技术高，能以楮、桑蚕丝以及竹藤，织出“文布”、“班布”、“广幅布”。这些布美观适用，曾作为贡品。他们以竹木为楼居。所谓楼居，就是后来史书中记载的干栏。干栏是以竹木茅草（或

空首铜剑

西汉

1978年贵州威宁中水区梨园出土



稻草)为材料,分上下两层的楼房,上层住人,下层为家禽、家畜活动之所,是适应于南方湿热气候的建筑。1990年广西合浦出土了新莽时期的干栏式铜仓,仓底就由四根柱子支撑,显示了这种建筑形式广泛存在于南方越族地区。

第四节 西南各族

西南夷,是秦汉时代对居住在蜀郡西北、西南,即今天四川成都西北、西南,云南、贵州两省及广西西部广大地区诸少数民族的总称,主要有夜郎、滇、邛都、犍、昆明、徙、笮都、冉駹、白马、哀牢等。这些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日益密切,逐渐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夜郎自大

关于夜郎,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夜郎自大”这个成语了。该成语记载,夜郎国的国君问汉朝的使者道:“你们汉朝大,还是我们夜郎大呢?”后人就用此成语来比喻妄自尊大。其实,从战国楚顷襄王派遣庄蹻讨伐夜郎起,至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前28—前25)不再见于记载,夜郎存在了约三个世纪。夜郎的疆界,《后汉书》记为“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相当于今天的贵州中、西部和与其毗邻的四川、云南的部分地区。夜郎的人口,“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可能有十多万户,数十万人。这在当地是相当强大的国家。在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的部族中间,汉朝唯独封滇和夜郎为王,是有原因的。看来,夜郎自大还是有些道理的。

夜郎的社会生产状况,文献记载很少。《史记》、《汉书》记载夜郎“耕田,有邑聚”。



陶豆、陶罐

西汉

1977年贵州赫章可乐出土

1960年至1978年，在赫章可乐地区共发掘墓葬207座，其中汉人墓葬39座，其余为夜郎时期当地民族的墓葬。2000年9月至10月，在该地又发掘了108座夜郎时期当地民族的墓葬。类似的墓葬在威宁中水地区也有发现。其中前者发掘的当地民族的墓葬较汉人墓规模为小，无封土，长方形竖穴土坑，葬室一般长2米，宽1米，绝大多数无棺木痕迹。骨架多腐朽，只有20座存有部分头骨，被放置在墓底一端铜或铁制的釜或铜鼓内，躯体则被放置在墓中部。这种套头葬在中国国内很少发现，具有典型的民族特征。出土的300多件随葬品中，陶器29件，铜器197件，铁器118件，其余为

石器、木器、竹器。其中铜器有锄、戈、铍、洗、谯斗、釜、鼓、镜、镯、戒指、发钗、汉钱等，铁器有锤、铎、剑、刀、削、釜等，木器有梳等。尽管铜器比较粗糙，缺少精美的大型作品，但夜郎的长条形锄、扁圆径空心无格剑、宽刃无胡戈等器物的民族特色还是比较浓郁的。这些当地民族的墓葬，不仅展示了夜郎的葬俗，也反映了其社会贫富和阶级分化的情况。

二、“滇王之印”金印

汉武帝时，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汉武帝曾经派遣唐蒙为中郎将，率

“滇王之印”金印

西汉

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出土

高1.8厘米，边长2.3厘米
此印为金质。蛇钮，印面刻阴文篆书“滇王之印”四字。晋宁县汉代属益州郡。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滇国区域设置益州郡，赐滇王金印，使其继续统治滇民。金印正是这一史实的明证。汉武帝所赐“滇王之印”，滇王当代代相传，不能用来随葬，而且此印制作较潦草，字体亦不严谨，当是滇人的仿制品。





七牛虎耳铜贮贝器

西汉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通高43.5厘米，底径21.8厘米

此器器身作筒形，中束腰。腰部有对称的虎形耳一对，器盖上铸七牛。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中直接表现牛的题材最多，反映了在农业为主的滇族社会中畜牧经济仍占重要地位。牛在当时还是衡量财富的一种标志。墓主把这些以牛为题材的青铜器作为随葬品，无疑是为了表现其财富之众多。

领千人，经过笮关（在今四川汉源县境），进入夜郎。夜郎及其附近的许多城邑相约归附汉朝。汉朝在那里设置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不久，汉武帝派遣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在那里设置一都尉和十余县，归属蜀郡。张骞从西域归来后，汉武帝想打开由西南地区通往身毒的道路，前后派出使节十多起，但到了昆明以西均无法前进。前111年，西汉攻破南越后，在西南设郡，在邛都地区设置越嶲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在笮都地区设置沈犁郡（治今四川汉源东北），在冉駹地区设置汶山郡（治今四川茂汶北），在白马地区设置武都郡（治今甘肃西和南）。前109年，汉武帝调

集巴蜀地区的军队到滇国，降服滇王，在该地设置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东北），并赐滇王王印，让他统治其民族。这颗“滇王之印”金印的仿制品，已经在晋宁石寨山滇王墓中发现。从此，西南大部分地区都归入西汉的直接管辖之下，西南各族和汉族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滇人居地以滇池为中心。1954年发现了晋宁石寨山遗址，1955年至1960年发掘50座墓葬；1964年发现安宁太极山遗址，发掘17座墓葬；1972年发现江川李家山遗址，发掘出27座墓葬；1998年发现昆明羊甫头遗址，四次发掘共清理墓葬810座。这些遗址及其出土



诅盟场面铜贮贝器

西汉晚期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通高53厘米，器盖直径32厘米

此器出土时器内贮存贝300余枚，上铸圆雕立体人物127人（残缺的未计算在内），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古书记载滇人“俗征巫鬼，好诅盟，……官常以盟诅要之”。凡有大事，滇人必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盛大典礼。此器生动形象地记录了当时滇族社会“诅盟典礼”的仪式。

群猴环边铜饰

西汉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直径12.3厘米

此佩饰的中央原应嵌有一宝石扣，周围还镶有小圆点绿松石。铜饰边沿铸出互相缠绕的猴子二十只，其用途类似护身镜，使用时佩带在腹部腰带之下。



的遗物，展示了战国至秦汉时期滇人高度发展的青铜器文化，为我们了解滇人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

考古和文献材料证实，滇人处于奴隶主占有制的早期阶段。奴隶来源于战争中掠夺的俘虏。在出土的铜矛上有悬吊裸体俘虏的铸像，在铜扣饰上铸有俘虏的图像，在两件铸有战争场面的贮贝器盖上，也有战俘的图像，这些均形象地说明奴隶主要来源于战争。这些战俘转化的奴隶，带着手铐、枷锁在奴隶主的监督下从事各种生产劳动，可以自由买卖，有时还被残酷地当作祭祀中的牺牲。大量的青铜雕像场面表明，滇人社会还保存着较浓厚的母权制残余。监督奴隶劳动的、坐肩舆出行的、主持祭祀大典的以及供奉于神龛中的

祖先偶像，都是妇女。在农业劳动和交易活动中，妇女也占据重要地位。男奴隶主主要从事狩猎和战争。

滇人墓中的青铜农具相当多，有镢、锄、锛、镰，却一直不曾发现犁耕材料。根据一些贮贝器上雕铸或镌刻着与农业有关的“祈年”、“播种”、“孕育”、“报祭”的图像，青铜时代的滇人从事的是锄耕农业，似乎还不知道牛耕。

滇人畜牧业比较发达。青铜器上常有放牧和饲养牛、马、猪、犬、绵羊和山羊等牲畜的图像，其中牛的形象最突出，是被当作财富的标志而铸作的。那些放牧者全是男子，这与农业劳动者多是妇女形成鲜明对照。这可能是滇人最常见的一种男女分工。



纺织场面铜贮贝器

西汉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通高21厘米

此器在直径不到25厘米的器盖上，铸有铜俑18人，均为女性，主要表现一个家庭的奴隶从事纺织生产的场面。纺织作坊设在露天，女奴们箕踞而居。此器为研究汉代滇人的手工业生产，提供了重要资料。



贡纳场面铜贮贝器

西汉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残高39.5厘米

此器原状似为由重叠的两鼓组成，出土时上鼓已经残缺。在下鼓鼓口沿铸有立体人物、牛马等21个，人像按其发式、装束及行进之状大致可分为7组，即表现了七个族。每组多者4人，少者2人，其为首者皆盛装佩剑，当为首长形象，后随者，或牵牛引马，或负物，应为部族成员。从整个场面看，为臣服的诸族来向滇王纳贡。



虎背鹿铜扣饰

西汉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长13厘米，高10.5厘米

这件扣饰生动地表现了一只猛虎背负一只受伤之鹿行走的形象。在滇国青铜器上，鹿常被描绘成受猛兽追逐和残食的对象。

滇人的手工业门类很多，最发达的是青铜冶铸业。滇人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大，种类繁多，几乎涉及生产和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各式贮贝器盖上雕铸的各种人物、牲畜、房屋等立体模型，描绘了当时战争、生产、祭祀、贡纳、狩猎等活动场面，铸工极为繁杂精细，如果没有强度较高、透气性较好的铸范和熟练的技巧是很难完成的。通过对实物的



牛虎斗铜扣饰

西汉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长17厘米，高8.5厘米

此铜扣饰表现了虎牛之间你死我活地搏斗的瞬间场面。

吊人铜矛

西汉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通高38厘米

20世纪50年代，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滇人墓地出土了青铜兵器1000余件。这些兵器既有墓主人生前实用器，也有仪仗用器，如戈、矛、剑、斧、钺、啄、弩机、叉等种类，显示了滇人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水平。这件铜矛，刃两侧用细链各吊一名头梳椎髻、双手背剪的裸体俘虏，器形奇特，具有浓郁的滇民族风格，堪称滇人青铜兵器中的珍品。



细心观察和对部分器物的化学鉴定，确知滇人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泥范、分铸熔接、焊接，还可能采用失蜡法；铜器合金配合比较准确，能根据器物不同的性能和用途采用不同的合金比例；在器表处理上，能调节铜锡成分，采取保暖缓冷措施，改变器表色泽和增强抗腐蚀能力。除青铜器外，滇人的金银和玉石

制造业也很发达，生产出来的器物造型精美，品种繁多。滇人的铁器也有自己的特点，多为铜铁合制，即铁都用在刃部，其余部位仍为铜制，纯铁制的器物为晚期墓出土的铁剑、铁矛、铁斧。这批铜铁合制器应是本地制造，但铜铁合制器的大量存在也表明铁材并不充裕，一部分是从外地输入的。



铜啄

西汉

1972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
长26.1厘米，高14.8厘米
铜啄为汉代滇族常见兵器。

三人一牛铜扣饰

西汉

1972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
长6.5厘米，高4厘米
一牛作站立状，一人以绳缚牛颈，二人双手抓住牛尾。这三人服饰相同，均梳银锭式高髻，戴耳环，着对襟衣，束腰，跣足。对照李家山和石寨山出土的其他遗物，三人应为滇族。

出土的文物中，对滇人的纺织业有生动的展示。石寨山、李家山出土了卷布轴、经轴、分经棍、打纬刀等织机部件，石寨山1号墓出

土的贮贝器盖上雕铸有纺织图像。根据这些出土的实物和雕铸的图像，可知当时滇人使用的织机还是比较原始的踞织机——腰机。





鍍金四人舞俑銅扣飾

西汉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长15厘米，高17.5厘米
这四人服饰相同，均头戴冠，作舞蹈状。西南地区民族自古以来均能歌善舞，喜以吹笙，击鼓相伴，踏歌为乐。



铜枕

西汉

1972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
长70厘米、宽13厘米、高
36.4厘米

枕作马鞍形，两端上翘，各铸一圆雕立牛，中间有浮雕立牛3头。在西南少数民族中，自古即以牛为财富的象征，所以人们常常在房屋山脊、门前悬挂牛头。铜枕以牛为饰，大概也是出于这种用意。



滇人的居住、宗教、舞乐等方面的生活情况，也都生动而具体地反映在大量的铜铸雕像、铜制模型和各种铜器的图纹中。原始的干栏式建筑，不但用作居室，同时也用作祭坛。在宗教性的典礼上，铜鼓作为礼器和乐器被平放在地面上或成组地排列在台面上。舞乐大多结合宗教活动而进行。

羽人纹铜鼓

西汉

1972年广西西林普驮屯出土



三、句町国·昆明

前111年，汉武帝设置牂柯郡，管辖十七县，句町为其中的一县，句町之名始见于世。汉朝虽然在句町建县，但其所辖民族仍有自己的组织，存在着所谓的句町侯。前82年，句町侯因从征益州郡姑缯、叶榆的反叛而被封为句町王。据考证，句町的势力范围包括今云南广南、富宁和广西西林、隆林、田林、凌云、百色等县。1969年和1972年在广西西林县普驮屯发现两座独具特色的铜鼓墓葬，出土了从中原输入的鎏金骑马俑、六博棋盘、洗、车器、盖弓帽等铜器和少量铁器，以及具有浓郁地方民族特色的铜鼓、羊角纽铜钟、鞋底形虎纹铜当卢、山羊纹铜饰牌等。从墓葬的形式和随葬品看，该墓显然是贵族的墓葬，或者就是句町侯王的墓葬。据此看来，上述墓葬所在的地方应是句町国或句町县的政治中心。句町以农业为主，已经懂得使用牛耕，还有牛、羊等畜牧业。出土的铜鼓和其他铜器，证明句町的青铜铸造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昆明居于滇西洱海地区，族人头梳发辫，是一个随畜迁徙的游牧民族。考古发掘表明，昆明人的铜农具为数甚少。除在洱海地区的昆明墓葬中发现过制作粗糙的铜锄外，居住在怒江、澜沧江河谷的昆明人仍以畜牧经济为主，其墓葬中没有发现铜农具。该民族无君长，喜欢攻劫掠夺，处于分散的原始部落状态，常常被势力强大的滇人掠为奴隶。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的刻有图画文字的铜片上，就有被掠为奴隶的带枷的昆明人。在一块铜饰牌上，两名滇族武士得胜归来时，带回的战利品中就有一个被绳索缚起的、背负小孩的昆明妇女。

第五节 西域诸族

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包括天山南北、青藏高原以北的地区。广义则还包括葱岭以西、今中亚细亚一带。公元前2世纪左右，西域分为乌孙、疏勒、龟兹、焉耆、车师、楼兰等三十六国，至西汉哀、平时分裂为五十余国。

一、鄯善·精绝

鄯善，西汉昭帝以前称楼兰，位于今新疆罗布泊一带，后来曾经征服兼并过邻国精绝、

毡帽、牛皮靴

西汉
1934年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
出土



“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
锦被

汉晋

1995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1
号墓地出土

长168厘米，宽93厘米

锦被由两幅织锦缝合而成，藏青色地，以绛、白、黄、绿等色丝线织出舞人、茱萸等纹样，其中嵌织隶书“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字样。织锦为四组经线和一组纬线构成的四重平纹经锦，经密160根/厘米、纬密48根/厘米。织锦保存完好，锦面层次分明，色彩丰富。舞人和茱萸纹样与铭文颂祝吉祥的寓意相呼应。



且末等，据有西域南路的东半部地区。鄯善有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尽管有些封爵和官称是汉朝的，有的是匈奴的，但它们都是封赐给本民族的管理人员的。楼兰或鄯善已经形成了国王家族的特殊地位和父死子继的法规，这表明楼兰或鄯善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形成国家形态。

楼兰或鄯善，所居之地多沙少田，所食谷

物往往仰仗他国，是一个随畜牧逐水草的游牧民族。早期楼兰墓葬分布于罗布泊北部的孔雀河两岸，是一种形式特殊的船棺葬，墓前常插桨形木柱为标志。随葬品以木制品为主，一种梳毛用的带齿的木手较为常见，也有石镞、骨镞，羊毛织品以素地居多。由于这里的气候干燥，墓中发现过保存完好的干尸。他们一般头戴缀有羽毛和白鼬皮的尖状毡帽，身着毛织披风，足穿短靴，在腰部和腕部常佩戴

石珠、蚌珠或玉珠。晚期墓在葬具和随葬品方面仍然保留着早期的若干习俗,但有很多中原生产的精美的漆器和丝织品等,如云气纹漆卮、柿蒂连弧纹漆奩盖、鸟兽纹锦、“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锦、“永昌”锦等。陶器和木器也与中原的相似,还出现了铁器。在罗布泊西岸的楼兰古城中还保存着大片建筑遗址,房基基础粗大,在木柱上还残存朱漆的痕迹。

精绝国位于今新疆民丰县北的尼雅河沿岸,东汉时为鄯善吞并。尼雅遗址于1901年和1906年曾经两次被斯坦因盗掘,1959年进行了调查和发掘。1988年至1993年中日联合考察队又先后五次对该遗址进行考察。考古发掘证实,精绝国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国家。在

尼雅遗址中,保存着较完好的田畦、水渠痕迹。田畦不大,可能是为浇水方便,而把地块分割得很小。灌溉渠除见于佛塔西北外,在遗址区东南的古桥遗址,也可见到一条很长的引水渠。水渠位于古桥所在的河道东岸半腰,宽40厘米至50厘米,傍河成南北向铺展。这样的处置,有可能将水引上地势较高的地段。精绝王国统治者对水的管理、使用都有一套办法。水有专人管理,有一定的制度。管理不善导致损失,要受惩罚。一些耕地无水、干旱的情况,也要及时调查、处理。对水的重视和管理,不仅保证了农业灌溉和人民日常生活用水,也有效地维护了作为沙漠侵迫中的小绿洲——精绝国的生态环境。在尼雅遗址不少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质护膊

汉晋

1995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1号墓地出土

长18.5厘米,宽12.5厘米

护膊用彩锦和白绢制成,呈长方形,两长边各缝缀三条长系带。织锦为五组经线和一组纬线构成的五重平纹经锦,经密为220根/厘米、纬密48根/厘米。其色泽艳丽,图案题材新颖,有孔雀、仙鹤、辟邪、虎、龙等形象,并织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此类题材、风格的织锦尚属首次发现,对汉晋时期中国的丝绸工艺及相关科技领域的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住宅周围都有巨树环绕，树干粗大至一人不能合抱；果园中林木整齐，桑树排列有序，不少为数十年之巨桑；住处附近，从厚积的淤泥看，有静水积储。这些都说明尼雅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较有经验，人类生存环境相对较好。

尼雅的建筑分散坐落在河谷台地上，较大型建筑一般取当地巨型柳木作为地梁，按设计布局铺展地表，其上凿榫孔，插小柱。稍大的屋室内，还有用大型胡杨木做成的木质柱础。木柱顶端一般均取树木的自然枝杈横架房梁。墙壁以芦苇或红柳枝编成内芯，其上敷泥。泥墙外有的涂刷成白色，部分建筑物在白墙上绘三角形纹。房顶均已坍塌，情况不明。

在遗址的西北有墓葬区，葬具多为独木舟式的木棺。其中一座贵族墓，葬具为一具四矮足长方箱形木棺，长约2米。棺内尚存夫妻合葬干尸两具，男右女左，男的黑发高鼻高颧骨，女的多发辫，衣着均为丝织品，其中男尸着“万世如意”锦袍、“延年益寿宜子孙”锦袜和锦手套，女尸着绣领丝衣、绣裙、“阳”字锦袜，其中大部分应自内地运来，但男尸的白棉布袴和棺中所出蜡染蓝地白花棉布应是西域的特产。随葬品有藤奩盒、粉袋、木梳、木箭、箭筒、木纺轮、木杯、陶瓶、陶罐、小铁刀等。在遗址北部还发现一处冶铁遗址，残留有炉

址、烧结铁、矿石、炭渣和冶铸银、铜首饰的小坩埚等。

在遗址区内，有一保存基本完好的佛塔，残高6.3米，基部为方形，两重，上层为覆钵形，以大土坯砌成，土坯系用灰白色胶泥块制作。佛塔身后，为三重高大沙丘，红柳丛生。在沙丘北部、东侧可以看到红柳、草泥围篱、桑树及个别构件，说明沙下可能覆埋着古代寺院遗址。

这些出土文物说明，在汉晋时期，尼雅遗址所在的尼雅河下游地区，不论是作为精绝国，还是作为中原王朝鄯善郡的属部，“丝绸之路”南道中继站，仍是水丰林茂、人烟稠密的交通要站，农业及水利灌溉、畜牧业、林业、毛纺、皮革、冶炼、木器、陶器制作，均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生产部门，保证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站之一，西亚的玻璃器，希腊风格的艺术，犍陀罗的装饰图案，印度的棉织物，黄河流域的锦、绢、漆器、铜镜、纸片，都是人们物质文化生活中可以见到的，显示了精绝作为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线路上的一个绿洲王国特有的风貌。

二、乌孙·于阗

乌孙最初居于祁连、敦煌之间，西汉前期

羊首铜刀

西汉

1959年新疆新源县查布哈河采集

长23.3厘米，宽3.9厘米

此铜刀为古代乌孙族的典型器物。





于阗汉佉二体钱

东汉

1929年新疆和田北阿克苏比
尔旧城出土

直径2.4厘米，厚0.4厘米

西迁后，击败大月氏，占据伊犁河流域。伊犁河流域有良好的高山牧地，草场开阔，山间松林密布，而且气候湿润，茂草高及马腹，所以乌孙的社会经济以畜牧业为主，盛产良马，中原称之为“西极马”，即现代伊犁马的祖先。乌孙富人有马多至四五千匹，大贵族的势力更为雄厚。

自1961年起，考古工作者在新疆昭苏的夏台、波马等地陆续发现了一批乌孙墓葬，初步揭示出乌孙文化的面貌。考古资料证明，乌孙的手工业主要有金属冶炼、制陶、皮革、毛纺织、骨器加工等。他们已经使用了青铜器、小型铁器，还有金银器。在乌孙居地的中心地区赤谷城一带，还出土了铁犁，发现了农业的存在。乌孙实行土葬，已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墓冢群，墓冢排列成行，漫布在山口草原。墓冢底周一般有二三百米，高约七八米，这样的墓葬，墓主人无疑都是贵族。随葬品有马、羊、狗和生产生活用品，个别坑中还有散乱的骨架，可能是惨遭杀殉的奴隶。

乌孙以畜牧业为主，随畜逐水草而居，善于骑射。乌孙墓中出羊骨，往往与小铁匕首共存，有些匕首还插在羊骨上，陶容器中曾发现残留的乳酪状物，这些都形象地反映了乌孙

人“肉食酪浆”的生活习俗。乌孙人穿的是皮革及毛织品，居住的是穹庐与帷帐。汉公主细君嫁与乌孙昆莫，在其思念故乡的歌中有“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的诗句，道出了乌孙饮食和居住的特点。

于阗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盛时领地包括今新疆和田、洛浦和墨玉等地。在东汉建武末年，于阗曾为莎车国所兼并，明帝时摆脱莎车的统治而独立，并进而攻灭莎车，成为自葱岭以东丝绸之路南道与鄯善并立的强国。于阗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宜种植五谷桑麻，盛产葡萄。有水名玉河，出玉石，山上也多美玉，是用于交换的重要物品。于阗“俗信巫”，巫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于阗王拒汉或反汉都相信或借重鬼神之言。佛教在汉代已经传入于阗，成为该国的一种宗教信仰。

于阗毗邻中亚，受贵霜和塞种诸国的影响较大，但汉文化的影响仍然非常强烈。新疆和田的买力克阿瓦提遗址，曾经于1958年、1977年和1979年三次进行调查。遗址是一座方形的城堡，城内西部有许多土台；中部有陶窑；北部曾经出土一口西汉陶缸，内盛五铢钱约45公斤；东北部是寺庙遗址，有佛像和壁

画残块。这里可能是汉代于阗国的一处府城。本地发行的汉佉二体钱为铜质，圆形无孔，分大小两种。大型钱正面为篆书汉字：“重廿四铢铜钱”，当中有一类似“贝”字形的符号，周围一圈回文。背面中央为马形或驼形，周围有一圈佉卢文。在佉卢铭文中标有王名，其尊号是“大王、王中之王、伟大者”。小型钱一般正面为汉字“六铢钱”，也有的在中间增加王室徽记；背面仍为马或驼形及一圈佉卢文铭文。于阗的汉佉二体钱上的汉字是打压而成，是从希腊承袭来的传统。因此，这种钱可视为东西两大货币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三、龟兹·车师

龟兹位于今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北的库车、拜城一带。这里气候湿热，盛产麻、麦、葡萄、梨、桃等，傍山处适宜放牧，出产良马、犏牛，在当时是畜牧业非常发达的国家。龟兹国有人口81000多人。国都延城即库车的皮郎古城，周回约7公里，内有不少巨大的土

台，有的可能为宫殿所在。西汉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即殁于该城，在沙雅县裕勒都司巴克曾发现他的私章。该城中还有佛塔庙千所，显示了当时佛教在龟兹的兴盛程度。龟兹山中有矿，黄金、铜、铁等冶铸业闻名西域。库车县北120公里的阿艾山，曾发现冶铁遗址，出土坩埚、铁渣、铁矿石及一件冶囊上用的陶甗。罗布泊地区出土的简牍中常提到西域的胡铁，其中当有龟兹的产品。龟兹地区还有著名的《刘平国作亭颂》刻石，在拜城东北喀拉达格山麓岩壁上，隶书，碑高49厘米，实是摩崖石刻。刻辞记录了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在永寿四年（158年）率领孟伯山、狄虎贲、万阿羌、石当卑、程阿姜等人，凿石作孔，构筑列亭，于八月十二日乙酉立此亭。此摩崖石刻，是东汉龟兹地区汉族和西域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建造亭垒的重要文物，至今该处山岩上仍可见凿孔等当年筑亭的痕迹。

车师位于今新疆天山东部，南及吐鲁番，北至准噶尔盆地，东至巴里坤湖，西及乌鲁木

坩埚

西汉

1958年新疆库车阿艾山炼铁遗址采集

这是龟兹融化金属和其他物质的器具。



齐地区。前110年，汉武帝派遣赵破奴进攻车师，车师开始分裂为车师前后国及山北六国，以后又有发展变化。在这些国家中，天山南麓的车师前国居有城，以田耕为业；天山以北的车师后国大都以畜牧业为主，也知农耕。根据考古资料，在鄯善苏巴什及乌鲁木齐乌拉泊、鱼儿沟、阿拉沟都发现了车师族系的墓葬群。其中在苏巴什发掘的八座墓，墓上都有长方形的石堆作为封土标志。其墓坑分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偏室墓两种。竖穴土坑墓约属春秋战国时期，竖穴偏室墓属西汉中晚期，处在车

师前国的初期阶段。竖穴偏室墓分墓道和墓室两部分，墓道是不规则的长方形竖井式，深约3米，在底部南侧掏出墓室。墓室平面也呈不规则长方形，墓室与墓道之间留有高约0.4米的生土二层台。墓口用一排短原木封闭，墓道口普遍覆盖一层树条、芦苇和杂草等。葬具都用尸床，与木床相似，床上铺树枝，有的还铺毛毡、羊皮褥子、毛织品。其中一座女性墓，死者头发保存完好，长发梳辮，外罩毛质网状发套。随葬品有陶器、漆木器、小铜器、铁器、银器、玛瑙、骨蚌器、毛毡、皮革、丝织品等。

第五章

秦汉经济生活



秦汉时期，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传统已经形成，生产工具的改进、水利灌溉设施的普及、牛耕的推广以及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畜牧业、林业和渔猎的发展，使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很高水平。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兴盛奠定了基础，秦汉时期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分工的日益细密，使这一时期的冶铁、纺织、漆器、陶瓷器、盐井和酿酒等生产工艺技术得到全面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大量的出土文物折射出了秦汉时期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一节 精耕细作—— 秦汉农业

秦汉时期，农业生产迅速发展，除中原传统农业区域外，边远地区的农业开发也有长

足的进展。冶铁业和冶铁技术在战国基础上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使铁制农具得到改进，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多，使用地区更为广泛；西汉中期，赵过推行耦犁，是中国牛耕史上的一个创举，此后牛耕技术不仅在中原地区普遍采用，而且推广到了边远地区。一些新的耕作方法，已开始出现或逐步推行；秦汉时期不但注重水利的兴修，还根据各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修建了各具特色的水利工程，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畜牧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饲养管理技术的进步，家禽、家畜优良品种的培育和兽医及相畜业的发展；在林业方面，除天然森林资源外，人工植树的范围比较广泛；渔猎的发展也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

一、铁铧与耨土

农具的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

的发展。秦汉时期，铁制农具在农业生产中已占有统治地位。

考古工作者曾在全国五六十个地点，其中包括甘肃、内蒙、云南、贵州等边远地区，发现了大量汉代铁制农具。1972年山东莱芜西汉早期墓中发现了一批带有姓氏铭文的铁农具范，证明了当时私人经营的冶铁作坊都在铸造铁农具，表明铁农具需求量大大增加。1980年福建崇安县汉城遗址出土了镢、锄、镰、耙等铁制生产工具。崇安当时是水陆交通要冲，是闽越族的重要聚居地。这一地区铁制农具的出土，显示了中原汉族和闽越族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也说明西汉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已经推广到边远地区。

汉代铁制农具的改进和创新在考古材料中屡有反映。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牛耕有关的生产工具——铁犁铧的改进和广泛使用。汉代的铁犁铧已由战国时期的铁口铧发展为全部用铁制作，不仅更为坚固耐用，还可



以提高生产效率。目前，在北起辽宁，南到云南、贵州，东起山东、福建，西到甘肃、四川的广大地域内，都出土了汉代的铁犁铧、犁壁以及犁铧铸范。出土的汉代铁犁铧一般都是

铁耙

西汉

1980年福建崇安汉城遗址出土

长16厘米，高12厘米



大铁铧和装有镢土的铁铧

西汉

分别于辽宁辽阳和陕西咸阳出土

耧车复原图

此图根据王祯《农书》、山西平陆汉墓壁画，并参考南阳地区早期三脚耧车绘制。



持锄陶俑残片

东汉

1952年四川成都青杠坡出土
残长20厘米

持锄中耕除草为农务之急。《汜胜之书》中一再提到“早锄”、“复锄”、“有草锄之，不厌数多”，可见锄在农作物生产中的重要性。

汉代的锄有全铁制的，其锄头有呈板状、两肩斜杀的，也有呈斜肩梯形的。另外，还有一种铁口木锄。这件执锄陶俑残片即为使用末端外侈的铁口木锄之例。

中空的，其前端部分较薄，向后逐渐加厚；犁铧的两个边缘部分较薄，向中间逐渐加厚，以致铧面中间形成了一道高高凸起的脊。铧的底面有的是平平的，有的中部隆起。此种形状的犁铧可减少在泥土中穿行时的阻力。出土的汉代铁犁铧有大有小，其用途也应有所区别：小的可以犁熟地，较大的可以开垦生荒

地。山东滕县长城村出土的铁犁铧，长44厘米，后宽47厘米；石家庄东岗头村所出者，长41厘米，后宽46厘米，重12.5公斤；福建崇安所出者，残重15公斤。这种犁很可能是用来开沟渠的。在出土的铁犁铧中，有的还在其前端套着铁制的“V”字形铧冠（这种铧冠在不少地方都有出土）。它是为了使犁铧经久耐用，不致因铧头刃部磨损而很快报废。铁铧冠器形小，用材少，制作简便；磨损后再换的费用，肯定比买一个新犁铧要少得多，而且从出土实物看，铧冠的铁质常优于犁铧部分。所以，这种铁农具的发明，对汉代铁犁铧的推广使用做出了贡献。辽宁省辽阳市出土的大铁铧和陕西省咸阳市出土的铧土更为先进。铁铧是耕犁破土的锋刃，铧土是耕犁的翻土器。铧土和犁铧组合，构成复合装置，能将耕起的土块破碎和翻转，更适于耕翻土地和开沟作垄。

除犁铧外，汉代其他农具也有很大的发展。从整地、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收获脱粒到农产品加工的农具有三十多种，已经基本具备一套完整的农业生产工具，而其中新农具的增加，对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有重大意义，也是秦汉时期农具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如翻土工具二齿耙、三齿耙都是在西汉时期出现的，这是一种碎土、平整土地的农具。汉代的播种在撒播（四川德阳出土的画像砖上有农夫执圆形器撒播种子的图像）、点播（四川新都出土的画像砖上，播种者一手执点种棒在农田中插洞，一手点播谷种）、条播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更先进、更科学的播种工具——耧车。据文献记载，耧车是西汉武帝时农官赵过领导匠人创制的一种新式条播机械。耧车为铁木制作，一漏斗下连三条长足，足端装置铁制耧足，足皆中空，漏斗后连木架。播种时，将种子盛在漏斗中，以牛牵引，扶耧的人边走边摇，盛于漏斗中的种子即通过三空



足而自动下播在田土中。这种条播机械能同时完成开沟、播种两道工序，而且行距一致，下种均匀。山西平陆县枣园村新莽时期的墓葬壁画中，有用驾一牛的三脚耧进行播种的图像。铁制耧播在辽宁省辽阳市三道壕、北京市清河镇、陕西省富平县等地均有发现。河南南阳还发现了西汉耧铧范。甘肃居延地区西汉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件硬木制的耧腿，其尖端装置的铁耧铧已经遗失。这些发现足以说明耧播法在汉代已得到推广。

二、牛耕画像石

汉代画像石是汉代社会的缩影。汉代无数的无名工匠把当时人们的生活和思想，都浓缩在这一块一块的石头上，这些沉淀了两千余年的历史画面，向我们折射出汉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牛耕生产在汉代已很普及，汉代画像石中多有反映牛耕内容的画面，欣赏着这些生动的牛耕画像，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汉代的牛耕与后世的犁耕已没有太大的区别，中国的牛耕技术在汉代已基本定型。

目前所见汉代牛耕图，时代最早的是西汉末年，多数为东汉时期。牛耕在中国历史上虽起源很早，但在秦汉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内，普遍采用的是“木耨手耨”的人力耕作方式，牛耕并没有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在陕、甘一带大规模地推广牛耕。昭帝时，徙民屯田，都给予耕牛。平帝时，政府给一些贫穷的农户耕牛。一些地方长吏也劝民务农桑。东汉时期，牛耕更为普及。东汉崔寔的《政论》就提到当时辽东牛耕的情形。西北宁夏、新疆等地区曾出土过汉代的犁铧和犁壁，南方广东、广西等地也出土过有关牛耕的实物、明器。九真郡位于今越南境内，当地人以射猎为业，东汉以前根本不知牛耕，任延任九真郡太



守时，令当地人铸作生产工具，推广牛耕，百姓生活丰饶。东汉以前，庐江人民不知牛耕，地有余而民食常不足，王景任太守时，教当地人使用耕牛，人们生活开始改善。这些记载反映了东汉时牛耕已推广到边远的郡县。随着牛耕的推广，牛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更加密切，以致汉章帝在位时期，由于连年牛疫，垦田减少，谷价抬高，人民流亡。

汉代牛耕通常的形式是二牛抬杠式。江苏睢宁双沟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就是这种耕犁法的形象反映：即两头牛在前抬着犁衡，挽拉一张长辕犁，一人在后扶犁并驱赶耕牛。从犁

执锒农夫陶俑

东汉

1978年陕西勉县老道寺出土
高20.5厘米

锒是汉代的起土工具，用于深耕。

牛耕画像石拓片（局部）

画像石 1952 年于江苏睢宁
双沟镇东汉墓出土



架的结构来看，由犁梢、犁床、犁辕、犁衡到犁箭这样一些畜力犁的主体结构，在西汉后期都已经具备了。至东汉，随着驭牛技术的提高和活动式犁箭的发明，在山东滕县、陕西绥德等地的画像石上，出现了一牛牵挽的犁；甘肃武威汉墓中也出土过一牛之犁的模型，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短辕犁。

三、水渠·井灌·陂池水塘

水利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秦汉时期的农田水利工程以关中地区为中心，同时向西北和西南等边远地区发展。各地根据自己的地理情况，发展了一些具有特色的农田水利工程。关中地区最著名的是汉武帝时开凿的漕渠和白渠。漕渠自长安至黄河，长约三百里，既可灌溉田亩又可通漕运。白渠引泾水入渭水中，可灌溉良田万余顷。与此同

时，战国时的一些水利工程，如郑国渠、都江堰等，这一时期都在继续使用，并十分注意维修。凿井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地位，也有所提高，水井已成为西汉常见的小型灌溉设施，在中原地区，人们普遍使用被称作“辘轳”的一种滑轮，从较深的井中大量提水用于灌溉。北京西郊、河南泌阳、安徽寿县都发现有比较密集的水井。汉代墓葬里用陶井模型随葬很普遍。如洛阳烧沟汉墓中就出土陶井模型97件，与井同出的还有陶水斗、滑轮和水槽，这些都是汉代井灌的真实反映。秦汉时期新式提灌工具如翻车、渴乌等的出现，使提水的效率大大提高。

广泛利用小型陂池水塘是汉代水利灌溉的一种类型。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东等省曾多次出土过汉代陶水田、陶池塘模型。模型上水田与池塘毗邻相连，中间有各种水

道贯通。这些模型表明，南方星罗棋布的小型陂池水塘已被广泛利用，在水稻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79年四川峨嵋县双福乡出土了一件石田塘模型。一侧凿出两块水田，一块田里积有堆肥，另一块田里两个农夫正俯身劳作；另一侧凿出水塘，塘中置一小船，还有鳖、青蛙、田螺、莲蓬等。这就是汉代陂池稻田模型。这种陂池水塘既可以蓄水灌田，又可以养鱼栽莲，同时发展多种农业生产。东汉政府专门设有“陂官”、“湖官”、“都水官”推广发展陂塘。杜诗任南阳太守时，特别重视修治陂塘，对农业生产起到显著作用。光武帝时，汝南太守派都水掾许扬主持陂塘修复工程，在方圆四百多里的区域内修建起若干陂塘，使几千顷农田得到灌溉，连年丰收。汉代大庄园主也注意修建陂塘。如南阳的樊宏（光武帝的母舅），在其庄园附近开凿了“樊陂”，解决了二三百顷农田的用水，并利用陂塘养鱼，塘岸种植各种经济林木，获利很大。陂塘在南方的普遍出现，表明了汉代农田水利技术的进步。

农田水利工程在西北地区配合屯田也有很大的发展。考古发现，在今新疆轮台、沙雅等地还留存有汉代的沟渠遗迹，当地人称之为



带辘轳水槽的陶井

西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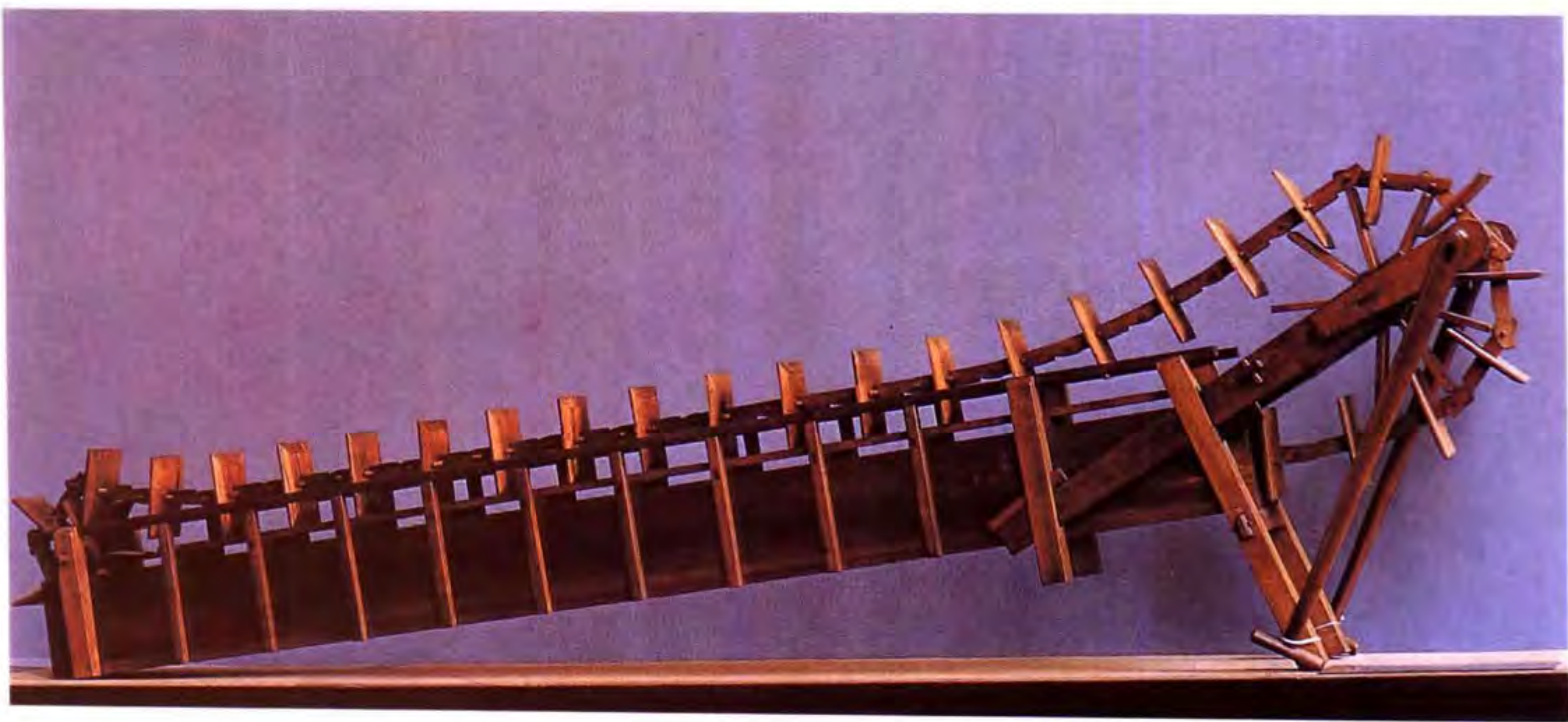
1953年河南洛阳烧沟出土
高47.8厘米



石田塘模型

东汉

1979年四川峨嵋双福出土
长81厘米，宽48厘米，高11厘米



龙骨水车（模型）

龙骨水车又叫翻车，是一种灌溉工具。东汉灵帝时毕岚发明翻车，三国时马钧予以完善、推广。它由手柄、曲轴、齿轮链板等部件组成。最先以人力为动力，后扩展为利用畜力、水力和风力。它制作简便，提水效率高，一直使用到现在。

为“汉人渠”。中原地区的井灌技术也在西汉时期传入了新疆。新疆的特色水利工程——坎儿井，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就是在吸取中原井渠经验的基础上发明的。

四、马厰坑·猪圈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这是唐代诗人杜甫歌咏大宛马的一首诗，诗中把大宛马神旺气锐的外貌和奔跑时风驰电掣般的速度描绘得淋漓尽致。大宛马是汉代从西域一带引进的良种马。“太一贡兮天马下，霏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跼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这是汉武帝在得到西域宝马后，兴致勃勃而作的《天马歌》。太初四年（前101年），汉武帝在得到大宛汗血马之后，又作《西极天马歌》：“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两首《天马歌》不仅流露出汉武帝对西域宝马的钟爱，也反映了汉武帝借天马寄托一种驰骋万里、降服四夷的雄心。

马蹄声始终伴随着古代帝王定夺天下的

经历。秦始皇对马的重视达到了极致。秦国的六畜饲养业较为发达。秦人素有善御、养马及尚武的传统，秦始皇兵马俑坑展示了秦人兵强马壮的浩浩阵容与凛凛雄风，而出土的秦封泥则让人感悟到另一种形式的强大阵容。考古工作者曾在秦始皇陵东侧的上焦村西探出马厰坑93座，试掘37座，发现了大量的秦封泥，其中有关马的封泥数量极大（约数百枚），足见与马相关的公文奏呈是很多的，它们或许就是“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秦始皇亲自批阅的。马政是秦政治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秦封泥使人们了解到了秦代有关马的复杂而系统的机构和职官。到目前为止，秦封泥有关马的机构和职官已发现22种，这些封泥不仅提供了诸多马厰名称，而且提供了主管这些马厰的官吏的构成情况。而这些养马与管马的机构与职官均隶属于秦中央政权，或者说直接受制于秦王。以一国之君直接处理养马管马之事，必有其对马特殊的理解、用心和渊源。这在其他六国则完全不见迹象。令人吃惊的是，秦律对官养马、牛还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对军马的饲养、选拔要求很严，对民间养马者也给予优待。秦始皇时期，



彩釉陶鸡笼

东汉

湖南长沙出土

高15厘米

汉代的肉畜主要是鸡和猪。鸡、猪的饲养地区很广，一般以圈养为主，规模虽小，却是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这个陶鸡笼就是东汉时期家庭圈养鸡的一种表现。

就有以专门贩卖马牛而致富的。云梦秦简《日书》甲种《马牒》为我们了解当时民间养马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马牒》篇是秦人祈祷马神以求马匹繁殖的祭祀仪式的祝词。祝词内容丰富，祈求马神驱逐马的疾病与灾难，希望自己养殖的马能达到理想善马的标准。据史书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秦国也非常重视耕牛的喂养和管理，云梦秦简《厩苑律》有评比耕牛的条文。经过评比考核，饲养耕牛好的啬夫、牛长有奖，否则对主管的啬夫要进行惩罚。政府的直接干预无疑对牛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政府对民间马牛还实行严格控制，将马牛数字统计与户口统计视为同等重要。秦律对偷盗六畜者都处以重刑，显然是秦政府保护六畜饲养业的有力措施。统治者的政策必然影响到民间，《日书》就记载有民间的各种禁杀、食六畜的规定，而且还罗列了六畜圈在房屋建筑中的方位，以及对人和六畜饲养的吉凶关系。其中涉及到六畜的保护、繁殖、饲养和买卖。这些都客观上促进了六畜的繁

殖和生长。

秦末汉初的社会动乱，使内地和边郡的畜牧业遭到破坏，整个中原地区马匹奇缺，甚至出现“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将相或乘牛车”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形势，西汉政府在边郡建立了官营牧场——牧师苑，在内地建立官马厰，并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民间养马。到汉武帝时期，已经形成了街巷、阡陌之间牛马成群的景象。同时优质饲草苜蓿从西域的引种和推广，对繁育良种马，增强马、牛的体质和挽力，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促进了汉代畜牧业的发展。在肉畜方面，汉代的鸡和猪饲养地区分布很广，汉代上林苑中，由水衡都尉主管各种肉用牲口的饲养，东汉隐士梁鸿因家贫就曾在上林苑当牧猪郎。当时一些地方的官吏，劝民每户养两头母猪、五只鸡或是一头猪、四只母鸡，政府还将此作为衡量官吏政绩的一个方面。出土的许多汉代陶鸡圈、猪圈，可以说是民间肉畜发展的一种反映。当时贵族很重视自养名马，出游赴会使用家产名马，



陶猪圈

东汉
湖南长沙出土
高15.5厘米

往往显示出身份和地位。如四川郫县出土的一块东汉墓门石刻上刻一出游图，一对夫妇乘坐一辆马拉辇车，马的头部上方竖刻“家产黑驹”四字。黑驹即是当时的一种名马。

由于军事和动力的需要，秦国一直重视马种的选择和引进。从蒙古引进了用于骑乘的蒙古马，秦始皇陵2号兵马俑坑出土的大量骑兵俑，所骑乘的战马就是典型的蒙古马；从甘肃引进了用于拉车的挽型马，秦始皇陵1号兵马俑坑出土的车兵，其陶马的形体就是挽型马。西汉王朝对马的良种引入和马匹的改良给以高度重视，先后由西域引入大宛马（名曰“天马”）、乌孙马（名曰“西极马”），在当时的西北牧区进行大规模的马匹选育和改良工作。驴、骡、骆驼汉时开始从长城外陆续大量输入。马驴杂交所产生的骡，具有耐粗饲、耐劳役、抗病力强、挽力持久等优点。这一遗传学上的重大成就，是中国古代在牲畜杂交方面的创举。河南密县发现的汉代画像上可以看到骆驼驾车的画面，说明骆驼已引入中原。两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猪的选育和饲养管理技术提高到新的水平，猪种呈

现了比前代优良的特征。近年出土的大量汉代陶猪模型，可以证实这种进步。当时中国已经有华南猪、华北猪、四川小型黑猪、江苏大伦庄猪、贵州黔西南猪等适合当地饲养的优良猪种。汉代猪的饲养，已由放养为主发展为圈养为主，或圈养与放牧结合。养猪业和农业，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的一个方面，就是养猪不但为人们提供肉食，也为农业生产提供重要的肥源。为了养猪积肥，汉代劳动人民设计建造了多种形式的猪圈。出土的许多汉代的猪圈模型，向我们展示了汉代猪圈的多样化：有独立式的猪圈，有与作坊连接的猪圈。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与厕所连接的“连茅圈”，在长时期内遍及华北、中南、华东地区，尤其盛行于华北地区，对古代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汉代家禽的饲养更为可观。四川省德阳县出土的《园禽》画像砖，上面有鹦鹉、雄鸡、鹅。成都土桥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石刻《家禽家畜》图，大院内鸡、鸭、鹅、猪、狗成群。汉代比较有名的鸡种有鲁鸡和长鸣鸡等。

相畜在秦汉时是一种专门的技术。相畜是根据牲口的外形，来判断其生理机能特点和生产性能，并以此作为识别牲口优劣的依据。秦国曾出现过伯乐、九方皋等相马专家。云梦秦简《日书》中对善马的标准有严格的规定，对马的头、耳、目、脊、腹、四足、尾等主要部位都有具体的要求，实际上是当时民间一部朴素的相马经，也是迄今史载与出土文物中最早的一部见诸文字的相马经。汉代相畜术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专门的著作，《汉书·艺文志》收录有《相六畜》三十八卷。官府内亦有专门学习相马理论者，当时相马术已成为专门技术自设一科，与书计、射御等同。“以相马立名天下”的相马家有黄直、陈君夫等，并有相马专书问世。长沙马王堆汉墓

出土的相马帛书总结了根据马的外形识别不同用途马种的经验。西汉武帝时，相马家东门京制作了铜马作为相马的标准。东汉的马援是一位杰出的养马家和相马家，他吸取先辈相马家伙氏、中帛氏、谢氏、丁氏相马部位的特长，结合自己丰富的养马和军事实践经验，在东门京铜马的基础上，创制了新的铜马，作为“马式”，立于洛阳宫中。近年陕西省兴平县茂陵出土的一尊汉代鎏金铜马，马的肌肉和筋骨的雕刻符合解剖比例，马体匀称合度，其年代大约为汉武帝时期，有专家认为这件鎏金铜马是专门鉴定大宛马的铜马式，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第一个鉴别良马的标准模型。也有学者认为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也是汉代的马式。汉代铜马模型相当于近代马匹外形学的良马标准型。而欧洲一直到18世纪才有类似的铜质良马模型问世。这些相马标准的确立和推广运用，对

于选育优良品种，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史记·日者列传》还记载了“荥阳褚氏以相牛立名”、“留长孺以相猪立名”，说明当时的相牛术和相猪术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秦汉时期畜牧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兽医学的进步上，从睡虎地秦墓竹简《厩苑律》中，可知秦代对公家的马、牛、羊、犬、鸡的饲养管理、繁育和疾病防治都有奖惩的明文规定。汉代有专门的牛医、马医。“流沙坠简”和“居延汉简”中有十几片记载着治牛马病的医方，有学者专门对这种木简进行了详细研究。云梦睡虎地秦简记载对入境的马匹，也有严格的检疫防疫制度。到汉代，牲畜阉割去势的范围已相当广泛，包括马、牛、羊、犬、猪等牲畜。这方面的情况在汉代画像石中也有反映。汉代还发明了水骗法为马去势，此法比火骗法更安全保险。秦汉时期，马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和作战工具，长距离的行使，使马蹄很容



鎏金铜马

西汉

1981年陕西兴平茂陵出土
长76厘米，高62厘米，重26公斤

气势轩昂，造型俊秀雄健，是典型的骐骥良种模式。竹批双耳，龙睛鹿颈，口齿很轻，有大宛马之神采，马尾高翘，有匹配良驹之态，是张骞通西域后从大宛传入的优良马种。

铜奔马

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

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

马昂首嘶鸣，三足腾空，扬尾，尾打结，头微左顾，右后足踏一飞鸟，飞鸟两眼似鹰，展翅回首，尾端有一穿，当是固着托底的铆孔。该奔马通过凌空掠过鸟背的飞驰，表现出浪漫主义的意境，飞鸟不仅烘托出骏马风驰电掣般的奔腾状，而且成为奔马的重心所在，使腾飞的骏马在刹那间有一静止的凝铸，产生了动中寓静的沉稳的艺术效果。学者们对它的命名持有不同的意见。有“铜奔马”、“马超龙雀”、“走马飞鹰”诸说。对铜奔马作用的不同理解，直接导致了对铜奔马命名的差异。有人认为该马为汉代的马式，是汉代相马时的标准器。专家们认为马脚踏的不是燕，而是乌鸦，它表示良马的品级。有人认为，它表现的是汉武帝从西域引进的“汗血马”。还有人认为，这匹马是马神“天驷”。天驷本是天上二十八星宿东方苍龙七宿中的第四位，名“房”，亦为“马祖神”。这件铜马足踏飞鸟，正好表现了“天驷”行空腾飞和其所处的位置。



易受伤，汉代出现了护蹄技术，给马穿上皮革制成的马鞋。

五、渔猎画像砖

考察秦汉人的饮食结构，可以发现水产品是当时人们饮食生活中的主要消费品之一。当时的人嗜食鱼，光鱼的烹饪方法，就有蒸、酯、鲍等，还有肉鱼同烧的名菜——“五侯鲭”。汉代饮食品种的丰富，也促进了渔业的发展，两汉中央政府有专门管理“渔利”、“渔税”的机构。湖北云梦秦简《日书》是供人择时择日的书籍，其内容与人们的社会活动息息相关，其中就大量记载了民间渔猎活动，为人们渔猎提供了良、忌日。汉代人们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捕捞形式，画像石上常常可以看到水滨垂钓的画面。山东滕县西户口汉画像石上，可以看到三条渔船浮水垂钓的情景，船上有捕获的鱼、钓钩、钓线、钓竿及浮子，均刻画细致。用网捕鱼效率更高，山东肥城栾镇汉画像石和微山两城汉画像石以及苍山前姚汉画像石都有持带柄网具捕鱼的画面。汉代还

曾出现一种以机械方式牵引绳索控制网具升降的捕鱼技术。四川郫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石棺上有人工驯养鱼鹰捕鱼的画面。山东武梁汉画像石也有使用鱼鹰捕鱼的画面。汉代边疆渔业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在甘肃居延肩水关遗址出土的鱼网、网坠、织网梭等渔具数量较多，出土的汉简简文中亦有关于在居延捕鱼五千条运往张掖郡售卖的记载。

秦汉时期渔业生产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水产养殖得到突出发展，除利用大面积天然水面养鱼外，当时已采用鱼类自然繁殖、资源保护和人工补充放养鱼种相结合的措施。池塘养鱼在秦汉时期得到突出发展。秦筑成都城，取土成池，“因以养鱼”。汉代墓葬中出土陂池模型，其中往往刻画或堆塑出鱼类及其他水生动物形象。汉代墓葬中还出土陶水田模型，可以提供若干有关当时稻田养鱼的实物资料。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石田塘模型上，一侧凿出两块水田，一块田里积有堆肥，另一块田里两个农夫正俯身劳作。另一侧凿出水塘，塘中置一小船，还有鳖、青蛙、田螺、莲蓬等等。陕



收获渔猎画像砖

东汉

1954年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
高36厘米，宽42厘米

西汉中出土的陂池稻田模型，一边为陂池，一边为稻田，中隔一坝，坝中部安有提升式平板闸门。开启闸门时，鱼可以顺水游至稻田之中。四川宜宾出土的陶水田鱼塘模型，大略地提供了当时陂塘、鱼池、水田之间的布局。西汉时期人们在长期养鱼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部《陶朱公养鱼经》，原书已佚，《齐民要术·养鱼》中引述了它的一部分内容，其中涉及到鱼池建设、鱼种选择和培育等等。

秦汉时期，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狩猎活动已退居次要地位，但仍是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一种手段。野生动物中，大到熊、虎，小到野鸡、兔，都是汉代人们狩猎的对象。如江苏邳县青龙山出土的狩猎画像石中，就形象地反映了人们用长柄网捕野兔的情景。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的收获渔猎画像砖上的弋射图是当时人们以丝缕系矢射鸟的情景。弋

者所用的短矢叫“矰”，丝缕叫“缴”，其另一端系着可以滑动的礮，这个礮还被装在一个半圆形的机械里，说明当时人们的狩猎工具已很完备。

六、“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

木材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皇帝贵族墓地、民居建筑、车船交通工具以及燃料等都离不开木材。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秦汉时期的林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当时的自然林区主要是关中西部（今甘肃、宁夏六盘山等地区），以及关中南沿秦岭山脉自西向东。在秦岭以南，有巴蜀山区。此外即东北广大的山林区。江南也有一定的森林资源。保护林业是秦汉时期政府重要的经济措施之一，国家按季节规定了对山林的禁伐，以达到合理保护和利用林木的目的。四川广汉县城郊女儿坟墓



桐园画像砖

东汉

1954年四川彭山出土

高24.2厘米，宽37.4厘米

汉代人多用桐油照明。桐油是西南特产。种植桐树、摘籽榨油成为当地庄园的主要副业之一。

中出土画像砖《大江行筏图》，木筏上乘二人，顺江而下，反映了四川地区大批木材通过水路外运的情景。秦汉时期人工植树的范围比较广泛，《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千亩漆”、“千亩桑麻”、“千亩竹”等，很明显都是人工种植的用材林和经济林。当时的道旁路侧，多栽植行道树。秦代有名的驰道上，“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驱车上东门，遥见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这是汉代有名的《古诗十九首》中的句子，诗中向我们描述了树木夹道的情景，反映了汉代道路植树的史实。汉代人已经认识到树与土壤的关系，开始采用秋冬季采条覆土、春季掘土栽植的“休眠枝埋藏技术”，在驰道行道树上采取插穗，在兰池宫苗圃中培育苗木。可见汉代的

育林技术已经有很大的发展。贵州曾出土一件汉代陶水塘稻田模型，周壁刻画有大致等距的树木九株，反映出当时农田四周植树的情况。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贵族宅院的两侧，也常刻有茂密的树木，反映出当时住宅周围植树的情景。《古诗十九首》中“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反映了汉代陵墓旁植树的习俗。秦汉时期人工植树造林规模最大者，当为长城附近的榆溪塞。据史念海先生考证，“所谓榆溪塞，乃是种植榆树，形同一道边塞”，“这是当时的长城附近复有一条绿色长城，而其纵横宽广却远超过于长城之上”。“树榆为塞”对改良长城附近地区的植被状况，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节 部门齐全 ——秦汉手工业

冶金业是秦汉时期规模最大的手工业生产部门，遍布全国的冶铁作坊遗址反映了这一时期冶金业规模的宏大，出土的各种铁制铜制器物，反映了当时冶金业的工艺水平。秦汉时期是中国纺织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期，画像石上形状各异的纺车和花色品种繁多的纺织品实物，是这一史实的最好说明。丰富多彩的秦汉漆器表明了这一时期漆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顶峰时期，后世漆器工艺的许多技法，都可以追溯到汉代，汉代的漆器工艺在中国漆器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时期的陶瓷业出现了新的品种，如北方的铅釉陶，南方的青瓷，都代表了这一时期陶瓷工艺的杰出成就。秦汉时期制盐业和酿酒业的发展大大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生活。

一、冶铁画像石

1930年山东滕县出土的一块画像石曾引起几代学者的极大兴趣，这是一幅反映冶铁



场景的画像石，图像展示了从冶炼、锻打到磨砺铁刀的整个生产过程，有如今天的生产流水线，分工明确，繁而不乱。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冶铁图上的皮囊，围绕皮囊的构造和功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20世纪50年代，王振铎先生还对其进行了复原。这个皮囊可以说是冶铁用的鼓风机装置，它的内部装撑环，两端装挡板，前挡板上有关气口，后挡板上有关气口外连接着通向炼铁炉的风管，囊顶装有活动吊杆，使用时须不断推拉。在这幅画像上，

冶铁画像石
1930年山东滕县出土



“永初”纪年铁刀
东汉
1974年山东苍山出土
长111.5厘米

霸陵过氏脰

汉
汉代冶铸鼓风用的陶管残段，上有文字“霸陵过氏脰”。



排囊（模型）

据《后汉书·杨璇传》和山东滕县出土冶铁画像石制作排囊是冶炼用的鼓风器。外部用皮革制成，内部用木环作骨，两端用吊杆挂起，以便推压鼓风。

除有人在囊前压囊鼓风外，还有一人卧在囊下以将囊推回原位，操作起来是很费力的。该皮囊虽然至今仍是汉代及其以前冶铁鼓风机的孤证，但在当时应是冶铁业中普遍使用的。河南巩义铁生沟、郑州古荥镇、南阳瓦房庄、鹤壁鹿楼村等遗址都发现有陶鼓风管，应是装在这种皮囊上伸入炼炉的鼓风口进行鼓风



的。汉代也通过改进鼓风设备的方法加强风压，提高炼铁炉的炉温，以求炼出质量更高的铁制品。鼓风新设备水排在东汉初年已经发明，水排不但节省了人力、畜力，而且可以提高鼓风量。在欧洲，水力鼓风装置是12世纪才发明出来的。

冶铁画像石为我们了解秦汉时期的冶铁业提供了形象的资料，全国大范围的冶铁遗址则再现了当时冶铁业的规模。秦国是春秋战国时期较早掌握冶铁技术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从出土的秦律看，秦王朝不但专门设有“左采铁”、“右采铁”等主管冶铁的官吏，而且在采铁、冶铁的考课以及铁器供应和使用方面都有具体而详细的规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秦铁器广泛使用的情况和铁器制造业的发达。汉武帝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铁官，管辖冶铁作坊。现在全国已发现汉代冶铁作坊遗址三十多处，其面积多在一万平方米以上，有的甚至达十几万平方米。地处中原的河南省，是发现汉代冶铁遗址最多的地区，这里的大型冶铁遗址就有巩义铁生沟、郑州古荥镇、南阳瓦房庄等。北京清河、内蒙古呼和浩特、河南洛阳均出土了汉代的坩埚，根据对坩埚附着物的分析，有的坩埚甚至能炼出铸态钢，不过大部分还是用于炼铁的。由于用坩埚难以满足大量生产的要求，因而西汉时又出现了炼铁的竖炉。竖炉在汉代冶铁遗址中已经常见，河南的新安、鹤壁、巩县、临汝、西平、南召，江苏的徐州、泗洪，北京的清河以及新疆的民丰、洛浦等地都曾发现其残迹。性能优异、体型巨大的竖炉，是汉代冶铁业发展规模的标志。

对出土的汉代铁器的金相分析，可以让我们了解汉代铁器制造的工艺水平。考古出土的汉代铸铁件有白口铸铁、灰口铸铁和麻口铸铁。河北满城汉墓中这几种铸铁都有发



水排（模型）

据《后汉书·杜诗传》和王桢《农书》立轮水排复制。水排是利用水力进行鼓风的冶炼设备，它是根据水碓和杠杆的原理，利用水力冲击水轮，以拨动皮制排囊鼓风。

现，其中冶炼灰口铸铁需要较高的温度，它的出现是汉代铸铁工艺的新发展。汉代出现了百炼钢技术，它是以生铁为原料，在空气中加热搅拌，再经反复加热锻打而得到的钢制品。出土的百炼钢实物有：1978年徐州市出土的建初二年（公元77）“五十涑”长剑；1974年山东苍山县出土的永初六年（112）“卅涑大刀”；1961年日本奈良栢本东大寺山古墓出土的中平（184—189）纪年“百炼清钢”刀。同样，用熟铁原料在木炭中加热、渗碳、折叠锻打，改变含碳量，使碳的分布均匀，也可以获得钢制品，汉代发明的这种铸铁工艺称为块渗碳钢。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铁剑和铁书刀都是采用这种工艺制成的。满城汉墓刘胜佩剑的锋利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制造的技术之一是剑的刃部采用了淬火技术，它是将加热的锻件放入油或水中，使其迅速冷却，以增加钢铁的硬度和强度，这把佩剑只在刃部进行了淬火处理，这样就使剑刃部分坚硬锋利而剑脊部分则保持较好的韧性，使得钢剑既犀利而又不易折断，显示当时淬火工艺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出土的汉代铁制品，完全表明汉代冶铁技术和金属加工工

艺已达到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成熟阶段。

秦的青铜器使用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大和改变，即青铜礼器减少而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建筑构件等大量出现。仅秦始皇兵马俑坑所出的青铜兵器就达数万件，而且大多数兵器上还镌刻有生产年代、产地与监造者名，说明秦的青铜兵器制造有一套严格而细密的管理制度。在青铜铸造工艺方面，秦人

鎏金鸟兽纹铜尊

西汉

高14.6厘米

铜尊呈筒形，熊形足，盖上有环和三飞鸟，器底嵌银铭文，器身鎏金，虽磨落很多，但显示了汉代铜器制作中发达的鎏金工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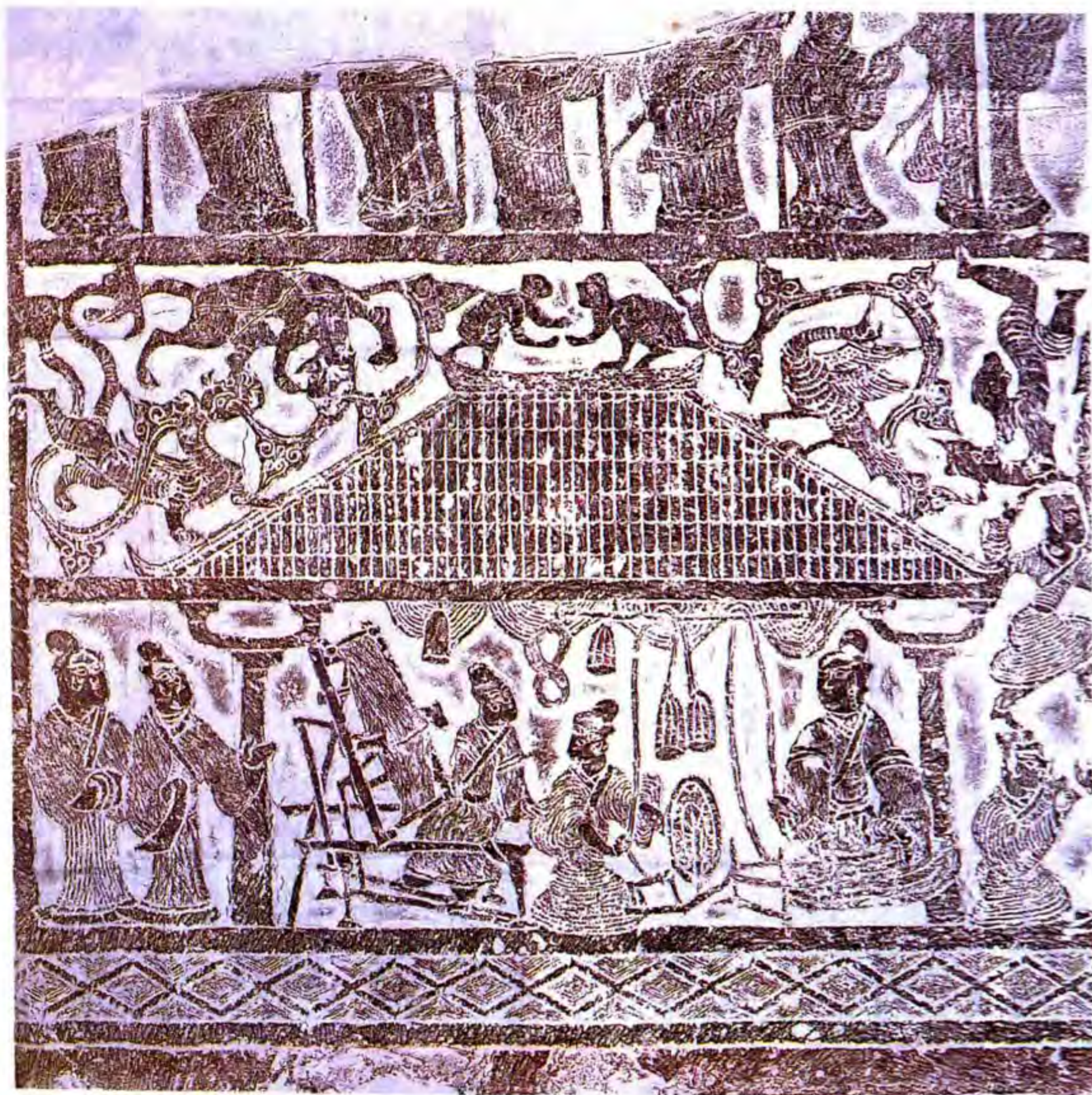


更是有突出的成就，铜车马就是很好的说明。如2号铜车马体积大，结构复杂，全车由3462个零部件组成，总重量1245公斤，采取了多种工艺组装而成，在地下埋藏二千多年，而大部分接口都牢固如初，是秦青铜制造工艺的结晶。同时同地出土的秦青铜兵器，不蚀不锈，光耀夺目，也是很好的证明。相对于汉代冶金业迅速发展而言，汉代的青铜冶铸业的地位有所下降，但铜器制造业的规模还很大，铜制品的数量和种类增多，其造型已摆脱了商周铜器神秘、厚重、古拙的作风，显得灵便、轻巧，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需要。纹饰虽简素，但在铜器上鎏金、鎏银以及用金银、玻璃、宝石之类镶嵌花纹的技术却相当发达。在河北、河南、陕西、甘肃、江苏、广西、云南等地，

都出土了不少保存较好的汉代镀金器物。河北定县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大小镀金器物总数达五百多件，仅耳环就有九十件，可见数量之巨。满城汉墓所出镀金器物更是气势非凡，举世瞩目。如1号墓出土的蟠龙纹壶，通体镀金镀银；2号墓出土的长信宫灯、薰炉等皆通体镀金。鸟篆文错金银铜壶、错金博山炉等，皆通体加饰，图纹精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铜兵器虽然在秦汉时期不占主要地位，但考古发现的秦汉铜兵器出土时都光洁如新。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出土的铜剑，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铜箭头，它们的表面都有一层灰色保护层，经X光荧光分析及电子探针检查，是用铬化物进行了处理，使兵器更加耐腐蚀。目前人们还不清楚当时的工艺过程，而

纺织画像石（拓片）

画像石 1956年于江苏徐州
铜山洪楼村出土



脚踏纺织机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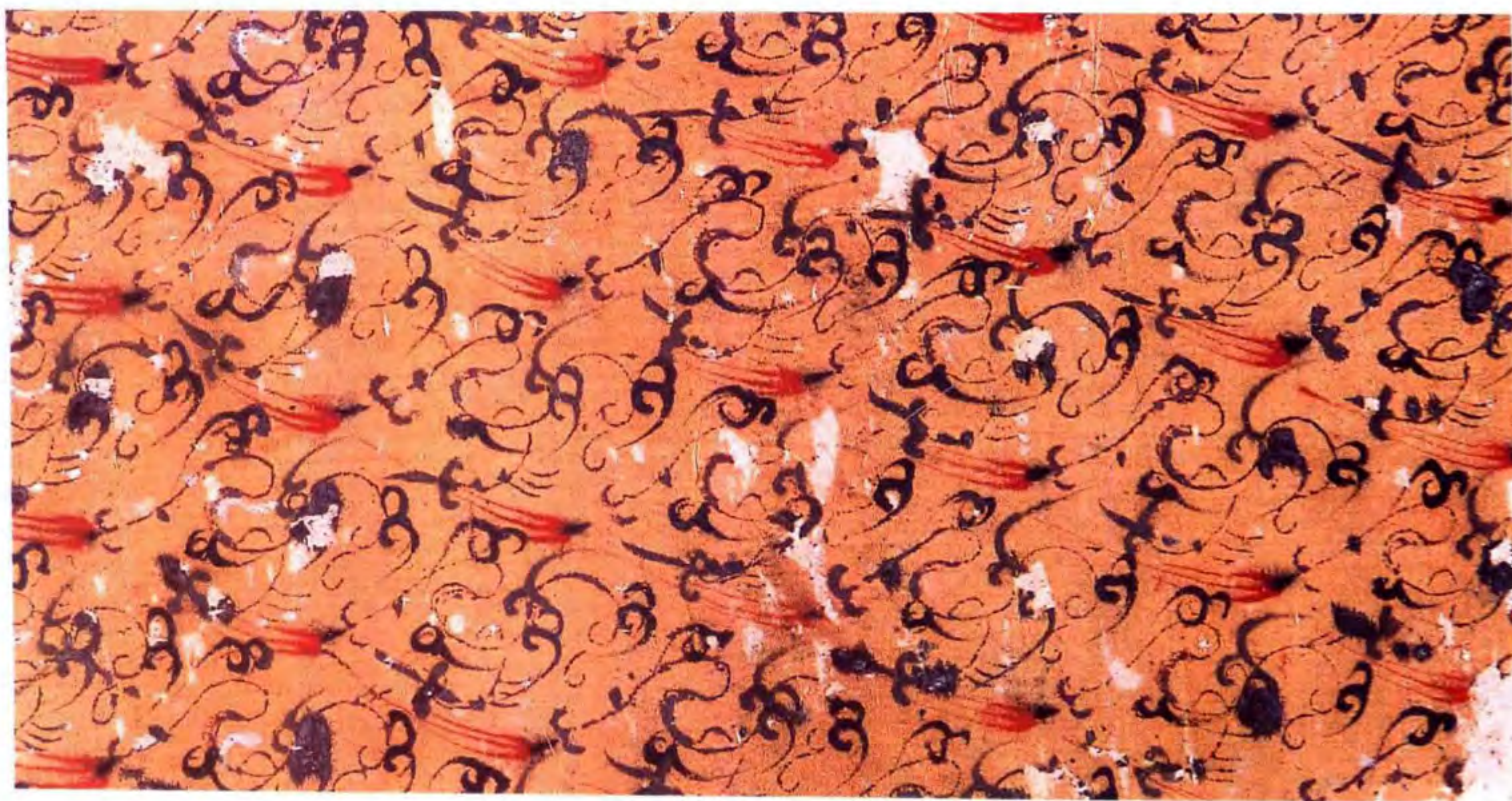
现代金属镀铬技术在西方很晚才出现。

二、纺织画像石

“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东汉人王充一语道破了汉代丝织生产的普及和工艺水平的提高。秦汉时期齐郡（今山东淄博市一带）的绣，襄邑（今河南睢县）、蜀郡（今四川成都市）的锦，驰名于天下。用于刺绣的织物是如何纺织出来的呢？1956年江苏铜山县洪楼采集的一块纺织画像石，再现了东汉齐鲁地区家庭纺织的场景。

这块纺织画像石上，清楚地描绘了汉代纺织的三道工序：调丝、纺纱和织布。其中的纺车是手摇纺车，一般而言，纺车的生产能力比纺坠要高出15—20倍，纺车还可依据织物

性质，来决定丝麻缕捻度之高低，纺坠则难以做到。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素纱禅衣，衣长128厘米，连袖长190厘米，仅重49克，薄如蝉翼，反映了当时缣丝技术的先进水平。脚踏纺车在汉代已经出现，1974年江苏泗洪县曹庄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刻有一幅脚踏纺车图，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脚踏纺车资料。画像石上所用的织机为斜织机，这是秦汉时期普遍使用的纺织机，这种脚踏纺织机的出现，是中国纺织业划时代的进步。织工坐在这种斜织机上，整个机面的操作状态一目了然，能够减少布面的断头，使织物更加均匀平整。更重要的是，这种织机的机轮牵引力提高了，而且用脚踏织板，把织工的右手解脱出来，双手配合纺纱和并线。这种脚踏织机，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画像石上所反映的斜



“长寿绣”黄绢

西汉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出土



印花敷彩纱

西汉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出土



铜质印花凸版

西汉

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
长3.4厘米至5.8厘米

大小两件，大的为主纹版，如松树形，有旋曲的火焰状纹，小的为定位版，轮廓近似“人”字形，正面凸起云纹。两者背面皆有一穿孔小钮，可穿绳执握，如盖章般依次逐个打印，套印出彩色图形。此印花版纹样与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泥金银印花纱图案非常相似。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套彩色套印织物的工具。

织机是单片综双踏杆的素织机，只能织出平纹织物，但从出土的图纹华茂的汉代纺织品来看，提花机在汉代已经出现。汉代的提花机已经基本上具备了中国传统提花机的各种主要部件，从性能上看，已经能织造任何复杂变化的纹样。李约瑟先生认为，西方的提花机是从中国传出去的，使用时间比中国晚四个世纪。汉代出现的彩锦，就是一种经线起花的彩色提花织物，不仅花纹生动，而且锦上织绣文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几种起毛锦，说明汉代已能织造起绒织物，使织锦真正具有了锦上添花的立体效果，成为中国传统的织锦工艺之一。

秦汉时期，织品的练、染、印工艺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所列的织物色调就达39种之多。这一时期还发展了套色型版印花，发明了蜡染。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了两件铜质印花凸版以及部分印花丝织品，为了解中国古代印花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其中一件印花版正面花纹近似松树形，有火焰状纹凸起，印版上有明显的因使用而磨损的痕迹。同墓还出土一件仅有白色火焰纹的丝织品，其花纹形态与松树形凸版纹相吻合。马王堆1号汉墓出

土一种金银色印纹织品，图案与南越王墓印花版十分相似。有关专家认为，马王堆“金银色印花纱”采用的就是三套色型版颜料印花工艺。1959年，新疆民丰尼雅东汉墓葬出土有“蜡染花布”，其花卉、人物等图案都精巧细致，可知当时蜡染技术已相当成熟。

三、轻便美观的漆器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曾有过辉煌的彩陶时代和青铜时代。但是彩陶用颜料彩绘，因黏附力差，极易掉色、剥落，所以随着社会的进步，彩陶时代退出了历史舞台；青铜器虽然能铸造出奇巧的造型、精致的纹饰，但是，它的颜色太单调了。汉代的工匠们把审美的眼光投向了漆器，漆器成为他们展现才艺的新天地，漆器制造业在汉代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漆工艺在汉代社会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漆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当时的器具，凡是可以髹漆的，无不制成漆器。人们从审美的角度出发，给器物髹漆，赋予器物以新的美感，汉代人们给青铜器髹漆绘画，使青铜器光彩焕发。同时，髹漆后的青铜器，还可以防止表面锈蚀，使器物更加耐用。如广西



马蹄形漆盒

东汉

山东莱西岱野村出土

高5.5厘米

这件漆盒的匣盖镶有银质四叶，边沿以银片包镶，内外绘云气纹，是当时的钗器。

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铜胎漆筒和铜胎漆盆、山东诸城汉墓出土的彩绘铜胎漆壶等，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陶器上髹漆，使暗色的陶器变得鲜艳夺目。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许多汉代陶胎漆器，如山东临沂银雀山4号西汉墓出土的陶胎漆器多达21件，器形丰富多彩。木胎漆器是汉代以前的主要传统。汉代的漆器仍然以木胎为主，但木胎的制法更加多种多样。西汉早期的漆器多为斫木胎和旋木胎，即用斫、剡、削、凿、刨等方法制出的胎型，或用旋床旋出外壁和底部。晚期多卷木薄胎。汉

代木胎漆器，总的发展趋势是由厚向薄、由重向轻。汉代已能生产出多种器形的卷木薄胎漆器，它们是用很薄的木板卷成圆筒形，接楔处削成斜面，用胶漆黏合而成，这是一种非常精巧的漆器，它既需要精细的刀具，又需要高超的技术。但卷木胎漆器在使用时，容易开裂或变形，人们就在卷木胎上，裱上一层麻布或缁帛，然后再刮灰髹漆，使轻巧的薄木胎器更加耐用。在此基础上，汉代人们开始大规模生产一种新型的漆器——夹纆胎漆器。纆是一种细麻布。其制法是先作胎骨模型，然后在模型上层层裱褙涂有漆灰的麻布，干固后去其模，便形成了漆器的胎。由于麻布夹在漆灰中间，人们便称其为“夹纆胎”，这实际上就是后世脱胎漆器的始祖。夹纆胎漆器在西汉中后期开始大量流行。如西汉中期的长沙曹娥墓，出土漆器150件，绝大部分是夹纆胎漆器。山东长清双乳山的一座西汉中期墓，出土大量漆器，全部都是夹纆胎，不见木胎或竹胎。除了麻布为胎的漆器之外，还有用缁帛作胎的。缁帛比麻布柔软细密，用它做胎，能使漆器表面更加光洁美观，造型更加轻巧，大大提高了漆器的档次。以汉代特有的漆緌纱冠为代表，甘肃、山东、长沙等地曾出土多件这种纱帽，

锥画漆奁

西汉

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

高17厘米、口径28厘米





云纹漆匜

西汉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
高8.6厘米，口径23厘米至
29.5厘米

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漆缁纱冠，在网状的丝织品上，涂上漆液，乌黑发亮，所以又称“乌纱帽”。

汉代的漆器还特别重视装饰手法，除传统的油漆绘画外，锥画漆器是汉代的新发明，它是用金属锥在尚未完全干透的漆模上镌刻各种图画。由于是用锥尖刻画，故花纹线条细如游丝，图案格外纤丽。《西京杂记》记载，汉成帝昭阳殿有一漆屏风，“文如蜘蛛丝缕”，可能就是一件高贵的锥画漆屏风。锥画漆器的成就多表现在小的器物上，方寸之间，尽现其工艺的精致入微。如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件锥画漆奁，高仅17厘米，口径仅28厘米，但锥画的内容却极为丰富：在青山绿水的衬托下，鸟在空中展翅飞翔，鱼在水里自由游动，小兔在地上尽情奔跑，其间还有耗子匍匐爬行，手持长矛的猎人追赶着两只仓皇逃命的梅花鹿。此外，还有仙人乘龙遨游。画面的上下方，绘有各种装饰图案。锥画在汉代初期发明后，很快在全国流行，大量生产，如江苏邗江姚庄西汉晚期墓的大量夹纆胎器上，全有锥画纹饰。锥画发展到西汉中期，又有创新，

那就是在锥画的花纹中填金彩、红彩。这样，在黑漆地上的图案熠熠生辉，这就是后世所谓“戗金”、“戗红”漆器的始祖。堆漆也是西汉漆器装饰手法的新创造。所谓“堆漆”，就是利用漆黏稠不易展开的特性，使图像高出画面，具有立体感。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棺、漆奁等都采用了堆漆的新工艺，画面有明显的浅浮雕效果。

贴花也是汉代漆器主要装饰手法之一，有金箔贴花、银箔贴花、金漆错、羽毛贴花和锦绣贴花等多种手法。贴花装饰的手法是把黄金或银等捶成极薄的薄片，镂刻成各种图形，再利用漆黏性很强的特性，把薄片贴在漆器表面，然后经过多次髹漆和反复打磨后，露出金银饰片。使用这种方法制成的漆器，富丽堂皇，精美光洁，表现出高超的工艺技巧。考古资料表明，西汉初期墓葬很少发现金银箔贴花漆器，但自西汉中期开始，金银箔贴花漆器增多，至晚期大量出现。1978年长沙杨家山304号西汉晚期墓出土的一件漆盒，上有许多金箔贴花，内容丰富多彩，其中人物有着袍盘坐者、拂袖起舞者、耍杂技者等，飞禽有雁、



双层九子漆奁

西汉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
高20.2厘米，口径35.2厘米

燕、雀，走兽有骆驼、虎、豹、鹿、牛、野兔，还有不少装饰图案。图像轮廓清晰，具有立体感。

从战国至秦汉，木胎漆器总的发展趋势是由厚木胎向薄木胎发展，漆器变得越来越轻巧和精致，但牢固性也日渐减弱，人们必须想法采取加固措施，于是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用金属加固器物口沿的漆器，到了汉代这种技艺才得到普及和提高。用金属加固漆器口沿的，汉代称之为釳器。汉代釳器有黄金釳器、白银釳器和铜釳器，黄金釳器是所有釳器中级别最高的，汉代规定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皇帝生前吃饭需用黄金釳器，死后祭祀时，也享受黄金釳器的待遇。皇后、太子可使用白银釳器。按规定，一般臣民是不能享用黄金、白银釳器的。但这种规定随着社会上釳器的大量生产而自行消失。后来，富贵人家也使用银釳漆器。考古发现，一些并非皇室、王侯的汉墓，也有银釳漆器出土，这就证明，昔日为皇室王侯专用的白银釳器，已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同时也表明汉代漆器生产已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汉

代的高级釳器，一般多与金银箔贴花、彩绘、镶嵌等装饰相结合。如江苏邗江西汉晚期墓出土的一件银釳贴金箔漆盒，器身三道银釳之间，有三道金箔纹饰带。金箔图形有西王母、羽人、凤凰、灵芝草、飞鸟及山水、流云等，勾画出一幅美妙的仙界图画。漆器银釳银光闪闪，金箔金碧辉煌，相互辉映，流光溢彩，富丽异常。

镶嵌也是汉代漆器重要的装饰手法之一。汉以前的漆器，虽也有镶嵌，但嵌料多是单一的，而汉代则出现了“七宝”、“列宝”、“杂宝”漆器，即用许多宝贵材料杂嵌于一器之上，与后世的“百宝嵌”类似。如北京大葆台1号汉墓出土的漆器嵌件就达155件之多。河北满城1号汉墓有集嵌金、银、珍珠、玛瑙、骨雕于一器的漆奁。

秦汉时期，随着工艺技术的发展，漆器生产的分工日益细密。“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在出土的许多汉代漆器上，往往刻有该漆器的监造人员及制造工匠姓名的铭文。根据这些铭文，



可知当时制造漆器的工种包括有素工、髹工、上工、铜钹黄涂工、画工、雕工、清工、造工、供工等，监造人员有护工卒史、长、丞等等，名称合计达十六种之多。

四、铅釉陶与青瓷

秦汉时期是中国陶瓷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与秦泱泱大国相适应的秦代陶器，最大的特点是宏伟壮观，生活用器和陶塑艺术都是煌煌大器。出土的声势浩大的秦始皇兵马俑坑，就是秦代制陶业发达的最好例证。集前代技艺之大成而进一步提高的汉代陶瓷，以其特有的功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新兴的品种，如北方的铅釉陶、南方的青瓷，都代表了汉代陶瓷工艺的杰出成就。

釉陶中的釉是覆盖在陶器表面上的一种软玻璃质的薄层，釉料在焙烧陶器的过程中，随着温度的上升成为熔融状态，随温度下降硬化成一层薄膜，粘附在胚体上面。陶器烧成后表面光滑润洁，且由于釉里加了金属物质，

釉陶表面呈现各种颜色。陕西关中一带西汉武帝时的墓葬中，具有新特点的低温铅釉陶开始出现，但数量极少。西汉宣帝以后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今河南等地的墓葬中都有发现。西汉后期到东汉，铅釉陶流行地域十分广阔，西至甘肃，北达长城地带，东到山东，南抵湖南、江西一带，都有铅釉陶出土。铅釉陶主要的着色剂是铜和铁，在氧化气氛中烧成，铜使釉呈现翠绿色，铁使釉呈黄褐或棕红色。铅釉大约在700℃左右即开始熔融，因此它是一种低温釉，在汉墓中发现的铅釉陶都是随葬明器，所见器物有鼎、盒、壶、仓、灶、井、家畜圈舍以及楼阁、池塘、碉楼等。汉代北方的釉陶，色泽或作浓黄，或作深绿。如内蒙古包头市郊召湾村出土的黄釉浮雕尊，黄色深沉雅致，纹饰挺拔活泼，技巧熟练，是北方黄釉陶的精品；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的山东潍县出土的绿釉陶壶，通体披以翠色厚釉，光彩照人，是北方绿釉陶器的佳作。陶工还利用铅釉的透明性，在生胎上刻画出精美的花纹图案，

粉彩双层长方形漆奁盒

西汉

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
长48.5厘米，宽25.5厘米，
高21厘米

彩绘青龙、白虎、朱雀纹陶壶

新莽

1953年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出土

高48.5厘米，口径18.8厘米，底径18.1厘米

灰陶是汉代最主要的陶系，其容器一般都呈青灰色，火候均匀，烧成温度约在1000℃以上，质地坚实。有的绘有彩色的花纹，是陶器烧成后才绘描的，易于脱落，称“彩绘陶”，专为随葬而作。这件陶壶属彩绘陶，绘描青龙、白虎和朱雀等纹饰，鲜艳精致。





浮雕兽纹釉陶壶

西汉

高31.7厘米，口径12.8厘米，
底径12.8厘米

釉陶是汉代制陶业的一项新发明，用普通陶土烧制，胎呈红色，器表施铅釉，呈黄色、黄褐色或绿色，烧成温度约为800℃左右。因其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所以也称“北方釉陶”。由于陶质不坚，釉也容易脱落或变质，所以主要为随葬而用。这件釉陶壶，腹的上部作出兽纹浮雕，是釉陶中的佳作。

然后上釉，烧成后刻纹清晰可见，艺术效果极佳。汉代南方则广泛流行硬釉陶器，用当地一种密度较大、黏性较强的黏土制成，陶质坚硬，表面上有一层薄薄的釉，或黄或绿，颜色很淡。由于南方釉陶烧成温度很高，属于青釉的系统。如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的浙江杭州玉泉出土的波纹双系青釉硬陶壶，器身上涂有青黄色釉，是一件当时较典型的南方硬釉陶器。

在汉代的铅釉陶中，有的釉陶器表面全部或局部呈银白色，俗称“银釉”。对于银釉的成因，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

由于棺中的朱红变成水银粘着在陶器上面所致。还有学者认为，银釉器多出土在潮湿的墓葬中，银釉很可能是绿釉表面受到地下水或大气的轻微溶蚀而形成的。学术界对铅釉发祥地也一直存在着争议。有学者认为它是从国外传入的，最早出现在埃及，后来逐渐扩展到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西域一带，汉通西域时传到内地。也有学者主张铅釉是由中国人发明创造的，他们认为先秦时期对铅、铅粉的认识已达到一定的水平，汉代铅釉陶的烧制成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的。

青瓷是汉代制陶业的又一重要创造。东

双兽耳青釉硬陶甗

西汉

1955年浙江宁波出土

高21厘米，口径12.1厘米，
底径15.6厘米

汉代南方地区盛行硬陶，它上承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所谓“几何印纹硬陶”的余绪。在汉代陶器中自成一个系统。有的器物上往往施以黄、绿色釉，很接近瓷器。这件双兽耳陶甗，器身上部有三圈弦纹，弦纹中间有水波纹，涂青黄釉，是一件西汉时期较典型的南方硬釉陶器。



绿釉陶壶

东汉

山东潍县出土

高47厘米

东汉时期典型的北方釉陶制品。



汉后期，首先在浙江绍兴、上虞一带出现了青瓷器。青瓷是在商周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采用瓷土作胎，通体施釉，在1300℃左右的高温下烧成，胎质坚细，呈浅白色，釉色晶莹，吸水率低，已具备了瓷器的各种条件。其施釉技术由刷釉改为浸釉，釉层厚而均匀，胎釉结合紧密牢固，釉层透明，表面有光泽，釉面淡雅清澈。青瓷烧制技术较高，分氧化、还原、冷却三个阶段，关键是控制还原和冷却阶段的温度。对于中国古代瓷器出现的时间，学术界曾有过不同的看法。曾经流行过的一种观点认为是在魏晋，并把这一时期的青釉器称之为“早期瓷器”或“早期青瓷”，而把商周及汉代的青釉器称之为“釉陶”。近年来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把东汉末年视作中国瓷器的发明期，把商周到西汉的青釉器归到原始瓷的范围。中国在东汉晚期已经发明瓷器是确凿无疑的。多年来，



波纹双系青釉硬陶壶

西汉

1957年浙江杭州玉泉出土
高21.2厘米，口径9厘米，底
径10厘米

青瓷四系罐

东汉

1955年河南洛阳中州路出土
高16.5厘米，腹径18.5厘米
从器物形态看，应当是长江
中下游的制品，是东汉后期
青瓷的典型器物。

人们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都发现过汉代的瓷窑窑址。此外，在河南洛阳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冢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也都发现过瓷器。尤以江西、浙江发现最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纪年墓中所出的麻布纹青瓷四系罐，“熹平四年”（175）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薰炉和灶。黑釉瓷在今湖北、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都有出土，安徽亳县东汉建宁三年（170）墓同时出土青釉和黑釉两种瓷器，在上虞、宁波一些东汉窑址中还习见有青釉瓷和黑釉瓷共烧现象。这些有确凿纪年墓内瓷器的出土，说明东汉末年已经比较



青瓷甗

东汉

浙江上虞百家出土

高23.5厘米，口径20.8厘米
今浙江上虞一带是原始青瓷走向成熟的青瓷工艺之乡。东汉中期从今浙江的上虞、宁波到浙南的永嘉，同时制造了比较成熟的青瓷，为唐代越窑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青瓷盏

东汉

湖南长沙出土

高9.1厘米，口径17.2厘米
这个青瓷盏釉色光亮，质地纯净，叩之声音清越，代表了东汉时期青瓷器的发展水平。



成功地掌握了复杂的青瓷烧制技术，烧成了质量较高、色泽青翠的瓷器，为后世各种瓷器的烧制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五、盐井画像石·酿酒画像石

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被称为“食肴之

将”。盐业是汉政府三大重要赋税收入之一。汉代的制盐业颇为发达，当时盐的种类主要有海盐、井盐、池盐和岩盐。海盐主要分布在自辽东至岭南的沿海地带，以齐鲁地区最为重要，有诗赋描写齐地的盐“皓皓乎如白雪之积，鄂鄂乎若景阿之崇”。井盐主要产于川滇地区，尤以蜀地井盐闻名全国，诗称当地“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池盐则以河东的安邑（今山西运城市）最为著名，“河东盐池，袤五十一里，广七里，周百十六里”。诗赋称“河东盐池，玉洁冰鲜”。岩盐主要集中在一些山区。

汉代制盐的方法首先是煮，其次是晒。煮盐法是汲取海水或盐池、盐井中的咸水，经蒸浓煎制而成盐；也可煮咸土、咸石为盐。煮盐的主要工具是“牢盆”。《隶续》所收汉代铁盆铭文，一件标明“三百五十升”，另一件标明

“二十五石”。此两件铁盆均为东汉时煮盐的牢盆。此外河南南阳瓦房庄出土的一件汉代铁釜，直径达2米左右，似亦为煮盐的大牢盆。

井盐的生产，需先凿井取卤，而后设灶煎制。在四川成都东汉墓中，多次出土盐井画像砖，如1954年成都市扬子山墓出土的画像砖上，就形象地再现了东汉时蜀地的自然生态和井盐生产的繁忙景象。画面上群山耸立，植被繁茂，其间歇息着禽类和哺乳动物，山间是猎人追射的场面。左下角盐井上高矗着井架，架分两层，每层各有二人正用滑车和吊桶汲卤；右下角放置一灶，下有四根管排列，灶上有五釜，灶前一人正烧火熬盐；井架和灶间架有视筒，卤经视筒至灶上釜内；山麓有两个运盐者背负盐包行进。有专家甚至认为汉代四川临邛等地已开发利用天然气作为煮盐的燃料，成都扬子山出土的这块画像砖上，五口大锅并排置于灶上，在灶门处排列着四根管道，直通锅底，这些并排的管子，输送的就是天然气，供盐锅下燃烧用以煮盐。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画面上表现的是柴灶，全无使用天然气的痕迹，四川地区天然的地理构造虽然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但四川天然气的正式开发是在晋代，东汉末虽可能已发现天然气，但并未在煮井盐时大规模使用。

秦汉时期，在农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酒业生产的规模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酒肆作坊在城市和乡镇广泛分布。大工商业者经营的酒业作坊一般集中在通邑大都，主要供应城居官僚贵族和豪强巨富的需要，其经营者“富比千乘之家”。西汉元帝时，赵君都、贾子光等大酒商以卖酒称霸于长安，百姓痛恨不已，可见其势力庞大到何等程度。东汉时地主田庄所需之酒多为自酿，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就有反映地主田庄自行酿酒的内容。民间的酿酒作坊多是自酿自卖，规



模不大，但数量多，分布广，流传于世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中就有司马相如因家境贫穷，卖掉车马，买一酒店，身为贵族小姐的卓文君当垆卖酒，司马相如身穿“犊鼻裤”，与庸保一起酿酒的情节。四川等地曾出土多块酿酒画像砖，都反映了这种酒肆作坊的形象。1979年新都县出土的酿酒画像砖，画面正中为一酿酒大缸，一人左手扶缸，右手在缸内操作，似在和曲或搅拌，其右一人似在协助酿酒。灶前为一座酒炉，内有三酒瓮，左上部一独轮车上载一方形酒器，一人推车离店；下部一人肩挑酒瓮，回首与店主道别，再现了佳酿旺销、应接不暇的民间酒肆贸易盛况。

秦汉时期酒按原料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谷物酒，一类是果酒或水酒。酿酒的主要方法是曲酿。这一时期由于造曲技术的发展，不仅曲的品种增多，质量也在逐步提高，因而酒的度数也有所增加。西汉时期，粗米二斛可得成酒六斛六斗，出酒比率很高，当时人多能食酒数石而不醉。东汉以后，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尊，粟米一斗

盐场画像砖

东汉

1954年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
高41.2厘米，宽46.5厘米

酿酒画像砖

东汉

1954年四川彭县出土

高28.4厘米，宽38.3厘米
这块画像砖再现了当时小酒肆作坊生产与销售的情景，也反映了汉代饮酒风气之盛和四川酿酒业的发达。



得酒一斗为下尊，出酒比率明显降低，开始出现了一些度数较高的酒，人们已经认为“美酒为毒，酒难多饮”。

酒类品种的增多，是汉代酿酒技术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河北满城汉墓陶器文字中有“稻酒一石”，马王堆1号汉墓竹简中有“米酒”等，是以酿酒的主要原料命名的。以酿酒所用的配料命名的，如“兰英酒”、“菊花酒”等。以酒的色味命名的，如马王堆汉墓遣册中的“白酒”等。以酒味称呼的，如河南洛阳金谷园汉墓陶器文字上的“甘酒”、河北满城汉墓陶器文字上的“甘醪”等。一些地方还出现了特产的名酒，远销他地。

秦汉时期酒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影响了农业生产或造成了谷物的大量耗费，政府曾屡次发布禁酒令，同时封建统治者为扩大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一度实行酒类专卖，这些

都从侧面反映了秦汉时期酿酒业的长足发展。

第三节 丰富精致 ——秦汉衣食住行

衣食住行是反映社会发展状况、时代文明的重要部分。秦汉时期的服饰，质地精良，式样繁多，花案丰富多彩。秦汉时期的饮食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多元化的饮食模式已经形成，除传统的主食品种外，肉食的比重有了较大增加，品种不断创新，烹饪技术大为进步。秦汉时期人们的居住状况大为改善，中国传统的三合院或四合院的住房布局，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楼阁式建筑在汉代得到了普遍发展，居室内的各种摆设也是琳琅满目，在制作技巧和意匠上，都令人叹为观止。秦汉时

期无论是陆上的车骑还是水上的船只，制作技术都大有改进，使人们的出行更为方便。

一、衣

恺撒（前100—前44）是罗马帝国显赫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他不但是一个政治上的独裁者，而且是一个感情丰富、爱好打扮的人。有一次他身穿一件丝绸制作的长袍，出现在罗马剧场，那轻柔光亮的质地、轻盈飘逸的效果更让恺撒显得与众不同，剧场的人顿时对这件丝制长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那简直是“天堂上才有的东西”，因此称恺撒穿的丝制衣服为“天衣”。没过多久，在罗马帝国贵族当中，穿丝绸制作的衣服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也成为当时罗马人追求的一种时尚。罗马人称这种衣料为“西尔克”（Silk的译音），认为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生产“赛尔”（Ser）的“赛里斯国”（Serice）。这个被称为“赛里斯国”的国家就是中国，在罗马人心目中，那是一个神秘的国度。

在中国浩瀚的史籍中，虽然没有记载与

恺撒同时代的帝王们身着丝绸衣服的潇洒姿态，但所幸的是在湖南马王堆一个官爵为轪侯的贵族及其妻的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的丝绸衣服，让我们能一睹秦汉时期人们衣着上的风采。

中国在西周时代，贵族的服装不外乎冠



湖北云梦大坟头6号西汉墓
穿深衣的女子形象



素纱禅衣

西汉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
身长128厘米，袖通长190厘米

“信期绣”茶黄罗绮锦袍

西汉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
身長155厘米，袖通长243厘米

冕衣裳。所谓衣裳，指上衣下裳，是一种上下身不相连的服装。到战国时期，一种新式的、将上衣下裳连在一起的服装开始流行，称为深衣。战国时期的深衣以曲裾沿身体缠绕数层，将身体全部遮掩，深邃而严密，身分越高的人，曲裾缠绕越多。从战国至汉朝，上自百官，下至平民，都以深衣为常服，皇帝平时也

穿深衣。然而，深衣紧裹身体，行动不便，又浪费布料，不适合汉朝贵族讲究宽松、享乐的生活风格。因此，秦汉时期，贵族开始对深衣进行改革，形成了秦汉时期通行的袍服——禅衣、檐榆和袍。

禅衣是单层的薄长袍，是秦汉时期贵族日常穿的衣服。西汉初年禅衣是民间的常服，大臣们上朝奏事不能穿禅衣。汉武帝时期，大臣江充很受汉武帝的器重，有一次，他要到大台宫面见汉武帝，托人向武帝请求，想着禅衣去见皇帝。汉武帝答应了。江充身穿用绢纱做的禅衣，合身轻巧，再配上以方目纱所做的步摇冠和轻逸的纓带，大有飘然若仙的风姿，让汉武帝也大吃一惊，因而赢得武帝的好感，大受信用。到了东汉时期，禅衣已由一般常服变为武职官员的正式制服。制造禅衣，既有用高级丝绸的，也有用本色麻布的，穿着范围很广



“信期绣”绢手套

西汉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
长24.8厘米，上宽9.4厘米，
下宽11厘米



朱红罗绮绵袍

西汉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
身長140厘米，袖通長245厘米

泛。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了两件禅衣，是由素纱做成的，素纱是做夏服和衬衫的一种讲究而流行的衣料。其中的一件禅衣，身長128厘米，双袖通長190厘米，重仅49克，“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是目前考古发现最轻的衣服。

檐榆是禅衣的另一种样式，是一种更为宽博的长袍。檐榆有的是用厚丝绸做的，也有用毛织物做的。张衡的《四愁诗》中有“美人赠我貂檐榆”的诗句，说明檐榆有用貂皮做的，这种檐榆既实用，穿上又显得华贵无比，多用来当外衣，以御春寒秋凉，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墓画像石中的人物，服装特别宽大，就是檐榆的具体形象。

袍的形制和禅衣、檐榆同，所不同的是袍有里有面，所以也称为复袍。袍不仅是夹衣，在许多情况下还填有绵絮，是冬季的服装。凡

是用新绵之细长者所填制的袍，称为纁袍，为上层人物所服用。而用旧絮和新绵之短粗者所填制的袍，称为缊袍，为一般平民所穿，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线刻人物和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中的人物，很多都着这种袍服。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代贵妇的丝绵袍，竟有素绢丝绵袍、朱罗丝绵袍、绣花丝绵袍，黄地素缘绣花袍，泥金银彩绘罗纱丝绵袍、泥银黄地纱



锦鞋

东汉
193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楼兰遗址出土
長23.2厘米，寬7.5厘米

汉代画像石上着短襦合裆裤的武士形象



河南新野张楼村汉代画像石上着袿衣的舞蹈者



袍、彩绘朱地纱袍、素罗丝绵袍等十余种之多，同时还出土了穿衣木俑，所着服装也有罗袍和泥银彩绘袍。这些袍均做工精巧，用料考



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墓画像石上着檐褕的人物形象

究，纹饰繁复华丽，反映了当时贵族阶层对服饰的一种奢靡追求。

两汉时期经过改革的这三种袍服，摆脱了战国时期深衣的束缚，不仅穿着舒适，而且所用布料比深衣节省四成。三种袍服适应了一年四季的需要。汉高祖刘邦为沛县人。沛周时属宋国管辖，当宋为齐、楚、魏三国所灭后，转为楚国所有，刘邦是在楚文化的氛围中成长的，他始终崇尚楚俗，喜好楚歌、楚舞、楚服，而楚服多为短衣。当儒生出身的叔孙通面见刘邦时，身着褒衣大袍的儒服，刘邦看了很反感。叔孙通为了逢迎刘邦，立刻改变服装，身着短衣，刘邦转怒为喜。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因此汉代宫廷崇尚短衣，襦自然成为贵族子弟中最受欢迎的便服。襦是一种及于膝上的短夹外衣。穿襦时下身必须着裳或裤，在汉代男子上身穿襦，则下身必穿合裆裤。合裆裤较短，当时称为“穷裤”，西汉空心砖上出现过穿短襦和合裆裤配合的形象，但更多的是襦服和长裤相搭配的形象。女子上身穿襦则下身着裙，当时不但一般妇女穿襦、衫、裙，就是皇后和贵族官僚的妻子也如此。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贵妇穿的裙子实物，式样与后世不同，用素绢制作，四幅连接拼合而成，不施边缘，裙腰用绢条，两端缝有系带。1957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中出土了襦裙实物。襦以浅蓝色绢制造，中纳丝绵，袖端接一段白色丝绢。裙子特点是用黄绢制造，也纳有丝绵。到东汉以后，妇女好穿长裙，而上身襦、衫甚短，裙式多样。如当时加以褰绹的留仙裙，一直传到后世。浙江绍兴东汉墓出土铜镜上的舞女纹饰，即身穿长袖衣，下着细绡裙。汉代还有一种更为飘逸的裙服——袿衣。这种裙服战国时期已经出现，被作为上等服饰，是当时妇女的一种盛装，汉代更加繁杂华丽，衣上增加了缵制的缘饰，缘饰有燕尾式和飘带



“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袜

东汉

195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丰尼雅遗址出土

长43.5厘米，宽17.3厘米

式两种。汉代画像砖、石上的舞伎常穿袿衣。可以想象舞伎身着袿衣舞蹈时体若游龙、飞带飘逸的迷人姿态。这种服饰在南北朝时风行一时。

汉代贵族们的服装讲究整体效果，配套的鞋、袜、手套等，花纹图案和色彩都与服装协调搭配。夏季以丝绢为主，色彩淡雅。冬季以厚锦和织绣为主，色彩热烈艳丽。汉代人们在正规一点的场合都穿履。古代的贵族、官僚们穿的履是很讲究的，用金线或绣有花纹的高级丝织品作缘，一般的履也用带花的布帛或绦带缘边。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丝履实物，呈菜绿色，履面用丝缕编织而成，形制为方口，口沿前部缘宽边，履底用麻线编织而成，头部翘起两尖角。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出土的履是用麻制成。它和马王堆出土的青丝履一样，底部有所磨损，表明死者生前穿过。汉代人入室脱履，在室内活动时一般着袜。考古发掘曾多处出土过汉代的袜子。如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过西汉绢袜，新疆民丰东汉墓则出土过“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袜。

二、食

（一）饼饵麦饭甘豆羹

《急就篇》是西汉人史游编写的一本类似儿童启蒙读物的篇章，其中在描述“野人农夫”常吃的食物时，曾用“饼饵麦饭甘豆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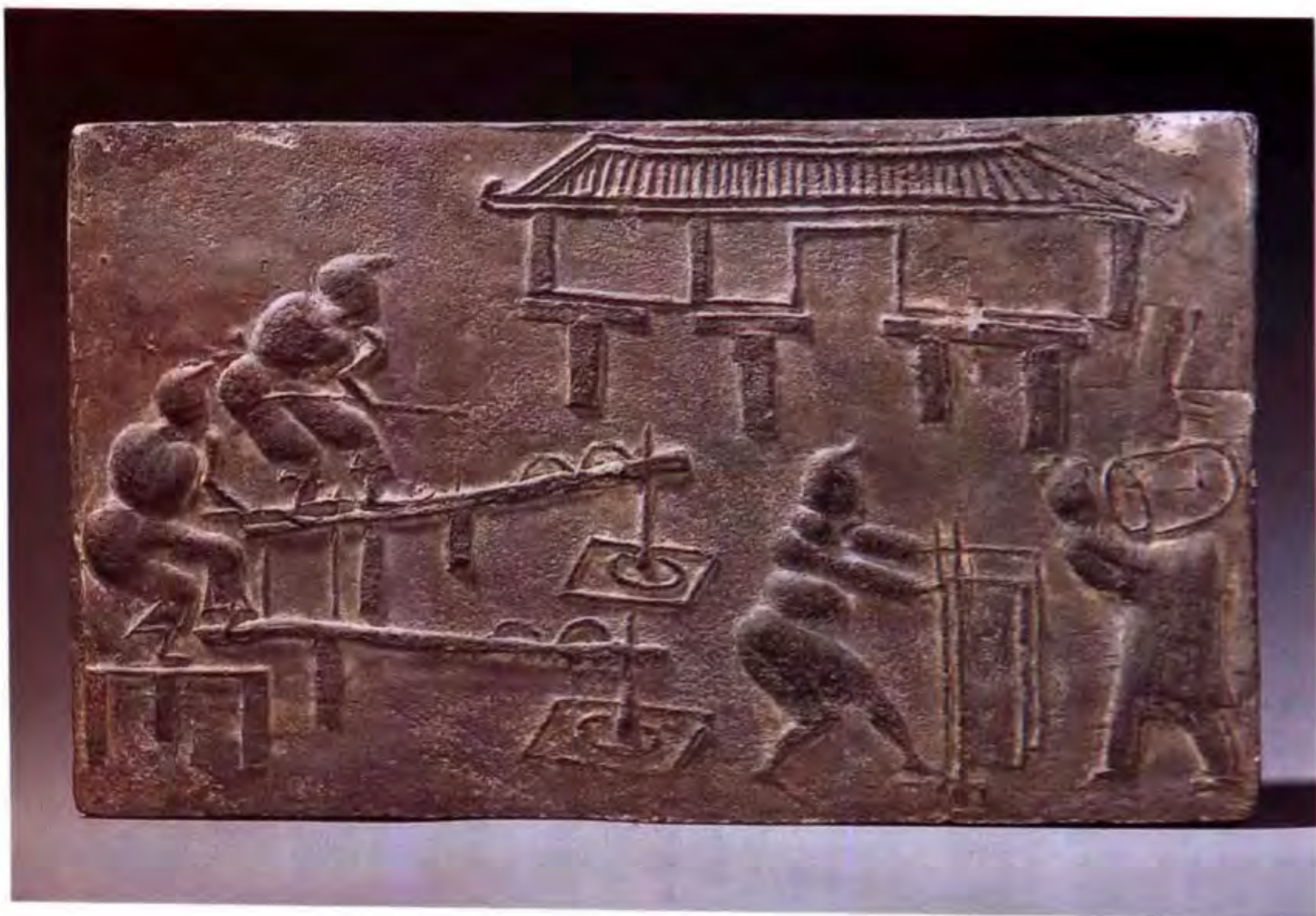
来概括。秦汉时期人们还认为吃饼饵麦饭会增加人的体力，所以从西汉开始，饼食成为整个黄河中下游流域人民的普通主食。

在古代一般将谷物粉面制成的食品统称为“饼”。古代饼所指的范围远远超过今日饼的涵盖范围，饼的品种五花八门，主要按照制作方法和添加原料来命名，如用蒸法制成的叫作蒸饼，用水煮的叫作汤饼，用火烧烤而成的叫作烧饼，添加芝麻的叫作麻饼或胡饼等等。晋代有个叫束皙的文人在他的《饼赋》中对当时士大夫之家烹饼、食饼的情景有生动的描写。他用“弱似春绵，白若秋练”来形容饼的形，用“面弥离于指端，手萦回而交错”来形容做饼人的动作，用“气勃郁以扬布，香飞散而远遍”来形容饼的香味，用“行人失涎于下风，童仆空嚼而斜眄；擎器者舐唇，立侍者干咽”来形容饼的美味对人们的诱惑，可以说把饼提到了一种美食的高度。当然像这样的美食皇族贵戚是不会错过的。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就十分喜欢吃饼，刘邦当上皇帝以后，将他的父亲从故乡沛县接到了长安皇宫内，想让他享受一下太上皇的富贵生活，却没想到这位太上皇不习惯皇宫内烦琐的礼节，总忘不了在故乡那悠游自在的生活，更怀念故乡那一口好吃的饼。刘邦只得下令将沛县的屠夫、卖酒店家等商贩统统迁到关中，在离长安不远的地方新建起一座县城，取名为“新丰”

舂米画像砖

东汉

1955年四川彭山出土
高25厘米，宽39厘米



县”，这些远道而来的商贩中，自然少不了卖饼的。由于饼是当时人们普通的主食，需求量很大，所以东汉时期，通过卖饼致富的人确实不少，史书上就记载有“莽之世，卖饼小人皆得等级”的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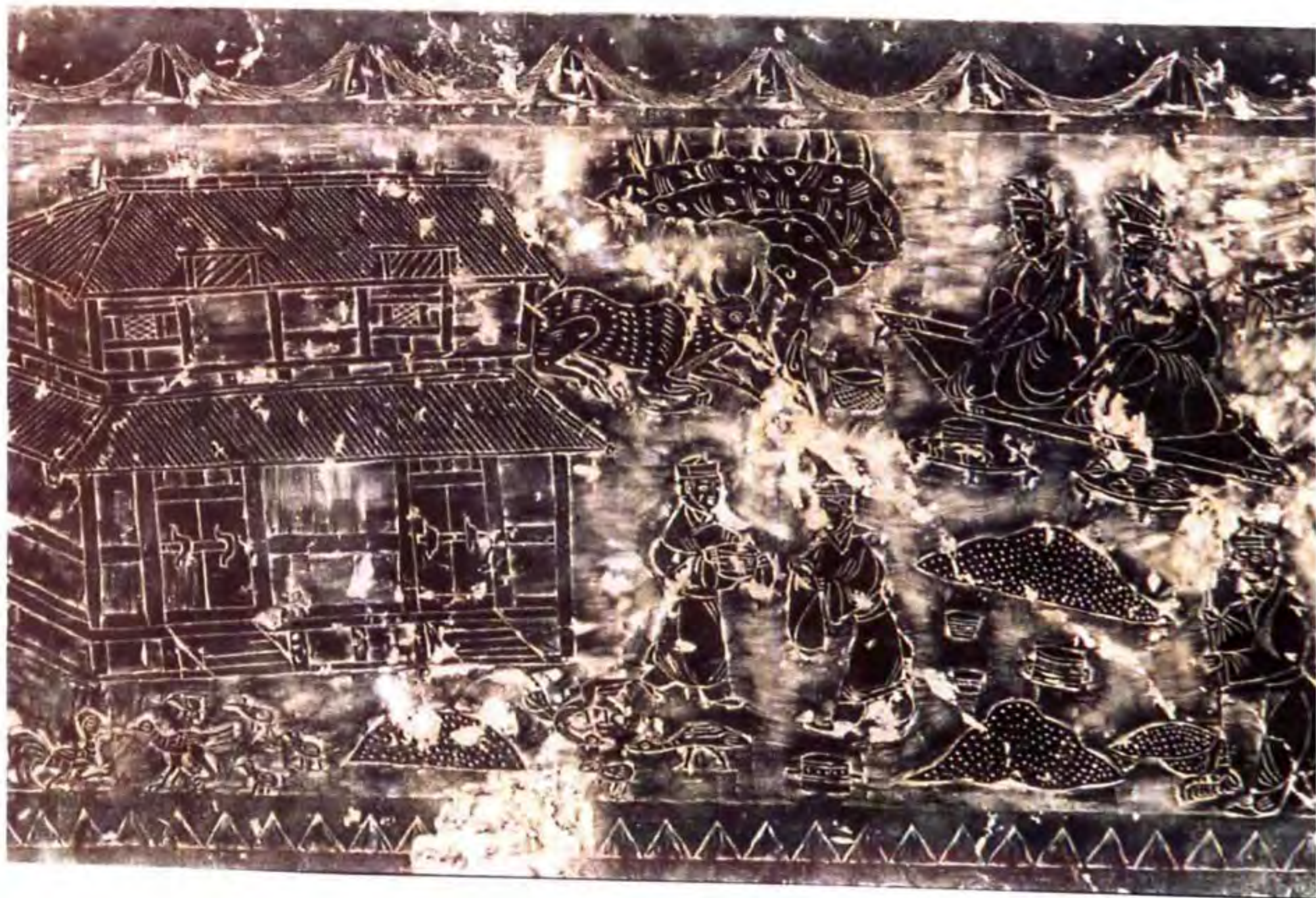
饼中尤值一提的是胡饼。中国古代常把西北临近的少数民族称为胡人，张骞通西域后引进了“胡麻”（即芝麻），将其用以烤制成烧饼便成了胡饼。胡饼一经传入内地，便深受人们欢迎，而且经久不衰。东汉末年的灵帝喜

宴享画像石拓片

东汉

1954年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出土

这块画像石的左半部是墓主人席地而坐，旁边有仓楼、粮堆和运粮车。右半部是厨房、灶、井及各式器皿，多人抬猪、杀牛、宰羊、烧水、蒸饭、炒菜、备酒等。画面反映了豪强大族的饮食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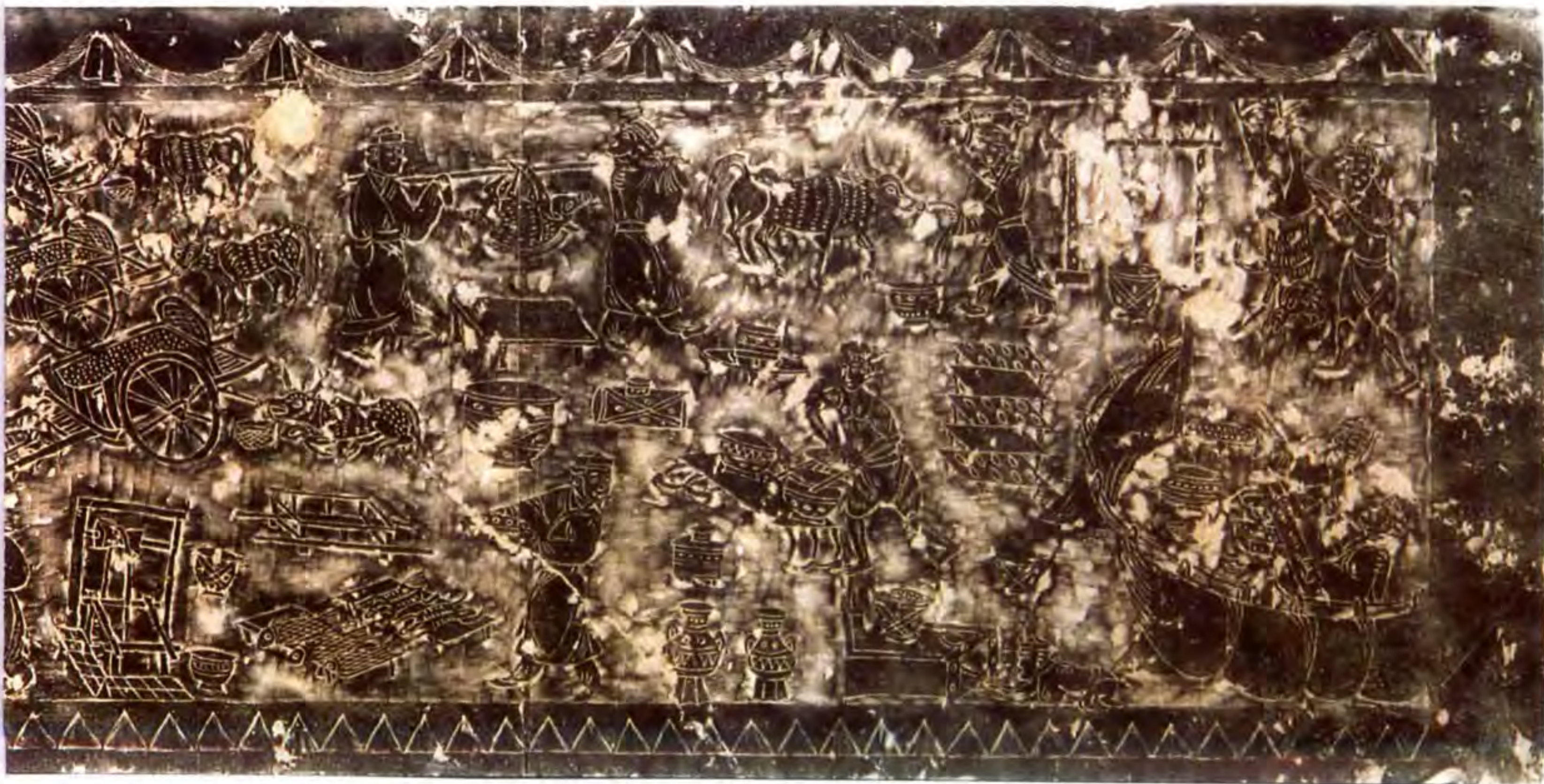
欢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舞、胡饭等等，京师贵戚也都学着他的样子，一时大吃胡饼成为风气。史书在总结汉亡教训时，就曾将灵帝喜爱胡饼，说成是汉室灭亡的先兆。东汉末年，吕布的军队出征，当地的官员做了一万个胡饼犒劳吕布的军队，可见当时制作胡饼的能力已很强了。崇尚胡器胡饼的风气在西晋时期还很流行，一些人还批评把胡饼摆在饮食的第一位，如此本末倒置，因而引来外来侵略，这是汉亡的覆辙。但客观地说，胡饼不仅刺激了汉天子和贵族们的胃口，也是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饮食文化的大交流。汉代人讲究饮食营养，还曾制作了髓饼，以动物的油脂作添加料，合面而制成饼，不仅丰富了口感，也更有营养。

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秦汉时不同地区的主食各具特色。黄河中下游地区以麦食为主，而江南和巴蜀一带，则以稻米为主。由于稻米加工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等级的稻米饭。如199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在沅陵虎

溪山清理了一座诸侯王家族墓地，出土了约三万字的竹简，其中有过去从未发现过的《美食方》，亦即食谱大全，它详细记载了做饭与菜肴的操作方法。其中有些标题称“为中粢饭方”、“为中黄饭方”、“为稻黍方”、“为狗芥苳酸羔方”等。《美食方》这种内容的简牍，在《汉书·艺文志》里也未见有记载。当然，南方也吃饼食，如湖南马王堆1号墓东边箱所出漆食奁中就盛有饼。

秦汉时期的副食主要有蔬菜、肉食品和豆腐。汉代的蔬菜品种很多，目前仅在考古发掘中就发现有葵（长沙马王堆1号墓曾出葵籽）；居延汉简的“治园”记事中，记载了葱和韭的种植；江苏邳江西汉墓曾出土菠菜籽；马王堆和邳江还出土过芥菜籽；广西贵县出土过黄瓜籽；甘肃泾川水泉寺东汉墓出土的陶灶上有浮雕的萝卜；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中则出土了不少蔓菁。因此，秦汉时期可被视为蔬菜的形成时期。

在汉代的副食中，豆腐是特别值得一提



的。相传豆腐是由西汉淮南王刘安发明的，初名“黎祈”。宋代著名学者朱熹有诗云：“种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术，安坐获泉布。”朱熹注解：“世传豆腐本为淮南术。”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豆腐之法，始于淮南王刘安。”有些专家认为河南密县打虎亭1号汉墓画像石的庖厨图中，就有做豆腐的画面，表现的是豆腐作坊中制作豆腐的主要工艺流程，有浸豆、磨豆、滤浆、点浆、榨水等过程。该墓的年代为东汉晚期，据此推断制作豆腐的工艺至迟于汉末已在中原地区得到普及，被作为日常的饮食活动表现在画像石上。持不同意见的专家认为这块画像石描写的不是豆腐的制作工艺，而是一幅酿酒图。豆腐的发明在饮食生活史上值得大书一笔，这种营养丰富的副食品受到世人的普遍喜爱，盛行古今，有“国菜”之称。

（二）铜染炉之谜

出土于河南陕县的铜染炉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汉代饮食器具，看到这件不

起眼的文物，您一定会产生疑问，无论从文物的定名，还是从文物的器形来说，好像都与饮食没有很大的关系。但确实是这样一件普通的器物，使人们对汉代的肉食品种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这类器物的探索和研究，也凝聚了几代学者的心血。

类似的器物在湖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河北、四川等地都有出土，时间都属于西汉中晚期，表明这种炉具在历史上流行的时间虽不算太长，但地域分布却很广大，使用比较广泛。这种炉具为青铜铸成，构造分为三部分，主体为炭炉，下面有承接炭灰的盘，上置盛器耳杯。有的炉具还饰有精美的雕饰，铸有力士和四神像，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对这种器物的名称及用途，学术界曾有一番争议。考古发掘中较早见到的这类器物，有学者认为它用于温热肉羹，因此称之为“烹炉”；炉上的耳杯同西汉时期通用的酒杯形状一致，有人称之为“温酒炉”；还有学者以为它是一种室内陈列用品，作熏香之用，定名为“熏

铜染炉

西汉

1956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高13厘米





庖厨画像砖

东汉

宽40厘米，高25厘米

在中国许多地方的汉墓中都发现有庖厨图，主要内容大致相同，仅有详略之别。这反映了汉代这些地区庖厨饮食习俗的基本一致性。从庖厨图看，汉代对肉食的加工方法主要是炙和蒸煮，炊具主要是灶、釜和甑。

炉”；因为有的器物上有带“染”字的铭文，有学者认为这种炉具是汉代贵族家庭染丝帛所用的器具。对器具定名的不统一，导致了对其

用途的误解。容庚先生根据两件传世炉具的铭文“平安侯家染炉”和“史侯家染炉（杯）”，把这种器物定名为染炉和染杯。容庚先生给



献食陶俑 庖厨陶俑

东汉

1957年四川重庆化龙桥出土
分别高38.5厘米、38.3厘米



汉代画像石上的“烤肉串”图

染炉的定名，为人们了解染炉的用途提供了更好的依据，也丰富了人们对汉代调味品和肉食品种的认识。其实，这种染炉既不是温酒器，更不是染色器，而是一种食器，是专作温食豉酱用的。染，指食品调味，汉代用食时，调味品常盛于耳杯中，长沙马王堆1号墓第195号遣册中就记载有小耳杯20件，其中两件盛放酱和盐。湖北云梦西汉墓出“土木方”中也有“酱杯十”的文字，说明染器是供加温调味品用的，故为王室典膳之食官所掌管。

酱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烹饪调味品，汉代

人普遍食酱，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传食律》中，规定了驿传人员的食品定量，其中就包括酱。到西汉出现了用大豆和面粉等加盐发酵而制成的调味品——豆酱。在此基础上，东汉时期产生了豆酱油。豆豉是秦汉时期发明的一种调味品，汉代曾出现“鲁门豆豉”这样的名牌产品。史书中也记载了有人以卖豆豉而成为闻名天下的富翁。从中可以看出，豆豉在当时的生产规模与销售数量之大，说明豆豉作为一种调味品，在当时已经深受人们欢迎。豆豉的作用在于能调和五味，使菜肴增鲜生香。这件铜染炉就反映了汉代人食用豉酱的习俗，它的用法是在耳杯中盛放豉酱等调味品，炉下生火，为调味品加热，食用时把肉食放到调味品中涮食。出土的铜染炉体量都很小，染杯的容量一般只有250毫升—300毫升；整套染炉全器加起来，高度也不过在10厘米—14厘米之间，十分精巧。这很符合汉代人的饮食方式，当时的人们是分餐制，一般是一人一案。有的染炉和染杯上还刻有顺序编号，宴饮时一人一套，随吃随“染”，有点类似现在人使用的小型火锅。

汉代的肉食除这种涮食法之外，上层社会还流行以烤肉佐酒。《西京杂记》说，汉高祖刘邦早年当泗水亭长时，曾遣送一批民工到临潼骊山修建秦始皇陵，临别时民工们送他两壶酒和烤鹿肝、牛肝各一块，当时他就与随从们高高兴兴地吃了喝了；后来刘邦做了皇帝，还念念不忘这件事。又据《独异志》所传，东汉光武帝刘秀一次食烤肉时，见肉上绕有发丝，差点杀了太官令。在汉代画像石上，庖厨和宴饮是经常表现的内容，其中庖厨活动似乎表现得更多。1967年，在山东诸城前凉台西村发现了一座东汉时代的大型墓葬，在高1.52米、宽0.76米的石面上，匠人以阴线刻画的手法，描绘出一个庞大、复杂、丰富、

忙碌的庖厨场面，集酿造、杀牲、烹饪活动于一石，把东汉时代士族豪强奢侈豪华的生活从厨房内外生动地刻画了出来，恰是一幅精彩的连环图式的庖厨鸟瞰图。在这幅画上有生动的烤肉场面，画面上有四人在操作烤肉，最下面的一人跪立地上，面前放有一大盘碎肉块，他正在将肉块穿在签子上。他的身边还有一个大圆盘，放着已经穿好的生肉串。这人的近旁，是一架长方形烤炉，炉上正烤着五支肉串。烤炉跟前跪立着一人，只见他左手翻动着烤炉上的肉串，右手打着扇子，扇旺炉中火，神情专注。山东长清孝堂山祠堂西壁有一幅“胡汉战争图”，在图的下方刻画了两名胡人围着一个带脚的四角形烤炉，正在炙烤着肉串。在祠堂上能出现这样的画像内容，说明烤肉串的食法已被当时社会普遍接受。汉代吃烤肉也并不只是肉串一种，有时也直接烤食大块的肉，烤熟了用刀割来吃。如1957年在河南洛阳发掘的一座西汉墓葬中，墓室壁画就描绘有烤肉块的场景。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铜烤炉，炉内有用来烧烤整只家禽的二股和三股的铁叉，铜烤炉在出土时，炉内仍留有若干骨头，炉上配备多种供烤炙用的零件，有悬炉用的铁链、烤肉的铁钎和长叉。有趣的是小烤炉的炉壁两侧铸有小猪四头，仰置，四足



朝天，中空，用以插放烧烤用具。由这种装置的外形，可以看出烤炉主要应是用于烧烤乳猪的。

庖厨图画像石（拓片）
山东诸城前凉台西城出土



铜烤炉与铁叉
西汉
1983年广东广州南越王墓出土
长61厘米

（三）天之美禄

汉代的饮料主要是酒，汉代人称酒为“天之美禄”。汉代有不少嗜酒成性者。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早年就是一个酒色之徒。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曾被称作“醉龙”。出土的汉代砖石画像、帛画、壁画上，多有酿酒和沽酒的内容，也有大量的酒宴场面。人们生时畅饮不够，死时还要以酒随葬，考古发现的许多书有酒名的酒瓮便是明证。河北满城发掘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摆放着三十多个高达70厘米的大陶缸，缸外书有“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黍酒十一石”、“稻酒十一石”等字样。据估计，这些陶缸的贮酒量合今一万斤以上。洛阳烧沟汉墓群出土有大批陶瓮，其中多为贮酒器。这些陶瓮一般都高达五六十厘米，有的外壁上明显写有酒名，或刻有贮酒的石数，内壁还附有黄色残渣，是盛过酒的遗迹。汉代人的饮料还有浆。河北满城汉墓出土了一件石磨，称为湿磨，出土时放在铜

漏斗内。根据复原图，它应由木架支撑，漏斗下置容器以容纳磨成的米浆或豆浆。

汉代流行漆制的饮酒器。公元353年暮春之初的三月三日，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和当时的名士谢安、孙绰等四十二人，会聚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酒会。他们面前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溪水，水面上漂着一只有两耳的椭圆形酒杯，酒杯顺着清清的溪水漂流而下，漂到谁面前，谁就拿起一饮而尽，并借着酒兴吟诗咏怀，这就是盛行于汉魏南北朝时期一种独特的饮酒习俗——曲水流觞。流觞的酒杯就是漆耳杯，因它的双耳形状如羽翼，又叫“羽觞”。这种独特的饮酒习俗在魏晋南北朝的壁画中也有反映。1968年江苏丹阳县南朝墓葬中出土了砖刻壁画《竹林七贤图》，画面上山涛留着长胡子，赤脚曲膝坐在皮褥子上，手拿耳杯饮酒。这种耳杯以汉代漆制的最为精致。秦汉时期中国漆器制作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漆器具有

长沙王后家漆耳杯

西汉

湖南长沙出土

长11.4厘米，高2.7厘米





鸟篆文铜壶

西汉

1968年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
高40.5厘米

铜器所不具备的绚丽色彩和轻巧精致。漆器取代青铜器用于饮食始于秦，盛行于汉魏两晋，有盛酒用的漆壶，饮酒用的漆耳杯、漆卮等。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的秦墓中就出土了许多漆器，其中仅耳杯就有23件。长沙马王堆汉墓、扬州西郊汉墓和临沂金雀山汉墓等墓葬，出土的饮食器已经全是漆器，无一件青铜酒食器具。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耳杯，长11.4厘米、高2.7厘米，浅赭色地，黑漆绘云鸟纹，纤细流畅。耳杯一侧近底处有“长沙王后家杯”六字，说明耳杯是专为软侯利仓家制作的。马王堆1号汉墓共出土耳杯90件，其

中40件漆书“君幸酒”三字，50件漆书“君幸食”三字，意思是请使用者饮酒、进食。漆耳杯作为一种酒器，虽然没有铜器那样经久耐用，但其华美轻巧，别具一种高雅秀逸之美，摆脱了青铜器所造成的庄重威严的饮食气氛。

汉代的酒器中，漆器取代了铜器的地位，越来越受到贵族们的青睐。但汉代少有的青铜酒器也有它的时代特点，其造型已摆脱商周青铜器神秘、厚重、古拙的风格，显得灵便、轻巧，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需要。纹饰虽简素，但通过鎏金、鎏银以及用金银、玻璃、宝石之

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西汉

1963年陕西兴平出土

高34.1厘米，长58.1厘米

中国古代做成动物形的酒尊不乏其例，如商时期铜器中的牛尊、象尊、豕尊等，周代铜器中的驹尊、兔尊、鸭尊等。到了汉代，肖形尊虽已不太流行，但仍为人们喜爱。



类镶嵌花纹使铜器变得华美、富丽。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鸟篆文铜壶可以代表汉代青铜酒器的最高水平。中山国是汉代诸侯国中比较大的一个，在今河北省境内。刘胜是西汉中山国的第一代王，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中山王。他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庶兄。史书记载刘胜为人“乐酒好内”，其墓中出土了十六件留有酒痕迹的大陶缸，还有许多精美的青铜酒器，都是他生前嗜酒和追求豪华的物证。这件鸟篆文铜壶，高44.2厘米，腹径28.5厘米。壶盖中心饰一蟠龙，壶身用金银错出各种图案，除怪兽纹、云龙纹外，还有鸟篆文装饰，都是心情美好聚会饮食、长命好免病、万年也不过量之类的祝福语。古代诗人饮酒，往往多着眼于饮宴场面的热烈与欢快、饮酒的美妙意境，而刘胜铜酒壶上的颂酒诗，则一语道明饮酒有“充润肌肤，延年祛病”的好处，这是中国以酒为药、养生祛病食疗保健法的较早记录。鸟篆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美

术文字，字体华丽、繁复，其笔画在篆书的基础上装饰鸟纹，宛似流云。这件壶上的纹饰，以金线为主，银线辅之，纹饰精细，别具风格，显示了两千年前中国工匠在金属细工方面的卓越技艺。

（四）火灶南北两大体系的形成

烹饪对火源热能的利用，主要是通过炉灶实现的。旧石器时代人们的烹饪是在篝火上进行的，那时尚无陶器，多采用直接烧烤的方式得到熟食。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将篝火搬到了居址内，这就是火塘的由来。比如仰韶文化时期许多房屋的中心部位都掘有一个圆形和瓢形火塘，也有少数火塘为方形。火塘的位置一般都面对着门道，是室内惟一的设施。火塘边上，有时还埋有一个装满炭灰的火种罐。高台火灶的始造年代，大约不会晚于战国时代，战国时的秦人已有了高台火灶，他们最先将陶火灶模型作为随葬品埋入墓中。秦汉时期的大、中型墓内，随葬陶灶之风流行，这是



陶灶

东汉

1955年广东广州东郊先烈路
出土

高26厘米

为了保障死者在冥间仍能享受到美味佳肴。从出土的大量陶灶中可以看出秦汉时期火灶的时代特点与地域特点。秦人的火灶样式，平面近似马蹄形，前有火门，后有烟囱，灶面有三个火眼。西汉时期的陶灶多以长方形为主，即所谓方头灶。比较明显的变化是：烟囱明显增高；火门上方出现高出灶面的挡火墙；少量灶面上还堆塑刻画食物形状，生活情趣很浓。东汉时代的陶灶已有明显的地区差别，南北两个系统开始形成。从平面上看，北方多前方后圆式的圆头灶，而南方多见尖尾弧背式的船形灶。不论南北，灶面都较以前更富有装饰性，上面模印或刻画出鱼鳖、蔬菜和各种厨具图形，有的在火门一侧还塑有庖人、家畜乃至油耗子的形象，生动自然。火灶南北两大体系的形成，既是传统力量制约的结果，也是饮食习惯和方式上存在的差异造成的。

三、住

（一）高楼连阁

中国城楼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汉代得到了普遍发展，西汉城楼已高达三层。而且西汉时皇帝崇信神仙方术之说，认为建造高大的楼阁可以会神仙，据记载，汉武帝在长安西郊建章宫内建造的楼高达五十丈。不过西汉时，为技术水平所限，建筑高楼常采用井干式，就是一种不用立柱和大梁，而是用大木平行叠置而成的房屋结构，这种建楼方式既浪费木材，楼的外形也缺乏变化，无论在建筑技术和造型艺术上，都落后于东汉的构架式楼阁建筑，所以当时高台建筑仍很流行。从东汉开始，由于木结构和施工技术的提高，除了满足特殊的要求外，高台建筑逐渐减少，而木构楼阁显著增多，平地起楼，免去了夯筑土台基的繁重工序，可大量节省人力物力，而且构架



陶楼

东汉

1952年河南睢阳出土
高147厘米，宽48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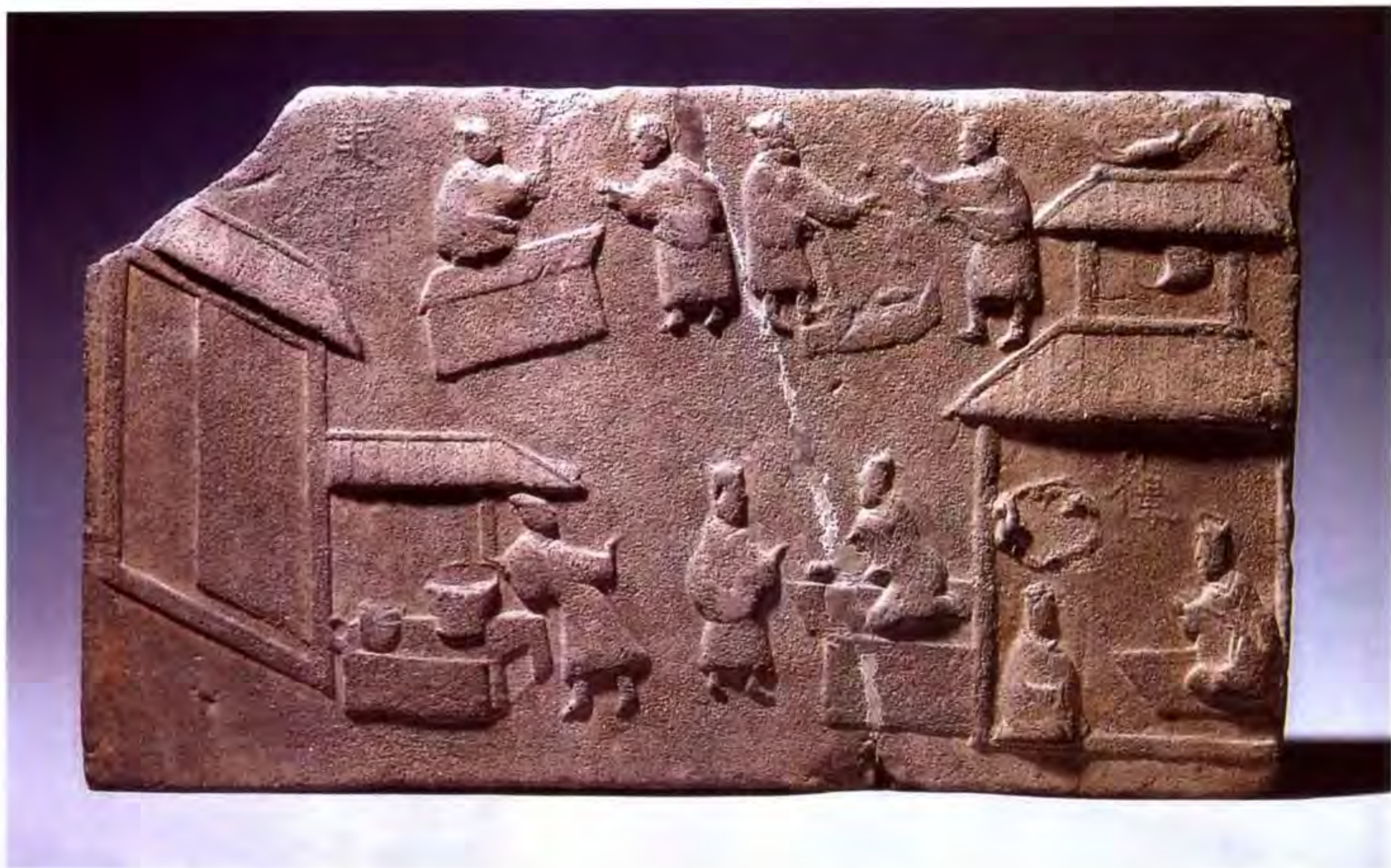
式可使楼阁外貌多样，造型更为美观。有的陶楼在腰檐上置平座，平座上施勾栏，这样既可满足凭栏眺望的功能要求，而且由于各层腰檐与平座搭配方式的不同，或挑出，或收进，明暗虚实错综起伏，使楼的外观具有抑扬变化的节奏感。1954年河南淮阳出土的陶楼，

二、三层楼腰檐上不仅有平座，平座中央放置卧榻，而且在二、三层的四角用了裸体人柱，使楼的外观更具神采。

出土的大量汉代陶楼模型及描写社会生活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等，使我们可以直观地欣赏到汉代楼阁的多样性和艺术性。东汉时的陶楼除用于居住的楼以外，还有城门上用于瞭望的谯楼、市场管理中心的市楼、储藏粮食用的仓楼、登高瞭望的望楼、守御用的碉楼、用于表演乐舞百戏的戏楼，并且根据“仙人好楼居”的传说，建有各种用于宗教活动的楼。东汉后期，佛教逐渐流行，这些用于宗教活动的楼与印度传来的窣堵波上的刹（即相轮）相结合，形成了楼阁式的佛塔。史书上描述得比较具体的最早的佛塔是笮融于东汉末年在徐州建造的，其中描述到佛塔顶上有九重鎏金铜盘（即相轮），重楼下设阁道。有专家认为笮融之塔顶装相轮的做法是汉代木构架楼阁在屋顶装标的发展。笮融之塔在重楼下设阁道，在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陶楼中也得到了形象的体现。楼居的习俗在南方是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的。南方湿热，有建造干栏式房屋的传统，而架高的干栏实与楼阁相接近。干栏式房屋多以下层为畜栏，上层为居室。自干栏式房屋演变出来的陶楼，如广州汉墓所出者，也多以下层为饲养牲畜或春簸粮食之处。有的下层甚至是空的，和畜栏连通为一体，其中不设隔墙，却在四周的围墙上开了不少窦洞。干栏式建筑是越族的主要建筑形式，秦汉时期在岭南地区十分流行，而江苏铜山出土的石刻建筑图像中还见到一件干栏式建筑，房子下用柱子等架空，该建筑的位置可能临水或者就在水面上，是为富人们享乐而设计建造的。

（二）四合院

汉代住宅院落一般都由堂、室构成。1954



年四川成都市扬子山出土的宅院画像砖，是东汉时期一个较为完整的豪强大族的庭院图像。庭院高墙环绕，楼舍齐备，井厨俱全。内院有斗鸡和双鹤对舞，和古诗“鹤鸣东西厢”相应。堂上宾主对饮，主人坐卧的后室则没有明确加以表现。前堂后室、东厨北厢，正是当时官吏豪富的居住建筑物的标准规格。由于石刻画的画幅所限，汉代画像石住宅图往往只展现住宅的局部。即便如此，我们也能看到汉代住宅建筑的多种布局：有方形、长方形、梅花形、曲尺形、“一”字形、“日”字形等，不拘一格，千变万化。山东沂南北寨村出土的陶庭院，由前后两个院落、三排房子组成，每一排房都是五间，是一个典型的“日”字形建筑。“日”字形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列六间的廊房。整座建筑有一条从前大门到后客厅的中轴线，中轴线的左右两侧对称。若以第二排房为横轴线，则形成前后对称。实际上这种“日”字形的布局类似今天的“四合院”。另一种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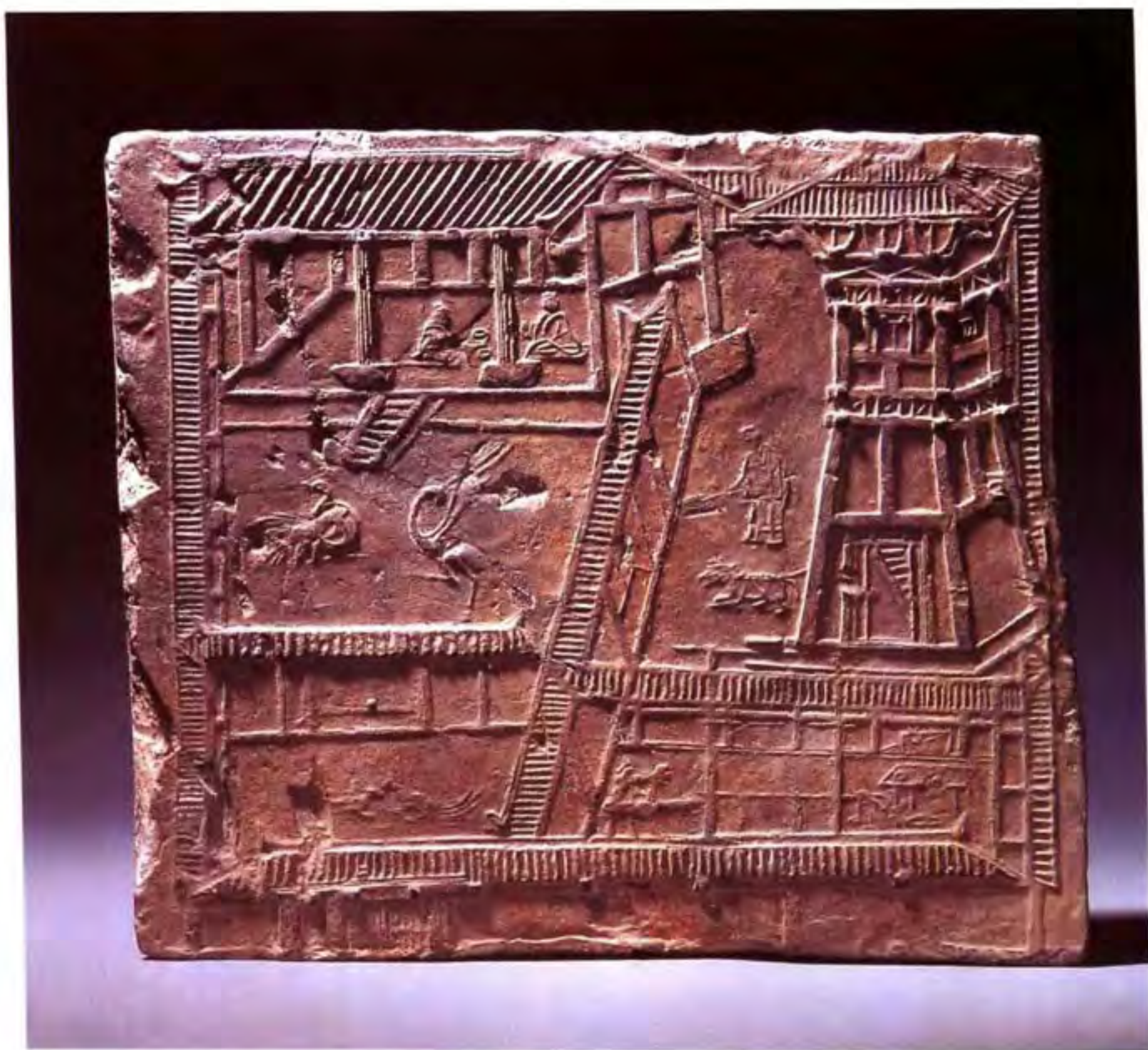
式的四合院建筑在汉代更为常见，它是由门房、厢房、厨房、仓楼、猪圈等部分组成。这种四合院陶楼模型多出土于西汉晚期中小官吏的墓葬中，揭示了当时中小官吏庭院布局和家庭经济生活的面貌。而陕西勉县老道寺汉墓出土的一件陶楼院，由十九件单体建筑组合而成，总面积为126平方厘米。由宅门、院墙、左厢、右厢、正楼为单元的主体四合院和偏门、佣人房、家畜家禽圈为单元的偏院等一整套四合院组成，是结构更为复杂的一种四合院建筑。曲尺形院落是汉代岭南一带房屋建筑类型之一。这种建筑主要由三幢房子组成一个“凹”字形平面，由前堂、后室和天井构成，前堂呈长方形，有俑持筛、舂米、宰羊等等。前面一幢作横的长方形，其余两幢对称于背面的两侧，当中用矮墙连接，构成后院。房屋两侧（或一侧）有走廊，在此设斜梯通往后屋。后面的两屋，一为厕所，一是畜舍，有的畜舍和院落沟通。

市楼画像砖

东汉

四川广汉出土

高28厘米，宽48厘米



宅院画像砖

东汉

1954年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
高40厘米，宽46.4厘米

两汉之交，融住宅、园林、田地于一体的庄园兴起。庄园住宅区不仅有重堂高阁，而且陂池农田环绕其间。武库和岗楼式的望楼是

庄园建筑必不可少的部分。大庄园自给自足，闭门成市，俨然一个独立王国。东汉末年，社会动荡，豪强地主拥有大量土地、附庸和部曲私兵，形成大大小小的武装集团，反映在建筑上，就是一种防御性的建筑物碉楼的出现和普及。汉代陶楼有的立于水塘之中，如陕西省西安市新筑镇三里西村出土的陶水榭，高两层，下层置梯，以登顶层；上层亭内有艺人在表演乐舞，平座四隅均有张弩控弦的武士，如临大敌。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陶碉楼，周围四角各筑有两层的角楼，以阁道互相连接，其防御功能几乎可与广州汉墓所出陶坞壁相比。这组建筑物当中的五层高楼，自二层以上的楼壁均镂出成排的扁孔，可能是射箭用的。这些都说明，东汉末年，从北到南，全国各地的地方豪强势力建造碉楼已成风气。

（三）坐席与镇

汉代室内家具的种类不多，比较讲究的房间里，也不过陈设矮床、几案、屏风等物。



三合式陶屋

东汉

1957年广东广州东郊麻陂岗出土
长31.6厘米，宽25.6厘米，
高23厘米



陶庭院

东汉

1959年河南郑州出土

高76厘米，宽90厘米

席是室内最普遍的家具。中国古代，上自皇帝下至百姓，起居坐卧皆用席。一般居民的席用蒲草、竹或蔺草编制；贵族用席，多加饰边缘，比较华美。长沙马王堆汉墓西边箱内就出土两条草席，以麻线束为经，蒲草为纬，编法与现代草席相近。其中一条包青绢缘，一条包锦缘。后宫用席更为讲究，据记载，汉成帝宠爱赵飞燕姐妹，她们居住在昭阳殿时，用的席子是用熊的毛皮做边缘的，毛长有一尺多，睡觉的时候把这些毛盖在身上，从远处根本看不见睡觉的人；坐在席上，这些毛可以盖住膝盖。这种豪华的席和赵飞燕姐妹受皇帝宠爱的身份是很相称的。为了避免起身落坐时折卷席角，还要在席的四角放置镇。考古发掘充分展示了汉代铜镇是如何不落俗套和变化创新的。各地汉墓所出铜镇，完整的一套皆为四枚，每枚高约3.5厘米至10厘米，底径6厘米至9厘米，重600克至800克，四枚约合2500克至3000克。为了避免牵羁衣物，镇的基本

造型趋向于一个扁圆的半球形。汉代出土最多的是动物形镇，常见的有虎、豹、辟邪、羊、鹿、熊、龟、蛇等。为了保持镇体的半球形轮廓，这些动物常蜷曲成一团，但其身姿并不显得局促。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的嵌贝鹿形铜镇，长10厘米，宽6厘米，高10厘米。鹿作伏卧状，前膝双跪，后腿屈于腹部。其脖颈细长直耸，头部的鹿角刚刚萌蘖，圆睁的双眼和微耸的双耳仿佛充满警觉，即使是伏卧休息，也在密切注视着周围的动静。鹿的背部嵌以有点纹的大型天然贝，贝上的天然涡纹，很像鹿身上的花纹，晶莹斑驳的贝壳与铜铸的其他部分搭配得十分和谐自然，实用性和装饰性达到了完美的统一。熊、鹿在汉代都被视为吉祥的动物。在汉代工艺家的手下，出现了许多憨态可掬的熊的作品。出土于安徽合肥市的鎏金熊形铜镇，肥胖的熊好像在对视而笑，一副愉快的神情。这样的四枚铜镇放在席子的四角，就使汉代较单调的室内布置增添



鎏金熊形铜镇

西汉
1952年安徽合肥出土
高5.2厘米

了活泼的气氛。

与人们席地而坐习俗相搭配的家具——案，是汉代室内常见的一种陈列品。《汉书》记载：东汉隐士梁鸿，受业于太学，后入皇家上林苑牧猪。他还乡娶孟光为妻，隐居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夫妻二人后来转徙吴郡（今苏州），为人帮工。生活虽然艰苦，但夫妻二

人感情很深，梁鸿每晚打工归来，孟光为丈夫端饭菜时，都要将案举过眉头，表示对丈夫的尊敬，传为佳话。这就是成语“举案齐眉”的来历。在汉代墓葬中，经常出土有纹饰华美的漆案，其形状一般可分为矩形和圆形两种，有的平底无足，大多数是安有矮足，矩形的常在四角各装有一足，圆形的则在案下装三足。在案的中央，常绘有精美而繁缛的图案。如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一件案为长方形，平底，底部四角附有矮足，足高仅2厘米，案全高5厘米，案面长60厘米、宽40厘米。面上髹黑漆，用红漆绘出两重方框，然后在案心及两重方框间的黑底上绘红色和灰绿色组成的云纹。底部亦髹黑漆，用红漆书写“软侯家”三字，表明该案所属主人为谁。出土时案上放置着五个小漆盘、一件耳杯、两件漆卮。小盘内盛食物，盘上放有一件竹串，耳杯上放有一双竹箸。这种摆设，表明了当时贵族宴饮时的情形。在汉画中，也可以见到不少坐席对案宴饮

嵌贝鹿形铜镇

西汉
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高9.8厘米





的场面，都是当时案在室内陈列中的真实写照。

（四）灯与熏炉

北宋著名词人晏几道写过这样的词句：“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对于其中的“缸”，后人百思不得其解。《康熙字典》甚至说缸不是灯，是诗人误用。其实缸灯是汉代人新创制的一种灯型，是科学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佳作，真正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环保意识。缸灯是一种带烟管的灯具，烟管有单管、双管两种，能将烟气导入灯腹内，有的灯腹内还贮有水，灯烟溶在水中，可使室内减少烟臭而保持清洁。汉代的缸灯有做成人物形或动物形的，其中有的制作得栩栩如生，达到了绝妙的境界。

1968年河北满城汉代窦绾墓出土一件后来享誉中外的长信宫灯。该灯通高48厘米，外形作宫女跪坐持灯状。宫女右臂高举，袖口形成灯的顶部。左手持灯座，灯座上部所插灯盘

中心有支钉，边缘有凹槽一周，由两片屏板组成的灯罩就嵌于凹槽中。灯座、灯盘、灯罩屏板和宫女的右臂及衣角等处刻有“阳信家”、“长信尚浴”、“今内者卧”等字，表明此灯最初属于阳信夷侯刘揭家，后被没入少府，归长信宫尚浴府使用。长信宫是皇太后居住的地方，汉景帝时皇太后窦氏是刘胜的祖母，因此此灯很可能是窦太后送给窦绾使用的。这件长信宫灯设计十分精巧。从装饰艺术看，此灯真实地再现了现实生活中宫女举灯的神情和姿态，灯的烟管、灯座和灯体巧妙地利用人体的不同部位，造型和动态的处理恰到好处，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全器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个部分分别铸造组合而成，可以拆卸。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节照明度和照射的方向。烟臭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进入体内，使烟臭附着于体腔以保持室内清洁。灯体底部大孔，可以弥补作为单管烟灯空气环流不好的缺陷，对气压可以起到调节

云纹漆案及杯盘

西汉

湖南省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案高5厘米，长60.2厘米，宽40厘米



彩绘铜雁鱼灯

西汉

1985年山西朔州照十八庄出土
长34.5厘米，高53厘米

作用。

除了这种人物形的釭灯外，汉代出土较多的是动物形的釭灯。山西朔县照十八庄1985年出土了一件彩绘雁鱼铜灯。该灯长34.5厘米，高53厘米，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首颈衔鱼、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汉代雁鱼灯，除山西朔州的这件外，还有另外两件，一件出土于陕西神木塔村，一件出土于山西襄汾。三件雁鱼灯形制极为相似，只是灯身纹饰繁简有所差异，显示了当时人们对水禽衔鱼这一造型的喜爱。这件彩绘雁鱼铜灯巧妙合理的构思设计也让人折服。雁颈修长，回首衔一鱼。雁体肥硕，身两侧铸出羽翼，短尾上翘，双足并立，掌有蹼，背部开口，接一带柄灯盘。灯罩为两片弧形屏板，其上部插入鱼腹的开口，下部插入灯盘内的直壁圈沿中。同汉代所有的釭灯一样，该灯灯盘、灯罩可任意转动和开合，以调节光照和挡风，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可纳烟尘，保持室内清洁，各部分可拆卸清洗，堪称功能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装单烟管的灯如果点燃时间过长，灯内烟气充溢，则气流的流通会受到影响，因此汉代工匠又发明了一种双烟管的灯，这种灯在保证气流流通方面更胜一筹。

釭灯在南北朝时期仍然为人们所熟知，经常在诗文中被提到，冠以“金釭”、“兰釭”的美名。到了唐代，这类名称还出现在诗人的笔下，而且从文献所记载的与釭灯相类似的“息烟灯”看，唐代人可能还曾使用或者至少还了解这种类型的灯。遗憾的是，这种展示古代中国人环保意识的灯型，到宋代就已经不为人知了。

《西京杂记》中记载，赵飞燕为皇后时，她的妹妹赵合德为姐姐送的贺礼中有“七枝灯”。这种多枝华灯在汉代很流行，是汉代一种华



贵高级的灯具，这种多枝灯，一般为一个灯座之上，支撑着高低错落、为数几个至十几个的灯盏。质地上有青铜、陶和铁制的，有的青铜多枝灯的各部分相互间以榫卯套扣合一体，可以置上卸下。如1953年河南洛阳市烧沟出土的十二枝铁灯，高73厘米，灯柱有规律地分层伸出枝条，枝头托灯盘，盘中立灯芯。这种灯点燃以后，灯火交相辉映，有如花树，显示出豪华的气派。

在六朝时期的诗文中，有这样的一首诗：“蔽野千种树，出没万重山。上镂秦王子，驾鹤乘紫烟。下刻蟠龙势，矫首半衔莲。”诗中描写的是汉代熏炉的形制。六朝诗文中还常借熏炉的炉与香，来隐喻男女之间的爱情。多

十二枝铁灯
东汉
1953年河南洛阳烧沟出土
高73厘米

长信宫灯

西汉

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出土
高 48 厘米



愁善感的诗人们借博山熏炉，引出闺中哀怨——负心人已去，空余香烟缥缈的博山熏炉，感叹人心多变。熏炉是汉代一种重要的室内陈设品。中国在室内熏香的习俗最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到了汉代，熏炉在贵族的起

居生活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作用。当时熏炉所燃之香最初是一种草本植物，叫茅香。茅香较易得，但香气不甚浓郁。燃烧茅香的熏炉在广东广州、湖南长沙等地西汉早期墓中出土了不少，中原地区则出现得相对晚一些，反映

出熏香的风气是自南向北逐渐推进的。茅香是草本植物，干燥后就可燃烧，所以对熏炉的要求并不是很复杂。早期的熏炉多为豆形熏炉，炉身较浅，炉盖较平。为了使茅香充分熏烧，往往在炉身下部或底部镂有进气孔，而在炉盖上镂有出烟孔，空气自进气孔进入炉内，香烟则从烟孔散出，弥漫室中。后来，汉朝从南海进口了高级香料龙脑，西汉张骞通西域后，还从西方输入了苏合香。龙脑、苏合等香的熏烧法与茅香的熏烧法有所不同。它们均为树脂类香料，须置于其他燃料上熏烧。因此熏烧树脂类香料的熏炉形制与前有所不同。这种熏炉的炉身要做得深些，以便在下部盛炭火，树脂类香料放在炭火顶上，使之徐徐发烟。为防止炭火太旺，汉代已将炉身下部的进气孔缩成很窄的隙缝，甚至往往做成封闭的，同时将炉盖增高，在盖上镂出稀疏的小孔，通过小孔的气流挟带熏炉上层的香烟飘散；而炉腹下部的炭火层，由于通风不畅，所以只保持着缓慢的阴燃状态，正适合树脂类香料发烟的需要。与这种香料相适应，熏炉为炉盖呈圆锥形、盖面铸出山峦的博山炉。

汉代豆形熏炉佳作不多，博山炉则是佳作纷呈。前引诗文中描写的就是博山炉的形制。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出土的错金铜博山炉就是其中极为精美华贵的一件。这件熏炉，通高26厘米，由炉座、炉盘和炉盖组成，通体错金丝。炉座圈足错金，作卷云纹。座把透雕，作三龙腾出波涛翻滚的水面以头托炉盘状。炉盘错金作流云纹，线条活泼流畅。炉盖上部 and 炉盖铸出高低起伏、挺拔峻峭的山峦多层。山峦间神兽出没，虎豹奔走，小猴蹲踞在高层峦峰或骑在兽身上，猎人肩扛弓弩巡猎山间或追逐逃窜的野猪，二三小树点缀其间，刻画了一幅秀丽的自然山景和生动的狩猎场面；在细部又加错金勾勒渲染，使

塑造的景色更加生意盎然。《西京杂记》记载：在西汉首都长安，有个能工巧匠叫丁缓，擅长铸造九层博山香炉，上面镂刻奇禽怪兽，穷其工巧。这件错金博山炉，通体错金，纹饰自然流畅，线条有粗细之分，细者若毫发；出烟孔利用山峦重叠之势，多开在隐蔽处，平视之不见孔隙，熏香时却升起袅袅烟篆，正反映了汉代能工巧匠的高度和杰出的艺术创造才能。

另一件极负盛名的汉代博山炉是1981年在陕西兴平茂陵1号无名冢出土的鎏金鎏银竹

鎏金铜熏炉

西汉

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

高26厘米





鎏金鎏银竹节铜博山炉
西汉
1981年陕西兴平茂陵1号无名冢出土
通高58厘米，口径9厘米

节铜博山炉。此熏炉通高58厘米，由底座、炉柄、炉盘和炉盖四部分组成。底座作圈足形，座上透雕两条蟠龙，翘首张口，龙身满饰鎏金细纹鳞甲，仅眼、须、爪鎏银。竹节形炉柄出人意料地出自底座两条蟠龙口中，分五节，节

上刻出竹叶枝杈。炉柄上端又铸出三条蟠龙，龙身鎏金，爪鎏银，线条活泼流畅，形象生动。三条蟠龙头顶炉盘，盘腹下部有十组三角形，内雕饰蟠龙纹。这十组蟠龙纹，底色鎏银，龙身鎏金。盘腹中部突出鎏银带一圈，上部浮雕四条金龙，龙首回望，龙身从波涛中腾出。炉盘口沿有鎏银宽带纹一圈。炉盖透雕多层山峦，云雾缭绕，加以金银勾勒，宛如一幅秀丽的山景。炉盖口外侧和底座圈足外侧有铭刻，知此器为宫内所造，原为未央宫物，后归阳信家，当时称作“金黄涂竹节熏卢”。这件只有皇室贵胄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器形罕见，全器纹饰多鎏金银，华美异常，既是一件陈列品，又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

（五）镜鉴之光

“流辉入画堂，初照上梅梁。形同七子镜，影类九秋霜。”这是多美的一首诗啊！望着那明亮的月光，南朝梁简文帝想起了他珍爱的“七子镜”。那高挂在天上的月亮，不正是一面闪着光的铜镜吗？铜镜是汉魏时期室内常见的陈设物品，梁简文帝所比拟的“七子镜”是汉代很流行、很珍贵的一种铜镜。

铜镜是汉代室内一种很重要的陈列品，从汉代铜镜的数量就可窥见一斑。传世汉镜极多，出土的汉镜数量也十分可观，从南国的广东、广西到中原的洛阳，据一些汉墓发掘整理报告统计，随葬铜镜的墓葬占总墓葬数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一面面小小的铜镜，让我们能寻觅到汉代人的情感世界，感受到汉代工匠们的高超技艺。

四神、禽兽、五灵是汉代铜镜中最主要的纹饰。汉代的许多铜镜，尽管内容、形式、排列不同，但是在这些图纹中总能发现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它们或同时出现在一面镜子上，或与其他奇禽异兽交错出现。四神既是传说中守卫四方的神灵，也是驱逐邪恶、护卫人



鎏金“中国大宁”铜镜

新朝

1951年湖南长沙出土

直径18.6厘米

们升天的神物。汉代四神铜镜的流行，与当时人们强烈的神仙思想有关。五灵学说在汉代极为流行，而四神与五行不能整齐地相搭配，所以在汉代的铜镜中，除四神纹饰外，又加上了由麒麟组成的五灵。不仅铜镜纹饰中出现五灵形象，有些铜镜铭文中也有关于五行学说的内容，如“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五行德令镜之精”。

汉代以四神、禽兽、五灵为主题的铜镜中，最神秘的莫过于规矩镜了。这种铜镜一般为圆钮，钮座外为一方格，方格有的排列十二地支铭文。方格四边各向外伸出一个双线T形

图像，与双线L形图像相对，方格四角又与双线V形图像相对，将铜镜内区分为四方八等份，铜镜上的T、L、V纹通称规矩纹。规矩纹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这小小的三个符号引起了众多专家的关注，有的认为它是早期铜镜纹饰演变而成的；有的认为它是古代游戏博局的格局，因而也称其为博局纹；还有的认为规矩纹象征着宇宙图式，镜钮代表茫茫宇宙的中心，钮座外的方格表示大地，圆形的镜子代表天，即天圆地方，方格外的乳钉表示支撑天盖的柱子，T纹象征四方之间，四隅的V象征四海，L象征防止恶魔进入大地的门。



“始建国二年”铜镜

新朝

直径16厘米

让我们来看看备受梁简文帝珍爱的“七子镜”是什么样子？这里的“子”其实指的是铜镜上的乳钉，汉代禽兽镜、四神镜上常常出现许多乳钉，一般四到九个不等，在乳钉间布置纹饰、图纹内容和整个镜子的构图，以七乳居多，纹饰更为复杂、细密，故称“七子镜”。七子镜的七区图纹为生动的禽兽形象，其中龙腾虎跃，凤舞龟行，奇禽飞翔，异兽奔驰，意趣盎然。

汉代人信奉神仙思想，神话传说是汉代铜镜中出现的新题材，在禽兽镜、规矩镜、四神镜错综变幻的奇异图纹中，开始出现了所谓“羽人”、“神仙”等，他们或舞蹈，或蹲踞，以各种姿态在小小的铜镜上展现出一幅幅丰富多彩的神仙世界。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周氏作车马人物画像铜镜”就以浮雕的手法，



错金五兽纹铁镜

东汉

直径16.5厘米

表现了神人、车骑等纹样。该铜镜直径22.5厘米，镜面四乳钉将内区分成四区，各区内分别配置神人车马。有两区是对置神人东王公、西王母及侍者，东王公、西王母端坐，形体较大，他们是汉代神话传说中的中心人物。另两区则对置车马，车两侧立屏高起，小窗启开，车后帛带飘举，骏马矫健有力，车驱马跃，十分壮观。整个镜面构思巧妙，刻画生动传神，动静对比十分强烈。外区为铭文带：“周氏作竟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铭文表达了人们渴望国家安定太平，生活富裕幸福的美好愿望。

东汉时期兴起了一种新的铸镜技术——错金银铁镜。曹操在《上杂物疏》中记载：皇帝用一尺二寸的错金铁镜一枚，皇后、皇太子用错银铁镜四枚。河北定州的中山穆王刘畅墓和山西侯马东汉墓中都出土过这种铁镜，镜背均用金丝错嵌出各种精细的花纹。

四、行

（一）制车轮画像石

“一器而群工致巧”、“车器难就而易败”，

是古代史书中描述制车工艺的词语。在“致巧”与“难”、“易”之间道出了制车行业的智巧与艰辛。贵族们拥有制车行业，普通人能成为一个制车人，也自然成为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所以在用于装饰墓壁的画像石上，除雕刻有显示墓主身份的车马出行、显示墓主希望成仙的各种奇禽异兽和神仙外，反映墓主家奴的制车内容也融入其中。在古代制车行业中，要观察一部车的优劣，首先要看车轮的制造是否合格。山东嘉祥洪山村出土的一块画像石，把主人期望升仙的思想同制造车轮的场景雕刻在一起，为我们留下了反映汉代制车行业的宝贵资料。这块画像石高57厘米，宽94厘米。画面三层：上层，西王母凭几而坐，旁有侍者跪捧芝草、蟾蜍和玉兔捣药、带剑的三足鸟、九尾狐。中层，分左右两格，左格画面上一人半跪执斧，正在凿制轮辋，面前放置着将制成的车轮，上方悬挂轮辋，一人背负小孩，手持轮辋；右格一人双手执器操作，地上设有安架，安架上下有缸、罐。下层是一幅观看格斗的场景。

这种对车轮制造技术的重视，也反映在出土的文物上。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的铜



制车轮画像石

东汉

1954年山东嘉祥洪山村采集
高57厘米，宽94厘米



栈车

西汉

1952年湖南长沙伍家岭出土
长106厘米

这辆栈车模型，式样和当时轻便的轺车相似，但稍简陋。通常用以乘人，可坐2人。

车马，作为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第一代君主的陪葬物，可以代表当时制车工艺的顶峰。它们的性能在许多方面显然已经超过了先秦时期的车辆。反映在车轮上表现为：牙的着地面窄，以便于在泥途行驶。牙的形状改变可以更好地利用离心力作用，使车行泥地而不易带泥。毂中的穿中部大，这样贯轴后，只有毂穿之两端与轴相接，可以减少摩擦力，使车行比较轻捷。已经修复的秦陵铜车，车轮仍可转动自如。湖南长沙汉墓出土的车辐，近毂者，像人臂膀上的肌肉一样均匀；近牙者，像人膝下腓骨一样圆滑，可以想见其工艺的精湛。先秦车宽度颇不一致，秦统一天下后，“车同轨”。汉代乘舆都是重牙、贰毂、两辖，使车子更为牢固和安全。为改善轮与轴的接触条件，车毂和车轴中的铁采用具有较高的耐磨性和较小的摩擦阻力的灰口铁制成。1954年，山西永济薛家崖还出土了三件汉代的铜制轴承，它与现代汽车轮上的滚动珠架一样，是一种铜制的环行槽，内分四格或八格，格中有生铁粒的残余，即以铁粒为滚珠，这应是中国最早的滚珠轴承。车轮制作工艺的提高，在汉代车的车速和载重量上得到反映，秦汉时期所造车辆，空车日行七十里，重车日行五十里，一车可载

二十五斛。

“群工致巧”说明秦汉时期造车业内部分工非常细密，有专家通过对秦俑坑出土的木车统计，发现秦代车子的同类零部件是标准化的通用件，像毂、牙、辐、衡及其铜构件等，其几何形状、尺码、表面质量和机械性能，都是统一的规格，以便互相替换。而且车子的輿、轮、衡等部分均可成为一些组合的单元，体现了秦代制车业的专业化和组合化，做到了独立制件，分类储存，装配组合成器。

“车器难就而易败”是说车器制作工艺复杂而又易于毁损，所以秦汉时期非常重视对车辆的保护。云梦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中对公车的修理、保养、折损上报和废弃，都有详细而明确的法律规定。秦时由司空役使刑徒制车，保证车辆质量的措施也列入法律条文。居延汉简中可以看到从事长途转输的运输车辆，常常携带斧、斤、锯、钳、锥等修理工具，有的还备有诸如轴承等一类部件。备用部件的管理都有相当严明的制度，对折损的车辆，设有专门的修复机构。

（二）丰富多彩的汉代车

《汉书·董仲舒传》中有这样一句话：“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背、挑重物）者，



辎车画像砖

东汉

1953年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
高39厘米，宽46.5厘米

小人之事也。”乘车与否代表了一个人身分的高低，车形的差异、驾车牲畜的不同，也是区别车主身分的标志，由此我们可了解汉代丰富多彩的车形。

汉代的高级贵族用车按乘坐者的姿势来分，可分为驷马高车和驷马安车，前者是立乘，后者是坐乘。驷马是四匹马拉，即当中两匹驾辕的服马和两旁的骖马，是供贵族出行专用的车辆。驷马高车车上竖有遮阳避雨的伞盖，地位越尊贵，伞盖也越高。皇帝的车盖用特别的质料，别具形制，叫做黄屋。颍川太守黄霸是汉代最有名的循吏之一，皇帝特赏他用一丈高的车盖，以示宠幸。与黄霸相反的是丞相王嘉，因罪被去掉车盖。汉武帝时，东海郡郯县（今山东郯城县）有位于公，在县里当监狱长，后来升任郡的法官。于公一身正气，秉公办案，闻名乡里。有一次，县里报来一个人命案子，于公经过调查认为是冤案，向太守力争重新判

决，太守不听。于公无奈，抱着案卷在郡衙门痛哭一场，就此告病辞官，回家闲居。不久，他家的里门塌坏，准备重新修建，于公说：“里门要造得高大些，让驷马高车能够通过。我办案多年，从没冤枉过一个好人，积下了阴德，我的子孙将来必定发达。”后来于公的儿子于定国官至丞相，封西平侯，孙子于永也位居三

陶马车

东汉

1955年广东广州先烈路出土
车长17厘米，高12.5厘米，
马高15厘米

铜鞮车

东汉

贵州兴义出土

长112厘米，宽53厘米，高88厘米



公，果然都乘坐着驷马高车出入里门，实现了于公的预言。驷马安车是坐乘的车，汉代名士陆贾就常乘驷马安车。孝堂山石祠所刻出行图中的“大王车”，就是诸侯所乘的安车，此车羽盖华丽，而且在车衡上立有一鸟，可以称得上是汉代最豪华的车。在汉代，如果君王用安车征聘某人（一般都是读书人），则表明这个人受到了皇帝的特殊待遇。《后汉书》就曾记载汉桓帝用布帛作为礼物，用安车去征聘韩康。以安车送行也是一样的道理。古代的车与轮轴之间没有弹簧，路面又不好，车子走起来颠簸之状可以想见。为了使乘坐者更加舒适，可以用蒲草裹住车轮减轻震动，以表礼敬。汉武帝征召《诗经》大师申公，就派遣使臣出动安车蒲轮，带上束帛加璧的礼物去迎接。

汉代的车就车厢形状而言，可分为轺车和衣车两大类型。轺车是汉代常见的一种车，是一种车厢四面敞开的车，车厢较小，速度很快，所以也被称为轻车。轺车既可驾一匹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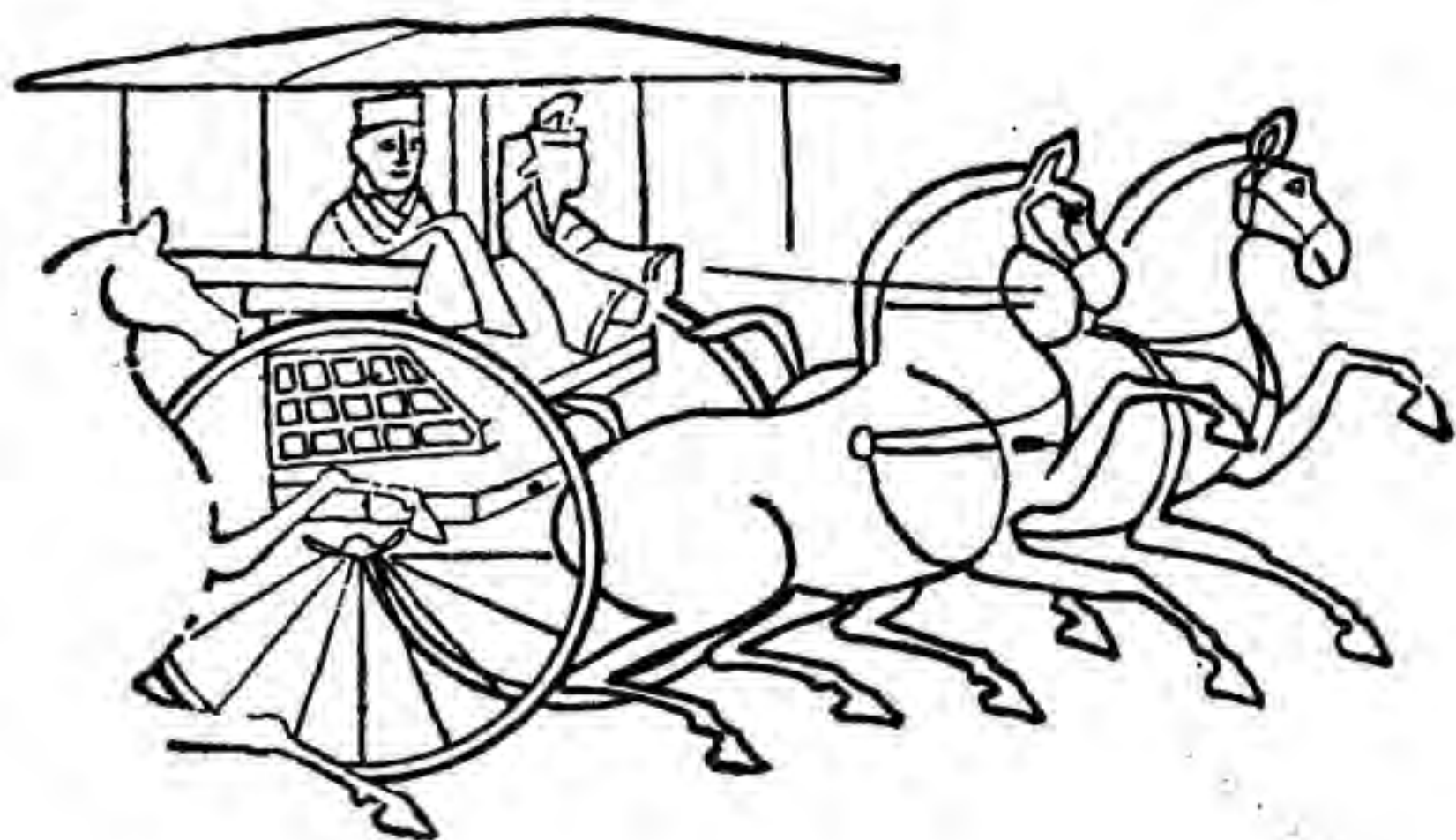
也可驾两匹马。天子和官吏的车驾均属轺车之类，而依等级高下各有不同。因为轺车轻便迅速，所以小吏出外办理公事或驿站备用的车辆也常使用轺车。战国秦汉时，曾经风行一种驱车争速的竞技运动，史籍称之为“驰逐”。驰逐运动在西汉时尤为皇室贵族所喜爱。而轺车迅速，必是贵族阶层在驱逐竞技时首选的车辆。与轺车同属一种类型的还有辒辂。辒辂比轺车多一对车耳。车耳是装在车椅上部用以遮住车轮顶部的挡泥板，多呈长方形，外侧有垂下的边板。汉代对车耳非常重视，官吏等级不同，车耳的颜色就有区别，汉代铜镜铭文上有“作吏高迁车生耳”的话，把车耳的有无与官吏升迁联系起来。山东沂南东汉画像石墓中刻画有十辆车组成的出行行列，其中墓主所乘的主车，就带有车耳。与轺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衣车。衣车车厢四周封闭，在车厢两侧开窗户，车厢后方开门。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的彩绘铜车马也是衣车的一种，其中的2号车分前后两室，前面和

两侧有启动灵活的车窗，后面有开关自如的车门。舆底铸有菱格纹仿毯车茵，舆顶有椭圆形车盖。汉代妇女多乘坐衣车，汉代的衣车主要有辎车、辘车、辇车。汉代辎车的车厢分为前后两部分，主人坐在后舆，御者在前舆中驭马。汉代辎车主要供妇女乘坐，史书中多处记载皇帝的母亲、皇后或后妃出门必乘辎车。1953年四川成都市扬子山出土的一块辎车画像砖，刻画了汉代一般富家妇女乘坐辎车出行的情景。沂南画像石中描写墓主夫人出行场面时，夫人所乘车即为一辆辎车。辎车是可以卧着休息的，所以显贵的男子在正式场合中是不乘辎车的。1955年广东广州先烈路出土一陶马车，车厢顶为篷盖形，门开在车厢后面，当时叫做“辇车”，也是妇女乘坐的，故车厢有帏布封闭，外面看不到乘坐者。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铜辇车三辆，架车的马胸前都刻有文字，说明都是夫人所乘的车。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的陶辇车和贵州兴义出土的铜辇车，将这种车的结构反映得更为细致。由于衣车密封的特殊形制，秦汉时也用这种车运送尸体，称为輓辘车。

汉代的车按拉车的牲畜来分，可分为马车和牛车。就各种车的贵贱而言，其中最具戏剧性变化的莫过于牛车了。中国最早出现的车是马车和牛车，初期的牛车车厢容积大，用于装货和运输稼穡，多从事劳务，所以被称为“役车”，地位很低贱，上层人物当然是很少乘坐的。西汉初年，由于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国库空虚，连皇帝的乘舆也很难配备毛色相同的四匹良马，将相便只能乘牛车了。甚至官家的祭祀活动，也常用牛车，驿站中也备有驿牛。当时牛车虽然很普及，但地位仍然很低下，大臣死后，用牛车送柩是薄葬的一项。在汉代，牛车一辆值钱两千，而马拉的辎车一辆值一万，两者相差悬

殊。然而到了东汉晚期，牛车的命运却发生了变化，自灵帝、献帝以后，从天子到士人、庶人都常乘牛车。袁绍青年时代交游广泛，与他结交的人很多，以至他家门前的牛车都“填接街陌”。社会上层人物出行时以牛车代马车，是车制上的重大变化。这与牛车的特点有密切的联系。因为自车诞生之日起，古人对乘车就有一套繁琐的礼节规定，贾谊在《新书》里对乘车提出了种种要求，乘车者必须有“坐车之容”、“立车之容”、“兵车之容”，认为站立不直、坐不端正、身体怠懈、神态骄傲、左顾右盼、动静无度、随意唾弃、语速太快、运气不顺等等，都是乘车时不应出现的动作。《汉书》还记载了汉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左顾右盼，说话不紧不慢，不指手画脚……这些都是天子乘车时的标准姿态。这种乘车时的矜持之态太束缚人了，汉代的高官贵族们也想舒服、安逸，而乘牛车可以不讲究这一套，正符合他们的要求：因为牛车有高大的篷，不像以辎车为代表的马车那样，车身敞露；而且牛车车厢大，乘坐者在里面可随意坐卧，不需要保持端正的姿态给过往行人看；加上牛车徐缓，乘牛车的颠簸程度比马车小……所有这些特点，对于养尊处优、恬淡清闲的士族阶层更为合适。所以从东汉末年开

记里鼓车模型





独轮车模型

始，乘牛车成为一种时髦。随着上层人物对牛车态度的转变，牛车的设备和装饰越来越讲究，迅速发展为一种高级车型。如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出土的铜敞篷牛车已设凭几。有的牛车为了抵御酷暑，还在车顶张上了帷幔。这种牛车文献中多次提到，但目前考古材料中还未发现它的具体形象。

124年，汉安帝为了宣扬国威，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在浩浩荡荡的乘舆大驾中，有两辆车特别引人注目，其中的一辆车是两轮小车，车上高高地站着一个精雕细刻的木人，车子无论朝什么方向行走，木人的手始终指向南方，这就是汉代的指南车。另一辆是双层的轮马，车的上层中间有一面鼓，鼓旁有

四川成都扬子山画像砖上的轺车形象



两个木头人手握鼓棒，摆出挥棒欲击的架势。下层中间挂一口铜钟，钟两旁也站着手握钟槌的两个木人。车子每行进一里左右，上层的木人就自动击鼓一次；车子行完十里，下层的木人就自动敲钟一次，这就是汉代的记里鼓车。有关这两种车的形象材料迄今尚未发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现藏的是王振铎先生复制的展品。

上述的各种汉代车，都是畜力车。较人力担挑、牲畜驮载而言，畜力车速度快，运载能力也强。但在狭窄的小路上，畜力车就无法发挥这些优点，而且在汉代，对普通的劳动人民来说，役畜还是一项比较大的费用。为了使运输更加方便、节省，汉代又发明一种新型的运输工具——独轮车。汉代的独轮车被称为“鹿车”。为何称为“鹿车”，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独轮车窄小，仅可载一鹿。另一种认为“鹿车”之“鹿”当是“辘轳”之“辘”，是指鹿车的独轮。文献记载，西汉末年即出现“鹿车”，是下层劳动人民的一种运输工具。有关鹿车最早的形象资料，是在东汉的石刻画像上。画像描述的是西汉时孝子董永的神话故事：董永幼年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家境一直不好。长大以后，董永对父亲很孝顺，每年到了农忙季节，便用鹿车把父亲推到田头的树阴下休息，还随时给父亲供奉上吃喝，自己则在田间忙于农事。不久，董永的父亲去世，董永无钱葬父，便向一个富户人家借贷了十万文钱。埋葬完父亲后，董永去富户家卖苦力还债，在半路上遇到一个女子，那女子请求做董永的妻子。两人来到这个富户家，那女子一天一夜就织出了三百匹绢，偿还了董永的债务。两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女子告诉董永自己是天女，是董永的孝心感动了天神，天神派她来帮助董永的。话一说完，那女子就飞上了天。在东汉的这块画像石上，董永的父亲坐在

车上，左手扶鸠杖，右手向前，车后有一棵大树，树上有小孩玩耍；董永站在左面，左手端一器物，右手拿着器物的盖，眼睛注视着父亲。董永头上面有一横空的女子，当为织女。画面上的车子就是一辆鹿车。四川彭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也有独轮车的形象，车上只装载一件羊尊。鹿车能在比较狭窄的道路上通行，从而在运输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欧洲则要到12世纪以后才出现这种类型的车。

（三）陶船模型

重大的考古发现往往带有偶然性。1974年，陕西临潼的农民在打井时，意外发现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坑，那庞大复杂的军阵，让人们联想到秦灭六国时的雄伟气势。同一年，因修建地下通道，广州市文化局大院的球场下距地表约5米处掘出一长段颇像铁路轨道的大木结构遗迹。就这样，一个与秦有关的遗迹也在偶然之中展示在人们面前，这就是秦代造船工场遗址。



统一六国以后，秦始皇派屠睢率五十万大军，向岭南进发。由于轻敌冒进，秦兵大败，屠睢被杀。秦始皇遂派任嚣、赵佗率“楼船之士”增援。这个造船工场即始建于此时。赵佗利用番禺扼处东、西、北三江总汇的地理优

广州秦代造船工场遗址

陶船

东汉

1954年广东广州先烈路出土
高16厘米，长54厘米





木船（原大模型）

西汉

根据1956年广州皇帝岗出土木船模型复制

势，在番禺组建庞大的造船基地，赶制大批按规格建造的船只，以应战事的急需。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统一岭南的战争结束以后，造船工场的使命就完成了。赵佗占据岭南、建立南越王国之后不久，王国的官署需要不断扩建，这个早已废弃的造船工场就被填埋了。

虽然这是一个应战事急需而建的造船场，且使用时间很短，但从残存的遗迹和遗物中，人们仍可以感受到秦代造船业的宏大规模和高超技术。这个造船工场，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船台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枕木用于扩大船台的受压面积，防止船体下沉。滑板构成滑道，便于船只下水。木墩用于支撑船体，以便于在船底进行钻空、打钉、捻缝等作业。滑道的宽距可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调节。这样各个船台既可以分别造大小不同的船，也可以造同一规格的船。造船工场整体布局合理，设备配套完善。有关学者根据造船工场遗址船台的规模，推算当时可造宽8米的大船，常用船只的长度为20米左右，载重约25吨至30吨，少数大船可能更大一些。

像任何其他学术问题一样，对秦代这个遗址的性质定论也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这是

一个“具备生活起居功能的”大殿遗址，有人认为是引水木渠，有人认为是铺有瓦顶的干阑建筑，还有人认为这是南越王朝汉台的基础。

虽然有关遗址性质的争论可能将继续下去，但秦汉时期作为水上的主要交通工具——船，已臻完善，众多的汉代船只模型和反映船只运行的图像内容向我们传达了这一信息。1954年广东广州市先烈路出土的一件东汉时期的陶船模型，高16厘米，长54厘米，船首有锚，锚正视为十字形，侧视为Y字形，锚上不仅有锚爪，而且有横杆，使锚爪没入水下，能较好地扣底抓沙。这种锚已远远脱离了锚的初始阶段，基本上具备了后世锚的特点，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船后有舵，舵杆通过舵室固定在尾部，这个舵不同于近代的舵，还保留着由梢演变而来的迹象。舵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上的重要发明，这是现知最早的一例。陶船上塑有六个人物，分立各处操作。如按陶塑人物身高比例推算，真船可长达14米至15米，载重约五十石。此外甲板上还布置有六组矛和盾，说明这是一艘有武装保护的内河航船模型。



汉代的划桨船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当时划船不仅用短桨，而且还使用长桨。湖南长沙出土的汉代木船模型有十六支桨架；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中发现了船模和许多竹筒木牍，竹筒上写有“大舟皆（？）廿三桨”，说明当时已有使用许多长桨的大船。

早期的船无甲板，汉代的船已有甲板和船舷板。湖北江陵凤凰山的木船模型底舱上有若干横梁，上覆盖板，构成船甲板。中部和尾部舱外有司篙荡桨的通道。甲板和船舷板的使用有利于船上通行和防止船舱进水，起到稳定船体的作用。秦汉时期的大船不仅已

铺了甲板，而且在甲板上还加了一层或几层楼，这便是“楼船”，是汉代规格最高的船。广东德庆汉墓出土的东汉陶船模型分前、中、后三舱，前为头舱，中为楼舱，后为舵舱。头舱为拱形篷顶，是水手操作的地方。楼舱是船的主体建筑，楼顶为庑殿状，两侧有对称的窗户，后有门与船尾舵楼相通。楼舱是梁柱结构，两侧墙与船舷相接处有三个小孔，可能是底舱的透光排气孔。这只是一只小型的楼船。史书记载，汉武帝在昆明池训练水军，其楼船高十余丈，上树旌旗，雄伟壮观，可能是汉代最豪华的船。

十六桨船（原大模型）

西汉

根据1951年湖南长沙杨家岭出土木船模型复制

第六章

秦汉科技文化

秦汉时期，科技文化得到迅猛发展。纸的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一项杰出贡献。中国古典天文学体系在这一时期形成，一些与天文学和地学有关的科学仪器被发明使用。出土的大量医书反映了秦汉时期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再发展。汉代文学创作的成就非常可观。散文创作继先秦之后又一次出现繁荣局面。汉赋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高度成熟和繁荣。汉乐府民歌在诗体形式、表现技巧方面都作了重要开拓，尤其是大大发展了古代的叙事诗。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弘气象。班固的《汉书》奠定了中国“正史”的格局。秦汉的乐舞百戏艺术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两汉舞蹈是以楚舞与中原舞蹈、中原与西域舞蹈的结合为特征。百戏艺术吸收了西域文化的特色，观赏性大大提高。汉代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的孕育与产生时期，外来宗教佛教也于这一时期传入中国。

扶风纸

西汉

1978年陕西扶风出土
残长7.4厘米，宽6.8厘米

第一节 笔墨纸砚

关于造纸术的发明，史学界历来争论不休，随着近年来考古中纸质实物的不断发现，这一困扰史学界的问题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答案，东汉蔡伦造纸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得到了应有的评价。

一、西汉纸与东汉纸

秦汉时期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简牍和帛。湖北云梦睡虎地、甘肃居延、湖北江陵凤凰山、山东临沂银雀山等地都出土了大量的秦汉时期的木简和竹简。长沙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大量的帛书。竹木简容字量少，体积大，使用十分不便。帛书柔软、光润、轻薄，易携带，但价格昂贵，普及使用相当困难。随着汉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书写材料的需要与日俱增，创造轻巧、廉价的新型书写材料成

为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社会这种的需求促使了造纸术在两汉的诞生。

纸是在两汉的什么时期产生的呢？过去一直沿用范曄《后汉书·蔡伦传》中的说法，认为是东汉宦官蔡伦于105年发明的。书中记载，蔡伦“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唐代李贤注《后汉书》引《相州记》说：蔡伦在耒阳县北有一处住宅，宅西有石臼，是蔡伦舂纸的遗物。此石臼后世一直作为文物保存着，据说直到宋朝仍然存在。蔡伦造纸的说法曾长时间居于有影响的地位，但是近代考古学发展后，打破了传统的观点，为我们研究造纸术起源问题以及如何评价蔡伦在造纸史上的地位，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西汉时已有絮纸。人们在煮漂蚕丝的过



程中，将蚕丝置于竹席上打击，打出的上乘者为绵，剩在竹席上的残絮晾干后取下，成为一层薄薄的絮片，即为絮纸。《汉书·外戚传》中提到在包药用的赫蹄上写字。赫蹄就是一种

金关纸

西汉

1973年甘肃金塔县金关出土
长15厘米，宽8.6厘米



马圈湾纸

西汉

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出土
长14.5厘米，宽10厘米

蔡伦像



絮纸，虽然能在上面写字，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因为这种丝纤维不可能像植物纤维一样在打浆抄制后在纤维间产生荏键结合而

成为纸。但是受丝絮纸的启发，人们在实践中逐渐用植物纤维代替丝絮，发明了纸。汉代最早的纸是麻纸。1933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新疆罗布泊汉代烽燧亭故址中掘得一片古麻质纸。据同时出土的木简断代，此纸属汉宣帝时期，比蔡伦105年献纸早150余年。1957年在陕西西安灞桥一座古墓中发现一叠垫在铜镜下的纸片，称为“灞桥纸”，由大麻纤维制成，经鉴定为汉武帝以前的产品，比蔡伦纸早200多年。1973年在甘肃金塔县金关又出土了两片西汉时期的麻纸，一为宣帝时期，一为平帝时期。1978年在陕西扶风中颜村发现了宣帝时的麻纸。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发现了成帝至王莽时期的麻纸五件八片，比蔡伦纸早100多年。这就意味着中国发明纸的时间应上推到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期，否定了蔡伦造纸的传统说法。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关于造纸术起源时间的热烈讨论。

坚持蔡伦造纸说的学者认为，灞桥纸可能是沤过的纺织品的下脚料，如乱麻、线头等纤维的堆积物，放在铜镜下面作衬垫用，年深日久，在潮湿的地下因镜身压力而形成的片状。居延金关纸和扶风中颜纸只是把麻质废料经过简单的切、舂（或捶打），成为薄片，虽具备纸的初步形态，但仍十分粗糙，也不宜作为书写材料，更谈不上代替缣帛，只能称为纸的雏形。这种纸的用途只限于包装或衬垫。有学者认为：蔡伦总结了前人的生产经验，集其大成，把造纸术提高到能生产书写纸的阶段，对人类文化的传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因此，我们认为即使在西汉雏形纸多次被发现的今天，把蔡伦评价为我国发明造纸术的代表人物或发明者，仍然是正确的。

但是八年以后的又一次考古发现，似乎对这场学术争论作出了一个无声的评判。

旱滩坡带字纸

东汉

1974年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



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发现了战国秦汉墓群，其中汉墓一座，墓的时代在西汉文景时期。其随葬器物中有一幅纸制地图，位于棺内死者胸部，纸残长5.6厘米，宽2.6厘米。纸面平整、光滑，结构紧密，表面有细纤维渣，原料为大麻。纸上用细黑线条绘制山、川、崖、路等图形，从而有力地证明了西汉初期不仅有纸，而且纸已经作为书写材料使用了。这次考古发现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立足点，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纸的起源、制造技术、用料及用途等。如果放马滩纸只是西汉纸已作为书写材料的孤证，那么过了四年之后，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又出土了汉代纸四百余件，其中西汉武、昭帝时期三件纸文书上，分别写着“付子”、“薰力”和“细辛”，均为药名。根据纸的形状和折叠痕迹，当为包药用纸。1997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上，展出了两张汉宣帝时期的纸，上面有用隶、草二体书写的文字，其中的一张上清晰可辨的文字有“顾伟君”、“不可”；另一张纸据有的学者从文字内容判断，可能是汉代的名刺，相当于现在的名片。这就进一步证实了在蔡伦以前不仅有纸的存在，而且纸已经成为书写工具，并在西北边郡广泛使用，足证当时的造纸数量较大，纸的使用与传播已相当普及。边缘清晰的整张麻纸的出土，也为研究汉代造纸工艺提供了实物见证。

蔡伦以前，纸作为书写材料的史实在文献中也可以找到证据。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从长安迁都洛阳时，“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说明至迟在西汉末年，国家文件档案除了用简帛之外已用纸。建初元年（公元76），汉章帝令贾逵选二十人教《左氏传》，并给“简纸经传各一通”，说明此时纸已在更大范围内使用。永元十四年（102），汉和



帝的皇后邓绥不喜欢珠玉宝器，却爱好纸墨，要各地进贡，这里将纸墨并列，把纸作为一种书写材料理解应该没有异议，而且说明纸的制造已普及到全国各地。

既然西汉文景时期已有了能作为书写材料的纸，那么蔡伦在造纸史上的地位该如何评价呢？蔡伦的贡献在于他扩大了造纸原料

帛书信札

西汉成帝（前32—前7）

1990年甘肃省敦煌市甜水井悬泉置遗址出土

高23.2厘米，宽10.7厘米

的来源，不但用麻、破布、鱼网，而且可用树皮为原料，开辟了木浆纸的先河，带来了造纸技术上的一次飞跃，从而大大降低了纸的成本，提高了纸的质量。1974年在甘肃武威县旱滩坡东汉末年古墓中的木牛车模型车厢两侧发现了三层粘在一起的纸，纸面平整，涂层均匀，纸上有较大的字，用汉隶体写成，字迹明显可辨的有“青贝”等字。旱滩坡纸在制造工艺上较前有很大的改进，它至少要经过浸湿、切碎、洗涤、浸灰水、蒸煮、舂捣、二次洗涤、打浆、抄纸、晾干、揭压等工序才能完成，说明在蔡伦以后一套完整的造纸工艺已经形成。从葬式、葬具的形制看，旱滩坡墓主人生前的政治身份不会很高，这说明纸不再是上层社会专用的奢侈品，而且这张用于衬裱木牛车的纸，也不能代表当时的高级书法用纸。东汉末，随着造纸技术的提高，在山东东莱出现了造纸名家左伯。人称左伯纸“妍妙生光”，说明这种纸制造精细，平滑洁白。在公元二三世纪时，“左伯纸”、“张芝笔”与“韦诞墨”齐名，被当时人公推为最佳书写工具。于西汉时发明的造纸术，至东汉末年已达到了很高的

水平。造纸技术的改进，推动了纸在书写领域内的广泛使用。目前在考古发掘中，已多次发现东汉末年用于书写的纸，如1901年新疆和甘肃敦煌曾出土汉末带字纸两片，一为诗抄，一为书信，前者还两面书写。1942年在内蒙古额济纳发现了东汉的一张字纸，也是一封书信。东汉末年，纸已逐步代替了简帛，成为人们日用的书写材料。而且这种质地优良的书写纸，很快就由中原传到新疆、内蒙、甘肃等地，可见普及是何等迅速。

二、“白马作”笔·隃麋墨·砚·书刀

毛笔在中国早已出现。到了秦朝，大将军蒙恬改进了毛笔的制造工艺。史载蒙恬南伐楚国，路过安徽宣城中山，发现那里的兔子毛很长，于是以枯木为杆、兔毛为毫，制出了第一批改良毛笔。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发现的三支笔，笔管系竹制，一端镂空成毛腔，将毛笔置于腔内，再以麻丝包裹，并加髹漆。整个毛笔藏在一枚竹制笔套内，笔套外部漆有黑地朱色条纹，外形颇为美观，较之长沙出土的战国楚笔，制作工艺已有明显的进步。

汉代沿用以前的制笔方法，笔管有竹、木两种，笔头有鹿毫、羊毫、兔毫等。甘肃居延红城子发现西汉时的笔，笔管以麻线捆扎四条木片而成，可以随时更换笔头。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中先后出土的两支竹制毛笔，分别刻有“史虎作”与“白马作”的字样，是当时比较讲究的笔。云梦秦笔、武威汉笔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笔杆的尾部都削成尖状，这是为了便于簪带，因为古代官员们为了上堂奏事记录时方便，常将毛笔插于发际，以备随时取用。“白马作”笔出于墓主头部左侧，就是汉代人簪笔的遗证。

墨的历史仅次于笔。秦晚期已出现了调

毛笔

西汉

1978年山东临沂金雀山出土



汉代画像石上的簪笔人物

制成型的墨丸，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墨锭，墨色黝黑，粒粗糙，成圆柱状。汉墓中的墨有呈丸状的，河北省望都汉墓壁画中有所反映。汉代已用松烟中的炭黑制墨。朝廷每月都发给尚书令、仆、丞、郎谕廩大墨一枚、小墨一枚。谕廩墨是尚书省的专用。谕廩指汉代的右扶风谕廩县。这里自古就生长有茂密的松林，松龄较长，松树枝条中含油脂高，适宜于烧烟制墨，因此在汉代成为著名的产墨区，以至到后世，“谕廩”索性成了墨的别称，许多制墨家常常把所生产的仿古佳墨，以“古谕廩”命名。到了东汉，宁夏固原出土的松塔形墨锭，更是黑腻如漆，烟细胶清，手感轻而坚致，虽埋藏地下千年，并未剥蚀龟裂，是汉墨的精品。

砚台是从研磨器逐渐发展演变起来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砚和砚杵，是初期的书写砚，这时砚的形态比较原始，无纹饰雕刻，仅是简单的圆形石饼。汉砚就更为丰富，就砚材而论，除石砚外，还有陶砚、木砚、漆砚、漆砂砚；以形制而论，有圆形砚、板砚、



石砚及研石

西汉

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
石砚面径9.5厘米，研石高
3.5厘米



松塔形墨

东汉

1974年宁夏固原西郊出土
高6.2厘米，直径3厘米



漆盒石砚

西汉

1978年山东临沂金雀山出土
长21.5厘米，宽7.4厘米



错金铁书刀

东汉

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
长18.5厘米，宽1.5厘米
右为书刀全器，上为铭文及
图案细部。



三足砚、龟砚、博山砚等等，砚盖、砚身、砚足雕饰许多图案，日益趋向工艺化。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汉砚不仅具有实用性，且有独特鲜明的时代特征及美学特征。

虽然两汉时期已发明了用于书写的纸，但竹木简在当时仍是主要的书写材料，为了修改简牍的误笔，因而需要一种小刀，汉代称为“书刀”。这种书刀最初是用青铜制造的，后

来改用铁制，汉代即用铁制的。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铁书刀，或装银首，或错金，或附象牙鞘，制作特别精细。东汉时尤重书刀，书刀已成为随身携带之物，东汉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上的人物就常佩有书刀。当时书刀中最讲究的一种叫“金马书刀”，是在刀上用金丝嵌出马形，并兼刻工名，是四川广汉郡工官所特制。这种书刀中有的是用钢制成的，古书中用“巧冶炼钢”的句子来赞美它。

第二节 天文、地学

汉代完备的历法是建立在对时间的精确测量之上的，大量的汉代测时文物反映了这一史实。张衡发明地动仪是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张衡的地动仪究竟是什么样，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问题。

一、圭表·铜漏壶·日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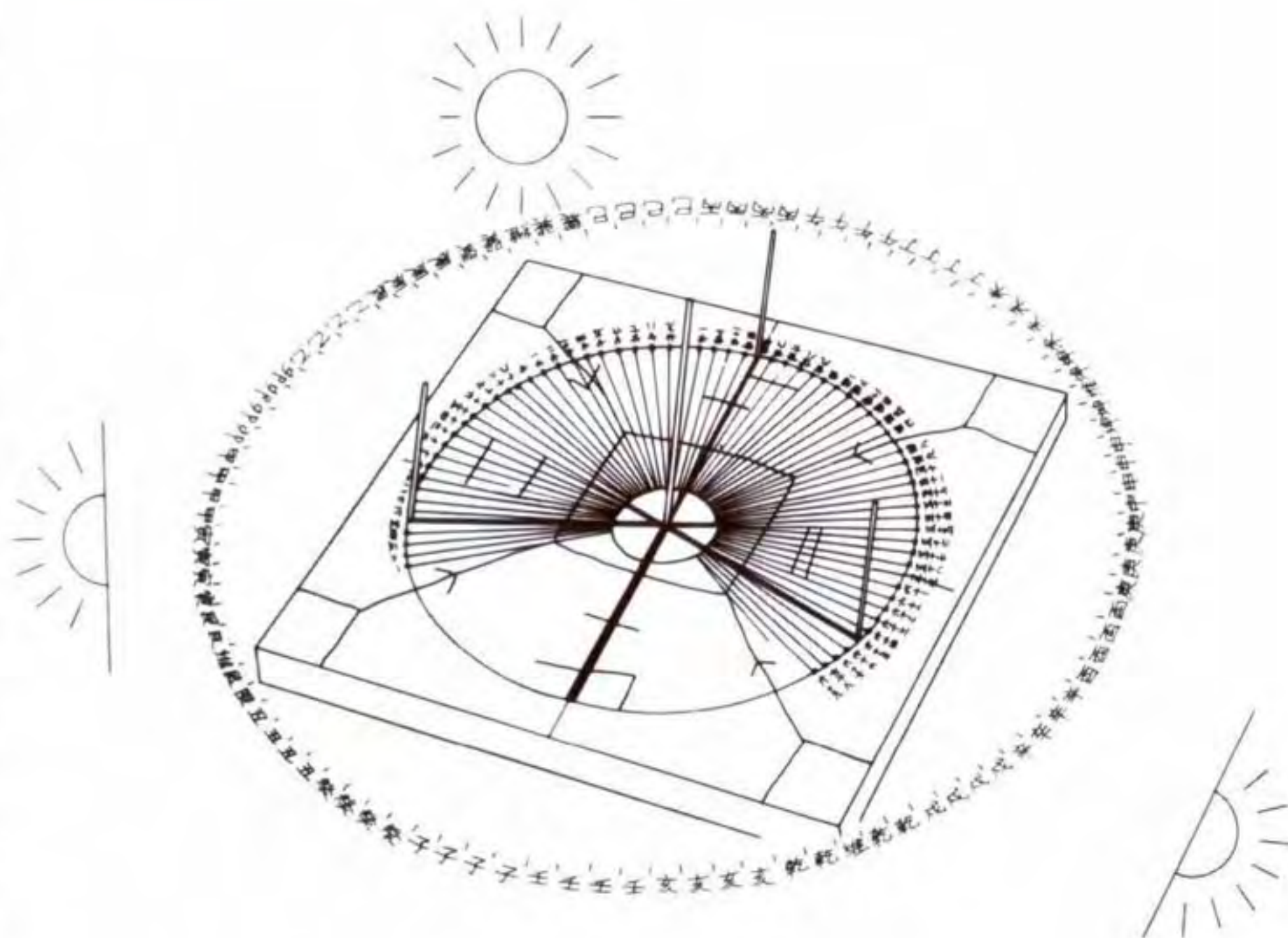
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历法的制定和修改，汉代的历法已相当完备和精确。在甘肃、山东等地曾出土许多记载历谱的竹木简，里面涉及到详细的节气。中国古代制定历法的根据是用圭表测量、比较和标定日影的周日、周年变化。表是垂直于地面的标杆，以备在日光照射下投影；圭即土圭，用于度量日影的长度。中国现存最早的圭表是在江苏仪征石碑村1号东汉墓出土的铜质圭表，圭和表合为一体，便于携带，反映出当时圭表的使用已相当普遍。与圭表同时使用的还有漏壶。陕西兴平东门外空心砖墓、河北满城1号墓及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的沙丘中，曾先后发现三件西汉铜漏壶，均为单壶泄水型沉箭漏。漏壶起漏后，壶内之水自出水管逐渐滴出，浮箭随之下沉，从而可根据箭上的刻度看出时间的变化。



日晷（左）及使用示意图（下）

汉
1897年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
出土
每边长27.4厘米，厚3.5厘米

兴平铜漏壶内壁上有圆形云母片，用于调节水的流量，以减少水量对水压的影响，使测时更为准确。汉代的天文观测，不是专为皇家所垄断的，民间也可进行，这也为考古发掘所证明。兴平汉墓规模不大，墓室长仅2.2米，宽只1.3米，陪葬品亦不甚丰富，当属一般平民或民间天文爱好者，可见汉代天文活动乃是可普及民间的，这与后世天文活动只局限于官方的情况有所不同。漏壶测时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漏壶中的水位和水压仍无法保持均衡，使滴漏的速度有快慢的变化，对测时产生不准确的影响。汉代除用圭表作为漏壶的校准器外，往往还用日晷。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1897年出土于内蒙古托克托的泥质大理石日晷，是目前发现的惟一完整的、也是最早的日晷。它的使用方



沉箭式铜漏壶

西汉

1968年河北满城1号墓出土
通高22.4厘米,口径8.6厘米

法是将晷体放正摆平,在晷心的大孔中立“正表”,在外圆的小孔中立“游仪”,将正表与游仪照准日出、日入时的太阳位置,就可以计算出当日的白昼长度,使掌漏的人员据以调整昼夜漏刻,确定换箭日期。

灵台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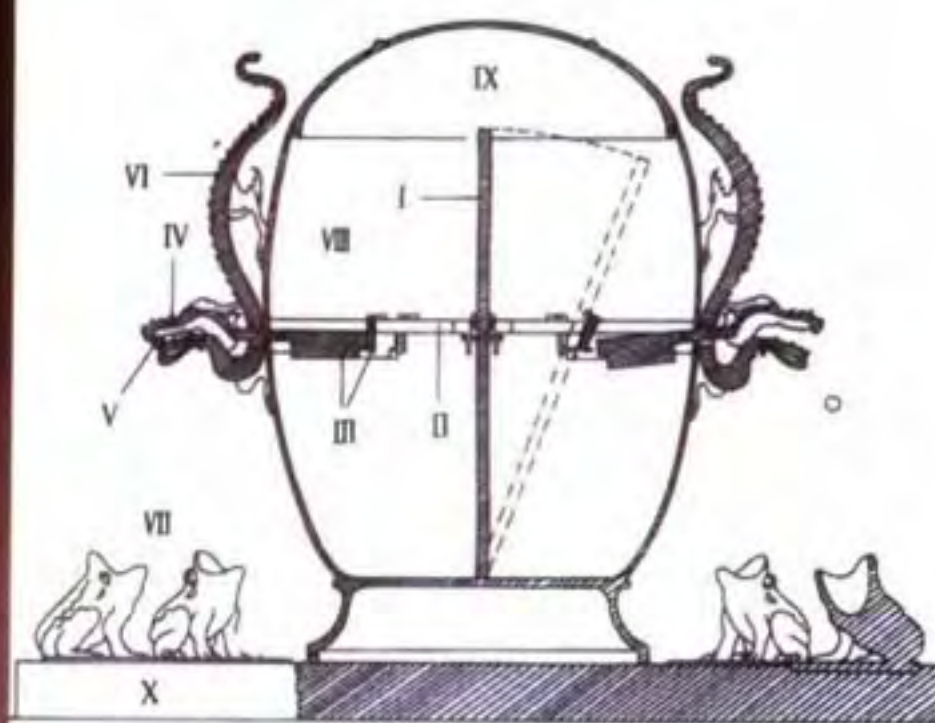
二、灵台遗址·地动仪

在古都洛阳南郊,方圆四万多平方米的地方,中间有一块杂草丛生的高台遗址,高台东西宽50米,南北长50米,高约8米。夯土台四周,各有上下两层平台,下层平台有环筑回廊的遗迹,上层平台四面各有五间建筑遗迹,地面全部用长方形小砖按人字形铺砌,四方建筑的墙壁上还残留有青色、白色、红色、黑色痕迹。台顶有明显的塌毁成椭圆形平面遗迹。这就是东汉灵台遗址,是中国最早的天文台。上层平台四面的五间建筑遗址是观测人员办事的衙署,椭圆形的台顶残迹是观测天象的场地。管理灵台的官员为太史令。东汉和帝时期,张衡任太史令,接管灵台,见观象仪器陈旧,年久失修,不能使用,他决定重新修造。从此灵台成为张衡大显身手的地方,一个又一个的新式天文仪器先后诞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候风地动仪。

东汉时期,中国各地频繁发生地震,仅仅在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到顺帝永和五年(140)的50多年内,京师洛阳和陇西地区的地震,有记载的就有33次,有22次是集中在公元100年至200年这一百年间。其中安帝元初六年(119)发生的两次大地震,波及数十



地动仪模型及剖面图



个郡县，使房屋倒塌，人死畜亡，造成很大的灾害。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张衡于132年创造出了“候风地动仪”，成为世界上第一台观测地震方位的仪器。据史书记载，张衡研制的候风地动仪整个用精铜制成，圆径八尺，有凸起的圆盖，形状像个大酒樽，外表刻有篆文及山龟鸟兽等图形。地动仪的外面镶铸着八条龙，龙头分别对着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每条龙嘴里都含有一个小铜球，每个龙头下各有一只张着嘴的蛤蟆。地动仪的内部，有一根上粗下细的铜质“都柱”立在中央，都柱周围伸出八根杠杆与龙头连接。哪个地方发生地震，哪个方向的龙嘴里的铜球就会掉落到下面蛤蟆嘴里，发出清脆的响声，守候在地动仪旁的人就可以准确记

录下地震发生的方向。

张衡设计的地动仪，是当时浑天学说的体现。中国古代有关天体、宇宙的学说，主要有盖天说、宣夜说、浑天说三种。盖天说认为天在上，像个盖笠；地在下，像个倒放的盘子；天体永远在地面以上活动，日、月、星辰附着在天盖上，随着天盖转动。宣夜说认为，天没有一定的形状，日、月、星辰是悬浮在天空之中的。浑天说认为，天地是浑为一体的，天圆得像鸡蛋，地像包在里面的蛋黄，日、月、星辰都在蛋壳上不断地转动。张衡设计的地动仪体似酒樽（卵形），象征浑天说的天；立有都柱的平底，表示大地，笼罩在天内；仪器上雕刻的山龟鸟兽等可能象征着山峦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二十八宿，所刻篆文可能

表示八方之气；八龙在上象征阳，蟾蜍居下象征阴，构成阴阳上下的动静的辩证关系；都柱象征天柱，居于顶天立地的地位。地动仪内部结构、基本原理和现代地震仪相同，都是利用物体的惯性原理来拾取地震波动。

张衡制作的地动仪当时安置在京都洛阳。永和三年（138年），它经受了一次检验。一天，地动仪正对西方的龙嘴突然张开，铜球落了下来。可是住在洛阳的人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地动，人们议论纷纷，有些人还怀疑地动仪的灵验程度。但是过了几天，便有人从陇西赶来报告说，那里在几天前发生了地震。陇西距洛阳有一千多里，人们不由对地动仪的准确性大为钦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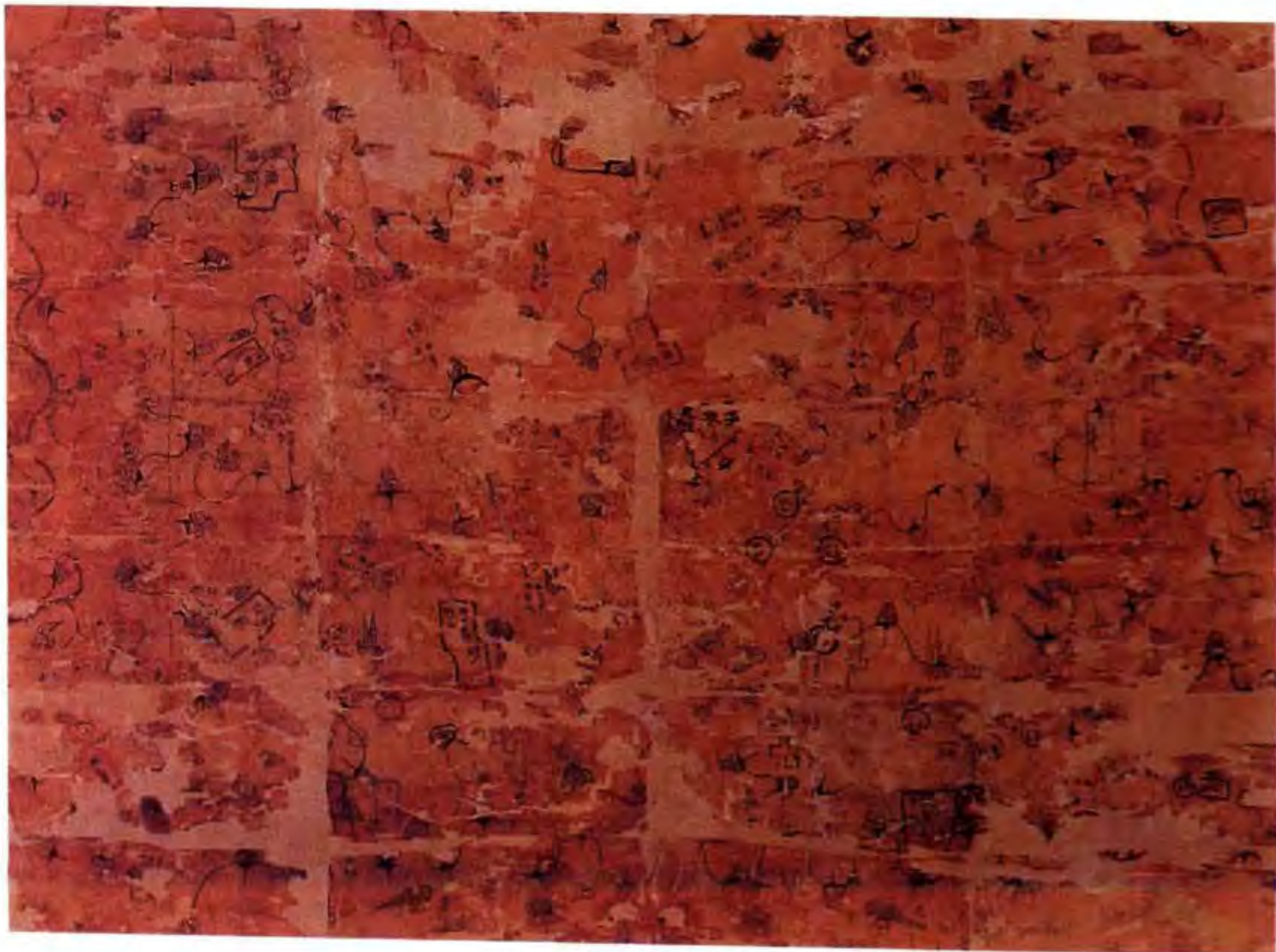
如此精确的地动仪是如何运作的呢？1951年，王振铎先生根据史书的记载，复原了张衡的候风地动仪。这件地动仪的工作原理是“倒立摆”。所谓“倒立摆”就是个尖脚棒槌，直立在那里，一有地震它就倒了。模型中这个棒槌站立在大尊中央，周围对称地设有八套杠杆机构，棒槌倒向哪方，就砸开哪边的

机关，与这个机关对应的龙嘴里的球就会掉下来。王振铎先生的这台复原模型成了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象征物。但最近几年，李超雄先生对王振铎先生的复原模型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史书记载中的地动仪“中有都柱”不能理解成“倒立摆”，整个地动仪是个高大的铜尊，高度超过2米，最大直径1.8米。这么大的铜尊本身重量就有两吨，这与那条轻盈无根的棒槌怎么也配不上。特别是倒立摆不可能有足够的灵敏度。李先生认为真正的候风地动仪的都柱应该是粗0.4米、高2.3米的铜柱，重约两吨。它有个底座，座下面有八个铜球作滚珠，可以水平滑动。但是没有地震它一点都不会动，因为有八个关从八个对称方向把它顶住了。如果有地震，关就会向中心挤进，那条靠近都柱、向下悬垂的杠杆（牙机）下端就会向外移动，于是原来被牙机下端（机牙）压制着的推球杠杆（龙机）便被释放开，以重力作用自然倾倒向外，推动铜丸下落。李先生认为，从物理推算可以证明，如此设计的候风地动仪要比王振铎先生的倒立摆灵敏上

长沙国南部驻军图

西汉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





长沙国南郊地形图

西汉

1973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墓出土

百倍，他正在尝试将自己的设计方案变成实物模型。

在国外，直到13世纪，在波斯马拉哈天文台才有类似仪器出现。到18世纪欧洲才出现利用水银溢流来记录地震的仪器。因此，张衡的地动仪制造和观测地震的成功，是世界地震史上的一件大事。

三、最早的纸地图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的一次考古发掘，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大风波，特别是研究中国造纸术的领域，更是争论纷纷。这是一座西汉文景时期的墓葬，在棺内死者的胸部，发现了一块残长5.6厘米、宽2.6厘米的大麻纸残片，这是不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纸，是专家争论的焦点。学者们除了研究纸的原料外，纸的内容也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在平整、

光滑的纸面上有用细黑线条绘制的山、川、崖、路等图形，原来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绘地图，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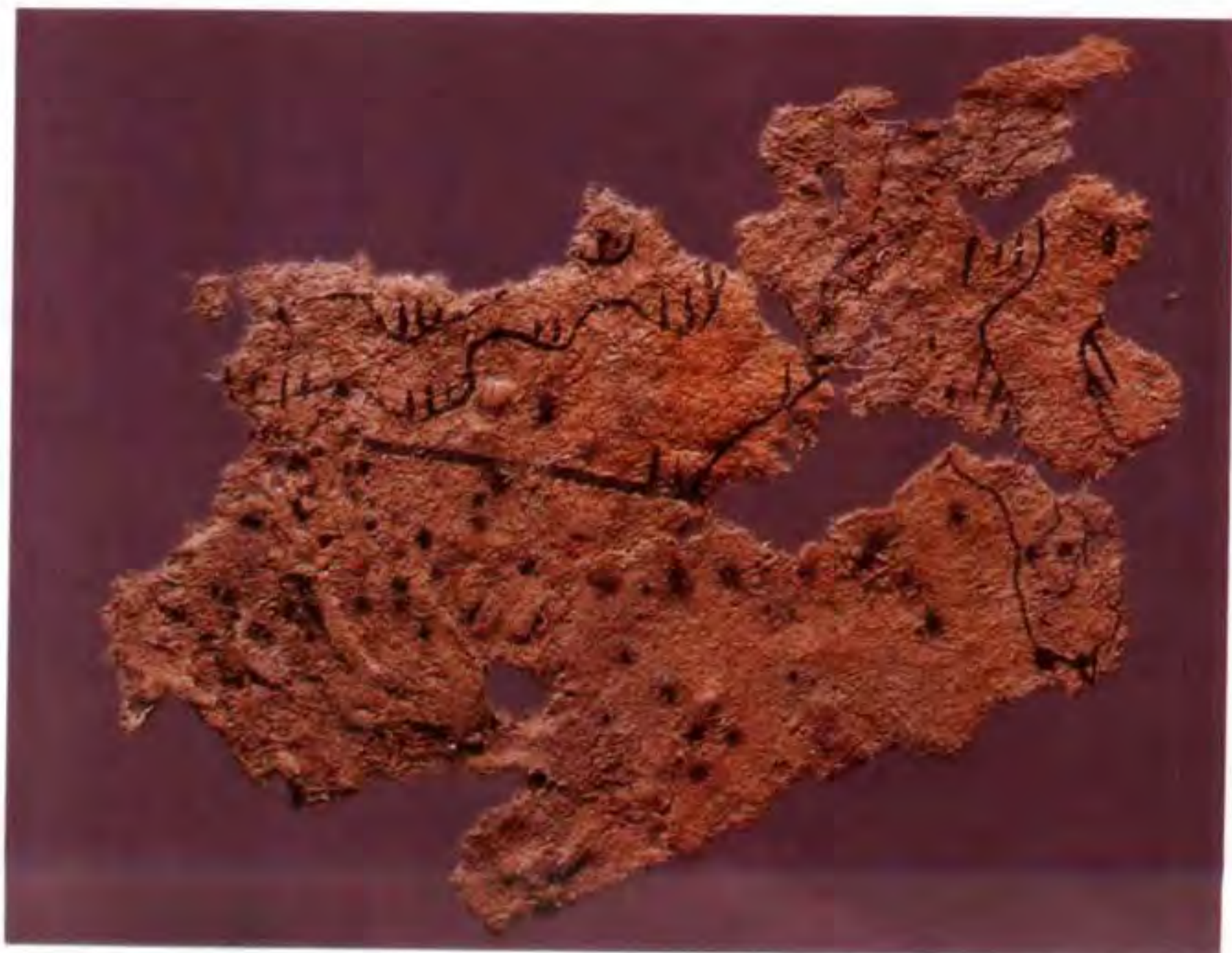
秦汉时期的地图除纸制的外，还有绘制

纸地图

西汉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5号汉墓出土

最大残长8厘米



帛书《五十二病方》

西汉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

长430厘米



在木牍上的，出土于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绘制在帛上的三幅地图，第一幅为地形图，第二幅为驻军图，第三幅为城邑图。特别是地形图，绘制的是今湘水上游潇水流域、南岭、九嶷山一带。在这幅图上，对于水系、地貌、居民点、交通线等都作了较详细的标示，具备了今天绘制地图的基本要素。其中河流的流向、山脉的走向都相当精确，说明当时已有了比较准确的测量技术。考古工作者以这幅地形图中所标城邑位置为线索，经过实地勘查，找到了汉代许多古城遗址，足以证明地形图的可靠性，表明在西汉初期中国的测绘地图技术已达到了惊人的高度。

第三节 医学保健

考古发现的大量医书和医疗文物，反映了秦汉时期临床医学的发展。张仲景奠定了中国中医学的基础，华佗是中国外科学领域

“医工”铜盆

西汉

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
口径27.6厘米，高8.3厘米

开山式的人物。《导引图》让我们对中国古代的养生和体育健身有了一个更为形象的认识。

一、简帛医书

秦汉时期的甘肃、新疆一带,设置了许多亭燧设施,这些亭燧设施相当于后世的边防哨所,保证了中原和河西走廊不受匈奴族的干扰。居住在亭燧中的官兵们,来往公函和私人信件多写在简牍和帛书上。20世纪初以来,在这些亭燧沿线或邮驿沿线遗址出土了大批汉代简牍,其中有关医药方面的简牍数量虽然较少,且多残缺不全,但其价值却弥足珍贵。这不仅因为这批简牍书写年代早,而且由于它是戍边吏卒亲手所书,未经任何篡改,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中国留存下来的最古老的药方。1972年在甘肃武威发现了一座东汉时期的墓葬,墓主人是一位年逾七十的医学家,约死于东汉早期。墓主人生前行医,在治疗许多病症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死后把这些病方随葬在身边,让后人佩服他精湛医术的同时,也让我们了解了当时西北地区医药学的真实水平。这些病方写在木质的简牍上,内容颇为丰富,包括临床内、外、妇、五官及伤寒杂病等方剂三十六则,列举的药物有一百多种,所以又称《治百病方》。其中对这些药物的炮制、剂型及用药方法,也有详细的记载,是汉代有关诊断、治疗、处方用药



铜药臼

汉
湖南长沙出土

以及医学理论等方面的比较完整的医药专著。在这部《治百病方》木简牍中提到药物要用铜器冶合的要求,解释了为何出土的汉代医疗器具多为铜制品。如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医工”铜盆,是中山王刘胜内府所用的医用器具。从器具外壁距口沿3厘米以下铜色发黑的现象来判断,它可能是隔水蒸药用的器皿。而且由于长期使用,盆的口部和底部各有一处修补,用铜钉铆合。同墓还出土了挑取药末用的铜匕、过滤药渣用的铜圈底皿、冷却药物用的带流铜三足器等等。满城汉墓还出土了用



银漏斗(左)和长流银匜(右)

西汉
河北满城汉墓出土
漏斗高5.2厘米,口径3.8厘米。
匜高3厘米,口径6.4厘米,流长6.6厘米



针灸画像石拓片（局部）

东汉
山东微山两城出土

银制成的灌药器，如带流的小银皿和银漏斗，是对危重病人进行急救时将药灌入喉中或鼻子中所使用的。

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也是抄成于秦汉时期的一部医方书。它记载了治疗五十二类疾病约一百零三种病症的二百八十个药方，内容涉及内、外、妇产、小儿及五官等科，用药共二百四十三种。在长期的医疗实践和生活实践中，人们的药物知识逐渐积累、不断丰富。一些出土文物也对西汉时期的药学发展情况有所反映。如在马王



金医针

西汉
1968年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
长6.5厘米，直径0.12厘米

堆1号汉墓出土文物中，发现死者手握的两个香囊以及樟箱中存放的两个熏炉、四个香囊、六个绢袋、一个绣花枕中，都装有辛夷、花椒、茅香、佩兰等芳香药品。这些药物含有挥发油，内服可驱风、发汗、祛痰、利尿，外用可杀菌，既适用于皮肤及环境消毒，又能起到散发芳香、矫正气味的作用。汉代用这些药物来殉葬，说明当时的人们对这些药的性能及功用已相当了解，并养成随时佩戴、随时应用的卫生习惯。

二、针灸画像石·针灸木人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早上，春秋的一个小国——虢国的太子遽然倒下，一命呜呼。虢国沉浸在悲痛之中，全国都在为太子准备丧事。一个叫扁鹊的游方郎中路过虢国，听到太子的死讯，详细询问了太子发病经过和死亡时间后，就请人报告国君，说自己可以救活太子。扁鹊到了宫中，细心地为太子切脉，又周到而仔细地对太子作了观察，然后说，太子脉搏紊乱，所以静如死亡，只是暂时“尸厥”（休克或假死）。扁鹊在太子头顶、胸部和四肢的一些部位进行针刺，不一会儿，太子就苏醒过来。扁鹊又给太子服药，并在两肋下热敷。又过了一些时候，太子竟然坐起来了。虢国太子死而复生，成为当时人人传诵的佳话，扁鹊高超的医术也顿时传遍天下。这是史书中关于扁鹊针灸救人的记载。有趣的是山东微山两城出土了东汉时期的画像石。石的一端刻着一个鸟身人，它的对面是依次跪坐的病人。鸟身人一手为患者切脉，另一手正持针准备刺穴；病人手上已经扎了数针。这个鸟身人就是扁鹊，由于对他的崇拜，后人把他神化了。画像石的内容是神化了的扁鹊针灸行医图。

针灸学在秦汉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自古，南方就盛行针法。1993年春，在四川绵

阳市永兴镇双包山发掘的2号西汉木椁大墓后室中，出土了一件髹有黑色重漆的小型木质人形，其上有红色漆线的针灸经脉循行径路，但无文字及经穴位置标记。这些遍布于全身的经脉循行径路，在黑漆的烘托下格外清晰分明。这是迄今为止不仅在中国，也是在上世界上所发现的最早的标有经脉流注的木质人体模型。此墓大约为汉文帝与景帝时期。针灸木人出土地位于涪江之畔。涪江即汉代的涪水。据《后汉书》记载，在这里曾产生过著名针灸家涪翁及其弟子程高、再传弟子郭玉。郭玉在东汉初任职太医丞，史书记载他曾受汉和帝之命为贵人治病“一针即瘥”。至于涪翁，不仅针术高明，医德超群，而且还撰有专门的《阵经》与《诊脉法》等书。由此可知，这件类似教学模具的针灸漆木人出土在涪江之畔就不足为怪了。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帛书《经脉》中论述了人体内十一经脉的循行，主病和灸法的古灸经，是有关中医学理论基础的经脉学的古文献。《黄帝内经》中对针刺疗法的解释极为详尽，介绍了九种不同的针，因用途不同，九针可分大针、长针、毫针、圆针、锋针等类型，长度约3厘米到24厘米不等；并为人体表面的365个穴道命名，同时按适于医治哪些病痛和疾病方式编列。至于制针所用的各种不同原料，书中指出金针虽然价格昂贵，但医治某些疾病格外有效，因其能刺激身体的功能，而银针则有显著的镇静作用。河北中山王刘胜墓出土有四根金针、五根银针，有的残破不能识别针型，能识别的有金质毫针、锋针和银质圆针。

三、张仲景与华佗

东汉时期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名医张仲景和文学家王粲初次见面时，张仲景再三审视王粲的容貌后，提醒王粲有疾病，需赶



针灸木人

西汉

1993年四川绵阳永兴双包山
2号墓出土

快服药，不然几年后就会眉毛脱落，甚至有生命危险。王粲认为张仲景是危言耸听，并没在意。过了很久，两人又见面，张仲景询问王粲是否已经服药，王粲谎称他已经服过了。张仲景依王粲的脸色判断他在撒谎，并再次提醒他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又过了几年，王粲果然眉毛全脱落，不久就死了。这个故事反映了人们对张仲景医术的推崇。张仲景医术的最高成就集中在《伤寒杂病论》和《金匱要



张仲景像

华佗像



略》两部医书中。

在《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系统总结了汉代以前诊治和治疗多种外感性疾病的经验，从病理、疗法、方剂和药性几个方面论述了伤寒病，可以说是创立了伤寒学说。他特别讲究诊断学，发展和完备了“辨证论治”的传统理论，在诊视中，他提出了先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来辨识病症属于哪一种类型，再用八种辨证法来分清疾病部位的深浅、病情的盛衰，作出最后的诊断，然后再对症下药。《金匮要略》论的是杂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内科为主，也包括外科、妇科、皮肤科等。《金匮要略》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本论点，认为疾病的产生都是整体功能失调、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的反映，从而提出了脏腑经络病机与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相结合、病与证相结合的辨证方法，为后世脏腑辨证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张仲景的这两部医学著作，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基础，直到今天还是学习中医的必读典籍。

三国蜀将关羽刮骨疗毒、谈笑风生的故事家喻户晓，为关羽刮骨的是生活在东汉末

年的著名医学家华佗。各种演义传说在赞叹关羽的勇敢时，都特意渲染关羽在整个刮骨过程中，一边豪饮，一边谈笑，自始至终都处在清醒状态。但具体的史实如何呢？关羽是否服用了华佗发明的麻醉药？这些只好留与人们去猜测。

华佗在中国医学上的主要贡献是麻醉学。史书上记载，华佗发明了一种名为“麻沸散”的麻醉药物，他让病人以酒服“麻沸散”，待麻醉成功、病人失去知觉后，便为其动手术。华佗曾熟练地做过腹腔肿瘤摘除手术和胃肠部分切除吻合手术，其手术切口四五天即可愈合，与现代手术的愈合期一致。华佗能在全麻下精巧地完成各种手术，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麻醉学和外科手术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所以华佗被后世尊为“外科鼻祖”。

四、《导引图》

华佗不但创造了麻醉法，而且还编制了一套养性导引的健身操——五禽戏。这套健身操没有使华佗长命，因为华佗不肯作曹操的侍医，终遭杀害。而在华佗的弟子中，有一个叫吴普的，他遵从老师华佗的教导，平时坚持操练五禽戏，九十多岁时仍耳聪目明，牙齿完好无损，而且身体有病时，可以依赖操练五禽戏而治愈。五禽戏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后世导引养生术的发展，同时为后来一些象形拳的创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五禽戏到底是什么样？它是通过什么原理来达到健身效果的呢？长期以来人们只能通过字面去理解和想象，而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发现的一幅帛画，让人们在五禽戏有了一个更为生动形象的了解。

这幅帛画出土于长沙马王堆3号墓，是一卷图文并茂的彩色画，在长1米、宽0.5米的

画面上，用红、蓝、棕、黑各种颜色，分四排描绘了44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穿短衣短裤，有的穿长袍，有的光背；大部分徒手，少数手持器械。这些人物都是用工笔彩绘在绢帛上的，每一个人有一个运动姿态。图画原无标题，但从人物的运动姿态及所标文字内容来推定，这就是古代的《导引图》。这幅《导引图》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描述运动姿态，有伸展、曲膝、体侧、腹背、转体、全身跳跃、舞蹈等肢体运动，有呼吸运动，有使用棒棍、沙袋、盘碟、球类的器械运动。例如图中有一幅“以丈（杖）通阴阳”，所画的是一个穿裙子的妇女，手执木棍，弯腰下俯，利用棍棒使双手呈直线状极力展开，以此来促使人体上半身位置下移，下半身位置相对上举，以“调和阴阳”。第二类主要说明这些运动模仿哪一类动物，如鸛背、龙登、猿呼、熊经、猕猴喧闹等等。“熊经”，画的是一男子穿长袍，模仿笨熊爬树；“信”画一男子，赤背，着短裤，弯腰向前，两手支地两腿紧靠，头向前伸，两眼正视前方，犹如小鸟舒展身体

并呼吸空气。第三类说明每种运动所针对的病症，数量最多也最重要，如引聋、引项、引热、引积等等。“引”就是用导引术来治疗某种疾病。

中国古代的导引，是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一种医疗体育方法。体育健身法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人们在同疾病和衰老作斗争中，不断创造各种导引术式，通过人的躯体与呼吸运动，达到强健身体、防治疾病的目的。那么导引是怎样起源的呢？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载，说是在唐尧时代，由于水道壅塞，人们心气郁闷，筋骨淤塞，尧教大家跳舞来宣导气血筋骨。这一记载真实性如何无从考证，但它说明，古代导引不仅历史非常悠久，而且很可能来源于舞蹈。“导引”为什么能够防治疾病，它的理论根据究竟是什么？用一句简单的成语来解释，就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属于肢体部位的疾病通过肢体运动来防治，有关内脏部位的疾病则用导引和呼吸法，局部活动不便的可以进行按摩。有关“导引”的古代传说也非常多，史书上记载了

帛画《导引图》(临摹)

西汉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



不少神仙之类的导引术式。其中彭祖导引法中说,导引可除百病,延年益寿。彭祖为殷大夫,经商周数代,活了七百余岁。显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它告诉人们,适当的运动可以使人健康和长寿。汉代张良为刘邦夺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张良多病,就曾导引辟谷。辟谷就是不吃粮食。

汉代非常重视体育医疗,长沙马王堆3号墓还出土了《养生方》竹简,其中《十问》一章,记载有黄帝及古代帝王与医家的对话,以及其他传说人物谈论养生、服食、呼吸、吐纳及房中术等方面的医学理论。简文中具体谈到了“精”、“气”和“神气之道”,以及吐故纳新、气候变化与有关保健方面的道理。同墓出土医书中的《却谷食气》,是西汉早期抄写的行气导引专论。文中叙述了行气导引方法和四时食气宜忌,提出随年龄的增长,要逐渐增加练功的次数,具有一定的科学性。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的竹简《引书》,则用文字详细讲述了导引的各个动作及疗病之法,表明了导引术与医学理论的结合。

第四节 文学史学

汉代文学以汉赋、乐府诗歌为代表。汉代的史学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为集大成之作。

一、江苏尹湾《神乌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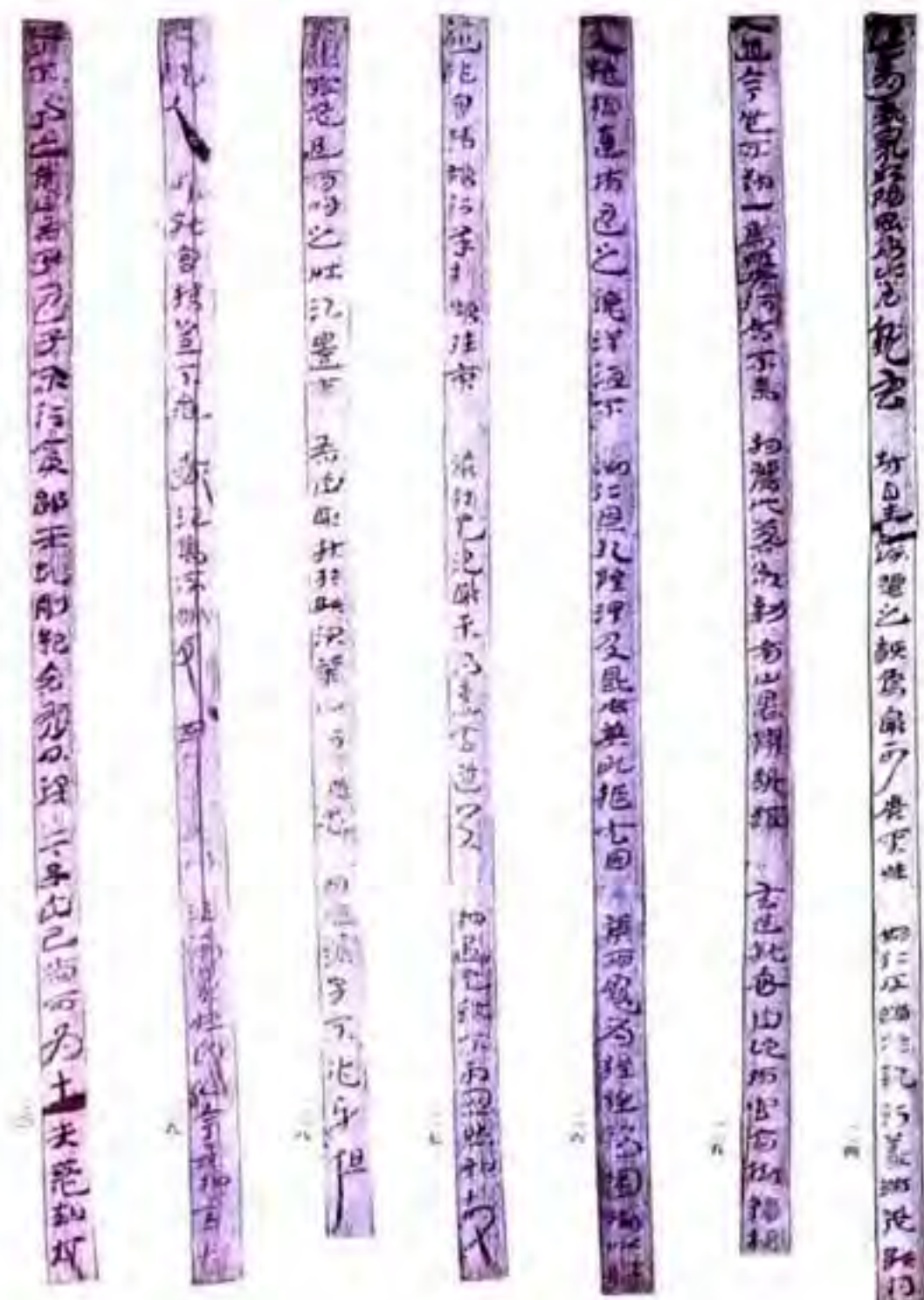
1993年,在江苏东海温泉镇尹湾村西南的高坡岭上,一群取土的农民意外地发现了古墓,消息传出后,立刻引起了文物部门和各方面专家的关注,经过发掘,发现这是一座西汉末期的墓葬,从所出土的数百枚竹简中,石破天惊地发现了中国古代诗赋珍品《神乌赋》。赋的竹简共计21枚,每枚约长23.5厘米,宽0.9厘米,全篇约640余字,首篇顶部书写隶书标题“神乌赋”,正文用草体书写。《神乌赋》是一篇基本完好的文学作品,全文采用拟人的手法,生动地讲述了一个雌乌护巢的故事:在乌(乌鸦)的家族中,有一对恩爱勤劳的夫妻乌,雌乌美丽、贤惠,远近闻名,被称为神女乌。夫妻乌为筑新巢,不辞辛苦,眼看大功告成,可是有一天来了一只凶猛的盗鸟,他不劳而获,偷走雌乌筑巢的材料,雌乌与盗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最后雌乌受伤而亡。临死时雌乌与雄乌悲戚诀别,表现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在接近末尾处,以“鸟兽且相忧,何况人乎”一语点出了主题。

赋是汉代最为流行的文体。赋之于汉,如同诗之于唐,词之于宋,曲之于元,小说之于明、清,堪为汉代文学的范型和代表。汉赋有两种,一种是骚体赋,一种是散体大赋。骚体赋是由楚辞发展而来,汉代骚体赋的重要作家有贾谊、枚乘等。以贾谊《吊屈原赋》最为有名,感情激越,哀婉凄清,为历代传诵之佳作。散体大赋在汉武帝至成帝时进入全盛阶

《神乌赋》竹简

西汉

1993年江苏东海温泉镇尹湾村出土



段。当时的统治者喜好这种文学形式，不惜安车蒲轮迎纳创作成就卓著者，更促使文人们殚思竭虑，驰骋才华，在辞赋创作上一展身手。散体大赋的特点是铺陈写物，长于宫殿建筑、田猎巡游等壮观场景的描写和品物的形容。著名赋家及作品有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扬雄的《甘泉》、《羽猎》，东方朔的《答客难》等。其中以司马相如名声最著。他的《子虚》、《上林》以游猎为题材，以假设的子虚、乌有先生和亡是公等几个人分别铺叙自己所见所闻的方式，叙述了宫苑之堂皇，狩猎场面之壮观，物产之丰饶，林木之茂盛，江山之秀丽。作品气势恢弘，词藻华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司马相如把汉赋发展到了极致，“千金难买相如赋”，显示了他独领风骚、卓然不群的文学地位。他的赋作成了后世赋家争相模仿的典范。

上述的《神鸟赋》以拟人的手法表现了雌乌和雄乌的坚贞爱情，而《孔雀东南飞》则以诗歌的形式描写了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二人生不能同衾则死同穴的深情同样感人泪下，是汉代文学的另一代表作。与宫廷气息浓厚的辞赋相比，诗歌则更多地反映了民间生活，它语言清新朴素，自然活泼，富有生活气息。流传下来的汉代民歌，大部分见于“乐府诗”中。汉朝掌管乐舞的乐府，采集民歌，加以润色，配合乐曲演唱，称为“乐府诗”。乐府民歌继承和发扬了古代民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对于当时和后世的诗歌有很大的影响。汉代民歌的体裁形式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而以五言为多。五言诗是汉代新兴的文学体裁。《古诗十九首》是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杰作，它绝大部分是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作品，主要反映他们的仕途生涯和家庭生活。诗句多抒写离别相思，有思妇闺怨，也有游子乡愁，共同的主题思想是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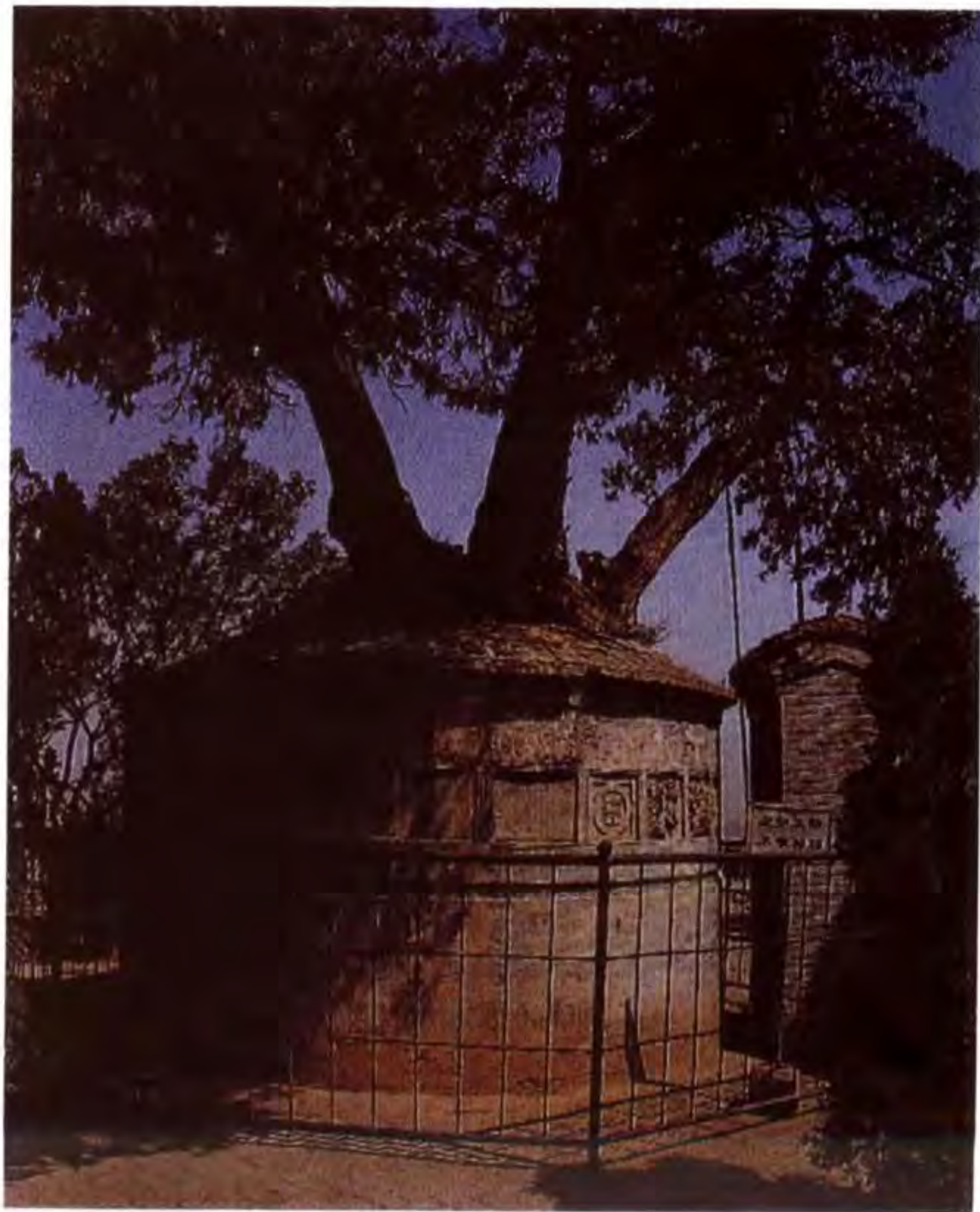
达离恨之苦，希望夫妻团聚，怨恨虚度青春。

其中《冉冉再生竹》写的是新婚夫妇的离愁别恨。“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妻子的孤独、凄苦和对迟暮的恐惧，跃然纸上。

二、汉太史公祠墓

西晋怀帝司马炽是一个短命而平庸的皇帝，在位七年，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但他在公元310年的一项举动，或许会让人们在回顾历史时对他产生一丝印象。310年，晋怀帝即位第四年，面对洛阳城内的饥荒和全国范围内的蝗灾，年轻的怀帝一筹莫展，痛苦中的他突发奇想，认为自己是司马迁的后裔，便下令在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可以东望黄河的梁山上修建了“汉太史公祠墓”。晋怀帝

司马迁墓



司马迁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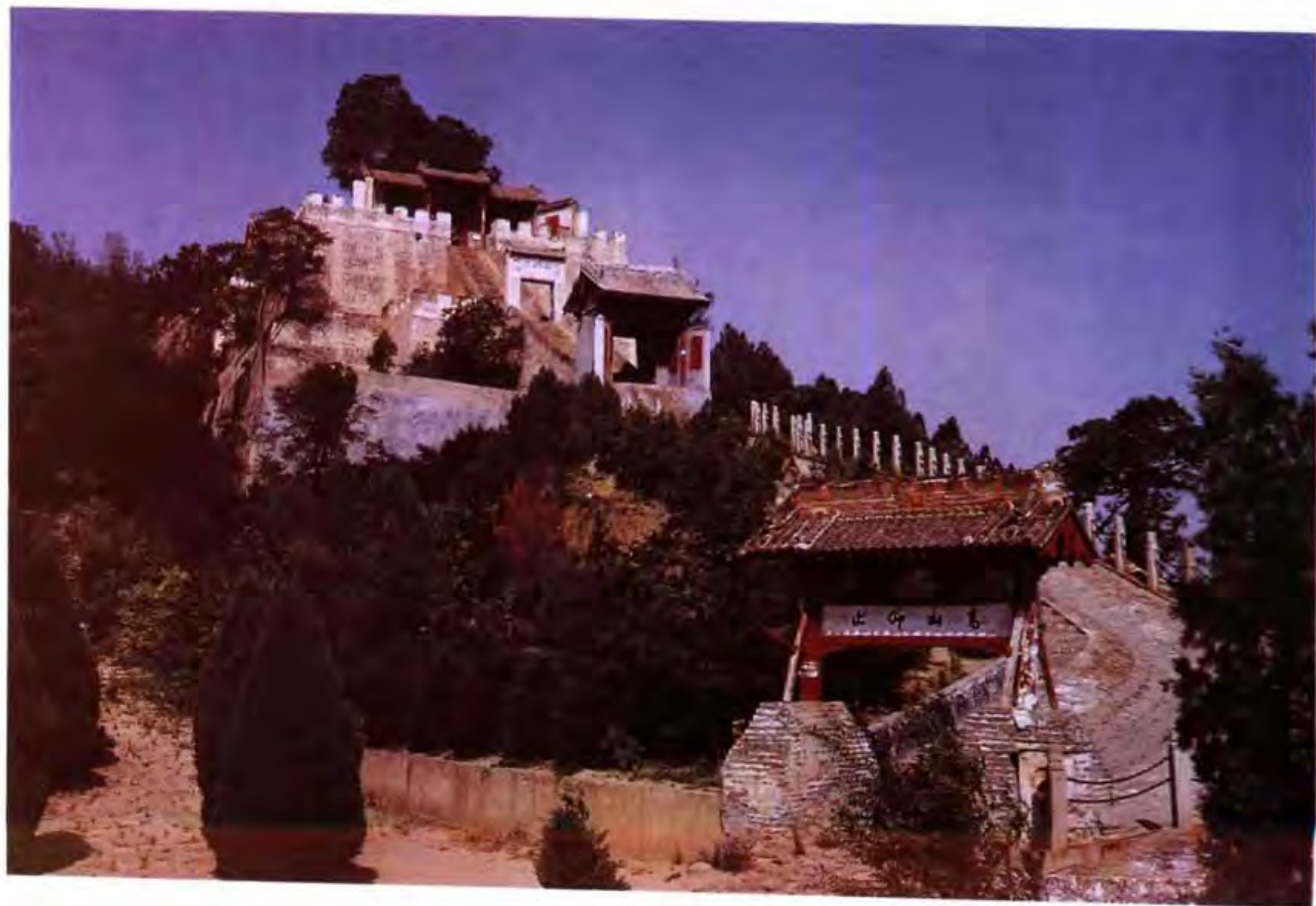
是否想通过司马迁祠墓来给自己留下美名，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他的这一举动，毕竟为后人提供了瞻仰凭吊这位伟人的地方。

现存的“汉太史公祠墓”是后代重修的。祠墓屹立在悬崖峭壁之上，气势雄伟壮观。芝水在山下环绕而过，通过芝水上的芝阳桥，一条大石铺就的马道依山势逐级上升，直通祠、墓前，这条石路名叫“司马坡”。大路上有牌坊题名“汉太史公祠墓”。祠用砖石依山势筑成四个高台。每个高台之间有石级相连，层层

上升，前面三个台上都有建筑物，最后一层就是砖砌的司马迁墓。墓呈圆形，墓顶有古柏五株，墓冢以青石包砌，青石上雕刻有花草和八卦图案。祠庙内有历代文人名士瞻仰凭吊时立的碑碣。站在太史公祠墓前，眺望滚滚而去的黄河，有多少人曾感慨司马迁坎坷不平的遭遇，又有多少人为他的文章和人品所折服！“千秋太史公，文章百代雄”，一部“史家之绝唱”的宏著《史记》，让人们了解了中华民族的一段历史，也让人们永远记住了它的作者——司马迁。

《史记》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五部分，全书共130篇（卷），52.65万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所记载的历史时代，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绵延三千年。它所囊括的地理范围，西到中亚，北至大漠，南至越南，东到大海。书中对于三千年历史的方方面面以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栩栩如生的描述，可以说是一部组织严密、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司马迁以他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整体认识，以及表述这种理解和认识的杰出才

司马迁祠



能，为史学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弘气象，对纪传体史书的发展以至整个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史记》是一部成功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史兼美的佳作。它的语言简洁、生动、传神，在铺陈形势、描写场面、塑造人物、摹写战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在司马迁笔下，历史人物神采飞扬、跃然纸上，鲁迅先生用“无韵之《离骚》”来评价《史记》在文学上的成就再恰当不过了。

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年少时即立下壮志要撰写一部伟大的史书。为此，他博览群书，并四处游历，寻访古迹，体验各地风貌。三十七岁时因为李陵辩护而受“腐刑”，这一沉痛的挫折非但没有磨灭他的雄心壮志，反而成为激励他完成《史记》的强大动力。四十六岁时他完成了《史记》的创作。通过他的笔触，我们了解到了许多或高贵或卑贱的历史人物的不同结局，而他本人却杳然不知所终。我们在欣赏《史记》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成就时，会不由得感叹司马迁一生的不幸遭遇，也不得不钦佩他伟大的人格魅力。

秦汉时期史学上的重要成就还表现在另一部史学名著《汉书》上。《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所记基本上是从汉高祖初到王莽败亡的西汉（包括新朝）230余年的历史。全书80余万字，原为百篇，后人析为120卷。由纪、表、志、传四个有机部分组成。《汉书》创造了反映一代皇朝史事的历史撰述形式，成为历代纪传体皇朝史的楷模，是中国封建社会史学的骨干——“正史”格局形成的标志。

第五节 乐舞百戏

“乐府”铜钟的余音能让我们感受秦朝的乐舞艺术。汉代的楚舞从出土的文物中得到反映。各种高难度的杂技节目代表了汉代百戏艺术的最高成就。大量文娱文物的出土反映了秦汉时期贵族阶层的娱乐活动。

一、珍贵的“乐府”铜钟

前279年，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酒宴上，秦国国君昭王依仗强大的兵势傲慢无理，让赵王弹琴为喝酒助兴，并让身旁御史以“秦王与赵王会于渑池，秦王命赵王鼓瑟”之类的词语把此事记入史册，以羞辱赵国。随赵王出使的蔺相如顺手拿起一只瓦盆，从容地走到秦王面前：“赵国大王也听说秦王善于演奏秦国的乐器，就请大王击缶以同乐。”秦王虽很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只能接过瓦盆，用筷子敲击。蔺相如命赵国的御史以“赵王与秦王



乐府铜钟

秦

1976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园
遗址出土
高13.3厘米

奏乐木俑

西汉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

通高32.5厘米至38厘米



会于浞池，赵王命秦王击缶”的话语把此事记录史册。秦赵浞池相会的故事，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处于西北地区的秦国，早期乐器并不发达，且极为简陋，不过是击筑、叩缶而已。后来又有秦始皇爱听高渐离击筑，几乎被高渐离刺杀的故事，更使人们相信了《汉书·礼乐志》中记载的内容：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乐府是皇家庆典和祭祀时管音乐的官署，过去以为乐府最早产生于汉代。然而1976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园遗址出土的一枚错金银钮钟，改变了人们的成见。该钟为青铜铸造，高13.3厘米，两铣间7.2厘米，鼓间5.8厘米，舞广6厘米×4.8厘米。钟的钲部和鼓部为错金蟠螭纹，篆间及钟带为错金流云纹，花纹细密而清晰，豪华典雅，虽在地下埋藏了

两千多年，出土后金银花纹依然清晰完整，充分体现了当时冶金工艺发展的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在钟钮的一侧发现刻有小篆字体“乐府”二字，从实物上首次证明了乐府的最早建立是在秦代。经过音乐家测试，这口乐府钟的内壁有调音带四条，其音为C调，造型工艺和音质都是秦代乐器所罕见的精品。更为重要的是，考古人员又在乐府钟出土处发现了乐府遗址。这里曾仿秦咸阳都城的设置，建有乐府官署，有各种祭祀用的礼乐，同时有一批乐人在此常驻，每逢祭祀之日便奏起礼乐，钟磬齐鸣，百官同祭。秦始皇在兵扫六国时，被六国那美妙的音乐、富于魅力的舞蹈所倾倒，觉得祖先流传下来击瓮叩缶的声音，远不能和六国妙音相比，从此，曾陶冶了秦人风尚数百年的古朴的“秦声”从国君的酒宴中悄然离去，流传到民间，而东方的《郑》、《卫》、《韶》、《虞》逐渐成为秦国乐坛的主流。可惜这个乐府仅存在了两年多，就在项羽大军的火烧之中变为尘土瓦砾。

瑟

西汉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

长116厘米，宽39.5厘米



真正推动乐府获得重大发展，使乐府性质发生变化的是汉武帝时期。当时的乐府设

在供帝王游猎的上林苑，主要职能是为宫廷采集全国各地俗乐，为祭祀、朝贺、巡幸、宴享等各种场合提供仪式性或观赏性音乐歌舞项目。乐府是当时最高级的音乐官署。在中国古代，根据音乐的演出场合和性质分为雅乐和俗乐。雅乐是古代祭祀天地、祖先和朝会、宴享时使用的正统音乐。汉代的雅乐更趋僵死和仪式化，难以引起人们的共鸣，所以雅乐所使用的大型打击乐器，如编钟、编磬等在汉代遗址中很少发现。俗乐是当时流行的民间歌舞。汉代是中国俗乐大发展的时期，汉代画像石（砖）墓、壁画墓以及器物的纹饰图案上，都刻绘有许多汉代乐舞百戏的图像，正是这种习俗的一个具体反映。汉武帝大兴乐府，促使俗乐在宫廷取得了难以动摇的地位，给中国音乐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东晋六朝以后，把乐府所唱的诗称之为“乐府”，这样，乐府就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并沿用至今。

二、楚歌与楚舞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汉高祖刘邦率军平黥布之乱后，路过故乡沛县时作的《大风歌》，词意奔放，是成功者的凯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这是刘邦为宠妃戚夫人舞蹈时即兴伴唱的楚歌，词意悲切，无可奈何，绝无“大风起兮”的豪迈气概。当时刘邦欲废太子，改立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由于吕后采用张良的计策，为太子请来了商山四皓，使刘邦的计划落空，戚夫人的悲惨结局也成为必然，刘邦与戚夫人相对凄然，戚夫人哭泣，刘邦对她说：“你为我跳楚舞，我为你唱楚歌。”刘邦那或慷慨激昂或凄婉悲凉的楚歌，我们再也听不见了；戚夫人动人的楚舞，我们再也看不见了。所幸的是流传下来的



彩绘陶舞俑

西汉

1954年陕西西安白家口出土
高50厘米

这件彩绘陶俑抓住了舞女舞动长袖的一刹那，把轻盈、舒展而柔美的长袖舞刻画得生动传神。

楚歌歌词，让我们可以借以揣度楚歌的韵律；众多的历史文物，让我们可以感受楚舞的美妙动人。

两汉四百余年，楚歌、楚舞风靡全国。汉高祖刘邦是在楚文化的氛围中成长的。他周



玉舞人

西汉

1983年广东广州南越王墓出土
高4.9厘米

观伎画像砖

东汉

1954年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
高40厘米，宽48厘米

围的核心人物中，萧何、曹参、周勃、樊哙等都与刘邦同为沛人，其他将相虽非楚人但亦多习楚风楚俗。正因如此，汉初从皇帝到将相多喜好楚的文化艺术，特别是楚之歌舞。在西汉军队中，楚歌甚为流行，项羽就是在“四面楚歌”中结束霸业的。从传世的楚歌歌词来看，楚歌语言清新活泼，平易通俗，句式灵活，

或长或短，音节自然流畅，一些乐句之中或末尾往往有一“兮”字作拖腔。楚歌的这些特点使得它声长情深，既能低吟曼唱，又能引吭高歌，很适于抒发深沉激昂的感情，正符合汉人奔放、浪漫、豪爽和深情的性格需要，因而容易引起共鸣，广为流传。

与楚歌相辅而行的是楚舞的发展，楚舞

陶舞俑

汉

河南洛阳出土

高13厘米至16厘米



的特点是飘逸、轻柔、敏捷、激越，这种特色主要从腰与袖两个角度反映出来。文献中形容楚舞有时像一道长虹横空而现，有时似一缕烟云冉冉升腾，给人以飘洒的美感和游龙登云的神韵。《西京杂记》中记载，刘邦宠妃戚夫人擅长“翘袖折腰”舞。汉代画像砖上、陶俑中表现这种舞蹈的内容丰富而多样。曾出土有许多汉代玉雕舞人，舞者身穿斜襟镶边长裙，右臂上举，长袖高扬过头，又顺左肩垂拂而下，左手抚腰，长袖顺裙边卷曲向上，纤细的腰肢向右扭去，衣裙下摆飘向左方，体态轻盈，婀娜多姿。河南南阳和山东微山的汉代画像石上展现的翘袖折腰舞人，侧体折腰成90度，双袖翘起，舞姿似弱柳临风，飘拂不定，既婀娜多姿，又妩媚动人。与长袖折腰舞相似的是巾舞，又称“公莫舞”，在汉代颇为流行，它不用长袖，而是挥动巾绸舞弄。汉代画像石上所表现的巾舞，巾最长的达两丈余。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的汉代乐舞百戏画像砖上，有一舞巾少女，头梳双髻，身穿纹饰镶边宽口袖衣裤，双手各执一条长巾，上身前倾，似正快步奔跃，双臂一高一低，舞巾上下飘飞，状如波浪，恰是张衡《观舞赋》所写的“香散飞巾，光流转玉”的风采。其身后一男

侏儒舞者正兴奋地张口展臂，似正以一种快速向前的“矮子步”急追舞巾少女，形象十分生动。

汉代在翘袖折腰舞的基础上，还流行过一种更为复杂的舞蹈——七盘舞。表演时先在地上排列盘和鼓，舞者舞长袖，在盘、鼓之上或盘、鼓之间跳跃徘徊，既有楚舞中飘逸、高雅的舞姿，又有杂技艺人在盘、鼓之上准确跳跃、掌握身体平衡的技艺。舞者必须且歌且舞，并用足蹈击鼓面，集歌、舞、蹈鼓为节于一体。“舞无常态，鼓无定节”，是汉代盘鼓舞的主要艺术特色，也正是盘鼓舞艺术生命力之所在。

三、百戏艺术

“戏车高幢，驰骋百马，连翩九仞，离合上下。或以驰骋，覆车颠倒。”“突倒投而跟挂，譬陨绝而复联。”“忽跟挂而倒绝，若将坠而复续。”这些都是汉代赋词中对戏车精彩表演的生动描述。“戏车”是指可以用来表演百戏的马车，赋词中所描写的“戏车高幢”，就是把长幢固定在马车之上。对长幢而言，是固定式的，但设在奔驰的马车上，就整体而言，又是移动式的。戏车高幢，表演时既要经受戏车奔

平索戏车画像砖

汉

1984年河南新野樊集村采集
长105.5厘米，宽35.6厘米





驰时的颠簸，还要在高橦上表演各种复杂的动作。因为它难度大，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赋中的描写是夸大之词，或是词赋作者的丰富想象，但1984年河南新野樊集村发现的一块画像砖，让人们多少有点相信了这种高难度的汉代戏车表演。该画像砖分为两部分，右半为车骑出行图，主车两马驾，驭手执轡，主人端坐，前有导车和导骑，桥右两小吏曲身恭迎。车骑出行上方，一人持杖追逐两兽，右上方二人持剑格斗，拱桥下一人荡舟。左半是平索戏车场面，在两辆车上各树一橦，前车橦上一人握橦平撑，橦顶端一人悠然蹲踞，左手拽一人脚踝，右手拉一索，后车上一人正在攀橦，车、橦、索互相牵连，表演者在两辆车子的奔驰晃动和绳索的摇曳起伏中作高难度动作，惊险动人，确实有些出于我们想象之外。

俳优也是汉代百戏的一种。秦时蓄养俳优之风很盛，宫廷中也养有俳优。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修离宫数百所，倡优成千。俳优，相当于现在的单口相声，表演者一般个头较小，靠口舌之利，取悦观众。这种人在秦代很多，如优旃便是其中之一。秦始皇大兴苑囿，东到函谷，西到宝鸡。优旃便向秦始皇说：“皇上的想法很好，园囿修好后，放进许多禽兽，敌人如果从东方进攻，放出园囿中的麋鹿用角就能把他们顶出去。”秦始皇听了以后，就打消了这念头。秦二世有一天忽发奇想，想把整个咸阳城漆一下。优旃又去说了：“皇上这个主意真是和我想到一起了。整个咸阳城都上了漆，敌人根本就爬不上来，真是太好了。”二世便打消了漆城的想法。这便是俳优这类人用幽默的语言、滑稽的行为，在逗人乐的同时，也对皇帝的一些想法委婉地提出了批评。古代人多以举鼎来显示威武有力。秦始皇的爷爷秦武王是一位举鼎高手。有一次，武王与力士乌获进行举鼎比赛，结果乌获两眼出血，



武王折断了膝盖骨，不久便丧了命。项羽也是一位举鼎的好汉。1996年9月，在秦陵的东南角发现了一座巨型陪葬坑，在北坑道内发现了十一件彩绘半裸百戏俑。它们的下身为陶塑厚短裙，裙上有各种纹饰，身体其余部分裸露，肌肤为浅粉红色。这批半裸百戏俑与表情严肃的武士俑不同，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有的俑胸部和双臂肌肉发达，腹部微鼓，肚脐外露，左腿前弓，右腿斜蹬，展现出勇猛剽悍的雄姿。专家们认为，这批陶俑只穿短裙，高大健壮，看来是从事百戏的艺人。其中的5号俑右肋夹着长木柱，很可能是爬竿或武术的用具。这批百戏俑群的发现，反映了秦代的百戏场面颇为壮观。在这个俑坑的上部棚木上还发现一大型铜鼎，双耳，三足，圆形，花纹细密，重212公斤。有专家认为这只铜鼎也应是举鼎时的一件道具。

俳优在汉代也很流行。满城汉墓曾出土两件俳优铜人像。它们身披错金锦纹衣，袒胸露腹，一人盘腿坐，一人跪坐，举手欲拍，表

击鼓说唱俑（左）及其面部特写（局部）（上）

东汉

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
高56厘米

陶奁

汉

1972年河南洛阳出土

高24厘米



情滑稽。四川东汉墓中先后出土多件形象类似的击鼓说唱俑，如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的一件陶俑，袒胸露腹，着裤赤足，左臂挟鼓，右手举槌，神态诙谐，动作夸张，一副活生生的俳优说唱形象，也说明当时蜀地说唱表演颇为流行。俳优在汉代的家庭宴会中很普及，这在出土的陶楼中多有反映。河南灵宝张湾出土的陶楼的门廊下，有俳优作演出状，还有的被安排在陶楼的第二层，对外表演。四川遂宁出土了一座东汉时期的陶楼，屋分上下两层，上层有一人抚琴，一人唱歌；底楼中有一俳优俑，张口伸舌，袒裸上身，左手环抱一鼓，右手抚其头部，左足蹲于圆榻上，右足高抬作表演状，表现了俳优演出的一个场面。

汉代百戏中的杂技和前代的杂技比较，有继承，更有发展，丰富和增加了许多新的表演项目。它的精髓部分一直留存至今。倒是传统的杂技项目，汉代的倒立出现了许多高难度的惊险动作。如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的杂技石刻画上，有一个演伎在飞驰的鼓车竿子顶端作倒立表演，这比起在静立的竿子上

汉代画像石上的跳丸飞剑叠案图



倒立难度要大得多。此外，四川出土的一些画像砖上，有在叠起来的六个案子上作倒立表演的，又有在叠起来的十二个案子上作倒立表演的。1972年河南洛阳涧西出土了一件倒立俑陶奁。在圆奁口沿上，相对倒立二俑，各以一脚在奁上相交，另一腿自然向外伸。第三俑则倒立于二俑相交的腿上。三个俑的倒立造型组合巧妙，高难之中显现了动作的优美。跳丸也是中国杂技中的传统节目，汉代的图像中见到有跳三、六、八、九丸者不等。就目前杂技界，能抛九丸的人也不多，汉代不仅已有能跳九丸者，而且在山东安丘汉墓的画像石中，还看到一个演员同时跳八丸、掷三剑。丸、剑同掷，起落纷繁，节奏急促，更加大了表演难度。

四、陶戏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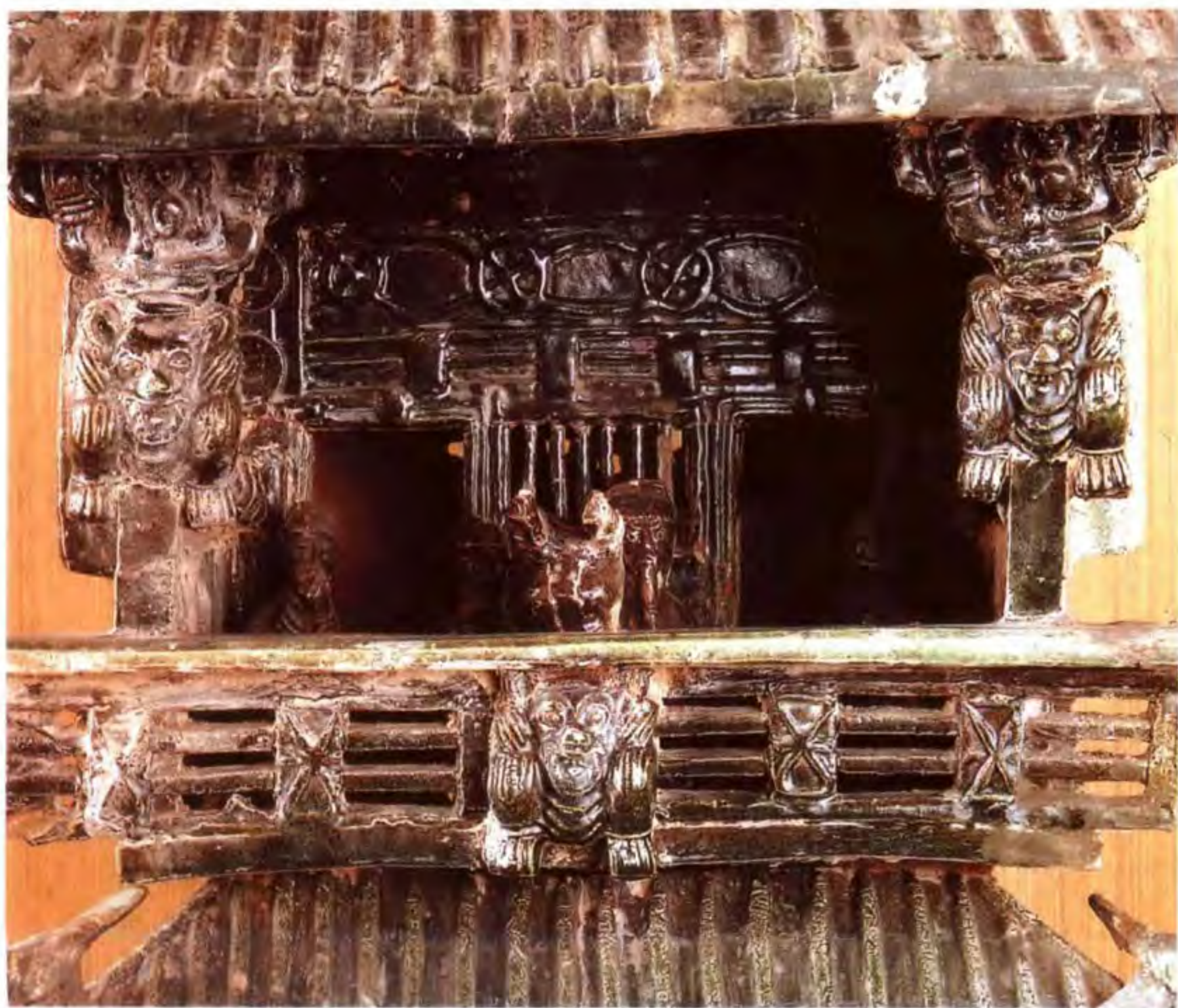
汉代的百戏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而是

随观赏者的需要随处表演。汉代的画像砖、画像石和彩绘壁画，为我们提供了百戏演出场所的形象资料。从这些文物的形象看，当时百戏表演主要是在三种场合举行：厅堂、殿庭、广场。许多汉代画像石（砖）在展现贵族家中的宴饮观剧场面时，都有帐幔悬垂或是屋宇的画面，表明这是室内演出。因为汉代风气，官僚贵戚都拥有众多的倡优女乐，平常在家中或自娱自乐，或宾客罗列，同饮同乐，竞赛豪奢。厅堂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很难满足大规模的百戏演出，很自然一些大的表演就由屋内移至院中，一般是主客坐在堂屋之中宴饮，伎人在庭院中表演。这种殿庭院落式演出的宏大场面，我们在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可以欣赏到。此墓的墓主人曾任使持节护乌桓校尉，治所在宁城县。壁画的正中主体建筑是一座高大的庑殿式堂屋。屋中帷幔高悬，墓主人端坐堂上，一边接受谒者的罗

绿釉陶戏楼及局部（左）

东汉

1975年安徽涡阳大王店出土
高99厘米



拜，一边观赏庭院里的百戏表演。宽阔的庭院中，伎人在中央表演节目，周围排立侍者，再外围则是一圈甲士环立，场面喧闹而隆盛，显示了主人的身分与声威。像奔马戏车一类百戏只有在大的广场才可能表演。汉武帝时就曾多次举行大规模的百戏会演，方圆三百里的人都前来观看，汉武帝在高耸的楼阙上观赏表演，不仅视野开阔，而且凌驾万民之上，尽显帝王的尊贵。

无论是厅堂、殿庭上的小范围表演，还是广场上的大场面表演，都未形成真正的剧场，这是人们对汉代百戏表演场地形成的一种观点，但是1975年安徽涡阳县大王店出土的一件陶楼，动摇了人们的这种看法。该陶楼通高99厘米，胎质砖红色，外施绿釉，分四层。有专家根据陶楼的布局和人物形象，认为这是汉代戏楼的一个缩影。这件陶楼一层开敞；二层是舞台。舞台三面封闭，一面敞开，分前台表演区和后台戏房，有上下场门。前台有五个伎乐俑，分两排，前排一伎作倒立表演，后排四伎伴奏；三层封闭；四层是鼓楼，中设建鼓。这件戏楼的发现，不仅把中国戏台史的起点

从公元10世纪的北宋提前到公元3世纪的东汉末年，而且打破了封闭式戏台来自西方的观点，推翻了三面敞开的戏台是中国惟一传统的论点。持相反意见的人认为，作为汉代表演艺术主体的百戏，是中国戏剧尚处于毛坯阶段的一种演出形式，其表演主要在厅堂、殿庭、广场三种场合举行。如果把陶戏楼这一明器视作专门的演出建筑，让观者在楼外观看，将无法看到楼上的伎艺表演，实际上这类明器是贵族地主楼居歌娱生活的反映，表现的仍是室内厅堂的演出。

五、博戏·投壶·围棋

“上金殿者，玉樽延贵客，八门黄金堂。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琴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这是一首描述汉代儒士宴会娱乐的歌词。词中所述的博弈、投壶和弹棋是汉代颇为盛行的娱乐活动。

博戏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成为人们喜爱的娱乐活动。秦汉时期更为流行，王公大臣酷爱博戏，不少公卿大夫还折节下交博徒。汉武帝时，博戏逐渐兴盛。六博大量见于出土文物，包括许多保存较为完整的六博实物和画像砖、画像石、画像镜上留存的大量六博图像。根据画像砖、画像石上的图像可知，六博是汉代贵族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娱乐活动。东汉彭城相缪宇墓南壁横额中部刻宾主对弈图，宾主两人跽坐在一拱形帷帐中，头戴进贤冠，身着右衽大衣，腰束宽带，目视六博棋盘。山东微山画像石上描绘的是宾主两人在四层楼阁上对弈。江苏邳县白山画像石上刻画的是宾主相对坐在一大榻床上对弈。画像石中还经常出现在乐舞的伴奏下尽情对弈的场面，最形象的如湖北当阳半月墓出土的六博画像砖上，在乐舞的陪衬下，两位头戴进

博苑

西汉

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
直径2.2厘米



贤冠、身着阔袖长袍的人在对博，左者身体前倾，瞪目视棋，右者身略后倾，仰首大笑。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套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最完整的博具。博茛的发现则更多，有的博茛还刻意装饰，不仅抛掷时铿锵有声，而且还具有欣赏价值，如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陪葬坑出土的空心错银镂孔铜茛，腔内有小铜块。

河南南阳汉画馆的一幅石刻画像让人们了解到了汉代儒士的另一种娱乐活动——投壶。画面中间立一口小颈长的壶，壶内插着已投进去的两根矢，壶左侧放置盛酒的樽，樽上放一把勺，供人舀酒用。有两人分别跪坐在壶的左右，每人一手抱三矢，另一手执一矢，面向着壶准备投掷。画面右边有一人跪坐，两手拱抱，似旁观者，又似侍仆。左边一人席地而坐，很可能是宴会的主人。从画面中可以看出，汉代的儒士对酒设乐，常有投壶助兴。汉代的投壶游戏对壶有特殊的规定，壶颈长七寸，腹长五寸，通高为一尺二寸（约合27.6厘米）。河南济源泗涧沟8号西汉墓出土的绿釉直颈陶壶高26.6厘米，江苏盱眙东阳4号新莽墓出土的刻花直颈铜壶高27.8厘米，其造型和高度都符合投壶的要求。投壶所使用的铜矢在湖南长沙战国墓中曾出土，而汉代高技艺的投壶所用矢为竹制的。《西京杂记》中记述了汉武帝时一个善于投壶的郭舍人。汉以前，投壶主要要求中的，为了使矢不跳出，故在壶中装有小豆，而郭舍人则改当时盛行的木矢



绿釉陶投壶

西汉

河南济源泗涧沟西汉墓出土
高26.6厘米

为竹矢，使之有弹性，竹矢入壶则反弹出来，然后接着又投，书中记载郭舍人能“一矢百余反”，常常为汉武帝投壶，汉武帝曾赐给他大量的金帛。

“先据四道兮保角依旁，缘边遮列兮往往相望，离离马目兮连连雁行，踔度间置兮徘徊中央。”这是东汉马融《围棋赋》中的词句。马融把三尺之局的围棋盘，比喻成战场，并认为下围棋者“怯者无功，贪者先亡”，只有“深念远虑”，才可胜券在握。马融以兵家战例形象地说明了下围棋的方法，说明当时人们对围棋已有很深的研究。关于汉代的围棋棋局，

投壶（画像石拓片）





绿釉陶六博俑

汉

1972年河南灵宝张湾出土
长28厘米，宽19厘米，高24厘米

已有实物出土，陕西咸阳甲6号西汉墓出土的铁足石棋局，面上用黑线画出纵横十五道。河北望都1号东汉墓所出石棋局纵横各十七道，与现代的围棋已很接近。

第六节 宗教

秦汉时期的宗教主要为道教和佛教。道教自西汉晚期兴起后得到迅速传播，墓葬中

朱书陶罐

东汉

1957年陕西长安三里村出土
高23厘米



大量写有道教内容的镇墓陶瓶的出土正说明了这一点。佛教自西汉晚期传入中国后也渐渐渗透在民众的信仰中，与道教同受供养，在许多出土文物中也有反映。

一、镇墓陶瓶·符篆木牒

中国古代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很多，许多因其造型优美、纹饰精细而受到研究者关注。而在东汉墓葬中出土的一种陶瓶，造型很普通，也没有精美的装饰花纹，上面有许多红色文字，通过对这些晦涩文字的研究，人们发现，这种陶瓶是一种镇墓瓶，是道教安慰死者灵魂的一种用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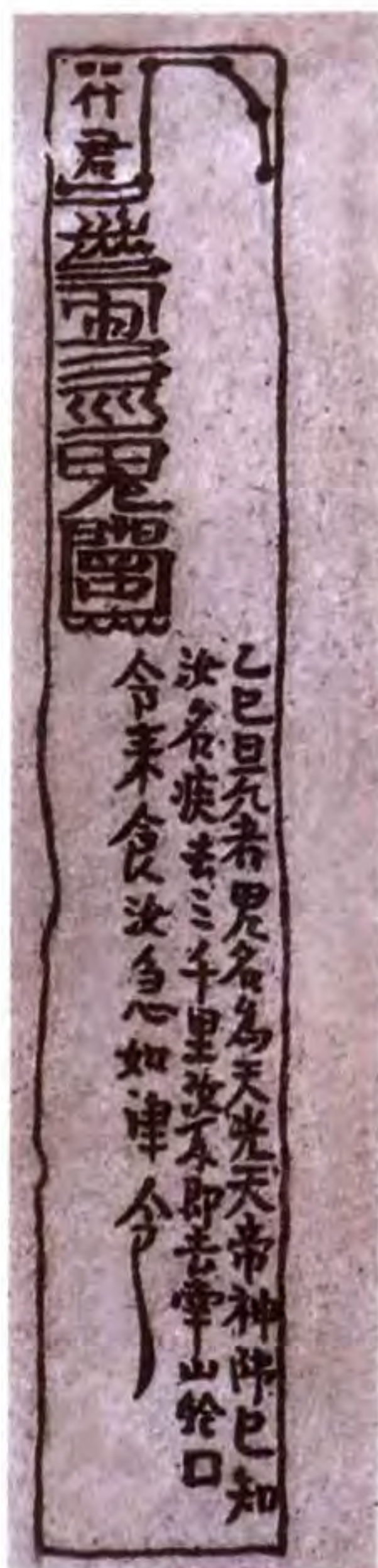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的道教源于黄老道家学说及巫术、神仙方术。一方面，方士作为神人之间的媒介曾经哄骗秦皇、汉武这样雄视百代的封建帝王，演出过一系列迷信闹剧；另一方面，古老的巫、祝、卜、史在对多神的筛选改造中逐步推出了以老子为教主的道教。中国的道教萌芽于西汉晚期，滨海地区是东汉初期道教活动中心，东汉后期道教已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广为信奉。道教奉老子为教祖，行符咒巫术之道术，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有四个派别，分别是黄老道、太平道、五斗米道和骆耀在关中创立的道教（修炼缅甸法）。其中河北的张角以太平道作为宣传，组织发动了黄巾大起义。1976年安徽省亳县元宝坑村出土了一块字砖，砖上刻字，是匠人随意刻画出的，其中“苍天乃死”与后来黄巾起义所提的口号“苍天乃死，黄天当立”相合。这块字砖，反映出在黄巾起义前夕太平道传播的广泛和民众渴望推翻汉朝统治的普遍心态。镇墓瓶在东汉中期，特别是后期的墓葬中常可以看见，因为瓶上的文字多为朱书，故又称为“朱书镇墓文”。镇墓瓶上的文字基本上有一定的格式。有的冠以年月日，开头几乎都写“天

帝使者”、“天帝神师”一类话语，最后都以“如律令”结尾。“天帝”是道教崇奉的神，天帝可以派神师压制恶鬼邪神。“天帝神师”、“天帝使者”是天帝派下的神师即太平道方士的自称，文字的大体内容是以“天帝使者”之类的名义为生人解罪，为死者求福，安慰并约束亡灵，使其认识死生有别，勿事纠缠，使生人的家宅安宁，使死者的墓冢稳定，墓主对冢地拥有不受鬼神侵扰的所有权。从文字内容可以断定这是道教为死者解除不祥的用品。镇墓瓶出土地点多在洛阳、陕县、灵宝、潼关、西安、宝鸡一线，最远的及于甘肃敦煌，反映了东汉末年道教流行广泛，影响深远。镇墓瓶内还经常放置铜钱、小块汉白玉与铅人。铅人在河南灵宝张湾5号墓、陕县刘家渠88号墓、陕西长安三里村、江苏睢宁刘楼等东汉墓中均曾出土。瓶上的文字中有“铅人持代死人”、“铅人池池，能舂能炊，上车能御，把笔能书”的文字，说明铅人是代替死者本人在冥间服役的。瓶中的铜钱和汉白玉代表金玉，死者可以用它贿赂地下冥官。为了保证墓主对墓地的拥有，道教还为这些死者设计了买地券。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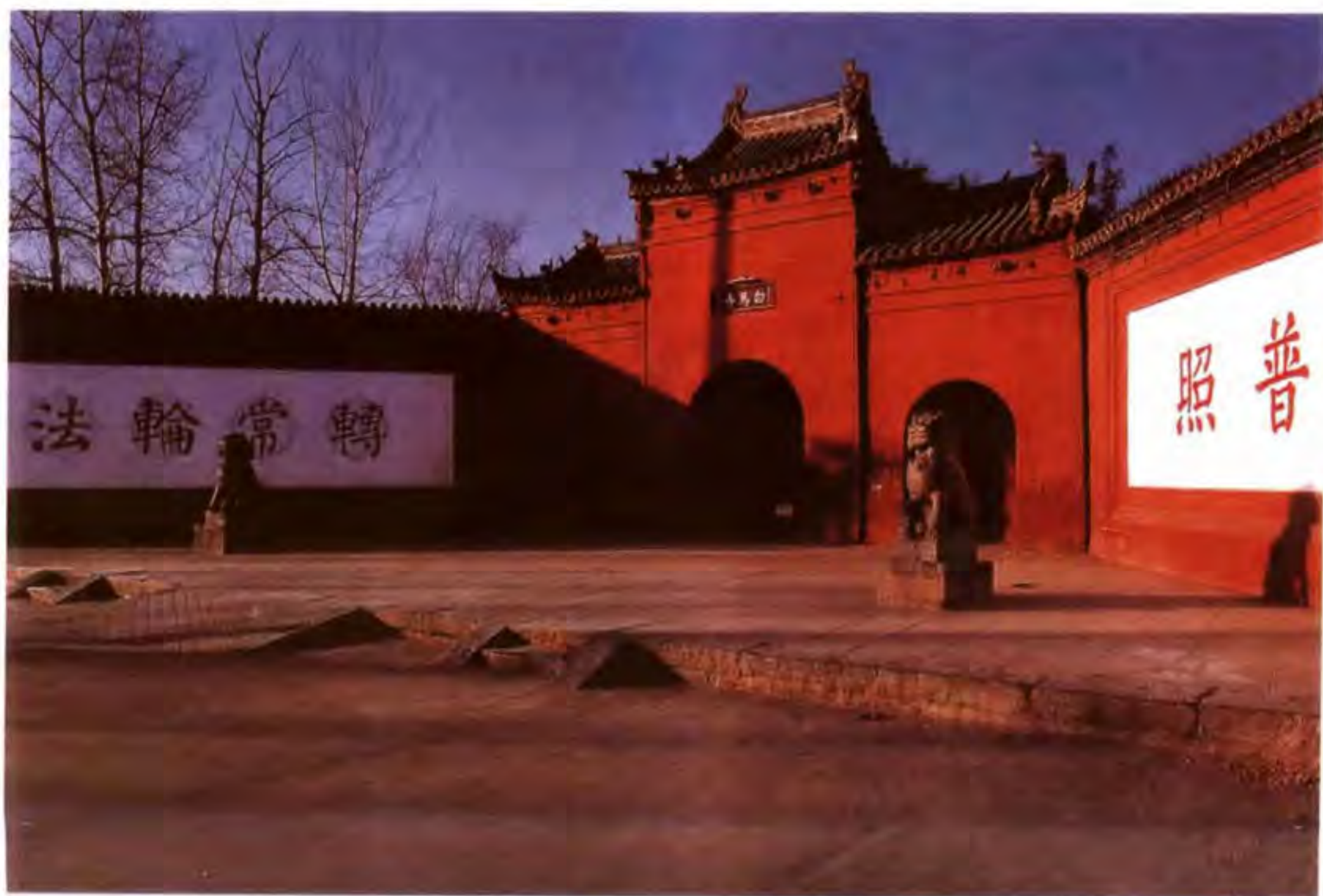
汉时的买地券多数刻在长条状的铅板上，亦有刻写在砖上或玉石板上的，令人好奇的是，其中的许多买地券，特别是东汉后期出土的买地券中，常常出现“天帝神师”、“天帝使者”、“黄神地章之印”、“黄神越章”等文字。“黄神地章之印”、“黄神越章”是道教的印信，在券上盖上印章，是死者希望以天帝的神威来保证对墓地的拥有，来驱除恶鬼邪神对墓地的骚扰，这些文字都表明了道教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无论是买地券还是镇墓瓶，都有附以符箓的。画符出现于东汉末年，当时还有以画符而出名的。1957年，江苏高邮邵家沟发掘一处东汉末年的村落遗址，出土有“天地使者”封泥和符箓木牍，反映了东汉末年道教在当地农村流行的情况。

二、白马驮来第一古刹

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的某个夜晚，居住在国都洛阳城寝宫里的明帝刘庄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一个身材高大的金人，头上顶着白光，在皇宫的殿庭里飞来飞去。东汉是非常讲迷信的一个朝代，人们晚上做了奇异



符箓木牍



白马寺

位于河南洛阳



佉卢文井栏杆残石
河南洛阳出土

的梦，第二天都要找人来释梦和圆梦。皇帝的梦当然轻视不得，它成了第二天早朝大臣们议论的中心。有一位非常博学的大臣傅毅奏道：“臣听说西方有一个有名的神人，他的名字叫佛，就像陛下梦见的那个样子。”刘庄于是就派遣大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八人同往西域寻佛，蔡、秦等人西行至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遇到了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他们邀请二位高僧同去中国，二高僧欣然同意。于是一行人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于永平十年返回国都洛阳。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史称“永平求法”。汉明帝刘庄果然寻到了西方神佛的踪影，兴奋异常，他先安排二高僧暂住负责外交礼宾事务的官署鸿胪寺，第二年又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外三里远的御道之北修造一座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之功，僧院被命名为白马寺。寺本是中国官署的通称，因二僧初止于鸿胪寺，僧院也跟着称寺。没想到这一借称，后来竟成了中国僧院的泛称，而官署反倒不称寺了。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因为史书上没有确切的记载，目前还难以定论。“永平求法”说明在东汉初年佛教已经传入中国，受到了各

阶层人士的关注。自蔡、秦等回到洛阳以后，陆续又有学问渊博的佛教僧徒来到中原。佛教在中原得到较大发展，是在桓帝时安息的安世高到洛阳大规模译经之后。不久，月氏人支谶、支曜等，也相继到洛阳译经。东汉后期京都洛阳已经有佛教僧团和寺院存在。大约在1924年或早些时候，洛阳出土了几块镌刻佉卢文文字的弧形石条。铭文中明确提到了僧团与寺院，年代约在灵、献（179—190）之际。佉卢文是以犍陀罗为中心的贵霜帝国的官方文字之一，犍陀罗又是当时佛教圣地，有关专家认为这些弧形石条是洛阳贵霜人佛教寺院的一个浴堂的附属设施——井阑。

三、西天如来登临孔望山

在江苏连云港海州锦屏山东北的东海之滨，有一个东西长约700米、高129米的小山，相传孔子曾登临此山以望东海，故名孔望山。孔望山上有许多模糊不清的摩崖造像，历史上人们大都认为它是表现世俗内容的汉代石刻画像。直到1980年6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先生来连云港考察时，才首次指出孔望山摩崖造像含有佛教内容，并认为是中国现存较早的佛教石刻。史先生的一番话使孔望山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一时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来自各方的专家云集孔望山，希望从那些静默了1800多年的造像中，发现更多的历史信息。

孔望山现存可辨识的造像有105个，刻在东西长17米、高8米的山崖上。离造像群东70米处有一大型的圆雕石像，南150米处有一圆雕石蟾蜍。石像南25米还有一块顶部有人工凿槽的“馒头状”巨石。目前学术界就孔望山造像的凿刻年代问题，已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孔望山摩崖造像是东汉末期的作品。而就造像题材内容问题，虽然分歧很大，

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造像中有佛教内容，其中明确可辨的佛教图像，有立佛、坐佛、佛涅槃变图、舍身饲虎本生故事图与胡人形象的供养人等。其构图布置、身后佛光、头上肉髻、手印范式等也都符合佛教造像的特征。从它的艺术风格看，造像者分别运用了凸面线刻、减地阴刻、浅浮雕和高浮雕几种不同的艺术处理手法，具有鲜明的汉画像石风格。以这样的传统技法表现外来的佛教题材，正是孔望山摩崖造像突出的时代特征。

佛教传播的一般规律是先传佛教故事和偶像，然后才是译经活动，而随着译经活动的展开，人们对佛教内容的了解不断加深，必将进一步推动造像活动的发展。任何宗教艺术的内容和题材，都与人们对它的理解程度相一致。从孔望山摩崖造像佛教题材的丰富和构图的严谨看，显然是人们对佛教有了一定了解后的作品。有的专家将孔望山摩崖造像与犍陀罗或印度同期造像加以比较，认为孔望山的佛教艺术是由海路传入的。有专家更进一步提出中国的佛教最早是由海路输入的观点。他们认为孔望山所在的汉代朐县是当时的一个国际港口。早在秦以前，从孔望山往西到彭城铜山，到中州洛阳，到关中咸阳，就有一条宽阔的陆上交通线，秦始皇曾三次东巡，到达朐县设立“东门阙”。由这条当时称之为“国道”的中段洛阳南下，经南阳、长沙、广州、日南（今越南），即可接海上航线，下南中国海，过马六甲海峡，穿印度洋，登上南亚次大陆，进入印度本土。同时，也可从孔望山沿着东南沿海航行，进入印度洋，这是一条完整的海上丝绸之路。而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认为：孔望山摩崖佛教造像在艺术上与西北印度犍陀罗、中亚和西域都有因缘关系。孔望山摩崖佛教造像明显地受到贵霜佛教艺术的影响，它是经西北一线由陆路传入的。刻在摩

崖上的那些礼佛的胡人，应该是汉献帝末年因避乱而移住此地的贵霜大月氏人。因为在初平元年（190），董卓逼汉献帝迁都长安，悉烧宫殿民居，洛阳城周围二百里内室屋荡尽。在这种情势下，洛阳的胡人纷纷举家外逃，有一部分人到了孔望山一带。侨居中国孔望山的贵霜大月氏人作为施主，汉地工匠根据他们的要求，在佛教初传中国的时候创造了带有贵霜佛教艺术特征，同时又具中国本土色彩、仪轨制度混乱、概念模糊的佛像作品。造像中那些戴尖顶帽、深目高鼻、着窄袖胡服的胡人都面向佛像。他们或持花或跪踞，姿态度诚，均作供养状，这些胡人就是孔望山佛像以及佛教题材雕刻作品的施主。孔望山是一处胡人礼拜他们自己的尊神——佛陀的场所。而且从中国古代交通史的资料来分析，西汉时期，甚至终东汉之世，人们对于从海路通印度的知识还很有限；同样，印度人对于由印度至中国的航线也不甚了了。如果印度佛教在汉末三国之际确能沿海路而至交趾，也是由交趾改由陆路北传的，沿海路而至北方沿海似无可能。孔望山尽管处于黄海之滨，但雕凿于汉末时期的佛教造像还不见由海路传入的

孔望山东汉摩崖造像

位于江苏连云港海州锦屏山
东北



迹象，海路传入说是难以成立的。

关于孔望山摩崖造像中是否有道教题材，以及造像中道教和佛教的关系问题，也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有专家认为，孔望山有道教题材的形象，其中有两个人像着汉式衣冠，正襟危坐，位于整个造像群的正中或最高处，形象高大，位置突出，这种安排，同汉画像石上所见道教崇拜的神祇形象类似。而且人像前有灯碗的设置，表明他们是受礼拜和供奉的神。更有学者推断，这些和道教有关的造像，是汉画像石中的习见形象，可以推断为太平道的造像。因为当时的道教以黄老为崇拜对象，在滨海地区至黄河中游一带因以《太平经》为经典，又称为太平道，所以这里的道教造像无疑是太平道的礼拜物。

东汉时期，孔望山所在的胸县属东海郡和东海国，东海郡和东海国隶属徐州，而徐州除辖东海，还有邻近的琅邪、彭城、下邳和广陵，这些地方既是佛教最早的传播地，也是道教发源地。外来的佛教和中国本土的神仙崇拜和道教在这里碰面了，那么双方都采取什么态度呢？这又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主张孔望山摩崖造像中的道教是太平道的学者认为，当时佛教已渐在中土流传并依附于道教，所以这里供奉的神像包括有佛教内容。从整体观察，这是一处佛、道交糅而以道教为尊、又以佛教题材为多的礼拜场所。而在张角起义被镇压以后，太平道（不是南方的天师道）自然会受到严重削弱，也许佛教正是趁此机会摆脱道教，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还有学者认为，具有道教色彩的人物造像是最早凿刻上去的，当以大月氏为主的胡人佛教徒来到东海的时候，看到孔望山可以利用的崖面，上面几位身着汉式衣冠的人物，并不影响他们的祭祀或膜拜，将佛陀同它们雕在一起，不但不会降低佛陀的身份，而且可以借中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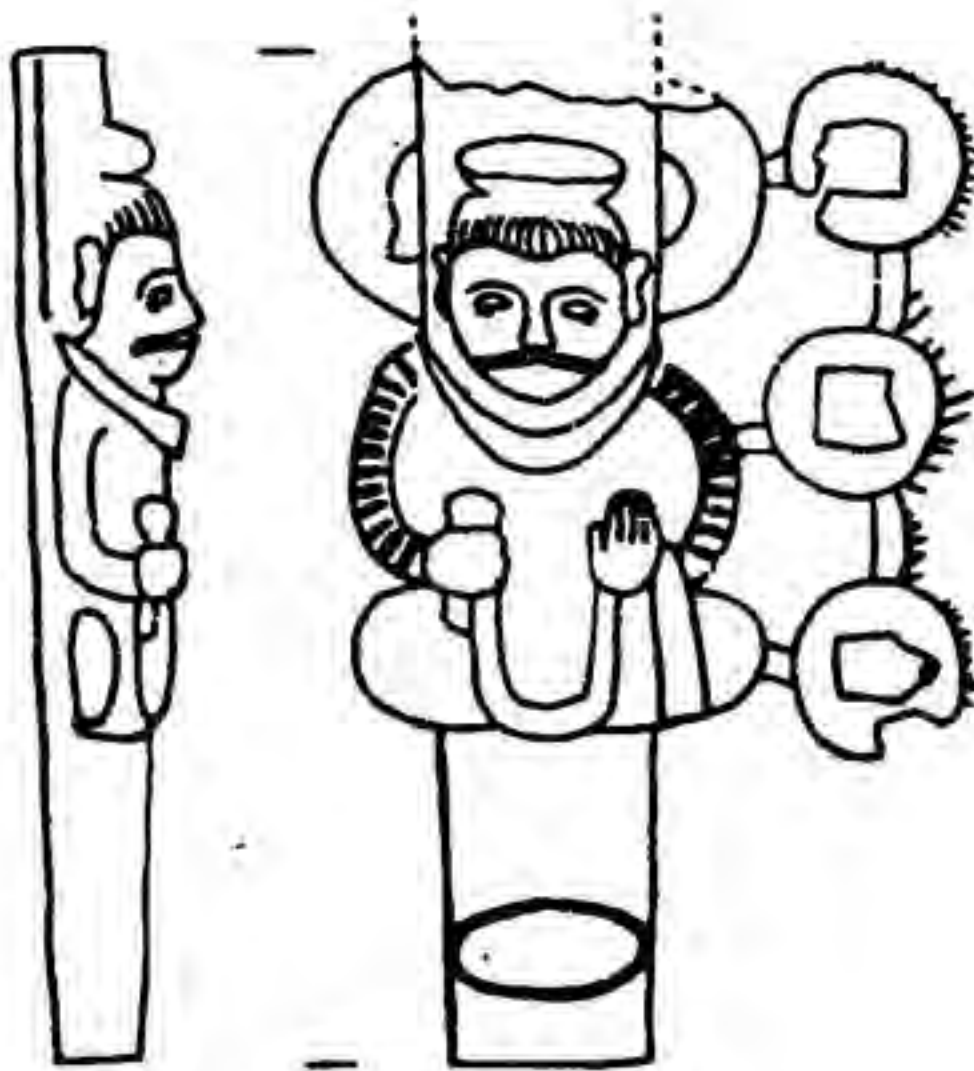
神祇以自重。佛教初传时期佛教徒采取一种权变的策略，借助中国本土的宗教和哲学学说。黄老与浮屠并祀是佛教初传中国时期的特点，把孔望山摩崖造像看作是佛道交糅而以道教为尊的礼拜场所，是不符合实际的。更有学者认为孔望山的造像是太平道的造像，造像中的某些佛教内容，是太平道排佛，告诫弟子们“愚者不信道”，终于落个“身死有余过”的结果，是用作反面教材来教育道教弟子的。

四、摇钱树上的佛像

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人们对它认识不深，经常从神的角度来理解佛教，加之佛教传播者为了使佛教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滋长，在传教时也有意顺应中国的神仙思想，所以汉代人们把佛和天界的神一起当作庇佑自己灵魂升天的对象而顶礼膜拜。这种信仰上的佛道杂糅现象，在西南地区的一些遗迹和文物中也有所反映。崖墓是四川地区特有的一种墓葬形式，在崖墓中出土了许多反映佛教内容的画像。如四川乐山城郊的麻濠东汉大型崖墓中，在中间一个后室的门额位置上，用浅浮雕的技法刻出一尊坐佛像。佛像高37厘米，头带项光，结跏趺坐，手作施无畏印。此像高居门上，接近于房顶，处在受供奉的位置，其形态是模仿外来的佛教造像作风。摇钱树也是汉代四川崖墓特有的一种随葬物品。有学者认为它是社树，社树就是土地神的象征，用摇钱树随葬，表明墓主想像拥有私有财物那样控制社神。有学者认为摇钱树出自海上三神山演变而来的传说。还有学者认为，摇钱树在汉代是财富与道教崇拜有关的特殊器物，将佛像铸于摇钱树，有以财富娱佛的含义，这一做法至今还流行于云南一带的寺庙佛事活动之中。虽然众说纷纭，但汉代摇钱树及陶座本

身是象征一个受礼拜、供奉的神物的观点是一致的。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在摇钱树上常出现佛教图像，如四川彭山的东汉崖墓内曾出土一陶摇钱树座，底部有双龙衔璧图像，身部有三个人，其中间一像结跏趺坐，高肉髻，右手作施无畏印，两侧之像站立而侍，为一整组的佛教造像——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即中为释迦，两侧为迦叶、阿难或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分别铸五尊形象一致的佛像。汉代摇钱树和陶座上经常可以见到东王公、西王母等神人和佛教图像共处的现象，也进一步证明当时人们佛道杂糅的信仰特点。而且从考古材料来分析，四川东汉佛教的传播已达多个社会阶层。绵阳何家山1号墓是四川汉代崖墓的中型墓，可能是当地中、小官僚或地主的家族合葬墓，说明当时佛教的传播已达统治阶级的中、下层，还有可能传播到普通百姓之中。以印度佛教教义故事为题材的石刻画像在四川东汉崖墓中也有发现。如乐山柿子湾的一座刻有隶书“尹武孙墓”题记的东汉崖墓中有石刻“大鹏鸟含蛇图”，麻浩东

摇钱树上的佛像



汉崖墓内又见石壁刻画“秃鹫啖蛇图”。此类以鸟、蛇、鹏、鹫为题材的故事在汉代传说故事中较为罕见，但却与印度佛教故事有关。这类曾吸收印度佛教故事的文物遗存，在四川南部还有发现。如泸州蛮子洞崖墓内一具石棺端头刻画的“共命鸟图”，图中之鸟呈一体双头，恰如释迦牟尼向众比丘所讲的雪山二头鸟，显示出四川的东汉民间传说所受印度佛教的影响。



第七章

秦汉中外关系

秦汉时期的中国国力强盛，是当时世界上的重要国家。秦朝徐福东渡日本影响了日本文化的发展。汉代和贵霜、安息、罗马帝国进行了广泛的陆路和海路交往，相互间的文化渗透，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第一节 一衣带水—— 徐福东渡的传说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巡行东方，这是秦始皇第二次出巡。在泰山封禅刻石之后，他向渤海进发，登上了芝罘半岛。芝罘半岛东西长五六公里，南北宽五六百米，高出海面三百多米。站在芝罘半岛上，登高望去，虚无缥缈。海市蜃楼的奇观，更令秦始皇心驰神往。为了迎合秦始皇长生的奢求，齐人徐福等给秦始皇上书，宣称海中有蓬莱、方丈和瀛

洲三座仙山，三神山上有长生不老药，请求秦始皇派童男女和他一起去求仙人仙药。秦始皇采用了他的建议，派数千男女乘船出航。几年过去了，徐福花费了许多费用，却没有得到神药。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第五次巡幸琅邪时，又询问起徐福为他求长生不老药的事，徐福害怕受到处罚，便编造谎言，说是由于受到海中大鲛鱼的阻挠，无法接近蓬莱山，一定要派技艺高超的射手去才能克服这些困难。秦始皇感到很奇怪，因为徐福的请求正和他夜里的梦境相吻合，随即选择善射者伴着御舟，亲往射鱼。到达芝罘时，果然见到了大鲛鱼。秦始皇亲自同弓箭手用连弩射死了一条大鲛鱼。秦始皇认为此后当可无虞，乃命徐福再次入海求仙药。这次徐福又率童男女三千人，装载五谷种子、技艺百工下海。

大约在宋代以后，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

在中日两国间流布开来。日本甚至有关于登陆地点在纪伊熊野浦的具体考定,以及所谓徐福墓和徐福祠的出现。日本列岛,从南到北,有十几个地方至今流传着徐福的故事。其中流传徐福故事最广的是和歌山县、三重县和佐贺县。他们认为徐福航海到平原广泽的新天地,便在那里建立了政权,这地方便是日本本州和歌山,至今在和歌山新宫东南有蓬莱山,并有徐福墓,墓前石碑上刻“秦徐福之墓”五个汉字。佐贺县诸福町有一处地名叫“浮杯”,传说徐福漂流到此,将一酒杯放入海内,酒杯在前漂浮引路,徐福一行便随杯前行,于杯止处登陆,这里至今还立有“徐福上陆地”的木制标柱。在佐贺县的金立山顶,有一处祭祀徐福的“金立神社”,据说建于2200年前,每隔50年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祭典。

长期以来,中国历史上是否确有徐福其人其事,有的学者是持否定态度的,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民间传说”。他们认为史籍记载不详,内容过于简略,况且还蒙着一层“神仙思想”的迷雾,从而怀疑徐福东渡是虚构故事。但近年来,许多中日学者从各个方面对徐福东渡的真实性给予了充分肯定。

日本学者研究证明,战国及秦时期,中国沿海民众大量往日本移民,徐福的童男童女仅是其中的一队。有的甚至认为徐福东渡日本后,在那里建立了日本王朝,神武天皇就是徐福。因此,不少日本人自认为是徐福及其一行的后裔,每年八月都要举行盛大的徐福祭。1950年,日本有关学者在文部省的资助下组织“日本民族头骨指数测定会”,根据六七万人的数据,日本最著名的人类学和体质学权威人士整理研究,并将有关数据与日本周围的民族进行比较分析,认定这些头骨指数大多数与中国江苏一带人的头骨指数相同,而徐福正是江苏人氏。1982年6月,因编写中华



“徐福上陆地”木制标柱

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江苏分册赣榆县地名词目,在查阅赣榆县地名普查的原始资料中,发现了一个原名“徐福”、后演变为“徐阜”的自然村,根据考证得知,这里就是徐福的故乡。据调查,徐福村位于赣榆县城北偏西18公里金山乡驻地前石堰南1公里处,清朝乾隆之前,该村仍称徐福村,后不知何时演变为徐阜村,可能是同音相谐所致。现在该村由南北两个自然村组成,南为前徐阜,北为后徐阜。后徐阜村即为原徐福村故址。故址附近,有后人因徐福东渡未归而修建的一座怀念徐福的徐

徐福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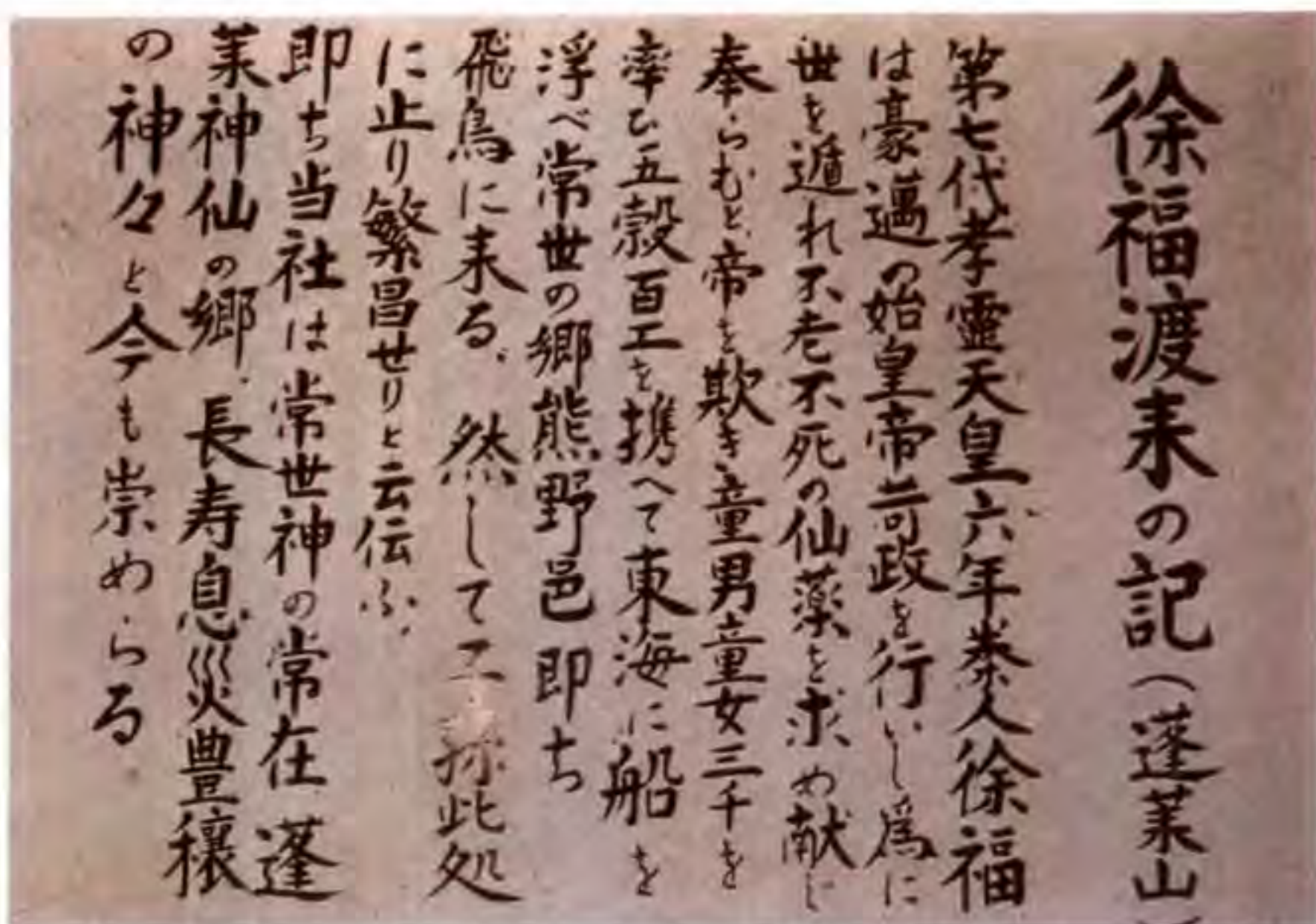
福庙。相传这座庙在唐代时还曾修过。离庙30米处，有两棵银杏树，高20米以上，直径可达2米，爬到树上，可以看到大海，沿海渔民以之为出海归航的航标。每逢二月十九、六月十九、十月十九徐福三次东渡起航的日子，方圆百里的人们都要到庙里进香，祈祷神灵保佑。现在徐福村已无徐姓居民，相传徐福脱身东渡，临行前叮嘱其亲属，他此行采药不成，是要遭灭门之罪的，劝告家人不要再姓徐了。徐福村位于海州湾西侧，地势开阔，是当时水陆交通和入海航路的重要地带，北上可入黄河，南下可通江淮，西北可达齐鲁，是汉代赣榆县一个人口和城邑密集、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据已有的考古资料，徐福村附近的汉代历史文化遗存分布最多，先后发现了汉代庙台子文化遗存、汉代大台子文化遗存、汉代大温庄木椁墓葬群、夏庄汉画像石墓群、汉代青

墩庙文化遗存、汉代祝其县故城遗址、汉代石拉沟文化遗存、汉代利城县古城遗址、汉代李城子文化遗存等等。如此密集分布的汉代历史遗存，说明徐福村在汉代已是一个重要的村落。

徐福村的发现，证明徐福并不是虚构出来的人物。有专家还从当时的海洋环境着手研究，认为徐福东渡日本是完全可能的。徐福入海东渡有两个地点。一个为徐山，旧属山东诸城县，现属胶南县，位于前219年秦始皇巡游过的琅邪台下石河入海河段。这里水深港阔，起航条件好，但在此起航东渡，因海上风恶，失败而归。另一个地点在离徐福村不远的海州湾南北两侧的岚山头或连云港附近朐山沿岸一带。此地在当时属于侵蚀性海岸，水深港阔，有利于徐福等集船起航东渡。海州湾和日本纬度相当，与日本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在古代可能是中日两国海上交通最佳起航点之一。另外海州湾及其外海南黄海海面，冬季半年盛行偏北气流，夏季半年盛行偏南气流。海流和气流为徐福东渡提供了有利的漂送条件。因此有专家认为徐福于前210年东渡日本是可信的。徐福东渡，不仅带去了三千童男女，还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各种器皿，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秦始皇虽未能寻得不死之药、长寿千年，却成就了徐福的不朽业绩。

徐福东渡的传说，可以证明早在秦始皇时期，中国大陆已经有能力使自身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东洋。公元前3世纪前后，在日本列岛绵延了数千年的新石器文化猝然而止，先进的金属文化伴随水稻农耕从九州北部迅速扩散至整个西日本，尔后在同石器文化碰撞与交融之中渐次传播到日本除北海道和冲绳岛之外的列岛各地——这便是绳纹时代与弥生时代的历史性交替。秦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还表现在葬俗上，那就是方形周沟墓在日本的出现和普及。方形周沟墓是秦人的一种传统葬俗。在渡海秦人最先到达的九州福岡一带，发现了公元前3世纪的方形周沟墓，以后除冲绳、北海道以外，几乎广泛分布于全日本。有专家认为：“日本最初的周沟墓，大概就是秦代渡海而去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为自己筑造的，以后再扩大到日本的本土居民中。”作为文化载体的汉简是否由徐福传入日本，历史上传说很多。宋代的徐福传说将“焚书坑儒”与汉籍东传联系在一起，衍生出徐福赉书东渡的情节，事见欧阳修《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在日本的一些信史中也称徐福赉书，江户时代儒医橘南溪著有《西游记》一书，认为徐福一行在日本熊野登陆，当地的新宫、本宫，至今仍称蓬莱山，宫内神宝中藏有先秦文书，新宫附近筑有徐福墓等等。最近有位名叫铃木贞一的学者，埋头研究传为先秦典籍的书，认为徐福携往日本的书籍计儒教经书1850卷，其他典籍1800卷，几乎囊括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典籍。徐福赉书一说，疑点甚多，显为后世伪托，但是如果我们撇开具体的人物，便可以大胆地推断：秦人移民在传播水稻技术和金属文化的同时，必定把汉文化载体——汉简也携带至日本。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的丝织品，也在同一时期传入日本。现存日本出土的最早的丝织品，是1966年在弥生中期的立岩遗址（九州福岡饭冢市）中发现的，这种包裹素环头的丝织物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同一遗址还发现了汉代铜镜。汉镜由于制作精良，为日本人所喜爱。当时日本对汉代的铜镜非常珍视，出土的实物也不少。前108年，汉在朝鲜西北部设立乐浪郡后，乐浪就成为向日本列岛百余国传递新文化的门户。当时日本分成许多小国，总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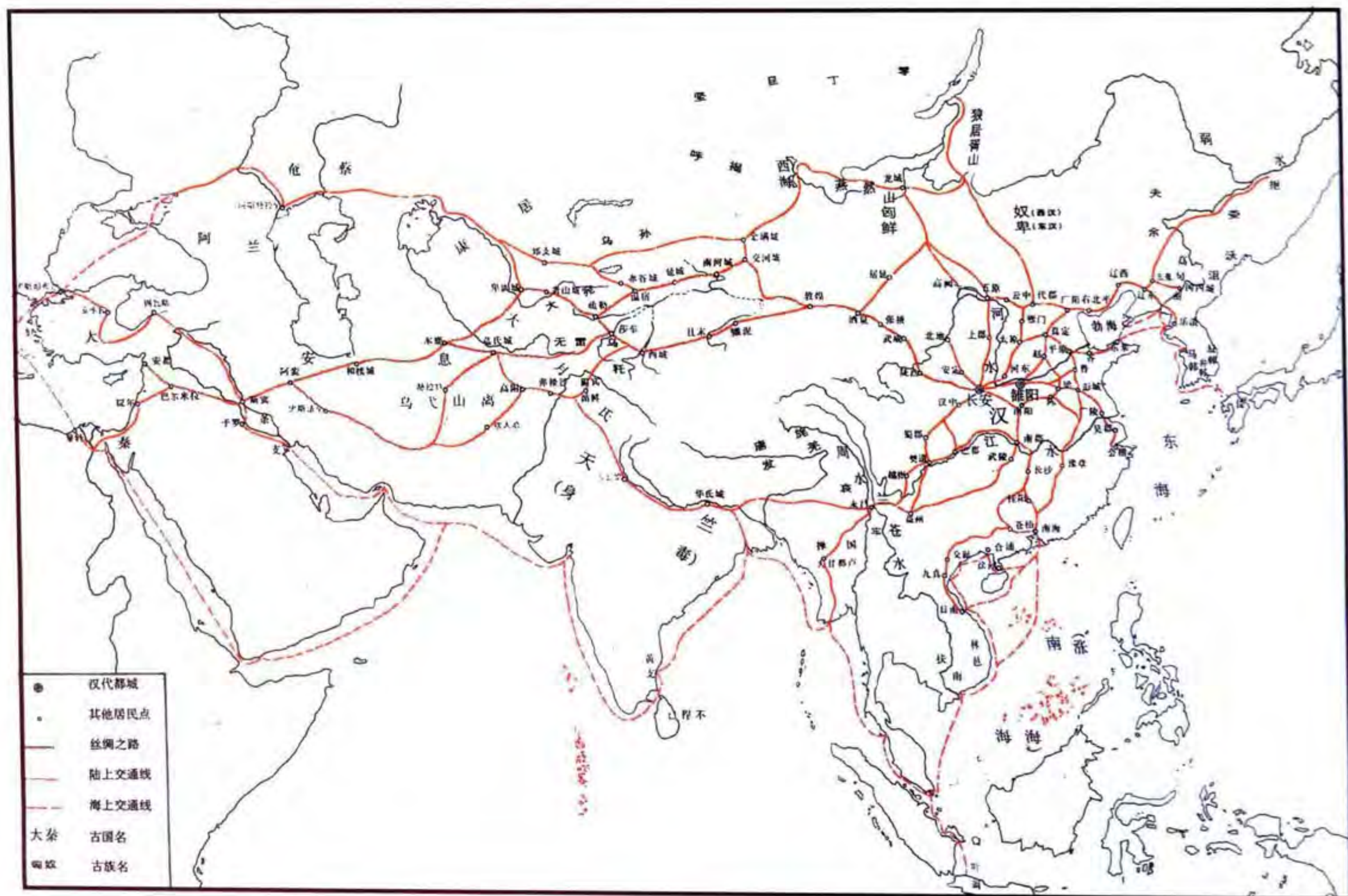
徐福东渡事迹说明牌

日本阿须贺神社

为倭。《后汉书·东夷传》中为“倭”列有专条，并明确记述自汉武帝平定朝鲜起，倭人已有三十余国与汉王朝通交。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倭奴国王派遣使臣至洛阳朝贺，光武帝颁赐倭奴国金印，其实物即1784年在日本福岡市志贺岛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一般认为“委（倭）奴国”地望，在北九州博多附近的惟县一带。此印反映出汉代中国与日本的密切关系。日本种子岛广田遗址出土的贝札上刻有汉文“山”字，看来系当地制作，其时代约为公元3世纪，反映出日本在这个时期，对大陆文化的吸收已达到相当的深度。

第二节 丝绸之路

公元1世纪到2世纪，沿着丝绸之路，自东而西出现了汉帝国、大月氏、贵霜、安息和罗马五个大国。汉代中国和贵霜王朝分别控制着丝绸之路东段，安息占据中段。在丝绸之路西段的罗马，被汉代称为大秦，意思是泰西（极西）之国。因为在海西，又称海西国。丝绸之路虽以运输丝绸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



汉代中外交通示意图

远超过丝绸贸易。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国，把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中国文明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的大动脉。古代文明通过这条大动脉而互相影响，大放异彩，给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贵霜货币

在中国新疆地区的汉代遗址中，曾出土许多货币，其形制与流通于中原的汉代货币完全不同，具有浓厚的异域色彩。其中在南疆的叶城、和田一带出土的一种中亚货币上面有迦腻色迦王的称号，这是古贵霜国流通很广泛的一种货币，它的出土反映了古贵霜国人在汉代中国境内所留下的足迹，汉代和古贵霜国的文化正是通过这一枚枚货币而互相影响的。

贵霜国是由月氏人建立的。月氏人最初居住在中国西部的敦煌、祁连山一带，公元前2世纪被匈奴击败，西迁到阿姆河流域，后吞并大夏，公元1世纪初，建立贵霜国。又南下印度，占领印度河、恒河流域。至1世纪末2世纪初贵霜王迦腻色迦在位时，国势极盛，占有帕米尔以西、里海以东的中亚地区以及伊

贵霜货币

东汉
新疆楼兰遗址出土





朗高原东部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成为中亚的一大强国。贵霜国扼丝绸之路的要冲，自汉向西方输出的丝织品、漆器、钢铁制品等大部分货物要经过这个国家，从而使得它拥有发达的商业。南疆叶城、和田一带出土的贵霜货币正说明了这一点，汉代的丝织品在贵霜国境内的撒马尔罕等地发现过。不仅如此，汉代的各式武器也极有可能传到了贵霜国，汉代制作的远射武器——弩机上的铜机牙就曾在贵霜国出土。汉代钢铁刀剑也传到贵霜国，虽然未发现刀剑实物，但经专家多方考证，汉代特有的彘式佩剑法和彘却在贵霜国屡有发现（彘是指鞘外的剑扣），并在当地已形成传统。在印度玛特地方发现的著名的迦腻色迦王（约公元78—96）石雕立像，手中就握有一把附彘的剑。在犍陀罗雕刻中，用这种方式佩剑的武士像曾屡次发现，可知从中国西迁的大月氏人对汉地武器的性能及与其相关的技术已有所掌握，并曾用于武装自己的军队。贵霜之所以能称霸中亚，看来这些汉式武器是功

不可没的。

文明的交流是相互的。棉织品在汉代出现于新疆，有学者推断中国的棉织品最早应是东汉时自贵霜传来的。1959年在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发掘了东汉晚期1号墓，墓中出土的一块蓝地白色显花的棉布在纺织史上颇有名气，它是中国出土的最早的棉布之一。这块棉布织得很好，均匀，经纱较细，纬纱较粗，织造缜密。图案已残缺不全，中心部分所剩无几，只能看出一只赤足的前端、半只狮爪和一段狮尾。更重要的是，这块棉布在左小角有一个约32厘米见方的方框，框内有一女神，上身赤裸，手捧丰饶角，其中画满小圆圈，代表果实或谷物。女神颈佩璎珞，头后有项光，身后有背光，最初被认为是佛教的菩萨像，其实应是一位中亚的象征丰饶的女神形象。一些贵霜王朝胡毗色伽王的金币背面的图像，与棉布上的形象完全一致。贵霜的国土与新疆相邻，胡毗色伽王的时代又和尼雅1号东汉墓相当，所以两者图像应是反映同一内容。而从

蓝白印花棉布

东汉

1959年新疆民丰出土
长48厘米，宽89厘米



广州出土的蚀花珠

西汉
广州游鱼岗3029号汉墓出土

织物的质量上看，这块棉布又非当时新疆地区所能生产的，所以断定它是从贵霜国传入的。

此外，在汉代遗址和墓葬中，还出土过另外一些带有西方色彩的器物。如云南晋宁石寨山13号墓、广州游鱼岗3029号墓等两座西汉墓中，各出土一颗人工蚀花的枣核形肉红石髓珠，均在橙色石质上蚀出白色的平行条纹。新疆和阗、沙雅等地也曾分别发现过六颗此类石珠。在相当于汉代的时期中，蚀花珠广泛分布于中亚各地，而以贵霜国又始罗发现最多，这里的蚀花珠有些与中国的出土物几

乎完全相同。可见中国这八颗蚀花珠可能都是从贵霜国传入的外来之物。

二、中国金银器上的安息风格

在广州风景秀丽的越秀山的西边，有一个海拔49.71米的小山岗，名曰象岗，是著名的西汉第二代南越王的墓地。这是一座聚珍藏宝的风水宝地，出土的独具特色的玉器和铜器是南越文化和中原汉文化交流的见证，而主棺槨“足箱”中的一件银盒，分明向人们展示着异域文化的风采。

这是一件装有丸状药物的银盒，从工艺特点看，它难以纳入中国铸造工艺自身的发展序列中。中国的传统工艺是用陶范或用蜡模铸花纹，而这件器物在器盖和器身上均用锤揲法打压出一圈膨起的凸瓣，每瓣一端出尖，另一端圆钝，颠倒相向，排列得整齐有序。它的表面光滑，在光线的照耀下，明暗变化交相辉映，显示出贵金属器物的灿烂华美，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装饰风格迥异其趣。1978年在山东临淄窝托村西汉齐王墓1号陪葬坑中也出土了一件同类型的银盒。这两件具有异域

银盒

西汉
广东广州南越王墓出土
通高12.1厘米，腹径14.8厘米





金花泡

西汉

广东广州南越王墓出土

直径1.1厘米

文化特色的银盒，在远处西亚的同时代安息帝国发现了它的源流。以锤揲法在金属器上打压凸瓣的技术是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兴盛起来的。安息的金银细工继承并发展了阿契美尼德时代以凸瓣纹为饰的作风，出土的安息国的银器与上述西汉墓出土的银器完全一样。所以可以断定这两件银盒是典型的安息帝国的制品，而且南越王墓出土的那件银盒在传入中国后，在器盖和底部又加上了汉字铭文，还按照汉代盒的流行造型，加以改造，在盖面焊上小樺，以套入兽钮，底部也焊上凸樺，以接上铜圈足，成为典型的“洋为中用”之物。安息金银工艺品的制作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这种特色不仅反映在银盒的凸瓣纹上，也反映在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小金泡上。在南越王墓墓主玉衣上的上胸处有珠襦残存，其上有三条装饰带，带上有由金泡、银泡和蓝色玻璃贝等饰物缝缀的菱形图案，而每组图案中作为主饰的焊珠小金泡，制作工艺特别精湛。泡的直径只有1.1厘米，呈半球形，球面用金丝焊接成圆形、心形、瓣索形等多种立体图样，在20倍放大镜下才可以看到焊接点，做工十分精细。

安息帝国在贵霜王国以西，占有伊朗高原的中西部以及两河流域地区。在大月氏以西几千里以外，东境直抵阿姆河，西边是叙利

亚王国，汉代译作条支，北邻康居。张骞出使西域时，曾派遣副使率领庞大的使团经大宛、康居前往安息，安息国王在前117年还特意派二万骑兵在东部边境城市木鹿（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里）接引汉使，汉使回国时，安息随即派使团一起到长安。此后双方使节、商旅往来不绝，中国丝绸、铁器和漆器通过安息，畅销西亚和地中海地区。西方各国的珠宝、香药、毛皮和毛麻织物，也经安息输入中国。中国生产的优质钢铁，是木鹿市场上集散的大宗货品。木鹿以冶铸刀剑闻名，用的原料是由中国运去的铁和铅、锡器物，这些优良的刀剑装备了安息骑兵。安息国人善于经商，安息货币曾在南疆出土。

安息时代的美术、乐舞和杂技具有精湛的技艺、独特的风格，在西方曾推动拜占廷艺术的发展，在东方也为汉朝的艺术增添了活力。汉代吸取安息的美术，突破传统题材的局限，增加了许多新的主题和表现形式。骆驼、翼兽和狮子这种起源于伊朗的动物题材和纹饰，在安息时代传入中国，大大丰富了汉代的艺术天地。东汉时期，翼兽不但作为石刻镇墓兽出现在大型圆雕作品中，也出现在墓葬和祠堂壁间的画像石中。东汉时传自安息的镇墓兽天禄、辟邪等，也都具有这种既保存安息式样，又增添中国格调的双重特色。汉代以

后，在长安、洛阳流行的杂技中，伊朗和印度的节目占有重要的地位。“安息五案”是汉代流行的一个杂技项目，中国古代的“叠案伎”大概就是糅合吸收了安息五案某些因素发展而成的。

三、来自罗马的玻璃器

如果说罗马恺撒大帝身穿用中国丝织品制作的长袍出现在大戏院的故事，只是在文字上证明了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交往，那么中国广西、广东和江苏汉墓出土的罗马玻璃器，则是两个帝国文化交流上的实物例证。

中国自先秦至汉的自制玻璃多属铅钡玻璃，质量不如罗马产的钠钙玻璃，所以中国古代常将西方传来的玻璃器视为珍宝。《汉书·地理志》中有汉武帝使人入海市求玻璃的记载。1954年在广州横枝岗2061号西汉墓出土的三件深蓝色玻璃碗，是中国已发现最早的罗马玻璃器。这是一种模压成型的钠钙玻璃。公元前后，罗马发明了吹制玻璃技术。1987年，洛阳东郊东汉墓出土的一件黄绿色长颈

玻璃瓶，自口沿至平底通体旋绕白色条纹，是典型的罗马搅胎吹制玻璃器。此器色调鲜明，造型优雅，且相当完整，十分珍贵。1980年在江苏邗江甘泉2号东汉墓出土的紫、白两色相间的搅胎玻璃器残片，复原后应为带竖棱纹的平底钵。与上一例不同，它仍是模压成型的。这种器物自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时在罗马很流行，它是采用绞花技法制作的，常以蓝和白、褐和白、紫红和白，甚至以三四种色料搅拌成仿大理石效果的彩色纹理，斑驳绚丽，颇为美观。

罗马帝国位于安息帝国的西边，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是罗马帝国的盛世。罗马帝国统治了多瑙河以南和莱茵河以西的欧洲地区、北非沿地中海地区、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把地中海变为它的内海，短时期里还统治过两河流域、亚美尼亚、达西亚（今罗马尼亚一带）和不列颠南部。西汉时，安息控制了亚洲西部和地中海地区的丝绸贸易。为了垄断这种贸易，安息阻止汉朝和罗马的交往，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为了突破这种阻拦，曾

碧琉璃杯

东汉

195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出土

高3.4厘米，口径5.9厘米
此杯模压成型，成型后又经过抛光，淡绿色透明，表面经风化变乌。经分析，此杯为一般钠钙玻璃，与罗马玻璃成分相符。





蓝琉璃碗

西汉

1954年广东广州横枝岗出土，高4.7厘米，口径10.5厘米。此碗作深蓝紫色，模制成型，外壁及口沿经过打磨，口沿下的阴弦纹也是磨花，磨得不很规整，很像是地中海南岸的罗马玻璃中心公元前1世纪的产品，也是迄今中国出土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皿。

做出多次努力。公元前1世纪，罗马军队入侵叙利亚，罗马和安息以幼发拉底河为界，不断发生冲突，战火连绵。新兴的罗马帝国占领了叙利亚和埃及之后，积极扩展东方贸易，迫切需要从中国运去丝绢。东汉王朝也谋求和罗马直接建交。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就是执行这一国策的具体行动。甘英出使大秦，目的是寻求通往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海路，但因甘英仍走丝绸之路在伊朗北部的干线，所以尽管他到达了波斯湾头安息西界的

于罗（今沙特阿拉伯东部乌凯尔），然而安息海商不愿中罗两国直接通使，便婉言阻拦，使甘英无法继续西航。166年，罗马皇帝派使者自埃及经由印度洋，直抵汉朝统属下的日南郡登岸，再北赴洛阳，完成了甘英未竟的事业，开创了两个大帝国直接通使的记录。《后汉书》称这次使节是安敦王所派，论述这是罗马和中国第一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罗马使者东来的航路，正是遵循着以南印度为枢纽的海上丝绸之路。罗马货物通过海路直运南



古希腊文铅饼

东汉

1979年甘肃平凉峡门乡出土，直径5.5厘米，厚0.9厘米，重115.45克。

铅饼正面凸起有鸟形纹饰，背面凹进并有古希腊文一圈，是由西域传入中国的。同类铅饼、铜饼在中国西安汉城故址、陕西扶风、甘肃灵台等地的汉代文化层中发现过数百枚。据考证，上面的铭文是传写失真的希腊文。一般以为是外国货币。

水晶串饰

广西合浦西汉墓出土



中国的也越来越多。

衣料、皮货和铁器，是罗马从中国进口的三项大宗货物。罗马为了进口中国货支付了大量的货币，普林尼在1世纪中叶估计，每年至少有一亿枚罗马银币被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取走。这些钱币曾在中国流通，在山西出土的罗马钱币，起自公元14年，下迄275年。在罗马所辖之地地中海东岸城市帕尔米拉的古墓中，曾出土汉代暗花绮，和斯坦因在新疆楼兰发现的汉代锦绮相仿。此城已接近丝绸之路的终点，这里的出土物可以视为汉代丝织品输入罗马的实物例证。

古代中国和西方的交往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丝绸是古代中国的特产，所以在一般印象中常认为丝路即中国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运向西方之路。其实就纺织技术甚至丝织技术而言，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亦受益匪浅。毛织品是西方的名产，大秦和大月氏人都擅长制造毛锦。新疆民丰东汉遗址出土的绿地人兽葡萄纹罽，织物是平纹组织，用纬线显花，表面平整，花纹有明显的西方风格。1984年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墓地1号汉墓所出壁挂，出土时已裁剪为四块，缝成裤子。复原后被连接起来，发现上部为希腊神话中吹奏竖笛的半人半马怪，下部为执矛的武士像。它以二十余种颜色的细毛线用通经断纬的方法织成，属于毛锦之类。武士的面部以层层退晕表示明暗，很有立体感。图案风格显然是在希腊神

话的影响下产生的。有专家认为中国唐宋时代产生过许多惊人作品的缂丝工艺，其通经断纬的织造技术就是借鉴了公元前后首先传到新疆的缂毛织品而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唐代晕绸锦的出现，大约也曾受到这类缂毛上的退晕织法的影响。

四、南海大门——广西合浦西汉墓

1970年7月，广西合浦炮竹厂的施工现场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正在施工的工人发现了一座古墓。后经专家清理发掘，证实这是一座西汉晚期合浦地区的郡县官吏或合浦地方豪强的墓葬。虽然墓主的棺具和人骨架都已腐朽，但大量精美的随葬器物，如制作精巧的铜器，色泽光亮的鎏金铜器，有高度艺术水平的金平脱漆器和造型美观、质地坚硬的施釉陶器等，无不体现了汉代的厚葬风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墓主颈部的玛瑙耳塞，腰部右侧的水晶、玛瑙、琥珀串珠等佩饰，都是舶来品。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吏，竟会拥有这么多精美的舶来品作为装饰，一定会让人感到吃惊，但如果了解了墓主所在地合浦所处的位置，这些疑虑也就迎刃而解了。

合浦在中国南海北部海湾，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设立郡县以后，由于与南洋诸国海上交通贸易的发达，合浦成了中国同东南亚各国友好往来和进行贸易的重要港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从徐闻、合浦出发可到达都元（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黄支（印度南部）等地。汉武帝以来常常派译使在海市上用黄金、丝绸换取东南亚一带的奇石异物，广西合浦成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大门。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很早就开始了。中国东南沿海百越民族素以航海见长，早在秦始皇进军岭南以前，岭南同南海各国商人

已经有了贸易往来。秦始皇之所以进军岭南，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获取那里的犀角、象牙、翡翠、珠玕，很明显，这些珍贵物品，并非岭南所产，而是从南海各国进口的舶来品。到了汉代，不但中国商人在番禺（今广州）同海外来华商人进行贸易，使番禺成为珠玕、犀角、象牙、玳瑁等奇珍异宝的聚散地，附近的徐闻、合浦等港口，也发展成为远航印度洋的启航港。西汉时，中国海船从雷州半岛出发，带着大批黄金和丝织品，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远航到印度洋的印度半岛南部黄支国，换取珍珠、宝石等物，然后从今斯里兰卡返航。这条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干线。中国丝绸通过这条干线传入到今日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和斯里兰卡。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绸对世界各地人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各国都派使节来中国通好，致献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和进行贸易交换。王莽摄政后，为了造成一个四海来朝的局面，特意遣使海外，于是有公元2年春黄支国自三万里外献犀牛的盛会。东汉时期这种交往更加频繁：公元84年有日南（今越南）徼外的究不事（今柬埔寨），131年有叶调国（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159年和161年有天竺（今印度），公元97年、121年和131年有掸国（今缅甸），都遣使来中国进献。掸国还献“国之珍宝”，又献“乐及幻人”（魔术师）。中国回赠金银、丝织品。记载中说这些幻人自言是海西人，即大秦人。他们很可能是从海路先到今缅甸的毛淡棉港，然后再和掸国使团一起来中国的。这是中国丝绸经越南和缅甸从海路传布到印度尼西亚、印度以至欧洲的另一途径。因为与中



玛瑙珠
广西合浦西汉墓出土



玻璃杯
广西合浦西汉墓出土

国进行丝绸交易，可以获取十倍的利润，所以处于北方陆上丝绸之路交通要道的安息国，就想垄断中国丝绸的贸易，极力阻挠罗马和中国直接往来。这样就迫使产丝的中国和消费丝绸最多的罗马，不得不努力于海上交通的开辟。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寻求海上交往的共同努力，为海上丝绸之路增添了新的活力。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从今越南入境，献上象牙、犀角、玳瑁等，这是罗马摆脱安息控制，直接和中国进行交易的最早的史料例证。广西合浦西汉古墓大量出土玛瑙、琉璃、珠玉、水晶、琥珀等陪葬品，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的重要物证。

参考书目

-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
- 王玉哲主编：《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 韩连琪：《先秦两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6年。
- 吴荣曾：《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
- 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
-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 何汉：《秦史述评》，黄山书社，1986年。
- 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
-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5年。
-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
- 田继周：《秦汉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
- 木芹：《两汉民族关系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 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 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
- 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
- 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秦汉经济思想史》，中华书局，1989年。
- 王思治：《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他》，三联书店，1980年。
- 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
- 陈玉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年。
-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编：《秦汉史论丛》，巴蜀书社，1986年。
-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5辑，法律出版社，1992年。
- 《中日关系史论文集》第1、2辑，三联书店，1987年。
-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
- 查瑞珍编：《战国秦汉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 袁仲一：《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7年。
-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

- 袁仲一、程学华：《秦陵二号铜车马》，《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一号。
-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
- 《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
- 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群联出版社，1955年。
- 山东省文管处等：《山东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57年。
- 《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出。
- 丘隆等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 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 《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
-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
- 《秦汉文化》，学林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
- 《辽宁重大文化史迹》，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
- 《汉唐壁画》，北京外文出版社，1974年。
-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
- 《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人民画报社，1989年。
- 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编：《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一卷）。

图片索引

秦始皇像	3	大瓦当	27
龙纹空心砖	4	云纹瓦当	28
秦朝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示意图	5	铁钳和铁桎	29
秦朝疆域图	6	“阡陌居贫里不更牙”、“杨民居贫大（教）”残瓦片	30
秦朝咸阳宫 1 号建筑遗址复原透视图	7	阿房宫夯土遗迹	30
方形铜量外壁所刻的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局部）	9	圆形、方形铜建筑构件	31
铜量	9	葵纹瓦当	31
陶量	10	上焦村 M7 墓葬及随葬器物平面图	32
秦始皇、秦二世双诏版（残）	10	帛书《五星占》中的“张楚”	33
八斤铜权	11	陈胜、吴广起义地点——大泽乡	34
铁权	11	陈胜、吴广起义	35
半两铜钱及钱范	12	项羽像	36
秦朝统一文字表	13	壁画《鸿门宴》（摹本）	39
小篆体十二字砖	14	鎏金银盘	41
小篆体十二字瓦当	14	刘邦像	42
直道遗迹	15	“汉并天下”瓦当	43
秦朝开辟驰道示意图	15	西汉长安城平面示意图	44
灵渠遗址	16	洛庄汉墓 35 号坑下部陶器	47
秦朝开凿灵渠示意图	16	楚王墓兵马俑	48
秦朝长城示意图	17	金鹵铜戈	49
秦朝长城遗址	17	鎏金铜弩机	50
修筑长城的工具：铁铲和铁凿	18	铁长铍及铜镞	51
坑儒谷	19	平定七国之乱示意图	52
明拓本泰山刻石残字册页	21	杨家湾兵马俑	53
琅邪刻石	22	陶仓	54
发掘中的石碑地碣石宫遗址	24	石猪	55
泗水捞鼎画像石	24	小半两铜钱	56
石碑地碣石宫中心夯土台基一角	25	《孙子兵法》竹简	57
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	26	霸陵	58

阳陵 21 号从葬坑出土情况	59	“仓天乃死”字砖	98
汉武帝像	60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	100
《仪礼·士相见》木简	61	三人奏乐铜带钩	101
“天降单于”瓦当	62	骑士铜带钩	101
铁矛及铜镞	63	牛形铜饰	102
铁戟	64	狩猎纹骨饰	103
张掖太守虎符	64	双羊铜饰	104
马踏匈奴石雕	65	透雕双驼纹铜带饰	105
《张骞通西域》壁画（摹本）	66	昭君墓	106
张骞墓	67	壁画《护乌桓校尉幕府图》（线图）	107
汉武帝五铢钱	68	珠饰	108
五铢钱铜范	69	马形铜饰	109
“齐铁官印”封泥	70	骑马武士纹铜牌	109
山阳郡铁器陶范	70	鎏金神兽铜牌饰	110
茂陵	71	铁铍、铜铍、鸣镝	111
铜斛	72	铜腕饰	111
铜石权	73	铁犁、铁铧和铁齿轮	112
铜方斗	74	越式铜鼎	113
王莽货币	75	“文帝行玺”金印	114
“国宝金匱直万”铜钱	76	提链铜壶	114
“大布黄千”铜母范	76	陶匏壶	115
“大泉五十”陶范	77	陶三足器	116
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复原图	78	四联陶罐	116
四神瓦当	79	兔形铜水盂	117
“更始”五铢铜母范	80	五铢钱纹铜鼓	117
壁画《车马出行图》	83	空首铜剑	118
壁画《属吏图》（摹本）	84	干栏式铜仓	118
壁画《庄园图》（线图）	85	陶豆、陶罐	119
壁画《牧马图》（摹本）	86	“滇王之印”金印	119
壁画《牧牛图》（摹本）	87	七牛虎耳铜贮贝器	120
绿釉陶楼	89	诅盟场面铜贮贝器	121
陶城堡	90	群猴环边铜饰	122
部曲陶俑	90	纺织场面铜贮贝器	123
绿釉陶水亭	91	贡纳场面铜贮贝器	124
蔡伦墓	93	虎背鹿铜扣饰	125
铁项钳、铁脚镣	97	牛虎斗铜扣饰	125

吊人铜矛	126	“长寿绣”黄绢	156
铜啄	127	铜质印花凸版	157
三人一牛铜扣饰	127	马蹄形漆盒	158
鎏金四人舞俑铜扣饰	128	锥画漆奁	158
铜枕	130	云纹漆匜	159
羽人纹铜鼓	130	双层九子漆奁	160
毡帽、牛皮靴	131	粉彩双层长方形漆奁盒	161
“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被	132	彩绘青龙、白虎、朱雀纹陶壶	162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质护膊	133	浮雕兽纹釉陶壶	163
羊首铜刀	134	双兽耳青釉硬陶甗	164
于阗汉佉二体钱	135	绿釉陶壶	164
坩埚	136	波纹双系青釉硬陶壶	165
铁耙	139	青瓷四系罐	165
大铁铎和装有辩土的铁铎	139	青瓷甗	166
持锄陶俑残片	140	青瓷盏	166
耒车复原图	140	盐场画像砖	167
执锸农夫陶俑	141	酿酒画像砖	168
牛耕画像石拓片(局部)	142	湖北云梦大坟头6号西汉墓穿深衣的女子形象	169
带轱辘水槽的陶井	143	素纱禅衣	169
石田塘模型	143	“信期绣”绢手套	170
龙骨水车(模型)	144	“信期绣”茶黄罗绮锦袍	170
彩釉陶鸡笼	145	朱红罗绮绵袍	171
陶猪圈	146	锦鞋	171
鎏金铜马	147	汉代画像石上着短襦合裆裤的武士形象	172
铜奔马	148	河南新野张楼村汉代画像石上着袿衣的舞蹈者	172
收获渔猎画像砖	149	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墓画像石上着檐褕的人物形象	172
桐园画像砖	150	“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袜	173
冶铁画像石	151	宴享画像石拓片	174
“永初”纪年铁刀	151	舂米画像砖	174
霸陵过氏阼	152	铜染炉	176
排囊(模型)	152	庖厨画像砖	177
水排(模型)	153	献食陶俑 庖厨陶俑	177
鎏金鸟兽纹铜尊	153	汉代画像石上的“烤肉串”图	178
纺织画像石(拓片)	154	庖厨图画像石(拓片)	179
脚踏纺织机复原图	155	铜烤炉与铁叉	179
印花敷彩纱	156	长沙王后家漆耳杯	180

鸟篆文铜壶	181	帛书信札	209
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182	汉代画像石上的簪笔人物	210
陶灶	183	毛笔	210
陶楼	184	石砚及研石	211
市楼画像砖	185	松塔形墨	211
三合式陶屋	186	漆盒石砚	211
宅院画像砖	186	错金铁书刀	212
陶庭院	187	日晷（左）及使用示意图（下）	213
鎏金熊形铜镇	188	沉箭式铜漏壶	214
嵌贝鹿形铜镇	188	灵台遗址	214
云纹漆案及杯盘	189	地动仪模型及剖面图	215
彩绘铜雁鱼灯	190	长沙国南部驻军图	216
十二枝铁灯	191	纸地图	217
长信宫灯	192	长沙国南郊地形图	217
鎏金铜熏炉	193	帛书《五十二病方》	218
鎏金鎏银竹节铜博山炉	194	“医工”铜盆	218
鎏金“中国大宁”铜镜	195	铜药臼	219
错金五兽纹铁镜	196	银漏斗（左）和长流银匱（右）	219
“始建国二年”铜镜	196	金医针	220
制车轮画像石	197	针灸画像石拓片（局部）	220
栈车	198	针灸木人	221
輜车画像砖	199	张仲景像	221
陶马车	199	华佗像	222
铜辇车	200	帛画《导引图》（临摹）	223
记里鼓车模型	201	《神乌赋》竹简	224
四川成都扬子山画像砖上的轺车形象	202	司马迁墓	225
独轮车模型	202	司马迁像	226
广州秦代造船工场遗址	203	司马迁祠	226
陶船	203	乐府铜钟	227
木船（原大模型）	204	瑟	228
十六桨船（原大模型）	205	奏乐木俑	228
扶风纸	206	彩绘陶舞俑	229
金关纸	207	玉舞人	229
马圈湾纸	207	观伎画像砖	230
蔡伦像	208	陶舞俑	230
旱滩坡带字纸	208	平索戏车画像砖	231

击鼓说唱俑（左）及其面部特写（局部）（上）	233	徐福像	246
汉代画像石上的跳丸飞剑叠案图	234	徐福东渡事迹说明牌	247
陶奁	234	贵霜货币	248
绿釉陶戏楼及局部（左）	235	汉代中外交通示意图	248
博戏	236	蓝白印花棉布	249
绿釉陶投壶	237	广州出土的蚀花珠	250
投壶（画像石拓片）	237	银盒	250
绿釉陶六博俑	238	金花泡	251
朱书陶罐	238	碧琉璃杯	252
符篆木牍	239	蓝琉璃碗	253
白马寺	239	古希腊文铅饼	253
佉卢文井栏杆残石	240	水晶串饰	254
孔望山东汉摩崖造像	241	玛瑙珠	255
摇钱树上的佛像	243	玻璃杯	255
“徐福上陆地”木制标柱	245		

后记

1997年4月，我从国家文物局调动工作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任陈列部主任。时值俞伟超馆长主持的中国通史陈列（隋唐至明清部分）修改后重新布展。同年9月，历时九年的中国通史陈列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以崭新面貌接待观众。在修改中国通史陈列的研究探讨过程中，俞伟超馆长、杜耀西副馆长等都有在理论研究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编一套书的想法，并积极支持我和陈列部的业务人员着手去做。

这个项目得到陈列部同仁的积极参与。从1997年下半年起开始启动，研究总体体例、编撰细则以及确定每卷撰稿人，接着讨论试写的样章、样条和部分初稿。在这一阶段，王冠英先生、安家瑗女士等给予很大的帮助。1998年先后担任副馆长的孔祥星先生和朱凤瀚先生都竭力支持这一项目。

2000年，朱凤瀚先生担任馆长后，继续把该项目作为馆里的重要任务安排。朱凤瀚先生作为编委会主任和主要审稿人，对全书从总体体例到各卷具体表述都付出了极大心血。展览部（原陈列部与美工部合并）主任董琦先生负责全书各卷的统筹协调，王永红女士承担了执行编务工作。该套书的编撰工作也不再局限于一个部门，成为全馆学术与业务协作的成果。

2003年2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部《文物中国史》也就有幸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主编的第一套多卷本古代文物与历史著作问世。



在开始构思这套书时，主要考虑到依托中国通史陈列的各位主创人员，将这套书的定位设计为：“以《中国通史陈列》的内容为主线，侧重反映中国远古以降的物质文明史，突出介绍历代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作为《中国通史陈列》成果的深化和延伸，充分体现学术界几十年来对历史文化遗产综合研究的学术水准，兼顾知识性、通俗性，以物带史，物史结合，全面介绍我国目前的文物考古和历史学科有关最新成果。”全书以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从原始社会到晚清，分为八卷。

几年来，各卷的作者为了实现本书的定位，作了大量的探索，特别是先动笔的前四卷更是数易其稿。有些作者甚至试写了相当篇幅的不同风格的样稿，不惜自我否定、推翻重来，为最后全书基本统一体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了保证本书的学术质量，各卷又延聘了专家学者审稿。他们严谨的学风和细致的校阅，为本书增色不少。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一直在研讨如何处理下列问题：

首先，《文物中国史》也是一种中国通史类著作，历史框架的完整性是必须的，例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不应该疏漏和缺席。但是作为博物馆编撰的中国史，主要特点表现在以历史文物为切入点和铺叙基础。难点在于，即使是中国历史文物藏品最丰富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使本书还借用了许多全国范围考古重要发现的资料，但文物相对于历史，总是极为残缺的、片段的。各位作者只能在书中粗略勾勒时代背景和演变线索，然后以物质文明史为主线，利用已有的文物，尽可能举一反三，展开描述，以求呈现远为宏大和复杂的历史场景。

其次，学术界最近的研究成果和各卷的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是本书的学术基础。正像我们在讨论新版中国历史陈列大纲时所表达的，要兼顾学术观点的前沿性



和稳定性。对于尚在争论的热点问题，应该清晰地表述主要的不同论点和作者的态度，供读者参考。但是本书的定位又使得上述表述局限于介绍性、结论性的文字，不过多进行考据和反映推理过程。相反，我们希望用生动活泼的、通俗易懂的笔调把学者思维所得向广大非专业读者娓娓道来。在学术与普及之间，这显然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分寸。

第三个问题是全书八卷，涉及十多位作者，前后行文的贯气与不同风格的个性如何协调。大家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全书应该在体例和内容的基本要求方面保持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在叙事方式、语言组织等方面，针对不同时期历史与文物的差异，鼓励作者展现自己的才华，寻找最贴切的格调，在浑然一体中各有千秋、相得益彰。

最后应该特别感谢出版社的朋友们。为了此书的问世，他们也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辛苦共尝，自然值得一同庆贺。

李季

二〇〇三年八月六日

北京 中国国家博物馆

